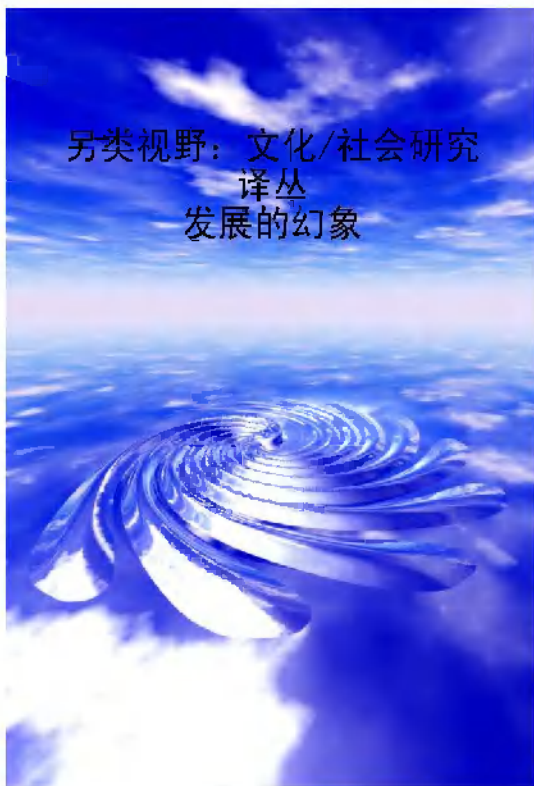


另类视野：文化/社会研究
译丛
发展的幻象



八 另类视野
网络社会与理论

发展的幻象

Developmental Illusions

许宝强 汪 晖 选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3 0002 3135 1

02416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展的幻象 / 许宝强, 汪晖选编.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9

(另类视野: 文化 / 社会研究译丛)

ISBN 7-80109-390-9

I. 发…

II. ①许… ②汪…

III. 发展经济学 - 研究 - 文集

IV. F06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5084 号

发展的幻象

许宝强 汪晖选编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 66117130 (编辑部) 66171396 (发行部)

E-mail: cctp_edit@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北京京鲁排印部 (63044503)

印 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13.625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另类视野：文化/社会研究译丛

编委成员

汪晖 宋伟杰 袁伟 许兆麟 孙歌
肖宝强 陈顺馨 刘健芝 戴锦华 罗永生

编辑顾问

Giuseppe Arrigh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USA

Toni Barlow

Women Stud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SA

Chen Kuan-Hsing

The Centre for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aiwan*

Muro Ichihiko

East Asia Resource Centre, Gower Institute

Mushakoji Kinoko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Meiji Gakuin University,
Yokohama, Japan*

Meaghan Morris

Fellow of the 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

Ashis Nandy

*Director,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New Delhi, India*

Seehy Prasertsoi

Faculty of Economic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Thailand

Sherry Simon

*French Department and Humanities Doctoral Program,
Concordia University, Canada*

Tejaswini Niranjan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Bangalore, India

Immanuel Wallerstein

*Fernand Braudel Center and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UNY - Binghamton, USA*

前言：发展、知识、权力

◆ 许宝强

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目标,依据不同的手段,例如高科技、工业化、国家干预或市场机制,产生出不同版本的发展主义学说——自由市场、外向型经济、依附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或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等等。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各类发展主义学说都没有(或没有能力)反思一系列类似沃勒斯坦(I. Wallerstein 本书第一章)所提出的基本问题:发展是什么?究竟为谁或为什么要发展?什么在发展?经济增长是否就等于改善人们的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社群所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对弱势群体(如原住民和女性)的影响又如何?除了“现代化”和“工业化”以外,有没有另类的发展(或“不发展”)轨道,能更直接改善人们的生活?谋求发展有什么政治含义?这些都是发展主义忽略了的重要课题。收编于本文集的文章所要探讨的,也正是这些课题。

对发展主义的批判并不是新鲜的事物。质疑“现代化”或“工业化”代表了人类的进步,古已有之,其中最受注意的声音,恐怕是马克思主义。然而,尽管马克思主义提出剥削和劳动异化等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概念,并据此要求平等和解放人类的社

会主义,它并没有否定“工业化”或“经济增长”本身是社会进步的必要前提。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虽然大力抨击发达地区(或中心地区)对欠发达地区(边缘地区)的剥削,使后者不能发展,但在根本上它并没有否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相反,不论是提出脱钩(dis-linking)或依附发展,依附理论学派在关注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不平等的同时,并没有质疑如何使欠发展地区(边缘地区)成功地增长经济财富这类议题(参阅 Amin 1990, Evans 1979, Cardoso and Faletto 1979)。

依附理论于80年代日渐式微,其中一个原因恐怕与所谓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迹”有关。尽管东亚四小龙均在颇大程度依附美国的市场和日本的技术,但它们在80年代的经济增长却差不多是全球最快的。为了解释这一个现象,而又不愿掉进自由经济学的窠臼,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所谓“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的概念,认为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是政府有效干预的结果,而非自由市场的功绩(Amsden 1989, Wade 1990)。然而,这种对自由市场发展学说的批评,基本上仍是把经济增长等同发展,并以追求有效的增长方法为最核心的关注点,因此可以说还是陷于发展主义的范式之中。

经济增长的迷思

发展主义一个重要信念,便是认为经济增长比不增长好,快速增长又比缓慢增长好。这种将“发展”等同“经济增长”,再将“经济增长”等同美好生活的信念,本是特定的历史产物(见沃勒斯坦文章),但却被看作为普泛的真理,支撑着整套发展主义的话语,将丰富多元的人类需求和自然生态,约化成单一的向度,仅以经济指标

来衡量。

用来量度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等指标。严格来说,这些经济指标均以货币作为量度单位,因此反映的只是一个被界定的经济体内年度的货币流通总量。不过,这些指标却经常被看作能同时反映“福利”、“生活质量”和“进步”的程度,导致不少政府甚至会用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总值增长作为发展计划的主要目标。这种理解,构成了偏好“经济增长”的发展主义话语的重要基础。

然而,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究竟涵骨什么?反映了哪些经济方面?又掩盖了哪些生计活动?它能反映“福利”和“生活质量”吗?

这些指标是根据某年度内生产出来的货品和劳务以货币衡量的价值,要通过贸易流程,才可以被汇总算入国民生产总值之内。域此,那些没有纳入货币流通过程,从而未能被货币衡量价值的产出及劳务,例如主要由女性负责的家务和育婴工作,或是自给自足的农业劳动,又或是朋友、亲属之间的互惠活动,或是志愿组织的服务等,均没有被计算在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之内,因此家庭妇女、农民和志愿工作者等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往往被低估了。

一个与此相关的有趣现象是,西欧 18—19 世纪工业化的过程当中,大量妇女由农村或家庭走向社会,进入劳动力市场;一部分则进了工厂,但更多的妇女则投身服务业。以 19 世纪中期的英国为例,约四成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妇女从事女佣工作(Tilly and Scott 1989:68-69)。换句话说,妇女由从事没有工资的家务劳动,转到收取工资的女佣岗位,提供的虽然也是家务劳动,然而这转换却奇迹般地使国民生产总值有所增加。

19 世纪的英国并不是惟一的例外,战后美、加、澳、英等地,随着世界经济急剧膨胀,大量妇女投身劳动力市场。女性进入市场

工作的比率由 1950 年的 25%~40% 上升至 1990 年的 60%~68%，其中已婚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比率则由 1950 年的 10%~20% 上升至 1990 年的 45%~60% (Snooks 1994a:15)。

国民生产总值在统计了妇女加入劳动力市场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之余，并没有扣除她们因而减少在家庭或农村的非工资劳务时间，因此高估了妇女就业所带来的好处。事实上，妇女的非工资劳务对社群的贡献非同小可，据斯努克斯 (Snooks 1994a:17) 估算，澳洲在 1850—1990 年的家庭非工资劳务占澳洲总体社群收入 (市场工资总额加家庭非工资劳务) 的 35.8%，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更估算非工资劳务所生产的价值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 (James 1994:173)。

这引起了另一严重的问题，就是计算国民经济增长时，由于工业化和市场化导致非货币经济向货币经济转移，结果是原来在非货币经济中没有被算入国民生产总值的产出或劳务，在经济货币化后却被算入指标之内，从而高估了工业化或市场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这种在统计上对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偏好，不单对欧洲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增长”造成错觉 (见下文)，在当代第三世界国家 (包括中国) 的工业化或市场化的过程中，由于仍然采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发展程度，结果也是高估了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增长”。

此外，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总值是以总数或平均数算出，因此并不能准确反映不同地区或相同地区内不同人口之间的不同福利。例如目前一些世界性组织在比较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经济状况时，只能将不同国家的货币折算为一种通用货币 (通常是美元) 才可进行比较，但在折算过程中所采用的汇率，却往往会造成对某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高估”或“低估”的现象。有人曾计算，1960 年至 1984 年间，发达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差距

扩大,有三分之二是由汇率的实际变动所造成的(Wood 1991)。换句话说,实际汇率的变动往往能在很大程度改变不同地区和家之间以货币量度的收入分配状况。此外,在一些收入分配极不平等的地区或国家之内,倘若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总值的增长与两极分化同时出现,那么对大部分贫困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便很可能没有多大意义。¹¹

除了上述的问题以外,采用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作为计划目标,亦会鼓励较贵重但却不一定是必需的产品的制造。相反,由于技术进步而导致产品价格下跌,却会使国民生产总值减少。因为较贵重的产品只有富人才有能力消费,而产品价格下跌却对穷人有益,因此这些指标明显带着不平等的偏见。

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只度量当年产出的流量(flows),但对拥有固存财富(stocks)——包括人工的和自然的——所带来的福利排除在计算以外。举例来说,若我们今年购入一部新的电视机,但同时把旧的抛掉,结果是新购的电视机的价值被加入国民生产总值内,但被抛掉的旧电视机的价值却没有在计算中扣除,结果是高估了人民物质福利的提高。

更清楚的例子是对自然财富(例如空气、饮用水、森林等)的计算。在把森林的树木制造成家具的过程中,家具的产出是算进国民生产总值内的,但生产过程中对森林的破坏(大量伐树)、对饮用水的污染(如制作家具的油漆等化学品被排放在河流中)或对空气的污染(减少林木将减少对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吸收),却没有在总值中扣除。更奇怪的是,由于自然环境的破坏,人们不能再免费地享用清新空气和饮用清洁的水,只好到超级市场购买“蒸馏水”或购买飞机票到夏威夷享受清新空气,结果进一步增加了国民生产总值;又或是为了把被污染了的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过来,只有购买昂贵的设备以清除环境污染,这也会增加国民生产总值

的数值。换句话说,破坏自然的过程为国民生产总值提供了两次增值的机会。

同样的逻辑亦可应用在人类环境的计算之上。工人在工作过程中(特别是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工作)也会像机器般“耗损”(depreciate)——视力衰退、消化系统破坏、思想退化等,但这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一样,也不会国民生产总值中扣除。不过,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些“耗损”而兴建的医院和增聘的医疗人员,则被算进国民生产总值之中,结果人类健康的破坏也为国民生产总值提供了两次增值的机会(参阅 Anderson 1991:21-28)。

塞林斯(M. Sahlins 本书第二章)更进一步指出,所谓资产是财富,越多便越好,这种观点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并不适用于原初社会的采猎部族。当采猎地附近的动植物资源差不多耗尽时,采猎户必然迁移。换句话说,游牧是采猎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只有不断流动,才能维持生计。然而高流动性却与积累资产不能并立。对终日迁移的采猎部族来说,资产只会变成负担。一方面,采猎部族面对的物质压力相对地轻,他们需要的生活资料,大部分能在居住的山林草野之中随手获得,当食物(野兽)或水资源渐竭时,只要转移到另一处地方,问题便能解决。因此,对采猎者来说,并没有必要建立库存,积谷防饥;另一方面,不断迁移使携带资产成为吃力不讨好的苦差,轻装上阵才能令采猎户的转移流动舒适方便。为了使迁徙过程顺利,部分采猎户更会刻意毁坏其所“拥有”的大型“资产”,甚至把不能移动的老弱伤病“人道毁灭”。对采猎部族来说,人生的终极目标绝非不断积累物质财富,而是得到不用背负沉重包袱的流动自由。

然而,原初社会的采猎民族的物质生活是否便十分匮乏,处于绝对贫困的水深火热之中?若从人的欲望无限,但却受有限资源制约的现代经济学逻辑出发,答案才会是“对”的。不过,欲望(特

别是对物质的需求)无限只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建构,并非亘古不变的规律,因此欲望的满足绝不必要透过不断拥有物质财富来实现;减少对物质资财的欲求,往往能使欲望容易满足,而后者正是原初采猎社会的经济逻辑。循此思路,我们甚至可以说,资产不断积累的社会才是制造贫穷的源头:若贫穷的意思是物质资财的拥有并不能满足个人的欲望,那么强调(甚至鼓励)欲望无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不无时无刻制造贫穷的。相反,原初社会的部族民虽然没有什么固定的物质资产,但他们并不贫穷,因为在他们特殊的社会背景(采猎经济)下产生的对物质的欲求,对他们来说是十分容易获得满足的。在一个不以积累资产多寡来确定社会地位的原初社群,“贫穷”自有不同的意义。换句话说,以无穷欲望和物质资财匮乏来衡量的“贫穷”,只是现代文明的产物。

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只是从数量上计算福利,但“质”的改变,例如宁静愉快的心境,却在很大程度上未得到反映。国民生产总值这些指标没有把工作能否为人们提供愉快的感觉考虑在内,因此倘若人们因为一些较苦闷的工作职位有较高薪酬而转工,虽然国民生产总值因而会提高,但人们的生活质量却未必会改善。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这些指标对闲暇(leisure)的处理。当我们能够以较少的工作时间来生产出与以往同样多的产品或劳务时(这可能是由于技术进步所致),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能反映多出了的闲暇时间所带来的好处;但假若我们把多出来的闲暇时间用来生产更多的产品或劳务时,却会引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从而好像“提高”了福利,反映了这种统计方法对闲暇的歧视(Anderson 1991:29)。事实上,正如塞林斯指出,原初社会虽然没有现代工商业社会的物质消费品,但活在原初社会的人却不用像在工商业社会一样要长时间工作,因此闲暇时间较多,特别是一些居于拥有丰富资源的森林的采猎民族,往往一天工作三至五小时便足够整天

的食用,剩下的时间,除了休息和睡眠以外,还有很多可以用作社交和谈天等现代人梦寐以求的生活,因此,采猎民的生活质量不见得比现代工商业社会的人为差。

荒谬的是,在“闲暇”备受忽视的同时,“闲暇产业”却在当代蓬勃发展。高尔夫球场,迪斯尼乐园式的大型游乐场等等,像雨后春笋般涌现,为现代(富)人解决他们的“闲暇”问题。然而,这些能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的“闲暇产业”,却背负着十分沉重的社会和生态代价^[2]。

超英赶美的幻象

发展主义另一个迷思是:所谓“落后”地区若能采取有效的方法,是可以慢慢追上发达国家的。而有关“落后”地区发展的研究,主要是论争什么才是“有效的方法”。新古典经济学自然开出了自由市场、私有化和出口导向的药方;社会主义国家则以计划经济作为发展的启动器;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则倡议由“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策略性地扶助重点工业。然而不论是哪一个派别,多数都不反对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必要(甚至是充分)的条件。

将工业化(或所谓生产性产业、科技产业)置于经济增长以至发展的中心位置,是各类发展主义话语的通病,这种生产/工业/科技中心论,基本上忘记了经济活动其实是包括了生产、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或使用)等环节,而这些环节都不仅仅是纯经济的活动,当中包含了各类文化、社会和政治因素。脱离了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等文化社群活动和政治活动,纯生产或科技本身是无法促进经济发展的,或更确切地说,从来就没有纯生产或纯科技的活动。

60年代到90年代中的东亚高速增长,为这种产业/科技中心论提供了新的养分,并成为颇具影响力的“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学说的确凿依据,为新一轮的发展主义信念打了补丁。不过,过去十多年东亚地区较快的经济增长,其实并非是由于政府以干预金融市场来集中庞大的资金对工业作高强度投资,以达到所谓“持续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而导致的,而更多是与当地的大企业和政府垄断或操控了生产、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等环节有关。以日本的对外投资为例,1981年至1994年间,投资于工业的总值约是1150多亿美元,而投放在服务、金融、保险和商业的总值,则达1760多亿美元,若加上运输、地产、农业和矿业等非工业部门,非工业的对外投资总值差不多是工业投资的三倍;而这些地区近日陷入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也并非所谓品质圈和看板管理等技术受到限制,更主要是由于这种垄断结构造成日益严重的贫富不均,削弱了大部分人口的消费能力^[3],从而导致消费不足所引起的生产“过剩”危机。

以备受议论的日本经济为例,强调工业和生产领域的话语,只把讨论的焦点放在高科技之上,完全漠视日本的大企业集团(特别是其中的商社)在战后长时期获利和高速扩张,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它们所建立的广泛贸易网和与政权的良好关系,从而得以垄断或部分垄断交换、流通和消费等市场环节,包括货运、保险、金融服务、资讯、广告、百货连锁店等。掌握了这些交易和政治网络,日本大企业便能够控制工业产品和各类劳务的供求渠道。

日本的商社是推动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企业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商社在80年代初直接的或与其他企业合作的对外投资中,超过一半是以少数所有权(minority ownership)的形式出现。换句话说,日本商社在外国的合资企业中,通常占有不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股权(大部分更是低于百分之三十),而外国的政府或企业

才是最大的股东。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难理解。除了受到当地政府的投资法律(特别是想保护本土工业的第三世界国家)的限制以外,日本商社本身亦主动以不拥有多数所有权的身份与外国企业合作,因为全资拥有虽或可较能保障产权,但却同时会成为某种负担,特别是在世界经济不确定的情况下,“绑在产业上”便意味着资本的流动性减低,风险增大。相反,作为拥有少数产权的合资者,日本商社能够较灵活地利用它们的投资,一方面可减少初始的投资成本,另一方面亦可降低日后营运所面对的经济和政治风险。

再者,放弃全权拥有合资企业,并没有导致日本商社的控制和管理权力下降;事实上,由于日本商社的经营主要以贸易为主,关心的是商品的流动(flow)而非固定资产(stock)或实际生产,所以它们情愿把资金投放在建立广泛的贸易网络上,特别是在重要的世界经贸金融中心(如纽约、巴黎、伦敦、香港等)建立各种“商业基础设施”,包括仓储、海运、保险、金融服务、技术资讯等,以控制世界市场。只要能掌握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的供求渠道和资讯,以及生产者所需的金融和商业服务,日本商社便不难控制合资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方向,并能获得远比生产/工业活动为高的利润(参阅 Kojima and Ozawa 1984)。

20世纪下半叶的日本并非特例。回顾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可以看到领先者往往在一些环节(不一定是工业)的技术或组织中占有优势,因此获得垄断的位置。而所谓发展竞赛,就正如沃勒斯坦所言,只是努力“创造或保持自己的垄断优势,或破坏别人的垄断优势”。各种发展策略:18世纪的重商主义、19世纪的工业化、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创新科技等等,基本上旨在利用政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企图削弱对手的竞争能力,以确保自身的垄断位置。

对生产领域的迷信,很可能是源于对 18—19 世纪欧洲(主要是英国)的工业革命的误解,以为工业(技术)革命确曾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事实上,英国工业革命对经济增长(以人均国民收入计算)的贡献并不十分大。斯努克斯指出,与过去的经济增长率比较,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增长并不突出。根据他的估算,在 1086 年至 1170 年的前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 1801—1831 年工业革命高峰期基本上差不多,而在 16 世纪上半叶的增长率,更是工业革命高峰期的三倍(Snooks 1994b:16)。

此外,牛津大学经济史范斯坦教授(C. H. Feinstein)最近重新估算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中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他的研究指出,以往对工业革命时期工人生活水平的乐观估算,存在不少问题。他综合了一些新的资料后指出,在 1778—1782 至 1853—1857 这 75 年间,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少于百分之三十,而在 1830 年以前的 50 年间,工人的平均工资基本上没有什么实际增长。人口增长导致工人需供养的人数增加,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城市化所导致的居住环境变坏和公共卫生恶化,再加上社会福利补贴的减少,使得工人在工业革命这 75 年间的实际收入增长,可能只有百分之十到十五。换句话说,工业革命并没有大幅地为大多数英国工人带来美好的物质生活。而 1810 年间此起彼伏的工人抗争运动,正好从侧面反映工业革命对工人的负面影响(Feinstein 1998)。

不论是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均以 19 世纪英国作为模型,而看不到更长时段(自 16 世纪甚至更早)和更大范围的资本主义历史,因而看不到 18—19 世纪英国的工业化,只是资本主义历史长周期过程中,资本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把资金投放到工业的一个结果。而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由于世界性贫富差距的

扩大,造成消费不足,再导致工业生产“过剩”,进入了另一阶段的经济长周期低谷,对低收入国家来说,工业化不仅不是增长的灵丹妙药,更可能掉进发达地区把生产过剩和环境污染的危机转嫁给贫困地区的陷阱。

低、中收入地区在60—70年代的工业化浪潮,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因工资等成本上升,导致利润率下降而将工业外移。这些新兴工业国因此被迫要在一段时期内互相竞争用作工业投入的资源,使工业生产成本上升,同时又过量生产相类的产品,使它们在世界市场中的价格下调,造成了工业产品的利润下降。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则把资金投放在金融资讯等第三产业,通过控制新兴工业国千方百计要争夺的资金,获取厚利。

伴随着低、中收入地区在60—70年代工业化的,也正是发达地区(特别美国和日本)的污染性工业的外移。据世界银行两位学者的一项研究指出,自1960年起,欧、美、日等地区的污染性工业占工业的份额持续减少。相反,拉美和亚洲等低、中收入国的污染性工业份额则稳定地上升(Mani and Wheeler 1998:231-233)⁽⁴⁾。

因此,将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紧密联系起来,其实是一个重大的误会,正如将富有国家称为七大“工业国”,基本上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这些所谓“工业国”其实已越来越非工业化,越来越依赖金融贸易等第三产业。相反,低、中收入国家则越来越工业化。然而,正如塞林斯、沃勒斯坦和阿里基(G. Arrighi)的文章分别指出,世界范围内的收入不均程度,不仅没有随第三世界地区的工业化而缩小,相反,在战后至今的数十年间,甚至是在过去400年内,更有扩大的趋势。在1997年,富裕国家约占全球两成的人口,共消费掉全球八成六的商品和劳务;而最贫困的两成人口则只享受到全球百分之一点三的消费(联合国《1998年人类发展研究报告》)。

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如80—90年代的所谓亚洲四小龙,不论

采用自由经济的出口导向,或国家干预的进口替代式工业化;也不论是采取依附论所倡议的与世界经济脱钩或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以发展工业为目标的低收入地区的发展主义式的追求,大多数以失败告终。事实上,工业化只是在某特定的历史时段,对特定的群体,如发达地区的工业资本家有利,而往往并不是低、中收入国家用来超英赶美的有效手段。只有那些在资本主义历史周期中,置身于良好的地缘政治位置的地区,才会获得资金的青睐,经济才会较快速地增长。然而这些幸运地区的人口,只能占全球人口的极少数,因为它们的富裕,是建立在对稀有资源的垄断和对大多数人口的排拒剥削之上才得以实现。这是维持哈罗德(Roy Harrod)所谓的寡头财富(oligarchic wealth)的重要机制(见阿里基文章)。换句话说,少数人的富裕是建筑在大部分人的贫困之上,无论低、中收入地区的人民如何努力,也不可能每人都享有美式的“富裕”生活水平。事实上,正如沃勒斯坦所言,在1750至1950年发展了的只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表面“发展了”的国家,其实只是独享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的经济成果,而这种享占,也不是个别国家的政策所导致的,而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剩余积累从中心溶化开来的历史效果。因此,落后地区的“赶上”,只能意味着别的地区的资本积累衰减,损害他人的经济福利。沃勒斯坦更预期资本主义世界的扩张已差不多到达极限,难以为继。

发展主义者将发展过程中包括的种种复杂的文化、社群以至偶然性因素,硬套为技术和生产率的提高、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和高强度投资等问题,只是在强化一种十分褊狭的习见;而自由主义、计划经济和“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学说之间的论争,由于将经济增长、工业化等视作理所当然,因此扮演着维护发展主义范式的共犯角色(见班努里文章),无法开拓新的话语空间。

“落后”的第三世界/边缘的建构与规管

对于西方以外的所谓贫穷地区,发展主义话语给予不同的命名:“第三世界”、“落后国家”、“发展中地区”、“低度发展地区”、“边缘地带”等等。尽管低度发展和边缘等概念源自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等批判现代化理论的学说,但对于大部分应用者来说,它们大抵与“第三世界”或“落后国家”分别不大,都是同一的、等待发展的地区,而发展与否,基本上是以单一的目标——工业文明和政治军事力量——来衡量。

埃斯科巴(A. Escobar)的文章仔细地梳理西方发展主义话语如何建构“第三世界”或“低度发展地区”等概念,并分析这种话语是如何运作的。借助福柯对知识、真理和权力的分析,埃斯科巴追溯发展主义话语的历史系谱,特别是发展经济学等学科的专业化过程。

埃斯科巴指出,发展主义话语自1945—1955年在西方出现和形成,与殖民帝国解体和共产主义冒升有关,在这个历史语境之下,西方为了界定自身的优越地位,建构出“第三世界”和“低度发展”等非西方地区的落后形象,提出要追上西方工业文明这单一目标,需要采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近的分类系统和技术,于是所谓穷国的人口、资本积累过程、天然资源、农业和贸易、行政管理以至文化价值,都成了无休止的规划干预对象;发展成为一种专业,发展经济学成为专业中的专业;引入外国技术、资金和投资成为发展的教条;而负责训练发展专业的则是欧美的大学和国际机构,不仅培养“第一世界”的发展专家,更为来自“第三世界”的“学生”提供各种建基于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真理”。

发展主义话语透过标签的生产,将纷杂多样的农民简化为“小

农”、“文盲农民”等生产因素，变成为可被替换和应该被管理、教育和规训的对象。这种充满现代化偏见的话语，在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协助之下，大规模地引入“第三世界”，强化了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与之相关的生产和权力系统。

埃斯科巴认为，对发展主义的最有力的批判，应该直接探讨发展与知识权力的关系，并将对发展主义的批判，与当地(local)的各种抗争联系起来。

尽管没有像埃斯科巴一样借用福柯对知识权力的分析，但透过仔细分析发展经济学家如何扭曲简化边缘地区开采业经济的具体研究，和探讨这种已简化了的发展经济模型如何进一步为政治家任意引用，邦克(Stephen Bunker)的文章对埃斯科巴的分析作出了紧密的呼应。

邦克指出，影响甚大的经济学家赫希曼(A. O. Hirschman)、诺思(D. North)和沃特金斯(M. Watkins)所建构的发展经济学模型，基本上是约化自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rold Innis)对开采业经济的详尽历史研究。英尼斯笔下的开采业经济，本是复杂多样、跟工业经济十分不同的经济体系，在极大程度上受制于地质、水文及生物因素，因此开采业之间的差异远大于工业经济之间的差异，故不能将开采业经济普遍化。然而，到了赫希曼、诺思和沃特金斯等人的手中，受独特空间限制的开采业成为了千篇一律的经济体系，当中纷杂多样的被开采物被化约为一种生产因素的变量(所谓原材料)，完全可被替代，空间和地形则被化约为只是关于运输费用的问题。开采业与工业经济的惟一分别，就是能否带动其他经济部门的增长，或所谓不同程度的连锁效应。

这种机械化的普泛理论，不仅将部门与空间混淆，更以经济学模型的貌似精确的措辞，建立一种科学的外观，再加上当中对地区增长的乐观承诺，吸收了不少政客和知识分子，使他们接受这种理

论。对这种发展模式持批判态度的反对者,被打成为顽固的反进步分子,或只顾地方特殊利益、不顾国家大局的保守力量,因而他们的声音很快就遭到淹没而被遗忘。

由于意义含糊和过于复杂,加上学科规范恪守的维护范式(paradigm maintenance)机制——发展模式本身超然于争辩以外,只容许对模型作出枝节性的批评——发展主义经济模型成为了机会主义诠释的温床,特别容易为政客利用。邦克以巴西亚马逊地区的开采经济发展计划为例,说明当地的政客和计划工作者如何运用这些早已被发展经济学家扭曲简化了的模型,为他们的宏图大计辩护和鸣锣开道。

班努里(T. Banuri)的文章从一个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进一步梳理发展主义的维护范式机制。所谓维护范式,就是在面对外来的批判时的主流范式,例如现代化理论,另外发展出一种不痛不痒的内部批评,或把问题转化,磨掉来自外部(例如生态保护运动)的批判力量。将现代化发展引申出来的问题,简化为纯物质利益分配,包括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的问题,例如把“自由”、“人的解放”等诉求转译成公平收入分配和扶贫等人类基本需要,正是一种维护范式的策略,因为强调收入分配、贫困和基本需求,就只能针对发展的后果,而非发展的过程和方式本身,换句话说,还容得下现代化发展模式自我修正。

班努里仔细分析了主流发展话语维护范式的几个案例。例如,面对兴起于60—70年代,对现代化理论强烈批判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主流话语的回应,一方面是强调天然的不平等,例如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禀赋的差异,以消解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所强调的中心地区剥削边缘地区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提出要强化边缘地区政权的政治经济实力,以改变依附的局面,或导致依附发展的出现,这也就是晚近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的说法。而

对于来自生态保护运动的批评,主流发展话语的回应,是把现代化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定义为管理主义的问题,是能够透过加强政府干预,或以市场动作便可解决的问题。换句话说,也是一种强调后果而非过程的策略。

针对主流发展话语的维护范式策略,班努里展开了更彻底的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批判。班努里采取的,是对现代化发展模式根本拒斥的立场。他认为原住民在西方文化入侵以前的生存状况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引入,却迫使原住民要分散精力,以应付和抵抗外来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宰制,而不能集中精力于正面追求他们自身定义的社群文化目标,这是现代化发展模式最大的祸害。他认为只要让原住民自己决定如何发展,尽管他们也会犯错,但与引入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专家不一样,原住民不会不断合理化他们自身的错误,而是会从错误中学习。毕竟,原住民与现代发展模式的专家最不同之处,是后者就像追逐野兔的猎狗,它的奔跑只求一顿晚餐;但原住民却是野兔,在生死线上求存奔路。

邦克、埃斯科巴和班努里的分析,都直接指向了有关发展的知识的生产 and 权力运作,如何使反对者不说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主义话语的普泛性分析方法、简化的模型和带乐观取向的修辞技巧,往往比强调历史特殊性的当地分析——其批判性质通常不会给出乐观的许诺——更有政治动员力。而对发展主义作出批判的当地知识分子,在既有的学科规范权力之下,也要同时面对削弱自身的专业权威的两难局面。这种种用以组织、管理和控制知识的生产、扩散和确立的技术和规范性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发展主义的霸权(hegemonic)地位。

知识、权力与现代化发展话语

自70年代以降,经历了越战、石油危机和第三世界债务危机等连串事件之后,在低收入国家乃至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滋生了各种对现代化道路持怀疑甚至批判的思潮。伴随着现代化发展出现的种种社会恶果,包括贫富不均、不断增长的失业人口、环境破坏、种族冲突、政治迫害、军备竞赛、战乱和政治恶化等等,变得越来越明显,使人不得不正视现代化发展的合理性问题。甚至在过去的10—20年间,沉醉在安定繁荣和高速增长乐观情绪之中的东亚地区,90年代末金融风暴之后,也被迫要正视现代化发展的局限。

在世界各地竞相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关于发展的话语也越来越只剩下现代化理论或它的变种;传统的、原住民的有关发展的知识,备受排挤以至无声无臭。这种知识的垄断局面,随着现代化发展的局限逐渐显现,也同时受到质疑。

马格林(S. Marglin)和阿帕杜雷(A. Appadurai)的文章,对现代化发展带来的社会文化代价,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并尝试在西方式的发展主义以外,寻找另类生计存活的可能性。这阿篇文章所关注的,并非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政治、经济问题,也不是自然生态破坏的程度,而是作为一种知识系统的发展主义或现代化理论,如何破坏第三世界的传统知识系统,和与此紧密相连的社群生活和文化活动。

马格林指出,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的一个支点,是承诺科技的进步能为大部分人带来富足。只要在农业部门内引进高科技,例如“绿色革命”,人们的生活状况便能逐步改善。

对这种现代化观点,马格林提出质疑。不过,与过往的批评不同,马格林并非从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或分配不均等角度来

批判农业科技化。不少对现代化持否定态度的论者,都曾指出高科技农业会导致过分使用化肥农药,引起环境污染;大量用水又会使水资源耗尽;杂交谷物减少植物的遗传基因;大规模生产方式对小农不利,导致土地、资金分配不均,甚至引发政治不稳定。然而,对马格林来说,这些都是并非没有争议的结论。马格林认为过去对现代化农业科技的批判,并不十分有效,原因是他们错把高科技农业当作是一种一次性的解决方法,而没有理解到科学家处理高科技农业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自我修正和自圆其说的过程。对科学家来说,高科技农业自然会制造问题,但科学却能找到解决方法,虽然解决方案本身又会导致新的问题。换言之,科学家深信的,并非是一次性的解决方案,而是这种带科学主义偏见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循环过程。换句话说,是知识的政治,而非科学方法的对错,支撑着现代化科技的统治地位。因此,要彻底回应现代化农业科技,就得要同时针对科学家这种“深信”,以及在背后支持这个信念的各类政治和制度性因素。此外,他认为现代化所导致的问题,不仅仅是在政治经济和自然生态方面。他所关心的,是现代化知识系统对原住民社群文化生活的冲击。

马格林提出了一个问题:尽管高科技农业或能增加粮食生产,但把大部分农村人口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进入工业,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是否为了那种无聊苦闷的工业劳动?对他来说,当农村迎来各式农业专家——植物医生、植物繁殖家、土壤专家、森林专家、农产品市场专家——之日,当农村旧有的社区组织解体之时,农业便由一种生活方式约化为一种生存的手段,农民变成农业企业家或农工。

这种把农民看作为一个生活社群,而非仅仅是与资金或土地等同的一种生产因素(投入)的视点,在阿帕杜雷的文章中得到呼应。阿帕杜雷引用印度西部一个叫娃迪(Vadi)的农村的案例,指

出现代化农业知识系统,对农村带来的消极影响,不单是在物质上的,还包括对社群文化生活的破坏。

娃迪村农民传统以皮制水桶汲取井水,从事农业耕作。由于资源匮乏,农民大都要分享水井以及作为动力的公牛,这是维系他们社群共同生活的一个重要基础。现代化农业科技引入娃迪以后,电力汲水方法逐渐取代动物拉水操作,金属水桶取代皮制水桶。对于大部分没有能力拥有新的电动水井设备的农民,这种替代意味着取消他们的生计,或至少增加了他们日益依赖市场的风险,而往日以制造皮革水桶为生的匠人,也陷于困境。不过,对阿帕杜雷来说,还有更重要的负面影响:现代化电力科技不单取代公牛动力,同时更取代了农民植根于此的合作生活方式,结果不仅是降低了大部分并不富裕的农民承受风险的能力,同时更导致一种合作互助的生活价值解体。这种对旧有社群合作生活的破坏,往往是难以逆转的。虽然基于现代化科技农业的新的社群合作方式将会出现,但阿帕杜雷认为这种新的合作只是策略性和工具性的,而非像原有的是一种强调合作互助的生活价值。

对于科学主义的偏见,马格林和阿帕杜雷的文章也分别作出回应。马格林首先揭露科学知识运作过程的政治性。他指出“绿色革命”推广的杂交谷物,并非如科学家宣称是由于它们较传统种籽优秀,而是种籽商要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取得垄断位置,使农民要依赖种籽商的供应。以杂交谷物为主的“绿色革命”得以成功普及,是种籽商、美国政府(农业部)和科学家利益汇合的结果。种籽商要的是垄断地位;美国政府要的是经济利益和冷战的考虑(以大规模生产粮食的承诺来取消共产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吸引力);科学家想的是社会和学术界的地位。

阿帕杜雷则指出,印度娃迪农村的农户之所以在70年代以后逐渐放弃使用牛粪作为有机肥料,并不是由于化学肥料更有效率,

而是由于1972年发生严重旱灾,迫使农户大量卖掉牛,再加上政府、农业企业和农业专家的压力,使有机肥让位于工业化肥,同时也使传统有机农业的知识流失。这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让科学专家取得了垄断有关发展知识的地位,而这种专家的知识霸权,所依据的并非是知识本身的真伪,而是独特的、与现代化模式吻合的政治操作方式。

针对科学家对“问题—解决—问题”循环自圆其说过程的“深信”,马格林和阿帕杜雷不约而同地提出相似的回应。他们指出,现代科技的专家的知识系统,本身并不是问题,只是众多知识系统中的一个。问题是这种现代科技知识系统往往要取代其他(例如农民或原住民的)知识系统,把农民或原住民的文化社群生活,约化为纯技术性的问题,只剩一种科学家或工程师的答案。但这种科学技术的答案,其实无法处理农民复杂多样的文化社群生活。根据马格林等人的看法,所有知识系统都必然嵌入社群生活之中,现代化科学主义的最大问题,是想抽离于其特定的社会背景,成为凌驾一切的普遍真理。因此,保护农民或原住民的非现代化知识系统,并非仅是怀旧的浪漫主义,而是恢复或增加农民和原住民的知识和文化生活选择的重要策略。

妇女与发展——对“发展中的妇女”话语的批判

妇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种种贡献和需要,长时期为发展主义所忽视。到了70年代,学术研究和国际机构才逐渐将与女性有关的课题放进发展话语和规划之中。一个叫“发展中的妇女”(WID——Women in Development)的领域出现了,将妇女纳入教育、就业、资金等各种被认可的发展规划范畴。接着联合国宣布1976—1985年为“提高妇女的十年”,一时间妇女在发展过程中的

地位,好像大有提高。

国际机构愿意直面妇女在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比以往完全视而不见,似乎有点进步。不过,这种“进步”实际上十分有限。更重要的是,将妇女纳入各种发展规划之中,是否是一种“进步”,还大有商榷的余地。

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妇女确实有她们的特殊角色和需要。在不少地方,相较于男性,妇女更难获得上地及其他资源,更不能掌控自身的劳动和劳动成果,流动性也较低(受家庭和社群的限制),对医疗卫生包括生育的要求也有较大的需求,自然,还得加上不平等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家庭暴力等等。

然而,对于这些妇女的特殊位置和需要,尽管采用“发展中的妇女”的措辞,国际机构所做的其实极为有限,妇女只能分得各种大型发展计划的残羹剩饭。在“提高妇女的十年”当中,联合国所有主管发展规划的单位的的项目之中,只有3.5%为妇女而设,占有发展项目经费的0.2%;在80年代末期,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的财政预算只有500万美元,占联合国7亿美元总预算约0.7%(Brohman 1996:280)。

这种半心半意的“发展中的妇女”的规划,更严重的问题是没有质疑发展主义的逻辑,只简单地接受“发展”——现代化便能改善妇女的生存境况。然而,是什么因素导致妇女在生存上面对的种种困难?妇女在发展过程,生计活动中,是否只是被动的受害客体?是发展造成了妇女的苦难?还是不发展?这些基本的问题,“发展中的妇女”这类话语并没有触及。

女性主义对这种表面上关注妇女但骨子里却是彻底的发展主义的话语作出了批判。帕帕特(J. L. Parpart)和阿普菲尔-马格林与西蒙(F. Apffel-Marglin & S. L. Simon)的文章,分别从后现代女性主义和第三世界妇女的立场,对“发展中的妇女”等话语和规

划进行了反思。

帕帕特从一种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角度,反对“发展中的妇女”话语所潜藏的第一世界(包括当中的女性主义者)偏见,就是将第三世界妇女同质化和他者化,将她们塑造成被动无助的受害者,等待现代化“救援”。在指出了第三世界妇女与第一世界的差异之后,帕帕特进一步指出第三世界内的妇女,亦呈现异彩纷呈的面貌,有千差万别的生存策略和需求。因此,联合国的发展机构那种无视妇女差异的发展规划,不仅不利于进一步理解第三世界的妇女,更可能会对她们既有的存活生计起破坏的作用。

汲取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养分,帕帕特清醒地要求避免掉进“不停地自我解嘲”的相对主义和由此引起的“政治无能”。在强调差异的同时,她并没有否定唯物分析,也强调阶级和性别的互动关系的重要性。然而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不同,帕帕特认为在不放弃性别和阶级立场之余,应该加进话语分析、知识/权力关系、差异性 etc 角度去重阅女性活生生的经验,否则,“女性与发展”便很可能会重蹈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殖民经历。

帕帕特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与马格林等人对发展主义的批判接近,也是反对将现代化等同发展,“反对纯粹自上而下看待发展的问题,要求仔细地、本土地和在具体的语境下考察南北半球妇女的生存策略”;发掘第三世界妇女“多样的‘声音’和‘知识’”,取消北半球发展专家对发展话语的垄断地位。

阿普菲尔-马格林和西蒙采取的更多是一种第三世界本土的政治立场,批判“发展中的妇女”及后继的“妇女、环境与发展”的话语中潜藏的殖民主义元素。她们认为这些发展与女性的话语,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东方女性形象的塑造,有着一脉相承的连续性,就是一方面把女性看作为被动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则还有将她们转化为“经济上具生产力、自主独立的主体”

的欲望。

以印度的殉夫为例,在殖民话语下,殉夫的妇女要么是贞烈忠诚的英雄,要么便是等待拯救的弱者。殉夫与面纱、阴部阉割等成为了压迫、传统和父权的象征,被普遍化成为“真正”的“落后”殖民地文化。然而,阿普菲尔-马格林和西蒙指出,在她们曾考察的印度地方,殉夫的传统并不存在;不论是依据印度宗教的经典,又或是地方的风俗,妇女在丈夫早死的情况下,可以有三个选择:殉夫、成为修士或重婚,而选择成为修士往往是地方的惯例,殉夫极少发生。

因此,她们认为,殖民话语下极不人道的殉夫习俗,很大程度只是殖民者为了合理化殖民统治,使殖民大致披上“教化落后民众”、“保卫柔弱、驯服和被动的受殖妇女”的道德外衣,而发明出来的传统。

这种矮化受殖主体的话语,再次在“发展中的妇女”等措辞中重现:贫穷取代了殉夫、面纱,成为落后的象征,要由西方“先进”的文化拯救。与殖民话语一样,“发展中的妇女”再一次以殖民宗主国/先进国家的妇女形象作为标准,来衡量以致教化“低度发展”地区的妇女,产除当地社群的“落后”传统,建立“自立、经济独立、完全整合在一个商品世界中”的新女性形象。

阿普菲尔-马格林和西蒙反对将妇女与家庭和社群分开,并将传统非历史化为压抑妇女的力量。她们以印度的本土医疗知识为例,挑战那种基于文明/落后、自主/压抑等二元对立的发展主义知识,指出女性身体跟土地或社群文化一样,被当地人看作是和谐地与自然共处,没有尊卑高下、没有人和非人之分。与塞林斯一样,她们认为印度本土女性的中心关怀并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经济学所说的如何超越匮乏,而是一种要求“不太多,也不太少”的存活态度,一种需要男女共同参与的孕育和再生的过程。^[5]

这些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批判,重新肯定女性在当地社群的生活过程中的重要贡献,也重新塑造出并非被动的受害者的女性形象。透过肯定女性的各种本地知识和才能,有力地反驳发展主义的各种偏见。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到,马格林等学者与女性主义者批判现代化发展话语的霸权地位,审视现代化进程对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民和原住民的经济、文化生活造成怎样的具体冲击的时候,并非简单地诉之于传统主义的浪漫情怀,也不是要完全排斥现代科技,而是想跳出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在高科技发展与复古的两种极端之间,讨论(现代化)知识的政治,希望透过保护和恢复各类旧有的知识系统,使农民、原住民等广大人口重新掌握生存和发展的选择。

不是结论:怎么办?

尽管循不同的进路、持不同的政治和学理,本文集的文章均对发展主义作出不同程度的批判,质疑那种放诸四海皆准的现代化工业文明的合理性,挑战建构现代化发展话语的运作流程。可以说,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有力地动摇了发展主义大厦的根基。

然而,对于是否要大厦倒下,或大厦倒下以后该怎么办,这些文章却没有达到统一的意见。这也许是值得欣喜的。事实上,我们也很难相信,存在着一种惟一的出路。

较为激进的回应是班努里对现代化发展规划的根本拒斥立场,认为现代化发展只为原住民社群添加麻烦,并没有实质的帮助。沃勒斯坦则认为反体系运动应该以争取在各地提高工资的方法,对资本主义上层构成压力,尽量保留工人所创造的剩余。这样,便可以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负荷过重”,大幅减低资本积累的

速度,使经济资源上的分配更为平等。沃勒斯坦认为由国家政权推动的任何发展策略都只能是幻想,只有透过争取平等才有可能达到真正的发展。

相对于沃勒斯坦较为经济主导的关注,马格林和阿帕杜雷更多地关注“空降”的现代化发展对原住民社群性和既有存活方式的破坏,然而,不同于班努里,他们并不要求完全排斥西方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文集内其他作者在批判现代化发展主义之余,也没有接受完全排斥现代化的立场,只要求给予原住民的(不)发展模式和生计知识体系相同的地位。

埃斯科巴和邦克的介入点主要在话语层次方面,邦克希望建构一种新的、依据特定历史背景的发展模型,埃斯科巴则追求一种与批判西方发展模式的人民反抗结合的话语,“设法使用本地知识去改变既存权力架构”。这种介入与帕帕特、阿普菲尔-马格林与西蒙的观点相互呼应。所不同的,是后者更强调这种新的话语应该加强第三世界纷杂多样的女性的声音。

尽管建议不同,但各作者异口同声提出了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专家的不信任。沃勒斯坦在文章的副题中问道:(现代化)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对于在现代化霸权享有优越地位的经济学家、工程师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发展专家,答案自然是前者;然而大部分农民、工人或原住民对这问题的答案,恐怕会大出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专家意料的。

注 释

- [1]例如私人汽车产量的增加自然会导政国民生产总值的上升,但假如公共交通不普及,没有能力购买私人汽车的低收入人士的生活空间将大大减少,用于交通的时间则由于车辆过多导致堵塞而大幅增加。

[2]以高尔夫球场为例,首先,商人为获得政治上的保障,往往会对有影响力的本地或他国官员赠以名誉会籍,以换取他们的“祝福”。以日本为例,由于收取名誉会籍在法律上不算受贿,因此这种情况十分普遍,有人推算,如果日本在计划中的1500个高尔夫球场建成的话,而每个球场容纳200—300个名誉会籍,那么便会有约30万个有影响力的人成为这张资本主义上层利益网络的一分子,形成一个对市民不利的垄断特权集团。

此外,高尔夫球场的兴建,往往会导致自然环境的破坏。一般来说,兴建一个高尔夫球场需要约100亩的土地,这不但在日本,香港或台湾难以获得,甚至在国内沿海地区亦缺乏这样有待开发的草地,因此,发展商不是在城市附近的农村进行新一轮的“圈地运动”,便只能把森林移平改成荒地,结果自然是耕地与森林资源的破坏,进一步恶化生态平衡。更严重的问题是,为了使球场的草地更绿,发展商得使用大量的化肥和农药,甚至三倍于普通的农用化肥施用量,而这些化学品最终会流向河流、湖泊与海洋,对动植物和人类均造成极大的损害。再以日本为例,在发展高尔夫球场的过程中,已发现了950多处水源因此而受到污染,间接导致了日本成为世界上进口海鲜的主要国家。再者,由于发展高尔夫球场需占用大量土地,再加上其他高级酒店、游乐场等设施,使得邻近地区地价居高不下,结果是加重了普通万民的负担(McCormack 1991)。

[3]不仅仅是东盟诸国,事实上,在过去的10—20年当中,东亚地区贫富差距增长最快的是日本、台湾和香港等地,东盟诸国的情况则相反稍微有些改善(参阅Ichimura 1998:43,48)。

[4]这份研究报告采用了钢铁、有色金属、工业化学品、造纸、非金属矿产等五类污染性最高的工业部门,作为度量污染性工业份额的基础。然而,一些污染程度较低的工业,例如纺织和电子机械等,当中污染程度较高的工序,亦往往由发达地区转移往低、中收入地区。

[5]阿普菲尔-马格林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更详细地谈及现代化论述如何将传统医学知识排斥,把人体纳入科学主义的知识/权力宰制网络之内,使本来是一种个人以至社群所经验的痛苦和治疗过程,逐渐为一种大规模和有计划的现代化医疗工程所取代;使人体化作一堆医学统计数据,变成由庞大的专业医疗人员队伍和复杂的科层体制监控的对象。在成为一种实

证科学技术的同时,西方医学也越来越缺乏自省的能力。西方医学能够反省的,仅仅是专业医护人员的技术,而非医学知识赖以植根的哲学和文化假设。

西方医学往往指斥传统的医学知识迷信,而看不到后者所根据的,是对疾病的性质和治疗的方法很不同的理解。阿普菲尔-马格林以印度为例,指出这些古老的医学智慧,并不像西方医学一样,把疾病和“导致”疾病的细菌病毒,看作与人类誓不两立的死敌,因此不需研制种种药物,把它们全数消灭;也不会把疾病仅仅归因于病毒的入侵,而是理解为人类与其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要预防和治疗疾病,得同时改变生活行为和生存环境。这些古老的医学智慧,并不将人体看成可以分割的单位,也不将人体健康与精神文化活动分割,因此传统的医疗过程,往往包括各种社群内集体的文化活动和宗教仪式,它们并非是没有“理性”的“迷信”活动;其所依据,是与西方医学所依据的实证科学不同的哲学和文化假设。

我们不能只根据两种医学知识的不同哲学和文化假设,来判定孰优孰劣;只有把它们置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才能审视各自的长处和局限。尽管西方医学知识的确在某些方面发挥了一些传统医学无法达到的功能,但它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包括滥用药物导致抗药细菌和病毒增加;过期或危险药物泛滥(在印度无用药物占有所有药物的七成,约有4000种在其他国家被禁的药品在印度广泛流传);治疗成本昂贵,使大部分穷困人口不能受惠等等。这些问题非透过改善西方医疗技术便能解决,因为问题根源于西方的医疗制度和运作方式。西方医学知识也没法回应现代化发展导致的环境污染和城市紧张生活,因此也不能根治这些发展促生的各种疾病。在种种局限下,若仍然排挤大部分农民和原住民一直依赖的传统医学知识,使其流失,不啻是把农民和原住民推入绝境。因此,恢复对传统医学的尊重,远非浪漫情怀,而是生存必需的策略(Apfel-Marglin 1990;另参阅 Nandy & Visvanathan 1990)。

参 考 书 目

- Amin, Samir (1990): *Delinking; towards a Polycentric World*, (translated by Michael Wolfers),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 Amsden, Alice H. (1989): *Asia's Next Giant -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derson, Victor (1991): *Alternative Economic Indicato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Apffel - Marglin, Frederique (1990): "Smallpox in Two Systems of Knowledge." in Apffel - Marglin, Frederique and Stephen A. Marglin: *Decolonizing Knowledge - From Development to Dialogu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p. 102 - 144.
- Arrighi, Giovanni (1991): "World Income Inequalities 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New Left Review*, 189, pp. 39 - 64.
- Brohman, John (1996): "Women and Gender," *Popular Development - Rethinking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velopmen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pp. 277 - 304.
- Bunker, Stephen G. (1994):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ory and the Subordination of Extractive Peripheries," in A. Douglas Kincaid and Alejandro Portes eds. *Comparative National Development - Society and Economy in the New Global Order*,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pp. 112 - 141.
- Cardoso, Fernando Henrique and Enzo Faletto (1979):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translated by Marjory Mattingly Urquidí),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vans, Peter (1979): *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einstein, Charles H. (1998): "Pessimism Perpetuated: Real Wages an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Britain during and afte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8, No. 3 (Sept.), pp. 625 - 658.
- Ichimura, Shinichi (1998): *Political Economy of Japanese and Asian Development*, Springer.
- James, Selma (1994): "Women's Unwaged Work - the Heart of the Informal Sector," in Mary Evans ed. *The Woman Question* (second edition),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pp. 173 - 177.
- Kojima, K. and Ozawa, T. (1984): *Japan's General Trading Companies*, OECD.
- Mani, Muthukumara and David Wheeler (1998): "In Search of Pollution Havens? Dirty Industry in the World Economy, 1960 to 1995," *Journal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Vol. 7, NO. 3 (Sept), pp. 215 - 247.
- McCormack, Gavan (1991): "The Price of Affluenc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apanese Leisure," *New Left Review*, NO. 188, July /Aug., pp. 121 - 134.
- Nandy, Ashish and Shiv Visvarathan (1990): "Modern Medicine and its Non - Modern Critics: A Study in Discourse," in Apfel - Marglin, Frederique and Stephen A. Marglin: *Decolonizing Knowledge - From Development to Dialogu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p. 145 - 184.
- Snooks, Graeme Donald (1994a): *Portrait of the Family within the Total Economy - A Study in Longrun Dynamics, Australia 1788 - 19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nooks, Graeme Donald (1994b):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 D. Snooks ed., *W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cessa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1 - 26.
- Tilly, Louise A. and Joan W. Scott (1989): *Women, Work and Famil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Wade, Robert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aiwan's Industrial Polic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ood, Adrian (1991): "Global Trends in Real Exchange Rates, 1960 - 1984," *World Development*, Vol. 19, No. 4, pp. 317 - 332.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目 录

前言:发展、知识、权力	许宝强	1
1. 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		1
沃勒斯坦(I. Wallerstein)著		
黄燕莹译 刘健芝校		
2. 全球收入不平等与社会主义的未来		22
阿里基(G. Arrighi)著		
陈俊杰译 潘永忠校		
3. 原初丰裕社会		56
塞林斯(Marshall Sahlins)著		
丘廷亮译		
4. 权力与能见性:发展与第三世界的发明和管理		84
埃斯科巴(A. Escobar)著		
卢思骅译 张彩云校		
5. 区域发展理论与受支配的开采业边陲		108
邦克(Stephen G. Bunker)著		
萧永桦 陈耀辉 谢德文译 许宝强 潘永忠校		

6. 发展与知识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在第三世界发展 中的社会角色的批判诠释	148
班努里(Tariq Banuri)著 陈耀波 刘传伟 译 潘永忠 许宝强 校	
7. 印度西部农村技术与价值的再生产	205
阿帕杜雷(Arjun Appadurai)著 叶沛瑜 萧润仪 译 黄燕翌 许宝强 校	
8. 农民、种籽商和科学家:农业体系与知识体系	245
马格林(Stephen A. Marglin)著 卜永坚 译 潘永忠 校	
9. 后现代主义、性别、发展	340
帕帕特(Jane L. Parpart)著 薛 翠 译 陈顺馨 校	
10. 女性主义东方话语与发展	362
阿普菲尔-马格林(F. Apfel-Marglin) 西蒙(S. L. Simon)合著 黄德兴 译 陈顺馨 校	
关键词	389

1. 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¹

◆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著

◇ 黄燕楚译 刘健芝校

目前,人们几乎一致接受的社会目标就是经济发展,其他目标恐怕难以比拟。依我看,过去30年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不坚称自己起码是为了本国利益,正迈向此目标。环顾当今世界,不论左派右派如何界定,它们的区分不在于发展经济与否,而在于谁的方针能给此目标的实现带来更大的希望。但究竟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达到此目标,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社会主义是发展之路,有的说自由放任是发展之路,有的说背离传统是发展之路,有的说重振传统是发展之路,有的说工业化是发展之路,有的说提高农业生产力是发展之路,有的说脱钩(de-linking)是发展之路,有的说向世界市场开放(外向型经济增长)是发展之路。总之,认为发展是可能的,只要我们方向正确。

那么,什么是正确的方向?想回应这问题的当然大不乏人,而且还会雄辩滔滔,甚至慷慨激昂。如果当今世上还有旷日持久的革命运动,内在的推动力是要结束被压迫的局面,但另一种激励革命者的动力的,就是期待全国取得革命胜利之时,便是他们的国家

· 本文原题为“Development: Lodestar or Illusion?”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in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Polity Press, 1991.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真正迈向发展之日。

与此同时，最近对以往发展政策取得的成果所存有的幻想，不少趋于破灭。在中国，人们提到“文化大革命”如何阻碍及延误了十年的发展；在苏联，人们谈及僵化的官僚制度和政治失误破坏了经济，要求“经济改革”；在非洲，人们辩论为什么独立后“十年”（确切地说是几十年）为发展作出的努力，却使经济日益恶化；在美国和西欧，人们说到政府怎样不适当或过分干预经济发展，结果使人们的主动性受到遏抑，经济今不如昔，形势本应更好。在一片埋怨声中，在中国、苏联、非洲、美国或西欧，却没有一个人质疑将发展定为目标的可取或可行性。无论他们给自己冠以什么名堂，批评家也好，改良者也好，都不过主张采取新方针以取代他们认为已失效的政策。

我们心目中的经济发展是1945年后的概念。当然，我们目前使用的术语，如政治家或知识分子所使用的，大部分是1945年后世界体系内地缘政治的产物。自1945年以来，作为信条教义，这个概念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被广泛运用，带有更大的社会合法性。但无可否认，这个概念可追溯到更早时候，其实它的历史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史似乎并存。知识界对国家发展问题充分的辩论，至少可追溯到17世纪。今天我们归纳为重商主义的政策，谈的不正是这个问题吗？

我想先回顾一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历史，再探讨下列五个问题：

1. 发展是发展什么？
2. 是谁或什么实际上得到发展？
3. 谋求发展的背后是什么需求？
4. 这样的发展如何才能实现？
5. 前面四个问题的答案有什么政治含义？

然后,而且只有这样,我才能回到正题: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

发展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涵义。一是指生物有机体的生长过程。巨大的橡树源于橡树小小的果实。一切有机现象都有生命或自然发展过程。他们以某种方式开始生命,然后生长或发展,到最后死亡。然而,个别有机体的死亡并非物种的灭绝,因为他们会繁殖。

社会经济方面假设的类比也是十分明显的。民族或国家或社会以某种方式(在某个地方)开始,然后成长或发展。不过,发展以后又怎么样呢?探讨的人并不多。比如说,这些实体是否有可能终于灭亡?或者这些种类是否会通过再造的过程而存活下去。我们也许会问:为什么不充分探讨这个类比?为什么我们把注意力全集中在序列的中间阶段,被视为常态或畸态的部分,即假设的增长过程。

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发展还有另一个与其说是生物的、不如说是算术法则的涵义。发展的意思通常只是“更多”。这里的类比不是指有机循环,而是指线性,至少是单调的投射。当然,线性的投射可延伸至无限。无限遥不可及,但总是存在的,总可以想像事物增多。如果指的是一种社会可能性,毫无疑问会令人鼓舞。今天拥有的无论是什么,明天便可能拥有更多一点。

当然,无限也颇使人害怕。无限实质上是虚无。无穷无尽并不是谁都喜欢的。临床心理学有一整套文献论述人类需要什么方法划出他们的宇宙界限,创造一个有能力管理的环境范围,从而有可能维持控制。涂尔干(Durkheim)关于失范的探讨,就是这个

论点的另一种说法。

然而,我们马上又碰到一个社会相对性的问题。在一个以物质拥有量来计算的数量表上,所有人都追求拥有更多,那么,处于顶端的集团的前面只有虚无,而处于末端的集团被他们上面的集团所规限制约。因此,一些集团可能面临似乎无穷无尽的未知数,其他的毫无疑问要首先面对有可能掌握的机会,即“迎头赶上”那些已经比他们拥有更多的集团。

我们都知道,这里还有另一个因素。世事无常,有时顺境,有时繁荣,有时停滞不前,甚至萧条。对顺境及逆境的社会诠释,大致上只是相对而言:顺境就是说我们觉得拥有的比过去增加了,逆境就是我们觉得或害怕拥有的减少了。当我们要区分数量表顶端与末端的集团时,便会发现两者在经济扩展期及收缩期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处于顶端的集团当然养尊处优,不过在扩展期他们会害怕前面的虚无,在收缩期又会害怕从高处掉下来。处于末端的组别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所获得的物质报酬相对地比别人少,扩展期会使他们满怀希望,觉得境况肯定会马上得到改善,会在中长期便赶上去,但收缩期又会使他们看到有可能从原来的低处再滑向深渊。

因此,人们为什么热中于发展,为什么在决定采取什么方案以求发展时那么犹豫不定、急速跳跃,也就不难理解了。获得“更多”,就是发展,这是普罗米修斯式的神话,是一切欲望的实现,是享乐与权势的结合,也可说是两者的融合。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欲望。作为一个历史体系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使这些欲望在社会上首次合法化。“积累,再积累!”是资本主义的主旨,事实上,在这个资本主义体系中,科学—技术成果创造了人皆可见、因庞大积累而产生的壮观景象,让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十至二十的人享受令人眩目的消费水平。总之,实现无尽积累的梦想已经不仅合法

化,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貌似可行。

但同时,作为生物,我们对死亡和痛苦又极敏感。我们都意识到一些人消费多了,大多数人消费的就少了。我们也知道消费是眼前行为,终有一天我们将消失,不再消费。那些消费多的人揭示了生命的蕴涵:不仅他们自己,他们所在的集团终有一天会“没落”。一句话,他们面临的是“文明及其失落”。

二

在历史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集体社群心理(或心态)中,尽管有关发展的争论激起了极大的回响,但是基本问题并非心理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到目前为止,历史资本主义在制度上对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地域的回报,向来存在差异。这是客观事实,不管我们认为这是理论的必然,还是历史的经验,我觉得事实是无可争辩的。

固然,另一情况也是事实:今天已是主权国家或可能成为主权国家的多个地缘—管辖区,有些国家今日的情况比他们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历史的以往时期明显富裕得多,例如把一个国家今天的情况与(大约)50年或100年或300年前的情况相比,或者把一个国家今天的和50年或100年或300年前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名次及在世界排列的名次相比。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某个国家(比如美国或瑞典)是“已发展”国家,物质方面及(许多人会强调)政治方面(公民权利的扩大等)都“较发达”。

从这个意义上说,谁实际上发展了?在一个层面上答案不难找。我们所使用的惯用语“已发展”或“低度发展”国家过去30年来已沿用,正是指那些过去50至300年来,上面提到的一个或两个方面的意义上都已“发展”(或未发展)的国家。一般说来,我们

把西欧的国家加上日本列入“已发展”国家,把所谓第三世界的国家归为低度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属于哪个类别最引起争议,无论是以下任何一个意义上:与昔日处境相比,他们今天的情况怎样?与昔日相比,他们今天的世界排名又如何?经济基本评估指标能说明什么问题?这些评估标准是否能准确反映社会主义国家的状况?分析家在这些问题上意见不一。

那么,1945年以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框架的“国家发展”模式我们又知道多少呢?时至今日,我相信对一些问题我们已有较明确的看法。

第一,以欧洲大陆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16世纪开始形成,并从一开始就建立了我们可称之为商品链的完整生产过程。这些商品链几乎都跨越了当时的政治边界。从商品链提取的全部剩余从没按创造剩余的地带公平分配,总是不成比例地集中在某些地带。那些在剩余分配上败在“中心”地带手上的地带,我们称之为“边缘地带”。历史进程的初始阶段,不同地理区域的经济财富似乎区别不大。但仅过了一个世纪,剩余的流动就在三方面使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泾渭分明:资本如何积累,当地生产过程如何在社会上组织起来,及新建立的国家架构如何在政治上组织起来。

因此,到了1600年,把正涌现的边缘地带(欧洲中东部及拉丁美洲)与在西北欧涌现的中心地带加以比较,我们就能指出边缘地带的三个特点:人均消费较低;本地生产过程使用带强迫性的劳力,工人的实质性工资较少(这当然是人均消费较低的主要原因);国家架构对内较少集中,对外较为虚弱。必须注意的是,上述情况在1450年并未出现,只是到了1600年,情况才是如此。已为历史所证实的上述三点,正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运作的结果。

第二,获取较大部分剩余的模式就是在商品链的某些环节中实行相对的垄断。垄断能进行是因为生产者的一些环节的技术或

组织中占有优势,或因为政治上强加的某种市场限制。不管造成垄断利益的根本理由是什么,垄断本身是十分脆弱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别人也可以“仿效”那些技术或组织方面的优势,或设法破坏政治上强加的市场限制。当然这正是在整体创造的剩余中比别人分得少的生产者所不断寻求的。

历史上短暂的垄断确实是脆弱的,在国内或国际上的优势经常受到攻击。18世纪时期对“国家财富”的关注,就是生产者在意识形态上表达对创造或保持自己的垄断优势,或破坏别人垄断优势的兴趣。我们所说的重商主义只不过是这个斗争中一种有组织的、互相倾轧的方式,是中等垄断剩余能力的生产者设法使用国家机构的影响力,去削弱在其他国家机构的、经济能力较强的对手。

新生产者赶潮流而大量生产高利润的产品,增加了总产量,破坏了垄断优势;于是市场便反复出现“生产过剩”的问题,引起世界经济周期性的停滞不前。重商主义者的政策谋求透过政治机制推翻他人的优势,而生产者投入生产则谋求透过市场削弱他人的优势。两种方法并不互相排斥,最终得出的结果则可能一样。

商品链中一项垄断被破坏,生产者就会设法营造其他新的垄断优势。在以市场为主导的生产积累中垄断大部分(而且是不合比例的)资本,这是惟一可能奏效的办法。我们所说的技术发展,不过是寻求新的垄断优势而已,随之而来的是全新商品链的建立,旧商品链也必然不断被重组。

因地域不同而带来的经济收益相对来说是较罕见的现象(长远来说经济上的重要性也较小),因此,在特定的时期内,一些地理区域在资本积累上比其他地理区域较发达,一些地区更中心,其他的更边缘,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与他们近期在世界经济运作的情况有关。一个特定地理区域所占据的角色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每次一个大垄断被打破,地域性优势的布局就要重组。我们在讨论

中往往忽视所涉及的相互关系,只把这种现象归结为我们称为国家的管辖单位。因此,我们只看到国与国之间的“流动”,一些国家的“兴盛”就意味着其他国家的“没落”。情况只能这样理解,只要剩余积累不平衡,我们就可以把地缘—管辖地区排列名次。

第三,原位于欧洲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边界,在随后的三个世纪内扩展了。扩展的原因来自内部架构本身的变化过程。这个基本的过程可以视为前后相接的连串事件。“主导”垄断的破灭,引起世界经济周期性的停滞(所谓俄国经济学家康达拉采夫所主张的约半个世纪一次的经济膨胀后的收缩期 Kondratieff B-phases)。每次经济停滞都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化,目的是恢复世界经济总盈利率以及保证维持不均分配;通过生产的进一步机械化及地域的重新分布,以减低工资成本,从而减低生产成本;进行创新以创造主要的新垄断产品;一部分劳动力进一步无产阶级化以满足有效需求的增加。

但是,最后一个变化使一部分劳工阶层的实际工资增加了,与增加全球盈利率的目的构成部分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的边界就开始拓展,以吸收新的低工资劳动力,等于对其他地方实际工资增长的一种补偿,这样便可以降低全球的平均工资水平。当然,对个别资本家来说,全球的平均工资并非他们关心的;盈利的不公平分配才是关键。可是,扩大资本主义经济所及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是达到此目标的途径。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主要努力不时寻求扩大边界,但并不意味一定能成功。不论在哪儿,人们对并入世界经济作出了反抗,尽管成效不一;特别是因为被并入者所取得的好处,不论是直接的物质利益或是文化价值观,并不那么有吸引力。不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已从本身内部机制的优势得到好处,创新不断带来回报,其中之一是军备技术发展,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核心国与世界经济

以外的政治架构的军事力量越来越悬殊,甚至实行中央集权的世界帝国也可被征服,至少使他们逐渐解体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并入的过程现已十分清楚:一方面,这些地区的某些生产过程被改造,融入世界经济的商品链中。起初,这些被并入的地区融入商品链的三个环节之一:为中心地区的某些加工过程提供原材料——商品作物(包括粮食作物)或矿物产品;增加生产粮食作物,供给边缘地区生产原材料的劳动力;利用当地的剩余粮食,提供食物给那些在特定时期转到原材料或粮食作物生产线(供给原材料生产者)的劳动力。

在并入的过程中,第二方面的改造是把现行的政治架构重组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国际体系内的国家。原来的政治架构或合并,或重组,或解体,或创建随意界定的崭新架构。不管怎样,关键在于新产生的“国家”(有时是那些叫做“殖民地”的非主权“国家”)要在国际体系的规则下运作。在内部,他们要维持某种程度的有效治理,以允许商品链运作所需要的流通。但与世界经济中心地区的国家相比,他们又不可过于强大,以免真正威胁到原来的主要垄断者的利益。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多次扩展,间歇但持续地进行,从17世纪开始一直到19世纪。到了19世纪末,地球上已没有一个地区处于国际体系之外。如果仍有一些地区未纳入构成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商品链的话,数量也不多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其余的也都并入进去了。

第四方面与生产力及财富水平的总体增长和提升有关。在名次的排列上,如果一些上升了,其他就会下降;尽管这是无可辩驳的逻辑,但下列其中一点可能成立,或两点都同时成立:(a)按“发展”的绝对指标来衡量,全部或大多数国家都“升”了。(b)这些绝对指标之间的离差减少了。自由发展论者的主要论点是:情况可

能如此,他们当中很多人更进一步指出历史其实已存在这种情况。

我认为从收入来计算,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十至二十、处在顶端的人们的消费财富的绝对水平,在过去400年内毫无疑问是上升了,而且上升的幅度相当大。我所说的这百分之十至二十的人在地球上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对中心地带大多数人来说,上述情况肯定成立。因此,如果我们用全国范围的标准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即使把物价通胀也计算进去,我们仍可看到这样的增长。

问题不在于生产力的改革是否引起累积的资产及实际财富有否剧增,因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也不在于这样的增长是否使全球的中间阶层(即所谓干部层)获利,这答案当然也是肯定的。问题在于有没有造福于全世界的大多数人。到1945年为止,这大多数人主要还是农村人口,要说有的话,实在令人怀疑。在绝对收入方面,这些人很可能比他们的祖先的境况更差。经过四个世纪,他们与世界顶端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七的人相比,收入的差距大得惊人。

我们又回到讨论的起点——1945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改造自1945年以来有两方面令人瞩目。世界经济在人口、产值、财富积累的绝对增长大概可与1500至1945年的总增长相比拟。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力量也比1945年以前有惊人的发展。这两方面加起来,可以说明为什么从那以后,“发展”成为意识形态的主题及斗争领域。当联合国把20世纪70年代宣布为“发展的十年”,很多人认为物质的增长及反体系力量的增长,预示了世界经济1945年前建立的架构将进行基本改革。但预期的改革并没来临。到了今天,差不多20年后,争论主要围绕改革为什么没有实现。

那么,1945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架构有什么变化呢?主要有两点:生产力的绝对发展意味着全球从事第一类产品生产、包括粮食产品生产的人口比率急剧下降;制造业的绝对发展及

第三产业的绝对与相对发展,导致全球“都市化”的势头无法遏止,目前仍大大失控。在这个过程中,现存的低成本劳动力来源快要枯竭,我们快到临界点。几乎全部农户都起码半无产阶级化。经济的停滞继续把半无产阶级化的农户改造成无产阶级,其结果是无论高利润部门或低利润部门的利润率都必然下降。

当然,商行及国家机构可能设法反击,不断试图使原来的一些无产阶级农户“边缘化”。许多迹象足以说明这一点。很多国家的政府在80年代采取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就是明证。例如,美国与欧洲有人不断建议允许个人选择不参加社会整体保险计划。如果这建议获得通过,就是上述政策的反映。建议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我认为未来30年最终将说明,资本要从政治上把无产阶级化的人口“边缘化”,比工人阶级阶层自身“无产阶级化”更困难。因此,总的趋势十有八九仍是农户的全面无产阶级化。这就意味着更高成本的雇佣劳动。假如这成为事实,资本将日益受到挤压。

1945年后第二个主要转变是全球反体系运动在各条战线取得一系列辉煌胜利,一方面表现为一个又一个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他们声称在某些方面继承第二国际的传统。当然一些国家的成功主要靠苏联的军事力量,但相当一部分是国家内部革命力量的胜利。令人触目的有中国、朝鲜、越南、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及(历史较特殊的)古巴。

第二方面表现为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在很多情况下,这也是民众大量投入斗争的成果。当然斗争的过程在不同的国家有很大差异。发生过重大民众斗争的国家,这里略举一二:印度与印度尼西亚、加纳与阿尔及利亚,安哥拉与莫桑比克、尼加拉瓜与津巴布韦。

第三方面表现为西方国家的工党或社会民主党1945年后执政,并使大部分国家变成制度化的“福利国家”。

我并不是说社会主义集团的马列主义政党上台、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社会民主党上台,是同一回事,不过他们至少有三个共同点:第一,他们的成功都是国家内部民众力量崛起的结果,并在某种意义上把他们的胜利视为反体系的胜利。(你也许同意、也许不同意我这个概念,我只是认为这是广为流传的自我形象。)第二,原是在野(通常是非法)的政党或政治运动参与斗争,后来都掌权。第三,这一点与我们目前的讨论关系最大,就是掌权的政治团体都给自己订立了发展经济及扩大内部平等的双重政策目标。

我在上面提到他们有三个共同点,其实最近又有了第四个共同点。各类上了台的政治运动都因没有达到或未完全达到这些目标——经济增长及内部更大平等——而受到来自国内、甚至运动内部的批评。这就是文章开首所指的理想破灭的根源。

三

这就引出了我上面提到要探讨的第三个问题:谋求发展的背后是什么需求?双重目标就有双重答案。一方面,发展意味着内部更大的平等,即社会(或社会主义)根本改革;另一方面,发展意味着经济增长,“赶上”先进,众所周知就是全面赶上美国。甚至苏联也曾订立此目标,扬言到2000年会“超过”美国,也为此声名狼藉。

可是,社会改革与赶上先进是截然不同的目标,两者也未必互相关连,还可能互相矛盾。后者似乎是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的理论核心。不管怎样,我们现在必须把两者分别加以分析,而不能像过去150年间发展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他们很多保守的对手那样,往往漫不经心地认为两者是相辅

相成的。

我说过,长远来说,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轻率的观点——经济增长以实现赶上先进及增加平等主义的分配——如果不是钱币的正反两面,就是两种平行的矢量。我的意思是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陈述都肯定这点,剩下的问题不过是,这两个源自发展概念而内蕴不同的目标之中,哪一个才是推动发展的政治动力?直截了当地说,人们过去以及现在真正关心哪个目标?他们过去把哪个目标放在首位?

答案只能是国家政权总是优先考虑赶上先进国,而在这个问题上,朝着这一目标的运动产生了分歧。其实分歧可追溯到他们本身和集体的历史。运动的参与者团结在同一组织内的,有那些渴望财富增加、赶上(不言而喻还要超过)他人的人,也有那些寻求平等的人。两个目标相辅相成,这个信念在以往是团结他们的纽带。这条纽带往往表现为坚定的信念:有了经济发展(结束短缺)就有可能达到平等。然而,这股力量上台后却迫使他们采取行动去制定先后缓急的次序,从而至少部分揭去了意识形态的外衣,结果是幻想破灭,起码引起了混乱和不满。

1945年以前这些问题并不存在,原因有两个:第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当时仍处于长期扩展的态势。情况持续、财富不断增加的前景,使大家指望分得更多,那些有希望在短期内分得更多的人,往往会全力支持当时的体制,而那些希望较渺茫的人通常构成反体系政治运动的社会基础,主要吸引力在于它们似乎能为加快实现获得更多提供一条政治途径。

第二,只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处于长期扩展的态势,反体系政治运动在政治上就仍处于劣势。尽管这些运动声称代表民众阶层,因而代表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支持他们的社会阶层的上下两端总是受到侵蚀。一方面,民众阶层中比较富裕的上层,受到体系长

期扩展、个人升迁的诱惑,在这体系中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团结一致进行斗争的意识也磨灭了;而比较贫困的下层(即半无产阶级化的农户)常受挫折,难以组织起来,甚至只能挣扎求生存。一些人也因希望得到全职工作而不得不驯服乖巧,获得全职工作意味着向上流动,当然只是流向无产阶级而非资产阶级;虽然只有一些人有这机会,但永远也无法确定是哪些人,因此,很多人似乎都可能有这样的前景。上述两个“游离层”当然解释了为什么传统的19世纪工人阶级革命前景从未实现。

看起来似乎矛盾,但情况确实如此:1945年前反体系的运动的政治弱点恰恰是他们的力量。由于他们永不能上台,可以不去触及他们统一而又矛盾的思想体系,因而可以以运动的形式存在,而且能立足。资本主义政治架构的削弱使大量的反体系运动得以成功并掌权,反而暴露了这些运动内部的严重分歧以及那些谋求向上流动和那些寻求平等的人之间的裂痕。

寻求发展求的是什么?这问题即使通过历史的分析也找不到单一完整的答案。这个口号掩盖了存在已久的极深的矛盾。自从1945年特别是70年代以来,这个矛盾令人触目,要求我们共同作出颇为艰难的、巨大的政治选择。

四

我们作出政治选择以前,还须澄清一个历史问题:“国家发展”其实是如何实现的?在哪里实现了?至少在哪里宣告实现了?——大概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实现了?

一般描述的图景是:大约在1750至1950年间,一些国家相继“发展了”或实现了“工业化”。(工业化常被认为是发展的同义词或标志)。故事一般是这样讲的:英国首先发展,然后也许是某些

西方国家,最后是一系列的(再加上日本)。历史事件的这个版本把我们带到约1950年,在这个关键时刻,比较保守和比较激进的有不同的说法:比较保守的说,1950年以来,进程继续,一些国家如韩国就是明证;比较激进的说,19世纪确有这样的发展,只是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妨碍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阻力大得多。因此,今天惟一的抉择是走一条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完全决裂的崭新道路。

不过,我们在比较外向型与脱钩型两个模式以前,必须先质疑这种看法是否准确反映了过去发生的事情。对1750至1950年期间的历史可以有另一种读法,可以不把它看成一系列民族发展的成功史,而是世界经济整体的长期发展史。我要提醒大家有关我们要探讨的这个架构的两方面:日趋严重的地区两极分化,及体系外围的不断扩展。我认为发生的事很易理解。运作地区范围的扩大,导致世界经济体系的人口增长,人口增长是为了在世界范围的商品链中创造低成本、创造剩余却不是保有剩余的环节。这些环节的绝对扩展就意味着这些商品链中其他环节的同步扩展。如果起初环节的剩余保留额是低的话,其他环节的就会高些。如果中心地带没有与边缘地带同时扩展(地域没有扩大),体系的性质就不再是资本主义的了。

与1750年相比,1950年似乎有更多的地区获得“发展”,这并不是10—20个国家“发展了”其“国家”经济的结果,而是因为这10—20个国家占享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整体扩大及发展的主要成果。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没有“取得”自身的“国家发展”而是别人“强加于他们”的。得到发展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剩余积累恰似溅在吸墨纸上的墨水从中心扩散开来。它之所以记在这个而不是那个国家的账本上,不一定是或主要不是该国政策带来的成果。

当今的情况确实起了变化,整个体系无法再在地域上扩展,因此中心地带的地域无法再扩大。如果说某些类中心地带的地域有什么显著的变化,就只能是一个得失抵消的游戏:一个新地带加入,一个老地带就要退出。过去由于体系整体上在扩展,上述情况可能只有部分是对的。现在却完全是这样。再过30年,中国或印度或巴西如果真的“赶上”了,这个体系内其他地区的世界人口的显著部分进行的资本积累会相应衰减。不管中国或印度或巴西透过脱钩还是以外向型经济还是用其他什么方法“赶上”,情况也都如此。只要国家(独立的国家)各自寻求发展,情况就会如此。赶上先进国意味着竞争,竞争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发展将以损害别国的利益为代价。

五

至此,我们点出大家都真正关心的问题:怎么办?从上述的分析可得出什么政治含义?我得出的第一个含义是最激进的:国家发展很可能是一个有害的政策目标。理由有两个: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目标都无法实现;少数可能实现目标的国家,将彻底改变世界范围的生产所在的地区,从而改变他们在国际名次表上的位置,他们获取的利益将以损害其他区域的利益为代价。在一定意义上,情况从来如此,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是如此。

我听到抗议之声,来自世界所创造的剩余分配不均之下受苦的人。他们问:那么,怎么办呢?难道叫我们坐以待毙吗?我的回答是:当然不是。

这里,我必须作一个假设,假设目标是一个真正平等、民主的世界,而不只是把目前不平等、不民主的世界体系颠倒过来。如果

这是目标,通向目标的途径呢?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多数人认为达到此目标的途径是在全国组织工人阶级运动。1945年以来,这观点已变得不同:通向目标的途径是在全民之中组织民族运动。

可是,在全民之中组织的民族运动实际上能达到更大的平等、民主吗?我和很多人一样,越来越表示怀疑。我觉得在全民之中组织的民族运动已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要解决问题绝非易事,濒于绝境,挫败失意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主张由国家去保留国境内创造的剩余的论据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架构运作的核心,是不平等的交换流动,而唯有作为动力源泉的国家有能力抗逆这流动的洪流。这个论点极有说服力,获得广泛的支持,不过它也有非常消极的一面:国家作为动力源泉需要决策者,就是占据主要政治及官僚职位的人。这些人形成一个小集团,在优先考虑发展/赶上还是平等这些问题的选择上,有直接利害关系。很明显,经济上的私利会把他们推向发展及“赶上”的目标,结果是普罗大众往往在中时段来说顶多保持原状,甚至境况会恶化。解决的办法只要仍由国家的层面寻求和制订,就会进退维谷;由过去的反体系运动力量统治的国家则仍须对本国普罗大众加以压制,最好的情况也只能是在赶上的游戏中取得部分成果,而这些成果却主要由干部攫取。

政治运动就没有别的策略了吗?我不是指世界范围的策略,因为那是要世界范围的政治运动去实施的。那样的做法是不现实的,至少目前是如此。世界革命,甚至是在世界范围协调的政治斗争,多数情况下仍停留在口头上。我想不如从剩余流动的另一个环节——生产这个环节——着手。比如说,反体系政治运动把精力集中在别处,在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在第三世界,对了,也在社会主义国家,把气力用在保留所创造的大部分剩余上。一个显而易见的办法,就是设法提高劳工价格或直接生产者的销售

价格。如大多数价格一样,这些价格受市场情况控制,但这些市场情况是受制于政治斗争因素的作用的。这些因素会变,经常变。资本家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世界政治斗争中所花的精力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在价格政策上。

19世纪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油价上涨,就是一个绝妙的明证。很明显,这是一个煞费苦心的政治斗争,开始的时候,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打了一场漂亮仗。不错,你可能会反驳说:你看看80年代的情况吧。这里不详谈各国对石油输出国组织如何进行了10多年的反击,但反击确实迫使后者作出了退让,从这点可清楚无误地看到国家层面的发展策略的隐患。1973年以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保留了剩余流动的较大比例,但却是保留在国家的层面上,然后由国家分配给干部、基础设施的建造、工人等等。压力是十分明显的,脆弱性也显而易见。

在整个过程中,如果一开始石油输出国组织油田的劳力价格上升,后果也许没那么令人触目,但要扭转它也会困难多了。如果这场斗争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内的工人抗争,而不是一个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对当时的世界强权的斗争,政治就不一样了。由政治引发的保留剩余的稳定增加,较少可能导致世界市场的严重损失,就是说,如果明天所有新兴工业国纺织工人的薪酬上升百分之二十,纺织品买家唯一的选择可能就是转向其他成本同样高的地区,他们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会这样做,或者要寻找新的新兴工业国。斗争会有起有落,不过重要的是在后备劳动力正面临枯竭的世界经济范围内,这种斗争的起比落更为多。

在某种意义上,我主张的是钟摆可以回转。以往对抗不平等的首要策略是所谓阶级斗争。19世纪时期这种斗争同时在工厂(通过工会的建立)和政治舞台(通过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进行。

资本家主要从两方面反击：利用国家机器镇压这些运动；从国内及国际的后备劳动力即（半无产阶级）农户中招募新工人。

由于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农户的分布并非随意的，而是由国族、族群、种族所划分，因此，把重点放在无产阶级农户的政治策略很明显不可能成功。因此，到了20世纪，钟摆重心急转向所谓“反帝国主义”，斗争强调民族解放及发展国民经济；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成员国内有同等重心的转移，转向反法西斯斗争。

然而，同一时期，资本主义对资本积累无休止的追求，削弱了它使用原是永不枯竭的后备劳动力的机会。后备劳动力的源泉现已有限，资本家的策略因而有所改变，石油输出国组织使用的斗争模式事实上对他们相当有利，“七姐妹”（世界七大石油公司）中没有哪一个因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价格上涨而蒙受损失。恰恰相反，只要积累的剩余价值仍由国家分配，资本家仍可把他们的资本重新部署而不会失去对这些资本的长远控制。

另一方面，由于世界经济在地域分布上已到了尽头，资本家已不再像往昔那样不易受“阶级”斗争原有的策略所左右。但要是有所作为，运动的重点须重新组织，运动不可与国家有密切的联系，即使是他们经过斗争扶植上台的政权也不行。运动所关注的必须是商品长链每一个环节上如何保留更大比例的剩余。这种策略最终会使体系“负荷过重”，大大降低全球盈利率，并拉平分配。这种策略也可能会动员起各类的新社会运动的力量，这些运动的目标大都着重平等多于着重发展。

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费边主义（Fabian）策略，并非缓慢地一步步朝世界平等迈进。策略是基于以下的信念：世界盈利率会受到各地的政治冲击。当各地的胜利逐渐积累扩大，体系的支柱相当大一部分将要倒塌，迫使贪婪者互相倾轧，吞食分配给其代理人及给中间人的那部分利益，结果当然是集体自杀；军饷不足的军队会

士气低落,无心恋战。没有一支“军队”(即庞大的政治和思想武器)去保卫资本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将无法稳存下去。

六

那么,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到此,我想我的回答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今天,国家发展无论主张或是采用任何办法都不过是幻想。如果我们全身心投入那方向,资本主义制度还可能像熊彼特(Schumpeter)所希望那样,为自身延长200年寿命。有了这额外的200年,地球上的特权阶层也许可过渡到一个完全不同但同样是不平等的世界体系。

不过,发展也可以是指路明灯。我们可以加快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长期发展的步伐,这是资本家最害怕的。本地及局部要求更多的参与,要求提高实际收入,即生产地的生产者在全球不受控制,就是政治上动员起来,经济上要求重新分配。这样也就把维持现状的得益者的最厉害的武器解除了;这个武器就是把(国家及世界的)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农户在政治上分化隔离,及呼吁个人(每人所创造的剩余)为国家作出牺牲。

这种策略并非如想像那么显而易见。传统的或是过去的反体系政治运动——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人、全世界的共产党、民族解放运动等都没有去认真鼓吹它,甚至没有把它看成较次要的策略。就是过去20至30年期间新兴起的反体系运动,也没有哪一个这样做,至少没有像我所主张的那样着意使体系负荷过重。他们仍对发展以达致平等信心过大;[我认为]他们需要认真考虑的是通过争取平等以达到发展,但这种平等主义不能是否定自我实现及社会多元化的。平等与自由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密切相连。如果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把两个目标分开,结果就是两者皆落空。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弱点正在于它的自我实现的问题。越商品化,不均等分配剩余的能力就越会减弱,积累就越不能集中。如果说加速商品化是摧毁体系的途径,又绝对不够,因为它自由发展,垄断势力就会设法减慢速度。传统的看法认为国家发展使商品化加剧,我却认为应把国家发展视为取代了其他可进一步加快商品化的策略。

生产者强调保留剩余,即强调更平等、更民主的参与,这决不是乌托邦,而可能是极为有效的措施。今天他们的要求遭到大资本家的反对,但更大的障碍来自反体系运动本身。他们必须认清发展的由来已久含糊不清的两个概念——更多,与更平等。他们必须选择后者。这个选择并非与国家无关,国家机器可以从很多方面支持这个计划,但如果计划实施的动力是国家机器,发展就不是指路明灯,只是幻象。

2. 全球收入不平等与社会主义的未来^{*}

◆ 阿里基(Giovanni Arrighi) 著

◇ 陈俊杰 译 潘永忠 校

本文论述的主题是,我们这个时代蔓延东欧、前苏联以及中东剧烈的政治动荡,源于世界经济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以及整个世界经济的不同地理和政治区域之间持续并且日益加深的收入不平等。我所说的“急剧转型”,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即已开始,并在1960年代加速,到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才逐渐停下来。这正如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扼要指出的那样:“在1950—1975年之间,是世界历史上最壮观、迅速、影响深远、范围蔓延全球的社会变迁。……在这一时期,农民第一次成为少数。(这)不仅在工业发达国家如此(尽管有的国家农民依然为数众多),即使在第三世界,也是如此。”⁽¹⁾这一变迁跨越了“东西”与“南北”的界线,它主要是旨在缩小“东西”与“南北”差距的有目的的行动的结果。大约在1950年,两条界线把世界人口分成两半:位于地球西面和北面的富裕的“西方”或“北方”,与位于地球东面和南面的相对的、甚至是绝对贫困的“东方”和南半球相对。在这些有目的的

-
- * 本文是我提交给由 the Fundacion Sistema 组织的第六届“社会主义的未来:社会主义与经济”大会(Sevilla, 1990年12月14—16日)论文的修改和扩充。我感谢 Terence K. Hopkins, Mark Selden 和 Beverly Silver 对我文章初稿的批评。

行动中,最为重要的,是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追求。(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希望,通过使本国“内化”(Internalize)富裕国家所具有的一两个特征(如工业化和城市化),从而寻获他们成功的秘密,并借此赶上它们的富裕强盛。除此之外,作为政府行动的补充和替代,私人组织和个人的行动也很重要。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力、资本和企业家资源的跨国流动。

撇开个别成功例子不谈,这些行动并没能促成财富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空间内较为平均的分配。当然,确有少数国家成功地世界财富中多分了一杯羹,许多个人通过跨国流动也同样得遂所愿。可这少数国家和众多个人的成功,并没能能在总体上改变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格局。相反地,经过了30多年的种种发展尝试,在今天,贫穷的“东方”和南半球与富有的“西方”/“北方”在收入上的差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大。

在1980年代,“东方”和南半球的国家发现他们自己正处于这样一种情形中:他们通过“现代化”,“内化”了富裕国家所具有的社会结构要素,但却无法成功地“内化”发达国家的富裕。结果,这些国家的政府和统治集团缺乏足够的财力支持,去满足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力量的要求。而当这些社会力量不满躁动时,便出现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t)的实践与意识形态的普遍危机。东欧与前苏联共产主义的危机,只是发展主义普遍危机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发展主义的资本主义版本的危机,它在中东和北非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中,表现得最清楚,但在整个南半球,它也以这样或那样的面貌出现。

在下面的文章里,我将就日益加重的全球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问题展开讨论。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正在迅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已经深入“南方”,而众多第三世界国家正处于迅速的工业化过程中。这都是不证自明的。然

而我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以为“工业化”和“发展”,两者是同一回事。

大多数人的上述观点根深蒂固,一直没受到什么挑战,虽然在一些最富裕的西方强国,它出现了“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浪潮。这些国家依旧被看做是“工业国”或“工业化国家”,而发生在那些相对贫穷国家的迅速工业化,也被想当然地认为是“发展”的代名词。这个观点混淆了一个事实:对工业化的追求本身,并不是最终的目标,而是追求财富的一种手段。工业化是否意味着“发展”,全在于它能否作为追求财富的有效手段。正如我们在别处阐明的那样,随着工业化的越来越扩散,它能在世界经济中带来财富的有效性便越递减,直至它的平均回报变成负数为止。^[2]

针对横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空间持续并且日益加深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我只想简单地强调,除开极少的例外,工业化的扩散,并没有带来财富。工业化往往使大多数人付出了无法估算的人文和生态代价(城市化就更是如此),但没有几个国家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所设定的财富的标准。因此,工业化——或者更一般地讲,现代化——并没能带来它所承诺的东西。这方面的失败,正是东方和南半球许多国家当前所面临的诸多严重困境的根源。这些困境不是地方性的,也不是一时巧合,而是制度性的和结构性的,与其说它是“东方”和“南方”的困境,不如说它是“西方”/“北方”与“东方”及“南方”所共同所属的整个世界体系的困境。对“西方”/“北方”社会主义的未来作出预测和规划,如果无视这些困境的制度性根源与后果,最多只是隔靴搔痒;不然的话,便是危险和误导。

一、经济成败衡量标准的变化

当我们说共产主义已经在东欧与前苏联“失败”，或者说资本主义已在日本和东亚的其他地方取得“胜利”，其实是什么意思？当然，对不同的人来说，意思也会不同。然而，在我们脑海深处，却隐然有一个普遍的标准而我们正是通过对照这一标准来评价世界上的各种政治与经济制度。这一个标准，就是“西方”/“北方”的富裕。在这里，“西方”/“北方”并不是指其中的任何一个特定的地理或政治区域，而是指一个由不同的既合作又竞争的单元所构成的整体。

这些相互关联的构成单元，各自的繁荣都一直有起有落。它们的兴衰，对“西方”/“北方”这一整体的各个单元而言，其影响自不容忽视；但对于不属于这个整体、或不久前才加入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其影响就变得不相干，而且也理应如此。当我们说共产主义已经在东欧失败，或者，说资本主义已经在日本胜利的时候，我们所指的，难道就是瑞典、德国、法国、英国、美国、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等某个具体的国家吗？显然不是。我们是在一般意义上指所有这些国家。而且，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心里实际上已有某种关于财富的平均或综合标准：“西方”/“北方”的每一个地区或政治单元已经长时间地享有了某种程度的富裕，尽管富裕的水平从来就不一样。

在评价当代世界经济的成败得失时，为分析的清晰起见，我把人均 GNP 作为评价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有机核心”(Organic Core)的综合标准的指标。根据我们的研究目的，我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有机核心”，界定为在过去 50 年左右的时间里居于世界财富阶梯顶端的所有国家；这些国家还因为它们的优势地位，(单

独或共同地)设下了关于富裕的标准。所有“有机核心”国家的政府都在设法维持已有的富裕水平,而所有其他国家的政府则都在努力去达到它。

这些“有机核心”国家分处三个不同的地理区域。其中,西欧——在此指英国、斯堪的纳维亚与本尼勒克斯(Benelux,指由比利时、荷兰与卢森堡于1947年成立的经济联盟)国家、前西德、奥地利、瑞士和法国——是文化与行政司法上最为多元的地区。位于这地区西侧与南侧外围的国家——即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及希腊,并不在这“有机核心”之中。在过去50年的全部或大多数时间里,他们远远不及那些西欧国家富裕,无助于全球范围内富裕标准的建立;他们自己——通过各自的政府——也在追赶邻居们所有的那份财富。有的如愿以偿,有的不那么成功。“有机核心”国家所在的另两个区域,在文化和司法行政上都不如西欧那么多元:一个是北美(美国和加拿大),另一个由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构成。

表1列出了在过去半个世纪(1938—1988)中的若干年份,上述三个地区各自的人均GNP与由这三个地区构成的“有机核心”国家总的人均GNP相比后的百分数值。表中括号里的数字,指的是某地区在三地区总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数值。表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50年中北美与西欧之间人均GNP的差距,它一开始急剧扩大,之后又逐渐缩小,直到最后,两个地区的人均GNP才比较接近。“西方”/“北方”的绝大多数人口,都集中在这两个地区。

北美和西欧人均GNP在50年间的变化,反映了人们熟知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那半个世纪里的发展趋势。初期差距的扩大,反映了北美经济在二战及其战后若干年间的经济“大跃进”,北美从此成为世界经济(包括西欧在内)的龙头老大。接着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更高水平的财富标准,新一轮的财富竞赛也随之展开。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西欧国家在新霸主美国大量的财政与制度援助下,西欧国家以北美经济为模仿对象,迅速地改造自己的国内经济。

表 1 西方(有机核心)国家的比较经济绩效

	1938	1948	1960	1970	1980	1988
1 西欧	83.2 (57.0)	56.5 (51.2)	65.7 (48.9)	73.5 (47.7)	103.0 (45.7)	91.4 (44.1)
2 北美	121.6 (40.5)	149.3 (46.0)	137.0 (48.0)	127.4 (49.0)	98.6 (50.7)	109.7 (52.1)
3 澳大利亚 & 新西兰	134.4 (2.4)	84.6 (2.8)	67.4 (3.1)	76.3 (3.3)	81.7 (3.6)	67.0 (3.8)
加权平均数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说明:

1. 表中的数据是这样计算得来的:某一地区的人均 GNP 除以三个地区总的人均 GNP,然后乘以 100;
括号中的数据,指的是某一地区人口在三地区总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
2. 西欧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与本尼勒克斯(Scandinavian & Benelux)国家、西德、奥地利、瑞士、法国和英国。北美包括美国和加拿大。

* 资料来源:1938 与 1948 年的数据来自 W. S. Woytinsky & E. S. Woytinsky. *World Population and Production; Trends and Outlook*. New York, 1953;其他年份的数据来自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Washington D. C. 1982 & 1990, 以及 *World Tables, Vol. 1 &*

2. Washington D.C.

如表 1 所示,西欧国家的赶超是非常成功的。到 1970 年,西欧与北美的收入差距已回到 1938 年的水平。而到了 1980 年,这种差别不但消失,而且西欧的人均收入还超过了北美。随后,西欧才又落在了北美后面。1980 年代西欧与北美相对财富水平的上下起伏,主要是美元对西欧各国货币汇率的波动所造成的。美元汇率在 1980 年代的波动,究竟是标志着之前 30 年西欧赶超过程结束的周期性波动,还是像在 1938—1948 年间发生的那样,将影响西欧与北美之间新一轮分化的深层结构转变的先声?这个问题已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但就本文而言,指出下列事实便已足够: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有机核心国家地区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以 1980 年代为最低。

即使考虑到表 1 中人口稀少的澳洲地区(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那条不规则曲线,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在 1938 年,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是有机核心国家中最富裕的地区。像西欧那样,该地区的相对富裕程度在 1938—1948 年间迅速地落在北美后面;但与西欧不同的是,这种下跌趋势还一直持续到 1960 年。在这之后,该地区的相对富裕程度才开始上升,但到了 1980 年,上升的势头再一次逆转。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曾是三个发达地区中的首富,50 年后,却成了发达地区中最不富裕的地区。

但是,澳洲地区这种不规则发展经历,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结论:在过去的 50 年中,世界经济有机核心国家地区间的收入差异程度,从未低于 80 年代的水平。这三个发达地区中,人均收入最高地区的人均 GNP 对于最低地区的比率,1938 年是 1.6,1948 年是 2.6,1960 年是 2.1,1970 年是 1.7,1980 是 1.3,而 1988 年则是 1.6。简而言之,如果我们把目光只限于世界经济最富裕的三个地

区,过去 50 年的历史,很可以用来支持亲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某些最基本的断言。在那 50 年中,三个发达地区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只有一次明显加大(即 1948 年),而这又刺激着相对落后的地区努力竞争,反而又导致了不平等程度的降低。而且,即使局限在收入不平等水平相对狭窄和稳定的这三个地区,地区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向上和向下的流动性;最富裕的可以变成最不富裕,而最不富裕的也可以变成最富裕。

二、经济奇迹与海市蜃楼

亲资本主义的教条还进而认为,那些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设立了富裕标准的国家所组成的“俱乐部”,是开放的,任何国家都可以加入,只要它能通过发展证明自己的富有。若干国家的经济地位在世界经济阶梯中引人注目的上升,更支持着这一信条。然而,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少,还不如把它们称为“经济奇迹”,才较为合适。我们应该问一问,究竟有多少这样的经济奇迹?它们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彼此之间又可以如何比较?

表 2 列出了最重要的真实的或所谓的“经济奇迹”的概况。表 2 所列年份与表 1 一致,表中的数据为表 2 左侧某一地区人均 GNP 对有机核心国家人均 GNP 的百分比值,括号中的数字则为该地区在有有机核心国家总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

表2 “经济奇迹”的比较

	1938	1948	1960	1970	1980	1988
1 东亚						
1.1 日本	20.7 (20.3)	14.5 (23.1)	23.2 (22.8)	52.1 (22.6)	76.3 (23.5)	117.9 (23.4)
1.2 韩国	缺失	缺失	7.7 (6.0)	7.2 (7.0)	12.7 (7.7)	20.2 (8.0)
2 南欧						
2.1 意大利	32.0 (12.6)	22.8 (13.2)	37.0 (12.1)	50.4 (11.6)	60.9 (11.3)	74.8 (11.0)
2.2 西班牙	41.6 (4.8)	18.4 (8.0)	18.6 (7.4)	28.9 (7.3)	48.0 (7.5)	43.4 (7.5)
3 拉丁美洲						
3.1 巴西	12.0 (11.4)	11.3 (14.1)	12.1 (17.6)	12.7 (20.7)	17.5 (23.8)	12.1 (27.6)

注:表中的数据由某一地区人均 GNP 除以有机核心国家人均 GNP(见表 1),再乘以 100 得到;括号中的数字则由该地区的人口除以有机核心国家总人口,再乘以 100 得到。

资料来源:同表 1

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并不认为相对的人均收入——即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人均 GNP 与有机核心国家人均 GNP 之比,可以作为衡量某一国家或地区居民福利水平有效而可靠的指标。因此,如

表 2 所示,当我们说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巴西的人均 GNP 一直是有机核心国家的八分之一(12%左右)时,这并不意味着有机核心国家居民的人均福利水平要比巴西高出 7 倍。巴西人均福利的实际水平,可能会高一些,也可能低一些,视乎一系列具体的情形而定,诸如收入分配的差异,以及在某一收入水平下人力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别等等,而人均 GNP 与这些具体情形并不十分相关。我们也不认为人均 GNP 的比率是衡量某一国家或地区相对的平均生产力——相对于有机核心国家的平均水平而言——高低的有效而可信的指标。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认为,巴西居民的平均生产力究竟是不是一直只是有机核心国家平均水平的八分之一,这要视实际的情形而定,诸如贸易、汇率、对境外收入的索取权、以及国家或地区间的转移支付等方面的差异或变化。对这些问题,相对的人均 GNP 比率这个指标是无能为力的。

不过,比起现有的其他指标,人均 GNP 比率——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人均 GNP 与有机核心国家人均 GNP 之比——更能反映有机核心国家中某一国家或地区居民对于该国或该地区人力与自然资源的相对支配能力的高低。比如,对巴西而言,人均 GNP 比率(约为 12%)告诉我们,在过去 50 年的部分时间里,巴西国民对人力与自然资源的平均支配能力,大概仅为有机核心国家平均水平的八分之一。

我们不应该把世界经济中地区间经济支配能力的这种不平等关系,与伊曼纽尔(Arghiri Emmanuel)提出的“不平等交换”^[3]混为一谈。至少在原则上,在不存在伊曼纽尔意义上的不平等交换关系的条件下,地区间经济支配能力的不平等可以存在并且一直延续下去。更重要的是,不平等交换还可以成为削弱地区间经济支配能力不平等的一个因素。^[4]但是,不管这两种不平等的形式,在某一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实际上会是什么样的关系,用人均

GNP 比率这个指标来进行测量的相对经济支配能力,并不能说明不平等交换,却可以表达有机核心国家的人民与非有机核心国家的人民之间交往的总体权力——政治上、经济上与文化上的——关系。在这两类国家的人民之中,前者总是居于优势地位。

现在回到表 2 中的数据资料中来。表 2 国家与地区名单上的头一个是日本,它可以说是经济奇迹中的奇迹。人均 GNP 比率这一指标向我们生动地说明了日本的辉煌历程。它一方面展现了日本过去 50 年中在经济道路上已走了多远,同时还表明了飞跃速度之迅猛。在 1938 年,日本的人均 GNP 只是有机核心国家人均 GNP 的五分之一多一点(20.7%),显然还稳居于中等收入国家(准边缘国家)的行列。但是到了 1988 年,日本的人均 GNP 水平,竟已高出有机核心国家平均水平将近 20 个百分点。需要指出的是,在 1938—1948 年,日本的人均 GNP 与有机核心国家人均 GNP 之比从 20.7% 下降为 14.5%,然而,仅仅在短短 40 年时间里,日本不但赶上而且超过了有机核心国家的富裕水准,而在同时期里,有机核心国家的人均 GNP 增长了 7 倍。如果考虑到这一点,日本这些的变化就更为惊人了。

表 2 名单上的第二个国家是韩国。从人口规模讲,它是亚洲“四小龙”中的老大。“四小龙”中的其他三个,或者是由于可比性资料的缺乏(台湾),或者是因为它们是城市国家/地区(香港与新加坡,对这两地经济绩效的评价,必须考虑到它们各自所在的经济区域的具体情形),因而都不在本表的名单上。

人们常常认为,韩国正在努力模仿日本的道路,这种说法可能有道理,但是,表 2 的数据却提醒我们要小心。相对于富裕的有机核心国家的标准,韩国是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才赢得一席之地的,这与日本的情况不同。另外,它经济的提高是在一个人均收入比日本低得多的基础上开始的。因而,韩国相对于有机核心国

家在 1988 年的地位,就像日本在几乎 50 年前的 1938 年当时的地位一样。因此,不管从别的角度看韩国是多么引人注意,但是,韩国在模仿日本的道路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如果有可资比较的数据,我们或会认为,台湾的成就同韩国相似,甚至要好一些。不管怎样,我们都应当牢记一点,从韩国的经济奇迹得益的人口比日本要少得多(在这一点上台湾更是如此)。

表 2 列出的第二组经济奇迹是有关南欧两个最大的国家:意大利和西班牙。在 1980 年代,意大利有时被称为“欧洲的日本”,西班牙则被东欧国家(特别是波兰)认定为发展的模范,如果不是因为共产主义的统治,它们就可以取得如西班牙的成就。对意大利和日本的比较,显示了二者轨迹中一种重要的相似性:两国的指标在 1938 和 1948 年间都下跌,此后直至 80 年代又稳步上升。主要的差别是——撇开日本有较多的人口这一点不谈——意大利的轨迹比日本更为平坦:它比日本的起点要高(32 比 20.7),但终点更低(74.8 比 117.9)。因此,意大利从没有追上(更不要说像日本那样超过)标准的富裕有机核心国家。然而在 1988 年,意大利已比有机核心中的较贫困地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富裕,它的人均 GNP 比整体有机核心只低 25%。

西班牙的轨迹甚至比意大利的更平坦。它在 1938 年到 1948 年间明显地下降,在 1960 到 1980 年间上升,但在 1980 年代又轻微下降。这种波动的结果是,西班牙的人均 GNP 与有机核心整体的人均 GNP 的比例在 1988 年同 1938 年大致相同(43.4% 比 41.6%)。从这一点来看,西班牙的奇迹(就其本身而言)更类似巴西的“奇迹”而不是日本的奇迹,而巴西的“奇迹”在 1970 年代吸引了很多注意,到 80 年代则被视为海市蜃楼。

如同图表 2 所显示的,巴西的轨迹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其绝对的和几乎不间断的平坦。从 1938 年到 1970 年,巴西的人均

GNP 保持在整体有机核心人均 GNP 的 12% 左右。在 1970 年到 1980 年间, 该比例上升到 17.5%, 但是到 1988 年, 该比例又降回到 12%。正是 70 年代末的短暂跃升, 使许多人宣称: 一个新的经济奇迹正在出现, 巴西正在赶上标准的富裕的有机核心国家。

后来证明, 这次跃升只不过是一条极为平滑的曲线上一点震动。但是, 我们不应该草率断言巴西的奇迹只不过是一次幻象。与日本模式的奇迹——甚至还可以加上意大利和韩国的模式——相比较, 可能以为巴西和西班牙的轨迹所反映的不是主要的成功, 而是小小的失误。但是, 这种评价是建立在关于过去 50 年什么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正常成就的被高度扭曲了的观点的基础之上。在对巴西和西班牙看似微不足道的经济成就做出结论之前, 让我们拓宽观察的视野, 将目光投放到占有世界人口越来越大比例的地区。

三、正在扩大的贫富收入鸿沟

表 3(编辑方式同表 2)反映出的整体状况是: 50 年前巨大的收入差距, 已经把“南方”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有机核心国家分离开来, 如今这种差距正在愈加扩大。自然, 正如将要看到的, 这种差距在时空上都非常不平衡。然而, 整体的长期趋势是明白无误的: 世界的绝大多数人口正越来越落后于西方所设定的富裕的标准。

这种经济地位的普遍恶化, 对各个地区的影响是不尽相同的。如果将我们的考虑限制在 1938 年和 1988 年也有确切数据的地区, 那么便会发现, 拉丁美洲的恶化最轻(不管是否包括巴西), 南亚最严重, 紧接下来是南非和中非。具体来说, 1938 年到 1988 年间在表 3 所列出的单位同有机核心国家收入差距——按即有机核

心国家的人均 GNP 同表中每个单位的人均 GNP 的比例,拉丁美洲增加了1.8倍(如果排除巴西则为2.4) 东南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增加了2.6倍,中东和北非(土耳其和埃及)增加了2.7倍,在南非和中非增加了4.1倍,在南亚增加了4.6倍。

表 3 南半球国家经济绩效的比较

		1938	1948	1960	1970	1980	1988
1	拉丁美洲	19.5 (31.1)	14.4 (38.3)	16.7 (45.7)	15.5 (53.7)	19.8 (63.8)	10.6 (72.9)
1.1	不计巴西	23.8 (19.7)	16.2 (24.2)	19.6 (28.1)	17.3 (33.0)	21.1 (40.0)	9.7 (45.3)
2	中东与北非	缺失	缺失	11.5 (19.6)	8.1 (22.5)	11.1 (27.5)	7.1 (32.0)
2.1	土耳其与埃及	14.9 (9.8)	13.0 (10.9)	12.8 (12.9)	7.7 (14.8)	8.1 (17.5)	5.6 (19.9)
3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3.1	西非和东非	缺失	缺失	3.6 (36.8)	3.4 (42.3)	4.7 (51.7)	1.6 (65.1)
3.2	南非和中非	25.2 (6.9)	18.3 (7.6)	10.5 (10.1)	11.3 (11.4)	缺失	6.1 (16.1)
4	南亚	8.2 (109.6)	7.5 (123.3)	3.6 (131.6)	2.8 (149.1)	2.0 (173.4)	1.8 (200.3)
5	东南亚	缺失	缺失	6.6 (38.4)	3.8 (43.8)	5.7 (52.0)	3.7 (58.9)
5.1	印尼和菲律宾	6.0 (24.1)	缺失	6.4 (29.5)	2.8 (33.1)	4.6 (39.2)	2.3 (44.8)

在过去 50 年里,不同的贫穷地区在经济地位恶化的程度并不一致,这导致贫穷地区内部的收入分化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

因此,五个地区中人均 GNP 最高与最低的比例,在 1938 年是 4.2,在 1960 年是 4.6,在 1970 年是 5.5,在 1980 年是 9.9,在 1988 年是 5.9。(我们不知道 1948 年的相应比率,原因是东南亚总体的数据无法获得,而那时东南亚在五个地区中人均 GNP 应该是最底的。在 1938 至 1948 年间,有理由相信东南亚的数字并没有太大幅度的下跌[百分之二十七或以上],使比率高于它在 1938 年的数值。

总而言之,在过去 50 年里,世界经济的较贫穷地区收入不平等发展方式、同富裕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的方式恰恰相反(见第一部分)。从 1938 年到 1948 年间当富裕地区内部的收入不平等急剧增加时,贫穷地区内部的不平等保持不变或在缩小;而从 1948 年到 1980 年间,当富裕地区内部的收入不平等逐渐下降时,贫困地区内部的不平等则稳步上升。从 1980 年到 1988 年间富裕地区不平等增加时,贫穷地区的不平等又急剧下降。这种对立运动的结果是,在过去 50 年里,收入不平等在富裕地区内部呈下降趋势,而在贫穷地区则呈上升趋势。

贫富间持续扩大的收入鸿沟不仅体现在空间方面,也体现在时间方面。南半球相对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地位下降主要集中在 1938 年至 1988 年的 50 年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 10 年。在过去 50 年里,只有一个地区(即南亚)的经济地位相对于核心国家而言经历了持续的、不间断的衰落,所有其他地区都一度经历过繁荣:1940—1960 年和 1970—1980 年的拉丁美洲,1960—1970 年的南非和中非,以及 1970—1980 年的所有其他地区。可是,却没有一个地区在 1938—1948 年或 1980—1988 年提高其相对于有机核心国家的相对地位。在这两段时间内,表 3 列出的所有地区都要比核心国家逊色;而且,平均而言,这两段时间的落后的幅度比其他任何时期都要大。

1938—1948年的落后更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北美经济的巨大飞跃(见第一部分)。这次飞跃使得世界经济的所有其他地区——包括西欧等传统的富裕地区——在1948年似乎变得比1938年贫穷了。的确,二战的破坏和中断使得许多地区和国家不仅在相对意义上,而且在绝对意义上都变得更贫穷。但是,不论在相对意义上还是在绝对意义上,除了北美以及后来出现经济奇迹的地区以外,南半球地区的表现并不比核心地区差。实事求是地讲,相对而言,南半球的表现是良好的。因此,虽然表3的所有指数在1938—1948年间都下降了——拉丁美洲下降了27%(如果除掉巴西则为32%)、南非和中非下降了26%、中东和北非下降了13%、南亚下降了8%;但是,这些下降幅度并不比表1和表2的下降幅度大,甚至明显低于西欧(32%)、澳大利亚和新西兰(37%)、日本(30%)、意大利(29%)和西班牙(56%)。

通过在世界经济中建立一个新的更高的富裕标准,北美经济的飞跃为其后30年的发展做好了准备。的确,新的霸权(美国)宣称在其领导下,只要竭尽全力遵循美国式的经济道路,古老的和新生的国家都能够达到这种标准。正如后来罗斯托(W. W. Rostow)的《非共产党宣言》所体现的,这种教条将国家设想为政治经济发展中一系列必要而相似的阶段——从传统束缚的贫穷通向高消费的繁荣的阶段。虽然大多数国家仍困处早期阶段,但是,只要追随自由资本主义的信条,最终每一个国家都能进入高消费的阶段。^[5]

这种信条的各种变种还为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秩序,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黏合剂,直到80年代这些信条被抛弃为止。大概有30多年,为赶上美国以及整个西方(包括后来的日本)所享有的高消费的生活标准,第三世界国家始终不遗余力地刺激经济的发展。期间有部分和短暂的成功,正如表3中众多的指标数值的增加所

显示的一样。但是就在所有指标似乎都在上升的当儿——1980年左右只有南亚是例外、在接下来的10年,所有指标又无一例外地下降了。

80年代的崩溃在质和量方面,都与40年代不同。从数量上讲,80年代的变动更激烈。在1980—1988年,拉丁美洲(包括巴西)的指标下降了46%(如果排除巴西则为54%),中东和北非则下降了27%(其中土耳其和埃及则为31%),西非和东非下降了66%,南亚下降了10%,东南亚下降了35%(其中印尼和菲律宾则为50%)。尽管这次衰退历时8年而不是10年,但其幅度都要超过(大部分要远远超过)前面所列出的1938—1948年时期的衰退。

但是,这两次衰退的主要区别在于质的方面而不是量的方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早前的衰退很大程度上是北美经济飞跃的反映,并且标志着为赶上北美所享有的高消费的生活标准,其他国家开始不遗余力地努力刺激其经济的发展。相反,1980年代的衰退则反映了这些努力的普遍失败,并标志着在内外交困之下,这种努力被放弃了。

外部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世界霸权的政策与意识形态的转变。在1980年左右,美国抛弃了其共同发展的信条,而代之以这样的观念:贫穷国家应当竭尽所能地减少开支以增强其偿债能力和维护其信用。核心不再是发展而是偿付能力。同时,美国政府机构和企业也开始提高其自身的负债比率——国内的和在国际的,并开始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同贫穷国家展开激烈竞争。

这种转变或许是1980年代第三世界收入急剧下降的最主要的原因。但它不是惟一原因。对发展的努力的挑战不仅来自外部,同时也来自内部。由于各自环境的不同,来自内部的挑战也多种多样。如广泛的持久的劳资争议、基层互助组织的蔓延、贫穷阶层的宗教运动(如穆斯林世界中什叶派的反抗和拉丁美洲的解放

神学运动)、人权和民主运动等等,它们之间的共同性看来很小。但在过去的10年中,它们都是第三世界人民反抗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行动,这种意识形态和实践对下层人民强加高昂的社会成本,却没有带来它承诺的美好东西。

陷身于外部和内部的这些挑战,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自愿地或被迫放弃了发展的努力,并且多少有些勉强地,屈居在全球财富阶梯的下层。今天,南半球国家(以及北半球国家)的当权者很少仍然会相信罗斯托的《非共产党宣言》,他们中的大多数相信(即使他们并不说出),世界各国并不是都走在通往高消费的康庄大道上。相反,他们都牢牢地被困于僵化不变的财富阶梯,虽然偶尔会有一两个国家升上去,而其他国家却在财富阶梯中原地踏步。

在那些全球财富阶梯中的底层国家的人们的心里(他们组成了世界人口的大多数),触目惊心的现实已被合理化,这在现在和未来都是有问题的。但在目前,对这种1980年代出现的前所未有的世界收入不平等的合法化的担心,却被如下一个普遍的观点减弱了:即这种发展主义的危机,不是世界体系中资本主义的失败,而是它的对立面——首推共产主义——的失败。让我们简要地看看这种观点的本质和起源。

四、从世界历史观点看共产主义的“失败”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统治模式在许多方面都失败了,不过,一般人都认为,其最大的失败在于经济方面——也就是说,在其统治领域内创造类似西方世界中的巨大的物质财富的梦想破灭了。因为可比数据极为缺乏,这使得在历史维度上精确评价这种失败变得极为困难。但是,我们所拥有的一些可比的数据,足以让我们作出

一些合情合理的猜测。

我们通过数据得到表4,计算方法同表2和表3一样。尽管有部分缺失,但表4的指标也能够启发我们理解关于共产主义失败的历史向度的某些想法。“东方”国家不仅没有赶上西方国家的财富标准,反而越来越落后于这一标准。在1938—1988年间,有机核心国家同我们数据所能显示的三个单位之间收入差距都增加了:同中国相比是2.3倍,与匈牙利和波兰是2.4倍,与南斯拉夫是2.9倍。上述三个例子中,共产主义体制都大约建立于1948年,所以不应当从1938年,而应当从1948年开始评价它们的绩效。不幸的是,对1948年而言,我们惟一的可比数据是关于匈牙利和波兰的。从这个惟一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统治下的40年的绩效多少要比更长远的--段时期更好——它的相对经济地位在40年里恶化了1.7,而在连续的50年里是2.4。但是,其绩效并没有良好到可以使我们放弃这一结论:共产主义不仅没能赶上西方富裕的标准,而且也没能维持住它同这些标准的差距。

表4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绩效的比较

		1938	1948	1960	1970	1980	1988
1	苏联	25.2 (48.9)	18.3 (55.6)	缺失	缺失	缺失	缺失
2	东欧						
2.1	匈牙利和波兰	26.7 (12.7)	18.4 (9.5)	缺失	缺失	缺失	11.1 (9.3)
2.2	南斯拉夫	41.1 (4.4)	缺失	28.4 (4.4)	18.0 (4.4)	22.5 (4.5)	14.1 (4.5)
3	中国	4.1 (129.4)	缺失	缺失	缺失	2.5 (196.9)	1.8 (208.0)

资料来源:本表指标的计算和来源同表2和表3。

毋庸赘言,如果我们比较共产党国家同在资本主义世界上升得最突出的国家的经济绩效,则其失败会表现得更具灾难性。比如说,1938年日本的人均GNP大约是南斯拉夫的一半,是匈牙利和波兰的五分之四,中国的五倍。可是到了1988年,日本的人均GNP是南斯拉夫的八倍,是匈牙利和波兰的10多倍,是中国的60多倍。另外,如果我们从匈牙利和波兰的指数来进行分析,特别是同意大利和西班牙作比较,在过去50年中,这两个国家的衰落集中在共产党统治的40年(1948到1988年)。在1938—1948年,匈牙利和波兰的人均GNP还几乎同日本或意大利不相上下。可是,在接下来的40年里该指标相对于日本便下降了13.4倍,相对于意大利下降了5.6倍,相对于西班牙则下降了3.9倍。

这种比较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如下结论:共产主义体制没有能够实现其赶超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的期望和承诺。由于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会比匈牙利和波兰好多少,我们可以将这个结论扩展到整个苏联帝国。但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就此推论,以为如果不是这样,“东方”国家就总体而言会比其实际情况更好。

尽管东欧和苏联的许多人们认为共产党的统治至少阻碍了他们赶上类似西班牙的经济绩效,但是,这种想法既没有现实的,也没有逻辑的基础。从现实上讲,这种想法忽视了什么才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常态(而不是例外)。从逻辑上讲,这种想法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以为被西方所设定的财富标准能够被普及到比目前更大比例的世界人口。我们首先讨论其缺乏现实性的方面。

正如前面讨论,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财富阶梯中几个向上流动的例子是非常特殊的,因而理所当然地被称之为经济奇迹。对中低收入地区和地区而言,常态就是它们既不能如日本与意大利那样,赶上西方所设定的财富标准,甚至也不

能如巴西与西班牙那样,维持同这些标准的差距。相反,常态就是:1. 贫富国家和地区间的距离越拉越大;2. 穷国穷、富国富,二者间实际不会有什么转换。

这一常态同样适用于共产党执政的地区。比较表3和表4的数据,我们立即看到,共产党统治地区的经济绩效和那些1938—1948年在世界财富阶梯中占据相似地位的地区的经济绩效相比,既不是更好,也不是更坏,而是差不多。对东欧和苏联而言,这些相似地区包括拉丁美洲(包括或不计巴西)、南非和中非(这一地区在1938和1948年的人均GNP同苏联几乎相同),以及包括了土耳其和埃及的中东和北非。至于中国,可将其同南亚和东南亚(即印尼和菲律宾)作比较。

在第一组比较中,从1938—1988年南斯拉夫的确比拉丁美洲更糟(不管我们是否包括巴西),同土耳其和埃及差不多,比南非和中非更好。从1948—1988年匈牙利和波兰比南非和中非以及土耳其和埃及好很多,只是稍稍逊于拉丁美洲(包括巴西),如果排除巴西则和拉丁美洲差不多。匈牙利和波兰的人均GNP同排除了巴西的拉丁美洲的人均GNP相比,比例长期稳定:在1938年是1.12,在1948年是1.14,在1988年仍是1.14。

因此,如果这些指标可以说明东欧和苏联的总体绩效,那便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在这一地区,共产主义体制在经济上的失败,只是相对于本身的承诺和人们对它的预期。共产主义体制透过一系列用中央计划来刺激发展、努力脱离全球资本的流通,希望在共产党的统治地区内创造出相当、甚至远远超出存在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巨大的物质财富。这些承诺和期望没有实现,但是,相对于那些在同一段时间内未曾采取计划经济、未曾脱离全球资本流通的中等收入地区的成就而言,共产主义体制算不上失败。不管是否采取计划经济、或者是否脱离全球资本流通,中等收入地区

还是保持其中等收入地位,与高收入地区的距离拉大了,与低收入地区的距离也拉大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过去的40年如果不脱离全球资本体系,被分割的东欧中一个或几个政治实体便不能取得西班牙或巴西模式的经济奇迹(甚至有可能是另一个日本或意大利)。但是,考虑到这一地区的大量人口,我找不到任何有效的理由来相信:如果没有实行计划经济和脱离资本体系,从前和现在由共产党统治的东欧和苏联地区会比拉丁美洲做得更好。事实上,我可以想出很好的理由相信它们为什么不会做得更好。在讨论这些理由之前,我们简要比较一下中国同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绩效。

这一比较甚至可以提供更强而有力的证据,来支持我们刚才透过比较东欧和中等收入地区的绩效所得到的结论。根据1938年的数据,中国是当时亚洲最贫穷的地区,其人均收入是南亚的一半,稍微超过东南亚(印尼和菲律宾)的三分之一。我们没有1948年的数据。但是,由于日本侵略和中国内战,1938—1948年中国所经历的破坏和混乱要远远高于其它两个地区——特别是南亚,因此在1948年共产党统治建立的前夜,中国的相对地位不会比1938年好多少。

如果这是事实,那么相对来说,共产党统治的40年,使中国的相对地位相对于南亚大大上升,相对于东南亚稍微上升(或轻微下跌)。在1988年,中国的人均GNP和南亚的相同(而在1938年和1948年,则只有二分之一),是印尼和菲律宾的78%(1938年只有68%)。(由于从1960年开始,印尼和菲律宾的表现比东南亚整体要差——见表4,所以中国相对于东南亚稍微上升,实际上很可能是轻微下跌。)

但是,相对于东南亚而言,无论是上升还是下跌,其差距都很小——肯定不会比它与南亚间的差距大,因此,我们前面的结论仍

然成立：共产主义在经济上的失败，整体而言，只是它相对于共产党人不现实的预期和承诺的失败。他们认为能够通过系统地脱离全球资本的流通，便可以改善大多数人口的生活，达到西方的富裕标准。但是，相对于那些没有脱离资本体系的其他地区所获得的成就而言，共产党的统治不能被称为失败。对资本体系实行封闭还是开放的政策，对改变其总体趋势来说没有区别，总体趋势还是全球收入分配不平等不断扩大。

当然，对全球资本体系是封闭还是开放在其他方面有重大区别。首先，在世界体系中它会造成地位和权力的不同。二战后 30 多年来，苏联和中国共同或独自有效地阻止了美国霸权在全球的扩张，并将其自身的权力网络扩展到南半球——从加勒比海到南亚次大陆，从南非和东非到中东。即使在经济危机时期，苏联在世界政治的分量也要远远超过拉丁美洲所有国家的总和。同样，中国的分量远远超过南亚国家的总和（我们参照的是那些人口总量和人均收入相当的地区）。

另外，采取封闭还是开放政策，对社会较低阶层的地位和福利的影响十分不同——在中低收入地区，这一阶层占其人口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正如上面所述，苏联在追赶西方的富裕标准这一“竞赛”中不比拉丁美洲好多少（或许要比它差），但是，在改善其人口中下层阶级的营养、健康和教育方面，它做得要比拉丁美洲（包括巴西）好。中国在这方面相对南亚和东南亚来说是做得非常好。

这种政治和社会的成就，尽管有时被忽视，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它们一直由于执政共产党的宣传和信仰所淡化和破坏。共产党宣称他们国家正处于追赶西方的富裕过程中，而实际上他们正越来越落后于这些标准。于是，他们同西方国家在军事、外交、文化和科技方面的竞争力也戏剧性地下降。与此同时，

无情的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社会力量开始挑战执政精英实现其承诺的能力。最后,中低收入地区力图升到富裕等级的结构性失败成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危机的一个因素。东欧体制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更大成就,只能使其危机比南半球更突出和尖锐。

五、寡头财富与收入不平等的再生产

现在让我们对如下“铁律”作出可能的解释:不管底层国家的政府怎样努力,全球财富阶梯始终没有变化——不管他们是否脱离全球资本体系,是否在国际体系中追求权力和地位,是否在其国民中消除不平等。对我而言,这种解释的关键一步是承认哈罗德(Roy Harrod)将西方所享有的富裕定义为“寡头财富”(Oligarchic wealth)。这一定义是相对于“民主财富”而言的。哈罗德的这一定义只涉及到个人财富(泛指长期收入),而无论其国家和居住地。然而,毋须经过实质性的修改,这一定义就可适用于如下国家的长期收入,这些国家处于全球贸易网络之中并为控制世界的自然资源展开竞争。

在哈罗德的概念中,民主和寡头财富被“不可连接的海沟”所分隔。民主财富是一种对资源的掌握,原则上直接与个人努力的强度和效率相关。相反,寡头财富同个人的努力的强度和效率无关。按照哈罗德的观点,情况之所以是如此,有如下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反映了我们对剥削(Exploitation)的理解。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支配在平均效率下超出一个人的凝聚了时间与劳动的劳务和产品。如果有人这样做,那就意味着另外某个人多劳少得。第二个原因是,在绝对或相对的意义说,资源是稀缺的,即广泛使用便会造或拥挤(Congestion or crowding)。因而,通过价格或其他分配机制对它们进行使用和消费,意味着对其他用途的排斥,

这就导致了超额利润(rents)和准超额利润(quasi-rents)的形成。⁽⁶⁾

因此,为获得寡头财富的努力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正如赫尔希(Fred Hirsch)所强调的那样(他使哈罗德的观点免遭遗忘):任何人都能够通过奋斗获得成功的观点是一个幻想。

单独行动时,每一个体都力图充分利用其地位。但是,这些个体偏好的满足改变了其他个体力求满足相似需求所面临的环境。实现这种个人需求的一系列交易行为,会将个体置于比从事交易时更糟糕的讨价还价的局面,因为这种行为的总和并不改善所有个体的地位。这样就存在一个“总合”问题(Adding-up Problem)。经济上的机遇,尽管连续不断地降临到这个或那个个体,同等的机遇并不能降临到全体。我们每个单个个体可以获得的成就,作为整体却不能够。⁽⁷⁾

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追求国家富裕的政府所面临的“总合”问题,同在国家经济中追求个人财富的个体所面临的问题类似,在更多方面甚至要更严峻。经济进步的机遇,尽管连续不断地降临到这个或那个国家,但同样机遇却不能降临到整体所有国家。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发展是一个幻想。西方国家的财富类似于哈罗德所说的寡头财富,它不能够普遍化,因为它的前提建立在相互之间的开发过程与排斥过程。这两个过程造成了对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相对剥夺。

实际上,排斥过程和开发过程同样重要。后者指的是这一事实:在居于世界经济阶梯底层的国家里,绝对或相对的贫穷,诱使着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和国民努力去参与国际分工,赚取微薄的收益,而收益的大部分则进了中上层国家的统治者和国民的口袋。

排斥过程指的则是,居于上层的富裕寡头国家为其统治者和国民提供各种手段,排斥下层国家的统治者和国民对稀缺资源的使用和消费。

这两种过程各有区别,又相辅相成。开发过程为富裕国家和其代理人提供发动和维持排斥过程的手段,而排斥过程又造成贫穷,使贫穷国家的统治者和国民不断地试图参与有利富裕国家的国际劳动分工。

这些互补的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运作得非常不平衡。事实上,有一些时期,它们运作得非常不好,以致令人产生了一种印象:许多国家实际上正在“发展”——就是说,它们正在渡过将其与西方寡头政治的富裕国家分割开来的不可逾越的贫穷鸿沟。在大多数贫穷国家试图达到西方国家的富裕的时候,正是系统性危机容易发生的时期,因为西方的财富根本不能普遍化,而多数国家的这些试图,正威胁到少数国家的财富的存在。

这种危机通常发生在核心地区资本的生产性扩张面临收益下降的时候。历史上这种情况曾出现于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早期。那时,“工资爆炸”出自布朗(Phelps Brown⁽⁸⁾)席卷西欧的大部分地区、北美和日本。这是核心地区资本的生产性扩张迅速逼近收益下降点的第一个标志。工资爆炸在1973年的首次石油危机中依然大显身手,它本身就是最显著初级产品的价格在经过20年的相对下降后开始普遍上升的一个表现。受工资增加和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核心地区生产扩张的收益率下降,资本开始寻求新的机会。

资本主义的扩张有两个方向。一方面,生产性扩张能够在更外围的地区继续下去,这些地区还没有受到劳动力成本或初级产品价格上升的影响。另一方面,生产性扩张可能停止,利润和其他金钱上余额则被用于金融投机,以获取超额利润和一部分的政府

收入。在 1970 年代的,这两种扩张同时造成资本和其他资源大量流向中低收入国家。相反,到了 1980 年代,第二种扩张落后于第一种,导致大量资本和其他资源又回流到核心地区。

资本在朝向和背离更外围地区这两个方向上的反复,由于如下事实的存在而变得更为强烈:在 1970 年代,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最主要是美国政府)继续追求生产性扩张,而没有认识到这种扩张是在杀鸡取卵,损害着投资的利润率。随着核心地区的利润率由于政府政策的原因而进一步降低,资本一方面流向更外围的地区,另一方面投向政府监管不了的投资形式,比如在一些西欧银行存放美元存款。

这种核心地区资本和政府政策的分离,为 1970 年代一般性的经济进步创造了条件——所有数据(南亚是惟一的例外)表明,这是 50 年中惟一的一段时间,所有中低收入地区和国家的收入似乎都缩小了它们同有机核心国家的收入差距(见表 2、3 和 4)。正是在这段时间,低收入国家,尤其是中收入国家置身于核心资本主义机构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投资、合资以及其他形式的无限制的大量贷款之中,它们组装起生产设备,不仅在内部相互之间、而且还同核心地区展开了竞争。甚至共产党国家也没有遭到歧视。相反,一些共产党国家成为这次良机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但同时要承担着沉重的金融债务,因而迅速同全球资本体系接轨。^[9]

这次繁荣(如果可以这样认为的话)注定是昙花一现。首先,中低收入国家可采用的发展手段突然充裕起来,导致了为实现工业化的竞争更加普遍和激烈,但是这种努力从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令对其成功来说是必需的生产投入的稀缺程度更严重。另一方面,它们又制造了过多的典型产品,因而降低了产品在世界市场中的价值。因而早晚这么一天将会降临:只有那些最有竞争力的才可以摘取工业化的胜利果实,其他的则会陷入收

益小于成本(包括在这一过程中增加的负债的利息)的困境。在这一刻,繁荣就变成了它的对立面。信贷和其他种类的援助将被紧缩,失败的国家被迫出让其最有价值的资产或未来收入,作为防止丧失其信用的惟一方式。

另外,1970年代的中低收入国家在发展手段上,倾向于消除核心国家资本的投机性与核心国家政策的脱节。越多核心资本流入中低收入国家,核心国家政府便越认识到它们试图操纵资本的生产性扩张不仅没有效果,而且导致了发展的扩散,这就威胁到它们的权力所赖以形成的财富阶梯的稳定。同时,核心资本的利润越依赖中低收入国家收益和资产的转让,就越要求核心国家政府在使这种出让合法化方面的帮助。

从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到1982年(墨西哥拖欠贷款),潮流发生逆转。里根一撒切尔主义到来,发展努力发生普遍性危机(南半球和东欧)。核心政府开始给从事金融投机的资本机构以最大的行动自由,并且进一步贱卖其财产和未来收入。此外,核心国家政府在其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分别或一致提供各种援助,使中低收入的国家能够偿还其债务。

不用说,资本世界对这一所谓“新政”的反响要比南半球和东欧强烈的多。“南方”与“东方”国家的盛宴结束了,西方国家的人们(或至少它们的上层阶级)开始经历他们的“黄金时代”,这令人回忆起80年前欧洲资产阶级的美好时光。这两次辉煌的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在于,作为受益方,它们所享有的空前繁荣几乎都不是建立在此前累积的危机解决的基础之上。相反,最近出现的繁荣只是危机转移,把一组关系转化为另一组关系。对那些认为没有比今天局面更好的人来说,更麻烦的危机的反弹只是个时间问题。

六、蝌蚪哲学与社会主义的未来

20世纪早期的黄金时代结束于系统性混乱时期(1914—1948),其特点为战争、革命和全球资本积累过程中深刻的危机。20世纪晚期的这次黄金时代很可能也会结束于许多方面类似1914—1948的系统性混乱(但在其它方面有很大不同)的时期。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将来回顾这一历史,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应被视为西方繁荣和安全的时代的结束,而不是开始。紧随共产主义崩溃而来的,是伊拉克—科威特危机和美国经济自1982年以来的首次严重衰退,都印证了这一事实。

推测即将面临的系统性混乱事件的形式和次序,并没有多少意义,因为它们大体上是不可预测的,并且,它也与本文的宗旨无关。然而,能够影响即将到来的事件的世界系统的趋势却是可以预测的,并且同本文的意图相关。因而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我将简要描述这些倾向和社会主义的未来。

从地缘角度讲,潜伏于1914—1948年的系统性混乱中的主要因素,是西方国家(日本那时已经成为其中一员)由于瓜分世界的力量的消长而造成的内部冲突的深化和加剧(即所谓的“帝国主义”)。它的主要后果是反系统力量的崛起,最终导致相互区别而相对独立自主的地理单位的形成:“西方”、“东方”和“南方”。而在我们即将面临的系统性混乱中的主要因素,则是瓦解中的“东方”和“南方”因争夺日渐稀少的世界经济资源而造成的内部冲突的深化和加剧。它最重要的后果,可能是世界政府机构的建立(原本由西方推动),并将最终彻底取代已经崩溃的东、西、南的世界地缘三分法。简而言之,前一次系统性混乱的局面所造成的,将可能在后一次拆毁。

在过去的10年里,这种模式的雏形已经存在。伊拉克—科威特间的宿仇以及一些更为严重的冲突,促使美国及其盟友出于对自身的考虑,推动了世界政府机构的建设(特别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作为其合法地和有效地介入及解决“南方”内部冲突的惟一方式。另外,如果没有由于压力而部分瓦解的“东方”地区参与,那么无论是使“南方”国家间在石油收入的分配使用方面的冲突升级,还是美国及其盟友运用联合国安理会以武力解决冲突,都会变得不可能。

在未来一二十年内,这种模式背后的社会力量将会越来越强大,而不是相反。这些力量一方面体现了1950—1980年间世界经济社会结构中不可逆转的变化,另一方面体现了这些变化在80年代的南半球和“东方”所造成的绝对和相对的剥夺局面。只要开发和排斥过程继续再生产出西方国家的寡头政治的富裕以及“东方”和南半球的绝对和相对剥夺,那么中低收入地区的冲突仍会局部性存在,并且使西方面临越来越棘手的局面。由于西方的战略部署是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持既存的财富阶梯,而不是改革(更不用说革命),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可预测的将来,西方所主持或强行解决的每一次冲突,都只能是将来另一次更剧烈的冲突的前奏。

“东方”和南半球持续不断的冲突的升级,反过来,有可能在西方内部制造矛盾的趋势。一方面,西方政府和人们被诱使着以更紧密的方式相互合作,来管理和保护其寡头财富赖以存在的全球贸易网络。另一方面,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人会发现保护这种寡头财富的成本超过了他们从中获得的收益。第一种倾向会导致进一步加强现有的世界政府结构,以及催生新的机构的出现,而第二种倾向则导致在保护或追求寡头财富时,当成本等于或超过收益时,西方国家在进行成本分配上发生重大的冲突。

这两种倾向的结合,使西方的社会主义力量陷入了两难境地。

在整个 20 世纪里,社会主义力量都有意无意地将自己认同为某种发展主义的变种。正如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指出的,这种认同背离了认为人类应当团结和平等的社会主义信条。因为这种发展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是托尼(R. H. Tawney)的蝌蚪哲学的全球版本。^[10]

聪明的蝌蚪能够协调它们与不利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尽管许多会死掉,但那些幸运的蝌蚪总有一天尾巴会脱掉,嘴巴和腹部会变大,轻盈地跳上干燥的陆地。或许,关于社会的这种观点可以被称为蝌蚪哲学,因为社会提供给它各种罪恶的慰藉,就是说个人可以成功地避开这些罪恶……这种态度意味着什么样的人生观?难道天才人物飞黄腾达的机会可以是平等,而所有周围的机会从出生起就处于不平等之中?难道对权力最神圣的运用就是不顾一切爬上岸,而不顾同伴的死活吗?^[11]

引用了上一段之后,沃勒斯坦接着说,(对)那些不想“爬上岸”的人来说,出路就是力求在整体上改变这个体制,而不是从中获利。我将这界定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本质特点。这种运动的合法性标准,是行动所能达到的最大可能的总体贡献的程度,以及它对迅速改革目前的世界体系并且最终以社会主义的世界政府来取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贡献程度。^[12]

15 年前(作者写作上文的时候),沃勒斯坦建议我们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世界政府,这听上去多少有些空想(甚至更糟)。那时,“世界政府”这一观点看来不合实际,“社会主义世界政府”的观点便更不可信;社会主义世界的实践,表明了它们或者没有实现其目标,或者变成强国控制弱国的工具。另外,1970 年代发展主义(包

括社会主义)的大多数变种都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过承诺。因而要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政府既不可行,又不可取。

今天,世界政府的观点似乎不像15年前那么空想。七国集团有定期会晤,并且越来越像一个管理世界资本主义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在80年代,IMF和世界银行越来越扮演世界金融部门的角色。最后同样重要的是,90年代,联合国安理会扮演了世界警察的角色。在完全没有计划的情形下,由于一些事件的压力,经济和政治大国正在以自发的方式逐渐地正在塑造一种世界政府。

诚然,世界政府形成的整个过程都被保守力量主持和操控,它们最关心的,是要将80年代南半球和东欧发展性努力失败后出现的全球财富分配的高度不平等合法化。实事求是地讲,就在发展性努力失败后,世界政府形成的加快决不是偶然事件。更可能的是,这次加快只是对发展主义失败后国际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真空作出踏实的反应。有人会问发展和强化世界的的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的这一过程,怎样可能变成促进世界平等和团结的手段?

在过去那个残暴贪婪和社会主义失败的年代,这种努力自然是希望渺茫。然而,让我们向未来15年跃进。如前所述,我们可以预料到,在世界政府形成过程的开始阶段,结构性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而不是日渐减少。但是,当世界政府远比现在进步的时候,对西方人而言,系统性混乱的成本也会更高,特别是保护成本——从广义理解,它不仅包括武装力量的投资,还包括向瓦解的东欧与南半球里的委托人和友好力量的援助,以及昂贵的和无法挽回的人类的精神创伤——会高到这种程度,追求寡头财富将会被认为是具破坏性,这种破坏性将少数人的繁荣和安全的成本转嫁给了大多数人,转嫁给了他们自己未来的子孙。

在这意义上,西方“青蛙”向东方和南半球“蝌蚪”的指手画脚,对其自身——或至少对其越来越多的成员——而言,是历史性的

错误。届时,西方社会主义者将面临关键一刻:要么他们同“东方”和南半球的力量相联合,并且提出一套理智的方案和政治规划,把系统性混乱改革成为更平等和团结的世界秩序;不然的话,他们有关人类进步和社会公正的呼吁,将会丧失所有残存的可信度。

注 释

- [1] Eric Hobsbawn, Comment in 'Reflecting on Labor in the West since Haymarket: A Roundtable Discussion', in J. B. Jenz and J. C. MacManus, eds., *The Newberry Papers in Family and Community History*, Vol. 86, No. 2, 1986, p. 13.
- [2] Giovanni Arrighi, 'The developmentalist Illusion: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Semiperiphery', in W. G. Martin, ed., *Semiperipheral States in the World - Economy*, New York 1990, pp. 18 - 25; Giovanni Arrighi and Jessica Drangel, 'The Stratification of the World - Economy: An Exploration of the Semi-peripheral Zone', *Review*, Vol. 10, No. 4, pp. 53 - 7.
- [3] Arghiri Emmanuel, *Unequal Exchange*, New York 1972
- [4] 见 Arghiri, "The Development Illusion", pp. 11 - 14.
- [5] 见 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 - 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1960.
- [6] 见 Roy Harrod, 'The possibility of Economic Satiation - Use of Economic Growth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Leisure', in 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blems of United States Economic Development*, 第 1 卷, New York 1958.
- [7] 见 Fred Hirsch, *Social Limits to Growth*, Cambridge, Mass. 1976, pp. 4 - 5
- [8] 见 E. H. Brown, 'A Non - Monetarist View of the Pay Explosion', *Three Banks Review*, 1975, p. 105.

- [9] 见 Iliana Zloch Christy, *Debt Problems of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1987.
- [10]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Capitalist World - Economy*, New York 1979, p. 76.
- [11] R. H. Tawney, *Equality*, New York 1961, pp108-9.
- [12] Wallerstein, p. 101.

3. 原初丰裕社会

◆ 塞林斯(Marshall Sahlins) 著

◇ 丘延亮 译

摘 要

在“进步”这个形上学理想的牵制之下,西方社会思潮,自来即设定文化之演化主要存在于一种累积的“经济发展”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旧石器时代的狩猎社会遂命定被打扮为一种低条件的角色;一种以绝对贫穷为印记的“糊口经济”,缺乏用以“建立文化”的闲暇,无穷尽的生产活动仅足以维持生存等等。

从世界范围和各地在现代狩猎民族中产生的证据,在极多关键性的方面对这种演化式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无论在食品或工具生产方面,他们每天的工作总量远低于其他社会经济构成下的人们;他们比起新石器时代或其他“更高”的生产样式有更多闲暇,

-
- * 本文系译自塞林斯 1968 年发表于 *Les Temps Modernes* 上的名著“La Première Société D'abonda”的英译。后收入作者 1972 版 *Stone Age Economics*。系近 20 年经济人类学最主要的论文之一,其突破性的理念,影响深远。为中文译文的需要,作者曾亲为删节,取消了若干章节及 22 个脚注。译文曾发表于《台湾社会研究》第 1 卷第 1 期 1988 年春季号,在此略有修订。

甚至常能在白天睡觉、猎人们并不对匮乏感到恐惧或萦绕于心。他们的秘密端寓于手段与目标间正常与可行的比例：人们的“经济需求”不是无限制的，而他们的生产手段足以负担那有节制的目标。同时部分地，他们游动的需要限制了贪欲的增长。是故，他们生活在一种我们谈到布虚曼人时所说的“物质的丰裕”之中。因为不须超乎寻常的生产性努力，他们的“需求”通常可轻易的获得满足。

每个人的工作量随着文化的“经济发展”而俱增，闲暇则随之而日减——而“贫穷”则仅在所谓“文明”的前行中才真的出现。匮乏与贫穷之所以独独在现代工业世界及其边缘区域广为散布，不但是由于市场体制的扩散，在手段与目标间产生了无法跨越的鸿沟，更由于这经济中所维系的朝贡关系（也就是阶级关系）造成了广大生产者的悲惨境遇——尤其是以西方殖民地偏远地区为犹甚，在与这些地区相对照之下，狩猎者与采集者的社会无异是“原初的丰裕社会”。

楔 子

如果说经济学是门忧郁的科学，研究狩猎者与采集经济，必定是它最先进的一个分支。我们的教科书，几乎绝无例外地，竞相诉说旧石器时代生活之艰辛，描绘出一幅大难临头的画面，饥饿的幽灵成群地在连篇累牍的册页间高视阔步，使得读者关心的不只是采集者之如何维生，而竟至于免不了疑心：他们到底能不能算真的在过活了！据此一说，采集者的技能之落后，除了维持其生存外，使他们既无休歇且无剩余；逼使人人不停工作，甚至于连“建立文化”的“闲暇”都没有。同时，在经济发展的教义里，他们遂命定了充扮坏榜样的角色：所谓“糊口经济”（subsistence economy）的代

表人物。

成见之为物,无疑是最顽强的东西;要想打破它,非有对立性的提法不可。因而当我对采猎经济细加考察之下,就不得不称之为“原初的丰裕社会”了。这个提法,意外地引出了另一个有用却出乎预期的结论。据一般性的了解:一个丰裕社会中,其全体成员之物质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肯定狩猎族群之丰裕也就是否定人类的生存条件系一种命定的悲剧——人类有如服苦役的囚犯,自困在自身欲求之无穷与自身手段之不足的永恒殊悬之中。

达到丰裕有两个途径,需求之“容易满足”不是生产多些,就是希求少些。西方熟悉的观念——即加尔布雷思的提法(the Galbraithian way)——中的种种预设,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特别合适的;它认为人们的需求大而无限,其手段虽可改善,但毕竟有限;是故,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差距得靠工业生产力来加以缩小,最起码可臻于“救急品”丰富的地步。可是到达丰裕还有另外一个方式,这方式与西方的方式在前提上就不一样:人类的物质需求有限而少,技术虽然不变却就整体而言足供所需;用这个坦宗的策略,人们可享有无比的富饶——以及较低的生活水平。

这第二套法子,我相信正是描绘着狩猎的人们;据之,有助于解释他们的一些比较奇特的经济行为。好比说,他们的“挥霍”——一种立即消费所有牲口的倾向。狩猎者不受市场性匮乏之纠缠,其经济的动向比起我们来说,可能更一贯地以富足为据。“血腥的布尔乔亚空想家”德特雷西(Destutt de Tracy)毕竟迫使马克思首肯他的观察:“在穷的国度里人们舒服”,而在富强的国家里“他们一般都很可怜”。

本文是提供了论证之后,将在文末谈及采猎经济真正的困难;在当前关于旧石器贫穷的种种陈说中,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认识过那些困难。

1. 错误观念的根源

一般人类学关于采猎经济的一般意见不外乎：“仅足以糊口的经济”，“除极特殊的场合外闲暇非常有限”，“无尽的追求食物”，自然资源之“贫瘠且颇不可靠”，“缺乏一种经济剩余”，“来自最大多数人的最大耗能”……等等。如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即说：

澳大利亚原住民即为经济资源最缺乏的典型例子……只有在最集约的应用上，生活才能成其为可能。

又如斯图尔德与法龙(Steward and Faron)在谈到南美的狩猎者即写道：

游牧的猎人或采集者仅足以达到最起码的生存需要，且常有不及的时候；他们的人口(每10至20平方英里一人)即是反映。不停地移动追寻食物，他们显然没有任何余暇从事任何作为生存之外的其他有意义活动；就算他们闲时可能生产些东西，也缺乏运输的能力。对他们来说，适当的生产意味着身体的存在，因为他们极少有时间上或物质方面的剩余。

这类关于狩猎民族困境的悲愁观点并不限于人类学；它是历史性的，且可溯源到人类学运作其中的经济理脉里。早自亚当·斯密的著作——或任何其他人的著作——这看法就有了。说不定这正是新石器时代最先产生的重大偏见！

可是我们当前对采猎经济颇不敢恭维的意见，却不必归罪到新石器人的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布尔乔亚的我族中心主义照样可以造就它。而现存的商业经济——它的每一转折都

是“民生学”[人类学的经济学(anthropological economics)]必须加意防范的陷阱——也会推展这种对采猎生活黯然的结论。

辩说狩猎民族有丰裕的经济,同时又绝对的贫穷,是不是真的那么似是而非呢?我们可不要忘了,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不管有多么丰厚的资源,却将他们置身于一种短缺的主张——世界上最丰裕的民族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肯定经济种种手段的不足。是故,一个经济表面的物质状况似乎不是这种经济所成就之事的有效措施,我们必须就经济组织样式有所讨论。

“市场—工业”这一个体系,以一种独特并无可比拟的方式设置了短缺;一旦生产与分配通过价格的活动而得以安排,生计全仗于收入与支出之时;物质媒介不足之虑就成了所有经济活动明显且可依据的起点了。企业主面对有限资本的选择性投放,工人们则希望在雇佣的酬报上有选择,消费者亦然。消费的本身无疑是双重性的悲剧:以不足为始,以剥夺而终。把国际分工摆在一块,市场上充斥炫人眼目的种种商品;所有这些东西都伸手可及,却总不能得而有之。更糟的是,在这消费者的“自由”选择的把戏中,每一个“得”同时也是一个“失”,因为每买一物就是放弃一些别的;那些放弃的,一般竟是边际性地较不可欲——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可能是更为可欲的——却没法子能得到的。

“劳碌一生”这句话似乎是特别为我们铸造的;“短缺”乃经济颁下的教令——是故也就成了我们经济学的公理:短缺之应用意味着在一定情况下,就可能的目标达到最大的满足。而我们偏偏从这么一个角度去回顾狩猎民族。既然作为一个现代人的我们,具备了种种技术却仍然没法子随心所欲,手执弱弓轻弩,半裸原始的猎人又能有什么机会呢?轻易地将他们硬套上布尔乔亚的欲望和旧石器时代的工具,我们贸然地就判定了他们境况的无望。

然而,短缺并非技术性手段的固有性质,它是手段与目的间的

关系。我们必须考虑一种经验性可能：狩猎者以维持其生身之健在以事，而就此确定的目标而言，他的弓箭是适当的工具。

可惜，人类学理论与民族志的应用中习有的痼疾及种种成见，合而排除这种认识的可能。

人类学一直倾向于借与新石器经济泾渭分明的夸张对比来强调狩猎的低效。洛伊(Lowie)空洞地认定：“狩猎者必定要比农耕及饲养者要辛劳工作得多，才得以维生。”在这一点上，特别是演化派的人类学，乐于——甚至理论上有必要——用非难性的老调。民族学及考古学家变成了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家，在他们热中于他们的“革命”时，对旧(石器)的时代则不遗余力地大加攻击。当中包括了一些陈腐的丑闻。同时这也不是第一次，哲学家们将早先阶段的人性贬出文化，而视之为自然的东西。布雷德伍德(Braidwood)写道：“一个人终生追逐野兽，杀了来吃，从一丛草莓移向另外一丛，其生活实与野兽无异。”狩猎者由是受到了贬谪，人类学家遂放声为新石器大跃进而高唱：一个最主要的技术进步，导致了“从纯粹谋食的追求中解放出来，而造成了普遍性的闲暇”……

另外一个特别源于人类学对旧石器时代之非议，来自于欧洲人对现存采猎者——如澳洲土著，布虚曼人(Bushmen)、欧纳(Ona)人或雅冈人(Yahgan)——进行观察时他们自身所处的背景。这个民族志的背景正好提供了一个产生幼稚看法的场合。现代采猎民族所处遥远且异样的(exotic)的环境，使欧洲人欲对之加以观察，产生了(对他们情势作判)最为不利的影响。澳洲或卡拉哈里沙漠之不同于农业或欧洲人的日常经验，对一个无思想准备的观察者而言，确感惊诧：“怎么会有人可以在这样的地方生存！”同时，加上狩猎民族变异惊人的食谱，认为他们仅仅足以维生的理论再次得到了加强；他们的食物中包括了欧洲人讨厌且认为

不可吃的东西,他们这种地方小吃,遂一再被当作是他们饿得快要死了的证据。

我们应当多注意一下格雷爵士(Sir George Grey),他在1830年代考察了西澳最贫穷的地区,他对当地百姓异常切近的关注,迫使他去反驳他的同僚对这种经济灾厄所作的臆想。为了暴露他们“对野外土著风习的普遍无知”,举了一个例子:他进行考察的同僚斯特尔特船长(Captain Sturt)遇见了一大群土著在采集大量的含羞草树脂,他遂推论道:“这些不幸的家伙,已经被推到最后的困境,他们没有办法获得其他的滋养,竟被迫收集这些分泌物”。殊不知,经格雷考察后发现,这种树脂是当地人们偏好的食品。当节庆来到时,采集的场合同时促成大量民众的聚集,并一同扎营,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社交机会。他结论道:

一般而言,土著过得不坏;在一些地区,可能由于某些特殊的理由食物不足,如果这情况发生,届时人们会放弃这个区域……我只能说在他们的茅舍中,我总是找到丰富的供应。

在做这个乐观的评价的同时,格雷特别留心不将那些生活在欧洲人城镇中的困顿土著包含在内,这个例外是很有启发性的。它提示了民族学错误观念的第二个根源:狩猎民族人类学,大部分是对在别的民族管理下的“前野蛮人”的时空倒错的研究,如格雷曾经说过的:对一个社会的尸体进行验尸。

作为一个阶级,食物的采集者是逐水草而居的人口,他们是旧石器时代的孑遗;出没在与这时代生产方式极为不类的地域——一个历史世代的避难所——远远离开了文明中心及其周延,以至于未曾遭受全球化文明演进影响;因为其特有的“贫困”,独立于其他进步经济的利益与能力之外。进一步说,两个多世纪以来,欧洲

帝国主义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的干扰极为严重,其程度可以说已使得作为人类学的库存货的许多民族志评介,事实上成为掺假了的文化赝品;如果今日的狩猎民族苦于地贫穷,其物资“贫瘠而不可靠”,这是本土状况的一个指标呢,还是殖民主义迫害的结果?

2. 一种物质的丰盛

考虑到上述臆说中所谓采猎者们的贫穷,布虚曼人住在卡拉哈里沙漠而有一种“物质的丰盛”——除食物与饮水外,最起码在日常必需品方面——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新奇:

当克孔(Kung)与欧洲人接触增多——已经在发生中了——他们才尖锐地感到缺乏我们所有的东西,而想要得多些?当他们站在穿衣的陌生人中间时,他们遂感到无衣的自卑。然而,就他们本身的生活及用具而言,他们是免于感受物质的压力的……他们生活在一种物质的丰盛之中,因为他们使用的生活工具适应于他们四周取之不竭、且对任何人皆属免费的资源……即今不然,也足够维持人口的需要……(他们)由于手边原料之富,而取代了对用具的依赖。克孔人不曾发展出长期贮藏的手段;没有必要或需求受到剩余及重农品的负累,他们甚至不愿每样东西都带一件;他们借他们没有的东西。因为这么惬意,他们既不贮藏也不累积除了与个人社会地位有关之外的其他物件。

一般对采猎生产的分析都分做两个部分:食物的生产(维持生存的部类)常被单独加以处理;其余的为非为维持生存部类方面。我们此处关于布虚曼人所说的,一般地,也细节地关于从卡哈拉里至纽芬兰的拉布拉多(Labrador)或迄于智利的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上的狩猎者。古辛德(Gusinde)对鸦冈的报告中提到他们厌恶拥有一件以上日常必需的同物,他认为这是“一种自信的表现”;他写道:“我们的火地岛人,在获取和制造器物之时都不花什么大力气。”

非维持生存的范围方面,人们的需要一般也易于获得满足,这种“物质的丰盛”,部分由于生产上的简易、技术的单纯;部分由于所有制上的民主。分工方面也很单纯,主要的是性别间的分工,再加上狩猎民族著名的分享所有的自由风习,所有的人遂得以参与他们所共同备有的长期丰足。

当然,“他们所备有”的那种“丰足”,同时也建立在客观上较低的生活水准之上。具重大意义的是,他们习惯中可消费物件的限额(以及消费者的数量),都在文化上均设定在一个适中的水平。不少人衷心认为,他们拥有的少数易制的物件,实系他们的真正福分。

对大多数狩猎者,这一种在非生存领域中不须满盈的丰裕,是不辩自明的,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满足于那么少的东西——如古辛德所说,这是一种策略,一个原则,而不是一种坏运。

不要就不缺。可是狩猎者对物质这么没有欲求,是不是因为他们自役于一种“从最大数量的人中需求最大能耗”之食品追寻,而无时无力于提供他样的舒适呢?一些民族学家证明恰恰相反:他们对食物之追寻的成效之大,教人们几乎有一半的时间不知道要做什么。另一方面,游动是成效大的条件之一;在有的情况下,游动多于其他的情况;然不管多少,这种需要都足以令他们轻待从业产得来的满足。对狩猎的人,他的“财富”,说得不好听,真是一种累赘和负担。在他们的生活条件下,如古辛德的观察所显示,财货可成为“难耐的重负”,他有得越多,越得带着到处去。尽管某些采集者确实拥有独木舟或狗拉的雪橇;但他们大部分都要自己

背载教自己舒服的所有物；是故他们只保有可留教他们舒服地带来带去的那些东西。

这种对物质的需求的节制是制度化了的東西：它成为一种积极的文化，表现在各种形式的经济安排上。沃纳(Lloyd Warner)关于默宁人(Murngin)的报告中即指出了：可携性乃当地的什物的一个决定性的价值，小东西一般都比大东西好。在最终的分析上，“物件的相对运输方便性”在对其处置的决定上，超过了物件的相对匮乏性与所含的劳动价值。沃纳写道：“最终的价值是游动的自由性”。恰恰是这一种“从对社会之游动产生妨碍的种种物件的负担和责任之中，得到解脱的欲望”，使得他们“产业之心不高”且“无兴趣发展技术性的装备”。

我们可说狩猎者是“非经济人”，最起码就非生存性的物质而言，他们是任何一本“普通经济学导论”第一页上，不朽抵制式“漫画人物”的反面形象。他们的需求很少，手段则(相对地)很多。是故，他们“比较不感到物质的压力”，“没有占有之心”，表达了“产业意识的不发展”，是“完全无视于任何物质的逼迫”；呈现了一种对发展的技术性装备的“不感兴趣”。

狩猎者与现世财货的这种关系提出了清晰且重要的一点：自这经济的内部视野以观，说他们的需要“受制”，欲求“被限”；甚至连财富是属“有限”这些观念本身都是不对的。这些说法预先就设定了一个“经济人”，和一个对恶劣条件奋力挣扎的猎人；最终，他必为一种贫困的文化之咒所压服。那些词句意味着对(事实上从来没有发展过的)贪图之心的克制，对一种从未存在的欲望的压迫。所谓“经济人”不过是布尔乔亚的一个构想——有如莫斯(Marcel Mauss)所说：“不是在吾人之后，而是在吾人之前，有所谓的‘道德人’。”猎人和采集者并未限制他们的“物质性的种种行动”，他们只是从来没有将之塑造出一个体制来而已。我们习于认

为采猎者是穷的,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不如认为他们因为同样的理由而是“自由”的。古辛德告诉我们:“他们极端有限的物质所有,令他们从照料日常所需的种种杂务中摆脱,而得以享受生活。”

3. 生存经济

当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在1958年写作《经济人类学》之时,人类学的例行操演中,惯将布虚曼人或澳洲原住民当作“经济资源最为缺乏的典型例子”,“在其岌岌可危的处境下,只有对资源最集约的应用,生存才成为可能”。在今天,这种“典型”的认识可以说被倒转了过来——从来自他们的两个族群的具体资料中得到了反证。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采猎民族干的活计得没有我们多;他们对食物的追寻不但不是不断的苦工,反而是闲歇性的,有极多的闲暇——每年每人在白天睡觉的总量比任何其他条件的社会都多。

澳大利亚方面的证据在早期的资料中曾相当具体地出现过。现在我们尤其幸运地掌握了1948年美澳科学考察团在阿纳姆地(Arnhem Land)收集到的量化资料。1960年,这些惊人的材料出版了,它们引发了对一世纪来澳洲记录的重要检讨;或许也将对更长时期的人类学思考有所修正。

单从阿纳姆地的材料导出一般性或历史性的推论,我们一定会有严重的保留。不但是其理脉不够纯净,研究时间太短,同时也因为某些现代状况的某些因素——如金属工具——可能将生产力提高到超过本土的水平;不然,人口的减少也可能相对地减轻了地方上食物资源的压力。目前,我们暂时将这份证据当作是实验性的,其可靠性有赖于其他民族志或其他历史材料的旁证。

这些证据最明显、直接的结论是人们并不努力工作;每人每天

投入获取与准备食物的时间平均是四五个小时,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持续工作。生存的追求是高度闲歇性的;人们一旦获得够用的生活资料,就停止进行工作。余下极多的闲暇。显然,生存的活动有如其他部类的生产,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具备特定、有限目标的经济。狩猎和采集的那些目标并非按时完成,因而,工作方式相应地不规则。

采猎活动第三项为一般见解所意想不到的特点是:他们不但未受到可用人力与资源的节制,相反的,这些澳洲人似乎“并不充分利用”(underuse)他们客观的经济可能性。

这些群体中的任何一个,在任何情况下要增加一日采得食物的数量都是轻而易举的。尽管对女人而言,寻找食物是每日皆然的工作,她们休息的机会极频繁,并非以白昼所有的时间寻觅备食。男人们的采食则尤其间断,如他们第一天猎获大兽,第二天就休息……说不定还下意识地将扩大食物供应之利与须付出之努力互为衡量;也说不定他们是判断了足够的程度,一达目标,即停止工作。

接下来,第四点,这种经济对人们在体力上的要求并不大:调查人员的日记中指出他们都自以爲度,只有一次一个猎人是“累坏了”。阿纳姆地土著本身也并不认为他们生存的活动是为繁苛:“他们显然既不当那是可厌的差事而希图尽早结束为上;也不认为是必要的恶而将它尽量后延。”

最后,阿纳姆地资料对著名的闲暇问题又提出了什么样的证据呢?看起来采猎活动可达到超乎寻常的、自经济性的打理中获得解脱。他们的闲暇可说是货真价实的闲暇,用来休歇或睡觉;作为对工作的一个主要替换和互补性的转移,就是睡觉。

除了用在一般性社交、聊天、说闲话之类——大多在不同的活动的间隔中或煮食之时——的时间外，白天的好几个钟头也用来休息和睡觉。如果男人留在营地，他们通常平均在午饭后睡一到一个半小时；或者更长。……如果他们成天留在营内时，他们零星地小睡，大多在午后，女人们，当她们外出到林间采集时，她们休息得比男人还频繁。如果留在营内，她们也零星小睡，有时时间更长。

阿纳姆地土著之未能“建立文化”，并非没有时间，乃是因为“游手好闲”。

对澳洲土著说得够多了，至于被赫斯科维茨跟他们连上一块儿的布虚曼人，李(Richard Lee)最近两份完美的报告显示了他们与澳洲土著之间的状况完全一样。他发现，朵贝(Dobe)地区尽管雨量很少，其“植物却惊人地丰富”。食物的来源“多变且充足”——尤其是能量极高的曼杰提粟子(mangetti nut)，多到每年上亿万颗，因为没有人采食，任在地上腐烂；他报告中采食的时间长度与阿纳姆地惊人地接近。

布虚曼的数字显示一个男人的劳动——狩猎与采集——可以赡养四或五个人。表面看来，布虚曼的食物采集比法国迄于二次大战的农业更有效率，当时法国有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农民赡养其余的人口。不可否认，这个说法是误导性的；然其令人诧异的程度则更甚：李接触到游动的布虚曼人中：61.3% (248人中的152人) 是有效率的食物生产者，其余的不是太年轻就是太老。是故，食物生产者与人口总数之比为3:5或2:3。不过这61%的人“工作时间占36%，而其近40%的人则完全不工作”！对每个成年人而言，等于每周一天半到两天的工作。

同澳洲土著一样,布虚曼人用于生存所余的大量时间都在闲适或消闲活动中度过。我们再次触及了旧石器时代节奏上的特点:做一—二天,停一—二天;停的日子在营地漫散地打发,尽管食物采集是主要的生产活动,李写道:“人们大部分的时间(一周中有四五天)都花在别的事上,诸如在营内休息,或是阿纳姆地拜访其他的营地。”

就阿纳姆地与布虚曼的例子独立地看,它们对已确立的理论立场构成了即便非决定性,也是深具摧毁力的攻击。事实上,阿纳姆地考查的证据在澳洲其他区域及世界其他地方的采猎人们中都得到了不少回响。在澳洲西南雨水充足地区情况更是清楚,当地土著们获取食鱼之充裕和轻易,使得1840年代维多利亚的一个牧场主(squatter)写道:“在我们这帮人来到教会他们抽烟之前,真不知道他们平常是怎么打发他们的时间的。”抽烟最起码解决了他们没有事可做的课题:“那个成就是相当可观的……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他们的闲时分成了两个部分:烧他们的烟斗,或者向我讨烟丝。”在新威尔士东北,另一个老资格的移民霍金森(Clement Hodgkinson)就类似的情况做了非常相似的评论:“捕鱼几分钟的收获就够喂养整个部族”,“无可否认,东岸这一带的黑人从来未曾如那些悲悯的作家笔下所认为当然地那么苦于食物的缺乏。”

以上我们提到对土著经济乐观的看法——如格雷所说:“在他们的茅舍中总是发现丰足的给养”,而他所指的就包括了贫瘠的西澳——与阿纳姆地考察的发现若合符节。格雷写道——在人们不因天气恶劣而困在茅屋中之时——“两三个钟头他们就可获得全天的食物,但他们平常都惯于从一处懒散地游荡到另一处,一边闲逛一边懒懒地采集。”此外,在全澳洲深入与广泛旅行的埃尔(Edward Eyre)也说:“在这次大陆的几乎每一个我到过之处,只要在欧洲人及他们的牧畜还未曾摧毁或限制土著们原初生活方式

的地区,我发现土著们通常在三到四小时内即可获得足够供一日所需的食物,完全没有疲倦或操劳。”

回到非洲,哈札人(Hadza)长期来即具有不超过布虚曼人或澳洲土著每日工作时间的同样写意的经济,他们住在埃亚西湖(Lake Eyasi)的四周——各种动物与植物“惊人丰盛”的地区;他们似乎热中于“机会之游戏”(games of chance)甚于“狩猎之机会”(chances of game)。特别在旱季的漫漫白昼,他们大部分的时间花在连续性的赌博上,似乎为的就是尽力输掉那些在狩猎大型动物时需用的金属箭镞。而事实上,许多的成年男子,“都没有准备也不善于狩猎大型野兽,即使他们手握必要的弓箭也没用”,伍德伯恩(Woodburn)写道:“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活跃的大野兽猎人;尽管女人是比较有恒心的工作者,她们的工作也都是闲散而没有长时间的劳作的。”虽然是这么的漫不经心且相当有限的经济活动,哈札人“仍然可获足够的食物而不需过分的努力”,伍德伯恩为他们生存必要的劳作提供了一个“概括的估计”：“以今年来说,恐怕平均一天只有二个小时是花在获取食物之上。”

有趣的是哈札人为了保持他们的闲暇,始终拒绝“新石器革命”。尽管他们四周都是垦植者,他们直到最后仍拒绝农耕,“主要是因为那需要太多的苦工”;这一点类似于布虚曼人,后者对新石器体制的反应是“世界上有那么多邦戈邦戈栗子,我们干嘛要耕作?”伍德伯恩虽未明言却给我们一个印象:哈札人实际上比他们东非的农耕邻居们在维持生存上花费较少的能量,也花较少的时间。

猎人们对农耕的态度,将我们引进了他们与食物获取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之中;再次地,我们进到了他们经济的内部领域,这个领域常常是主观的且总是不易理解的。在这方面,狩猎民族似乎有意加重我们理解的负担,他们具备了那么奇特的风习,遂授人

以柄,成为极端性的解释:“他们不是笨蛋,就真的是无所可忧虑之处。”前一个解释是基于他们的经济条件恶劣的前提下,从他们的漫不经心而作出的逻辑性推论;另一方面,如果生计容易,成功可期,人们的似然无思虑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在谈到市场经济的独特发展将匮乏制度化方面时说:我们“对食物信赖的动物性被阻碍了,而对饿死的赤裸恐怖则漫然四溢;所有人类文化的存在之所欲缓和的、人被物质屈辱地役为奴隶的景象,遂再次有意地被加强了。”可惜的是,那是我们本身的问题,并不是他们——采猎的人们——的问题。我要强调的是,透过他们的自信我们才能理解看来奇怪的文化;而这种自信则是在普遍成功的经济中非常合理的人性特质。

关于猎人们经年自一营地到另一营地的游动,这种迁徙我们当作一种烦人的现象,他们却以一种恣意之情而行之;史密斯(Smyth)详细述说了维多利亚区的原住民,没有例外的是,“懒散的旅行者,没有什么动机敦促他们加快行动。”

在狩猎者与采集者中,他们经常表现出一种教人恼火的“缺乏先见”,这是一个更严重的课题。他们永远针对现在,对翌日会怎么样,丝毫没有“最起码的考虑或担心”。狩猎者似乎不愿意节用物资,对必然前来的劫数缺乏有计划地反应的能力。他们反而采取一种知情的冷漠;那表现在其伴随的两种经济取向之中。

第一:“挥霍”——一种将营中所有食物一下子吃光(即使在困难的时期)的倾向。勒朱尼(Lejeune)在谈到蒙他那人(Montagnais)时说:“好像他们要猎的畜牲是在厩中似的”。巴斯斗(Basedow)谈到了澳洲原住民,其座右铭:“可以解释为今朝有酒今朝醉;如此说来,一个土著倾向于一次吃光所有的给养,而不愿慢慢一点点的吃。”勒朱尼本人甚至亲见这种挥霍导致了灾祸的来临:

我告诉他们这样处理不当,最好保留为来日之用,那么他们就不会那么受饥寒所迫了。他们则讥笑我,“明天”,他们说,“明天我们会就猎获的大吃一顿”。是的,他们获得的不过是寒与风。

有同情心的写作者试图将这种明显的不切实际加以合理化。解释道说不定他们是饿得头脑不清楚了;他们之所以狼吞虎咽乃因为久不知肉味了——而他们自以为很快又会猎获了。不然,就解释说一个人将他所有的给养请客吃掉,是遵从社会义务的反应,是遵行分享这一重要的规定。勒朱尼的经验和这两个解释都不一致,却提出了第三种解释——蒙他那人自己的解释:他们并不担心明日会怎么样,因为就他们而言,明日带来的是更多的一样东西——“大吃一顿”。

另外一个随之而来的倾向可说是“挥霍”的相反一面:不能够收藏剩余,建立仓储。就许多的采猎者而言,似乎食品之贮藏并非技术上不可能,也不是他们未曾意识到这种可能。我们必须调查,在实际情况中有什么因素使得他们不去尝试。古辛德问鸦冈人这个问题,答案则为同样的乐观主义,贮藏会是“多余的”:

因为整年过来,大海都以近乎无边的慷慨将各式的动植物供应狩猎的男人及采集的女人。……基本上,我们的火地岛人知道他们不必为将来操心,是故,他们不屯积给养,年复一年他们期待着明日,没有过虑……

古辛德的解释本身似乎不错,但恐怕不足。一种更复杂或微妙的经济考虑似乎在作用着。食物库存之有利与否当拿来与一定

范围地区内采集所得之报酬递减相权衡。对猎人而言,减低一定地区赡养能力的无控制采猎倾向,是绝对需要避免发生的情况,也正恰恰是他们游动的主要原因以及他们生产的基本条件。库藏的潜在不利性恰恰在于屯积财富与游动能力两者之中的矛盾,它将会把营地固定在一个天然食物资源很快就会枯竭的地区;积累的库存所造成的游动不便,人们可能更因之受到比在不同处所狩猎少许、采集少许更大的损失,因为,大自然,可以说,成为了自己的库藏——而大自然库藏中食物之多样性与丰富不但更为可欲,且是人力所收藏不了的。

4. 重新理解狩猎者与采集者

明显的,采猎经济必须重新加以评价:评价其真正的成就和真正的限制。传统知识的程序上的荒谬在于:从物质资源的情况向经济结构强以为解,从这一种生活的绝对贫乏中推论其绝对的困难。但是,文化的设置总无例外地是在大自然的关系中创发辩证。虽不能逃避生态学上的种种节制,文化却否认了它们;是故,整个系统同时地表现了自然诸条件的印记,以及社会反应的原创性——体现于它的贫困,也体现了它的丰裕。

采猎经济的践行中(praxis)真正的困难何在? 如果我们的例子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并不在于“劳动生产力的低落”;相反,这种经济乃严重的苦于“报酬递减现象”。自生存出发以扩及所属的部类,起首的成功似乎仅足以产生使进一步努力收益更小的或然性。这说明了—定地区食物采集的典型曲线:一个中型的族群通常早晚会用罄营地附近周延的食物资源;在那之后还留下不走就只增加实际成本而减低实际报酬了——如人们决定越行越远的追寻,成本就增加;如他们忍受缺乏的供应和近便较次的食物,实际的回收也就减低。解决的办法,当然就是到别处去。是故采猎的首要

决定性要件即：以游动维持生产的有利条件。

然而，这种游动——视情况而有频繁与距离之别——同时也将先天的报酬递减性转移到其他生产领域里去：工具、衣着、器皿或饰物，其生产不管多容易，只要一成了负担而非享受，制造它们即失去了意义；在可运输性的边际情况下，效益骤减。建构固定的房舍于是——因随时要加以弃置——成了荒唐的事。于是，猎人们对物质福祉的概念，是为禁欲式的；只对最少的装备感兴趣，对小的东西比大的评价要高，不喜欢有两件以上的同样东西，等等。当什么都要靠肩膀去担的时候，生态的压力遂以异常具体之势而出现了；如果说猎人的总生产短于其他的经济，应该怪的是他们的游动，不是他们的生产力。

同样的道理似乎可应用到说明采猎民族的人口节制上。人种“消除人口或物质”(débarassment)政策，在采猎民族一般人的层次作用着；以同样的原因，也以同样的方式。其方式可说是“冷血的”——受制于可运输的边际报酬递减率，维持最少的必需的工具，去掉一切重复等等——具体的也就是杀婴、杀老，哺乳期的性禁制等等食物采集者著名的风习。如果认为这种机制乃由于不能“负担”更多的人口，这一种假说大概是不错的，但是所谓的“负担”，指的是携带他们，而不是喂哺他们。这些人们要消除的——诚如猎人们时时悲伤诉说的——恰恰是那些不能有效游动，乃至妨碍家庭或营地游动的人们。猎人们被迫以处理东西的方式处理人，这种留下龙种的口政策，有如他们禁欲的经济，都是同一生态现象的反映。进一步说，这种人口节制的策略，同时也是对付经济上报酬递减的较大范围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地区的族群之容易受制于报酬递减——或游动及分裂的压力——在于其人口数的大小(其他因子一致的话)。只要人们打算维持地方性生产的优势，维持社会或生理的稳定，他们的马尔萨斯式实践是令人不快

地一以贯之的。现代的采猎者,在其极为恶劣的环境下,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极分散的小社群中生活。然而,这种人口模式毋宁说是生活得较好的代价,而非生产不足,赤贫的工资的结果。

采猎经济实际上克服了它本身的所有弱点。周期的活动,人口与财富的节制等不但是经济实践上的必要,也是创造性的适应。恰恰在这情况下,丰裕成为可能。游动与节制使得猎人们的目标处于他们手段所及范围之内,是一种“不发展”的生产模式,因而高度地有效率;他们的生活并不如外人所认为的困难。在某些方面,这经济反映了可怕的生态,然而也是对那生态的反作用。

现时期民族志中关于采猎者——特别是那些在最差的环境中者——的报告中一再提到,每个成年人每天用于食物生产的时间为三至五个小时;他们的工作时间和银行家一样;显然低于现代工业的工人(包括工会组织保护下的工人),所有这些工人无疑会极乐于接受这种每周 21—35 的工时!

传统上认为采猎者除了单单生存外少有闲暇,也是绝对没有的事。这方面,人们习惯于用旧石器进化之不足为解,并进而对新石器产生的闲暇齐声欢呼。事实上这传统的公式只有颠倒了才是真的;工作的总数量(每人口的)随着文化的演化而增,闲暇则随之而减。

在认识到采猎乃一种丰裕的经济时,我不否认某些猎人会有困难的时候。在伍德伯恩的记录中,他们有的人认为人之会饿死,甚至于饥饿超过一两天以上,也是“不可思议的”事。但其他的——特别是在极边远荒僻地区四散的小群猎人们——是周期地暴露于限制他们的旅行或接近猎物的严酷气候之下的。他们有时很受罪——尽管可能只是部分人受到影响(特别是对不能游动的家庭产生较大的影响)而非整个社群。

尽管如此,就算是这些易受威胁的弱点,暂时姑且以处境最差

的猎人作为比较，要证明贫困乃采猎者的特征仍然是极为困难的。以这个生活方式言，食物之短缺并非象征性的特质（不像其他经济）、我们断不能因之将采猎者划为一个阶级或进化阶段。罗伊问道：

像畜牧者，他们的给养周期性受瘟疫所害——如 19 世纪一些拉普（Lapp）族群，他们率自转回去成为渔人——我们又怎么说呢？至于原始农耕人民，开垦了土地却无能收获，用尽了地力而去就另一地方，同时受旱、涝、虫灾的威胁又怎么样呢？难道他们比起采猎民族来说，对自然条件而生的灾厄有更大的掌握吗？

同理，最最重要的，我们今天的世界又怎样？全人类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每晚以饥腹入眠。在旧石器时代，这比例必定小得多。我们现在才是空前的饥饿时代，今日，在这个伟大的技术能力的时代，饥饿成了一个建制。再把一个可敬的公式颠倒过来：饥饿的总量相对地也绝对地与文化演进齐增。

这么一个困难局面恰恰是我论旨的中心：采猎者在环境的势力下，采行了一种客观地较低的生活水准；但就他们的目标而言，配上他们适当的生产手段，所有人的物质愿望通常能容易地获得满足。积是之故，经济的演化产生了两个相矛盾的动向：增富的同时贫困化，对自然界的占有伴以对人的剥夺。进步的侧面当然是科技；它以多样的方式被加以宣传——“为需要服务”的财货与劳务在数量上的增加；被驯服的能源之文化服务的数量增加；生产力的增加，分工的增加；从环境对人的控制中解脱的增加。这最后一项，对某些观念持有者而言，于最早阶段技艺进步的了解特别有意义。他们认为农业不但将社会提升到自然食物资料的分配之上；

它使得新石器社区得以维持高度的社会秩序；在其中，人类存在的种种需要因而与自然的秩序相脱离。某些季节有足够的食品收获了，以便在无任何食物生长时维持人们的生活，这一切所导致的社会生活的稳定性是物质增殖的关键；文化自是从一个胜利跃向另一个胜利，以至于证明它能在外太空养人——甚至于重力和氧气都是天然所无的。

恰恰在这个同时，在世界某处的市场上，有人饥饿而死。这也是种种科技的、也是种种结构演化成果。那些结构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事关权势也关产业。它们在一个社群中发展，而今则发展于社会之间。无疑，这些结构都是技术发展的功能性与必要的组织；但在帮忙增加社区内部的财富的同时，它们在财富的分配上造成歧视，在生活的方式上造成分化。世界上最原始的人们拥有很少的物件，但他们并不穷。贫穷不是少数量的财货，也不只是手段与目标间的关系；最根本的，贫穷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贫穷是一种社会地位。是故，它是文化的创造物，它与文明共生共长；同时，它是阶级之间一种为人怨愤的区分。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朝贡式的关系——这关系可以使得农作的乡民比起任何爱斯基摩人的冬季宿营，更易于受到自然灾害的威胁。

阶级社会创造的贫穷问题，随近代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加剧；进一步使得“匮乏”的意义在社会中成为主导，具普遍性。换言之，当文化达到了接近其物质成就的最高顶点时，它遂为“不可能企及”的“无限需求”建立了神主牌位，奉之为神圣了。

从认识论的高度再思考“发展经济学”

——《原初丰裕社会》代译跋

丘延亮

剑桥的资深经济学教授裴安·罗宾逊女士 1977 年在《当代亚洲期刊》第七卷第一期,发表了一篇题为《正统经济学的准绳》的短文^[1],文中她写道:

经济学理论的所谓主流教旨有一种奇异的自我封缄(selfsealing)能力。每一个借着批评造成裂隙,意在于自现实中透入些新鲜空气的企图,结果都一律被堵塞了:方式是容纳那些点点滴滴,却力拒受到真正影响。职是之故,后者的老教条可以重复如故……^[2]

这段话除了它的普遍意义外,对“发展经济学”的发生、演变,以至于它今天和正统经济学家爱恨相交、纠缠不清的关系,都是一针见血的最好写照。

比如说, Peter Hall 1983 年的教科书叫做《成长和发展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写作的目的是使“发展经济学”受管束(manageable),并在“标准”经济理论(引号是原作者加的)和特别考虑发展国家诸问题的经济学分支间建立一个桥梁。因为他听到学生们的抱怨:在学习“发展经济学”时,见不到基本的结构。如果他花了一整本书的篇幅,重复教条,目的在

“意欲为发展的研究提供一个架构,使得它能逻辑地和有结构性地
进行”^[3]。然而,这时候,他却忘了第一页中他写的“发展的情境已
成为经济学科主体中所有新观点的试验场……而进一步的假设也
直接来自于发展的经验本身。”^[4]

我想,在这儿正反映了一个认识论上的困难,如果注4的引言
是对的,一个先验的结构或逻辑能以什么样的样式介入现实呢?
转过来,如果注3的引言中的办法是唯一可行的,世界范围天天发
生的分歧事例又怎么加以和解呢?问题是,过去解决前一个问题的
办法——种种“中层理论”(middle range theory)和模型建构
(model building)的努力及演绎归纳跳接的功能论拼凑——已不
够用。解决后一个问题的手法——一时以例子证道理,一时以例
外证同一个道理,或同时以一个或多个例子或例外进行倒证——
也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失去了信用。我们是不能不日渐被迫面对认
识论的真正问题了!

其实,任何一个经济学家就其训练而言(by training)基本都
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作为人类的认知活动的一支,他们活在一个
具随机法则的随机世界中(a stochastic world of stochastic order),
日日以随机的模型(stochastic model)对这随机世界的随机法则的
运用加以模拟。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个活动接近纯数学,没有必要
与现实世界发生什么明显的必然关系。但是,几乎从第一个称他
自己为经济学家的人开始,他就赋予了自己的行业担负社会工程
师的任务;由于这一开始即然之自我认同的混淆与二重性,经济
学家永远是应用经济学家;不像纯数学家永远成不了应用数学家(除
非从头重新来过)。这种二重性的结果,一方面对比较纯粹的理论
发展产生了掣肘;另一方面使他们对庸俗经验论及庸俗实证论的
中途站(halfway house)较轻易的照单全收。尽管如此,内化了的
二重性总是难免产生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c)效果的;正统经

济学与发展经济学之分,宏观微观之辨都是这种效果的反映。

有趣的是,经济学家们内部尽管龃龉不断,却无明显的分裂或根本性的大辩论;所有人仍相当一致地致力于维护他们在科技官僚阶层的霸权统治。这事实是有它一定之认知的(intellectual)基础的。也就是说,宰制经济学话语(discourse)的中心价值始终指向简单、干净,因而漂亮、有力的“逻辑”操演。在这个价值的主导下,发展经济学家遂被陷在两面不讨好的进退维谷中了!

为什么呢?我们不要忘了,要把变动不居,复杂不堪的大于世界,放进一个随机的模型中去“逻辑”,首先必要极力忽略事象,大胆作化约(reduction);一直化约到这世界只有供、需,资本、劳动、利率以及其他极少数范畴(categories)存在为止。虽然这个化约的过程从来没有清楚过,化约的剩余却是所有经济学家共同接受的。因为,非如此不足以建构模型、建立通则,使经济学成为一门规范的科学(nomothetic science)。反观发展经济学,一方面似从地上的实际出发,却必须建立在随机的范畴运作上;一方面着眼于具体殊相,却必须以抽象的通则为其指涉架构;一方面要面对恒在之历史的偶然,却必须将历史的叙事(narrative)驯化成发出同样声音,以为超时空法则佐证的标本。一方面以X、Y座标捕捉趋势,却必须进行预测、制定方案、指导经济因子的上下去落。

然而,20世纪最主要经济史家之一的卡尔·波拉尼早在1994年就明白指出了,经济科学中把活生生的人叫做劳力,生生不息的自然界叫做土地;两者都可以买卖;前者所得叫工资,后者叫地租。这些都是假的,这些假造的(fictive)范畴,把人化约仿佛他们是劳动力,把自然化约仿佛它们是资源;人和自然却并不因而真的不见或不存在了。人们和大自然的生活、生产和生长以及其再生活、再生产和再生长都还是要不断地进行的;只是那已不再是经济学家所关心的事罢了!^[5]这个把人和自然都化没掉的成就,也就是

Louis Dumont: 在他 *From Mandeville to Marx*⁽⁶⁾ 一书中仔细抓梳出的“经济意识形态的衍生及其胜利”(The Genesis and Triumph of Economic Ideology)的历史。换句话说,人和自然不是自来就不存在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即令在今天,它们也只是对于经济学家们的意识形态而言才是不存在的。同时,这意识形态不但是新近的创造,也仍然在不断地重新制造中。了解这点,或许能比较了解 Fernand Braudel 为什么在他西欧史的巨著⁽⁷⁾和意味深远的小说⁽⁸⁾中,都把物质文明(material civilization)和资本主义(capitalism)相对待。进此,Kochan 把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et Capitalisme, 1400 - 1800* 一书,英译时称之为 *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 - 1800* 是犯了大错了。但是,Braudel 的问题是他没有搞清楚,如果说西欧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前有“大转型”(Great Transformation, K. Polanyi 语)的话,这个大转型在一定的意义上都是假的;不过把人和自然假化(fictionalize)为劳力和资源,人和自然的生产与再生产问题在欧洲中心的对外扩展中,外化为诸殖民地和诸古文明或(今天)第三世界的问题罢了!如此看来,Immanuel Wallerstein 会那样错误的读进(read into) Braudel 也绝不是偶然的罢!至于其从者如 George T. Crane 谈到台湾在世界体系中的“上升”,似乎也能找到可以理解的缘由了!⁽⁹⁾

如果我上面的分析是对的,其理论的结果之于“发展经济学”是什么呢?首先,如果发展经济学处理的是现实世界不发展、未发展或发展中经济的诸问题的话,这个属于“发展”之外的经济事实所逼使吾人面对的,恐怕正恰恰是那些没有办法像“发展经济”中那样 fictionalize 或外化掉的真真实实的人与自然,其生产生活生长,其再生产再生活再生长的种种问题罢!这些正恐怕恰恰是 Braudel 范畴中的物质文明(物质生活或叫民生)的问题罢!它和发展了的、资本主义化的、假化人与自然的、外化人与自然的维持

与再生产成本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应该完全没有共通的问题性(problematique)的罢!

恰恰是这个事实,这个真切的世界,我们的发展经济学家从认知的进退维谷再次跌落现实的死胡同:人家的牛刀,借了过来,竟完全用不上手上活蹦乱跳的小鸡!这不打紧,世界级的斗牛师傅、小试其霍霍牛刀,大多也屡屡失手,鸡犬无以升天;例子太多,有机会再细细数来。

在这个节骨眼,塞林斯倡议已久的民生学(Anthropological Economics——有别于通常为人熟悉的经济人类学(Economical Anthrpology)——似乎闪现了一丝新意。假如说,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人类学中主要的辩论将存在于实体论(substantivists,以Polanyi为代表)与马克思主义者(Marxist,以Marx为代表)之间的话^[1];我相信90年代第三世界自己的所谓“发展经济学家”,则必须走到民生学的路口,才能够找到出路,才能解决从正统经济学中走出却无处可去的困境。《原初丰裕社会》一文是民生学的最早一篇力著,标示了民生学的可能,也展现了自学院经济学、学院人类学跨出而能开拓的广大天地。准此,谨以其中译奉上未来半世纪所有可能的同步者,期即开始思考、工作。^[1]

注 释

[1] Joan Robinson, "The Guideline of Orthodox Economic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7, No. 1, 1977, pp. 22-26.

[2] *ibid.*, p. 22.

[3] Peter Hall, *The Economics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 1983*, St. Martin's Press, N. Y., p. 313.

[4] *ibid.*, p. 1.

- [5]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944, Beacon Press, Boston.
- [6]Louis Dumont. *From Mandeville To Marx*, 1977,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 [7]Fernand Braudel, *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 - 1800*, I - III, Translated By Miriam Kochan, 1978, N. Y.
- [8] Fernand Braudel, *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Patricia Ranum. 1977,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 [9]George T. Crane, "The Taiwan Ascent: System, State and Movement in the World-Economy," in *Ascent and Decline in the World System*, Edward Friedman (ed), 1982, Sage.
- [10]Rhoda H. Halperin, "Polanyi, Marx. and the Institutional Paradigm in Economic Anthropology" in *Research in Economic Anthropology*, Vol. 6 (1984), pp. 245 - 272.
- [11]客中书籍资料甚缺,匆匆无法尽言。如有查询,当尽力查证奉告。

4. 权力与能见性：发展与第三世界的发明和管理^{*}

◆ 埃斯科巴(Arturo Escobar) 著

◇ 卢思骋 译 张彩云 校

本文将简要地介绍一篇博士论文(Escobar 1987)的基本论点和分析进路。这篇论文是关于一些国家(当中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地区)如何被建构为“第三世界”(Third World)或“低度发展”(underdeveloped)地区,以及其后所受到的对待。近年不同领域的论著探讨:在社会现实之再现(representation)中,话语与权力之动态关系。本研究在这些论著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1)一种关于这些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新思想模式如何在二次大战后初期形成;(2)这种新思想模式如何扎根在西方的经济实践中;以及(3)让“发展”产生作用的体制性实践(institutional practice)——既让“发展”这套话语得以施行,同时创造了更广泛的文化与社会关系。本文将通过哥伦比亚这个国家的具体经验,说明其中的一些论点。在结尾部分,本文将提出一些与人类学相关的结论。

-
- * 本文原题为“Power and Visibi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Inven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Third World”, by Arturo Escobar,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3(4), 1998, pp. 428—443,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发展”之编造发明

1949年7月11日至11月5日,国际重建与发展银行(即世界银行)组织的一个经济代表团访问哥伦比亚,目的是为哥伦比亚制定一个全面的发展策略。这是国际银行首个派往低度发展国家的同类型代表团。代表团中包括14名来自不同领域的国际顾问:外汇、运输、工业和能源、公路、铁路和航道、社区设施、农业、卫生和福利、石油工程、金融、银行与国民收入等生产核算领域。与代表团紧密合作的是一群来自相同领域的哥伦比亚顾问和专家。

以下是代表团为自身定下的任务,因此也成为它所要作的建议的特点:

我们理解我们的权责范围,乃是建议制订一套全面的和内部贯彻的计划……而非单是提出连串没有关联的建议。哥伦比亚经济中不同部门的关系非常复杂,只有对这些部门进行细致的分析,才能构成一幅贯彻的图画……我们不会建议哥伦比亚采纳一套根本上全新的秩序。刚好相反,我们只寻求对现状作出修改,将“经济发展”之重点稍为转移,以及提出一些改善和改革的建议。这就是一个全面发展计划的依据。片段的、零散的努力,最终改变不了整幅图画;只有对整个经济作出全方位的进取措施——包括教育、医疗、房屋、粮食和生产力等方面——贫穷、愚昧、恶劣的卫生和生产力低落的恶性循环方能彻底打破。只要打开缺口,经济发展的动力就会自行持续下去。(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1950: xv)

这个计划寻求“一些改善和改革的建议”，涵盖了经济活动的
所有方面。这种取向最强调它广泛而综合的性质：一方面，它的广
泛性质要求对所有重要的社会和经济方面向进行干预；另一方面，
计划的成功落实，有赖谨慎的企划、组织和资源分配，此为其综合
性质。这份报告不单附加了十份“可供专家参考”的技术性附件，
还提供了详尽的解困妙方，包括最终的目的以及可以量化的目标，
不同部门所需的投资、设计准则、研究方法等等。简言之，它构成
了管理国家社会经济事务的一种崭新取向。

然而，前往哥伦比亚的代表团，只不过是一套用来处理大批国
家面对的所谓问题的全新策略的第一个具体表现方式。二次大战
后，不计其数的国家被界定为“低度发展”地区。千差万别的国家，
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低度发展”地区后，目标变得千篇一律：创建一
个新社会；这个社会拥有物质上和组织上的条件，为它尽快达致工
业文明的生活模式铺路。整套话语环绕着一个虚拟的建构（“低度
发展”）而产生，将以上的单一目标潜移默化，逐渐成为每一国家都
必须达到的共同目标，并为它们提供达致目标所需的分类系统与
技术。此套话语于1945年至1955年出现和成形。当时正值战后
的大转型，这套话语令贫富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和范围上都
出现了急剧的变化，并且总的改变了人们对政府和社会应该做些
什么的想法。

这套新策略（“发展”）的历史根源，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
战国际层面上政治力量的重新整合。在西方（以及东方）重新界定
自己和环球权力结构的过程中，“低度发展”地区和“第三世界”成
为了行之有效的概念。^{〔1〕}在此，我们没法就发展策略出现的历史条
件详细地逐一分析——当中至少包括了旧有殖民体系的崩溃，人
口和生产结构的转变，共产主义的胜利以及伴随面来的资本主义
世界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此外还有因为马歇尔计划成功带来的对

科学与科技的信念,新形式的经济知识和区域研究的发展(例如“拉丁美洲研究”),以及对复杂的社会系统日益丰富的管理经验。大战结束迫使先进国家(尤其是美国)必须开拓海外投资机会和产品市场。这反映了一个事实,美国工业的生产力在战时增加了差不多一倍。经济发展、初生大财团主督促的贸易自由化以及多边财务机构(如世界银行与1944年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皆是成就这些需要和推行新策略的主要工具。^[2]

虽然如此,发展却并非纯粹是这些因素带来的结果,并非这些因素集结后并逐步演变的结果。发展亦不是新型知识或新型体制的产物,不是对资本运作环境的转变而作出的反应,也不反映对国际性贫困的新触觉或马歇尔计划的成功。发展倒是一个体制确立后的产物,这个体制集合上述所有的因素、机构和实践,在它们之间建立一套关系,保证它们得以继续存在。“发展”作为一种思考模式和各种实践的来源,不久便成为了一个无处不在的现实。穷国成为了无休止的计划与干预的对象,而这些计划与干预看似无法避免,更确保了穷国受到控制。这些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一切重要的事情(人口、资本累积的过程、天然资源、农业和贸易、行政管理、文化价值等等),皆成为了落实“发展”而出现的新科学领域所产生的专家直接计算的对象,亦通通成为由新近组成的一系列机构所设计的干预的受体。在短短几年间,这套前所未有的策略迅速扩展,影响社会的所有方面。

发展的专业化和体制化

众多当代学者有力地论证,话语的生产和流通是权力运作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例如可参考 Foucault 1980, 1881; Frow 1985; Said 1979)。发展本身作为一套话语,精彩地扮演了这个角

色。就这方面而论,下述两个机制必不可少:

1. 发展的专业化

专业化这个概念,是指一套用以组织、管理和控制知识的产生、扩散和确立的技术和性实践(*disciplinary practices*);换句话说,就是创造和维持一套真理政治(*politics of truth*)的过程。在“发展”这个案例中,达致专业化就是将现有的学科规范,应用到第三世界的问题上,又或是创立新的附属学科(包括医疗保健、人口、城市规划、教育、营养人类学等等,当中又以发展经济学为最重要,这点会在稍后讨论)。因此而出现各种理论,成功地将各样的处境和行为等变成被看见的现实(*a visible reality*),一个能够接受特定药方的现实。

在拉丁美洲,为了符合奉行发展主义的国家机器的需要,知识体制与风格在1950年进行了一次大重整。新的专业人士采纳了主要是源自美国的经验主义社会科学(*empirical social science*)的研究和教学模式(Fuenzalida 1983, 1985)。在美国本土,“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在主要大学扎根巩固,为生产关于第三世界的真理和规范化知识,启动了强有力的机制。欧美大学对第三世界学生的训练,提供意见的国际顾问(例如世界银行的代表团)以及第三世界的大学的专业学者日渐接纳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模型等,都是将发展问题专业化的重要因素。

2. 发展的体制化

这个机制是指一个体制性领域的建立;各式关于发展的话语和技术,都在这个体制性领域内,或由这个领域生产、纪录、确立、改良以及投入运作。带来这些效果的发展体制网络包括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以及它的“技术性”机构)、双边机构(例如美国国际发

展局[the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志愿组织(比如 CARE)、以至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全国性、地区性和城乡性组织。这些机构通过应用计划、会议、专家小组、顾问意见等,利用关于发展的知识,通过利用特定模式的知识而产生特定的介入方式,这些机构构成一个网络,组织能够被看见的以及不能够被看见的事物,让权力运作变得可能。

专业化与体制化过程的合流,主要依赖发展规划这门技术。前述那个世界银行的代表团,于 1949 年发表了《哥伦比亚发展计划大纲》,为该国首份发展计划。自始以后的 40 多年,类似的计划推陈出新,从未间断。翌年,有关当局成立了一个全国规划委员会和另一个经济发展委员会。虽然它们的活动规模有限,但为 50 年代末期职能更全面、权限更广泛的发展规划机关奠定根基。与此同时,自 50 年代中期开始,地区性的规划委员会也逐步成立(例如,在哥伦比亚南部肥沃的考卡河谷(Cauca),就设立了一个地区性的发展组织,依照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的模型发展;参与该组织的除了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外,还包括世界银行。)哥伦比亚的首项发展计划,事实上是由外来的组织制定,而且在五六十年代这段“规划时期”内,全国性的规划机关皆依赖外国专家的意见,反映哥伦比亚欠缺(所谓)符合资格的本土人才。因此,一批又一批的哥伦比亚学生被送往海外的大学(尤其是美国),学习新技术的知识和发展规划这门新兴事业所需的思维模式。^[3]

在发展的新天地里,规划师与经济学家扮演着特别的角色。然而,规划却绝非单纯的理论应用;规划直接地联系到国家机器和政策,是令经济学得以被应用的工具。因此,致力生产关于发展的基本真理的发展经济学家,堪称专家中的专家。人们相信,落后国家的底蕴奥秘,会在经济学家专注——当然也是不带偏见和客观

中立——的凝视(gaze)下,逐点揭露出来。在下一节里,我会简略地检视经济学家这个独特而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作为一门新科学的发展经济学

40年代末期,加尔布雷思(John K. Galbraith)开始在哈佛大学教授“贫穷与经济发展之经济学”。他在1979的著作中,忆述当年同事对他所抱的怀疑态度:“关于贫穷国家的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一直被认为是并不存在的。”到了1955年,这个情况已彻底改变,甚至到了一个地步——继续引用加尔布雷思的忆述——“将穷国人民从水深火热的贫困中拯救出来的研究的触目程度,是其他经济学领域望尘莫及的。”(Galbraith 1979: 29)于是,一门新的学科——发展经济学——诞生了,并自行肩负起指引整个发展过程的重任。要了解发展经济学的历史,就得先分析它出现的条件:它是如何在既有的经济学学说的基础上出现;发展经济学家如何建构“低度发展的经济”,以及他们那套话语当中的理论,是如何体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和发达国家文化的特点;最后,这套新的科学是如何取代和吸收了第三世界自身战前的经济话语。

正如原初所构想,发展经济学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副产品。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全球经济危机,为经济学理论带来了一系列的新课题,具体表现于凯恩斯主义和一套崭新的增长经济学。增长理论于30年代末期至40年代中期,在英美两国发展起来,成为发展经济学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先驱。根据这套理论,要使经济有所增长,便得将一定部分的成果储蓄起来和用作投资。储蓄和投资达到特定水平时,实质的增长率将取决于新投资的生产力。与此同时,投资创造的新生产力必须得到工资上升和新增需

求等条件配合。如此,经济将会增长,生产和生活水平皆会因应提高。惟一需要做的,只是定下一个“储蓄率”,以使在一定的生产力下,令国民生产总值(GNP)达致理想中的增长率。

尝试将这套理论应用于“贫穷”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家不久便发现,储蓄的水平还是不足以维持增长(“储蓄差距”)。他们也发现一个更为优越的投资领域——工业化发展——因为工业化发展的资本累积效益是其他领域所无法比拟的。工业化是发展的关键所在。正如发展经济学先驱之一刘易斯(W. A. Lewis)1946年就牙买加的工业化计划所言,这道理“清晰如朗日”(引自 Meier 1984:143)。工业化不单带来经济增长,促成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更在当地人口中间传播一种适当的理性。正如刘易斯所言(Meier 1984: 143),这种理性再助“训练一群劳动人口,令他们习惯工厂的纪律(discipline)”。再者,与其让那些(所谓)剩余的人口在极缺乏效益的农村游手好闲、虚耗光阴,不如利用工业化吸引他们从事更高生产力的活动,国家也能在国际经贸中提升竞争力。工业化推行的具体面貌成为了50年代形成的众多发展模型的核心问题。因为工业化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计划于是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环,而为了拉近储蓄差距和引入所需技术,外国援助、贷款和投资都变成是必须的。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要打破贫穷、低生产力、资本短缺等恶性循环,在最初阶段有赖[政府]大力推动。尽管如此,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只要投入足够的资金和使用正确的技术,这个任务是可以驾驭的,而落后的经济终将能够走向现代化。^[4]

拉丁美洲战前的经济话语,却是另一番图像。当时的经济话语,比较接近19世纪的模式,经济、社会与政治因素不可分割。这跟50年代以后引入的经验主义经济学或社会学完全是两回事。当然,变化不是没有的,尤其是在二三十年代,(如实证主义的残余影响,“现代化”和工业化开头数十年所催生的不断壮大的工业阶

级,这些改变为日后的发展经济学打下了基础。然而,这一代深受新科学精神影响的人所提出的建议,跟“发展”起步以后所提出的种种建议,却是显著地不同。在哥伦比亚,直至1949年第一个世界银行的访问团到访为止,情况正是如此。战后主要的改变是形成经济话语的系统本身。这段时期建立的一个新的结构并合了一个理论体系(发展经济学)、一些实践(例如政策与规划)以及国际性和全国性组织,令一套崭新的经济话语得以在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事件上形成。这个系统改变了经济话语建构的对象、概念与策略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人们要求经济学成为改变低度发展社会的主导力量,从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想像和理解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方法。利用这个优势,经济学自始渗透影响着发展的所有实践。

粮食与营养规划:发展之运作的一个范例

现在,让我们扼要地阐明“发展”如何具体体现一套实践的主导体制(regime of practices)。检视发展,就等同于检视针对特定问题的实践,而这些问题的出现,正源于既存理论和制度性机器(institutional apparatuses),而断非独立于它们之外。在文章的这部分,我将会展示在建构一个特定问题时——饥荒的问题,一套具体的理性技术如何既组织知识,又组织权力,并为两者打通经脉,浑成一体。

1970年以前的40多年里而,对抗第三世界的营养不良与饥荒的策略层出不穷,但它们宣称要消除的问题,却依然屹立不倒。直至1970年,营养不良仍或多或少被归咎为粮食、医疗、卫生与教育的不足,而这些因素都只被视为是个别的、互不相干的原因。在70年代初,基于过去种种努力的失败,包括诸如绿色革命等堂皇

宏大的策略,人们相信只有一个全面和综合的策略,才能有效地应付导致营养不良和饥荒的复杂成因。根据这项新理论,粮食与营养政策必须成为国家整体发展中的一环,并应该考虑到把关乎粮食与营养调控系统的各个主要方面,包括粮食供应(生产、价格、进口与出口等)、对粮食的需求(收入、饮食习惯、教育、津贴等)以及对粮食的生理耗用(健康、环境因素、年龄、性别等)。如此,规划又一次被征召上场,虽然在营养这个范畴中,这还是首次。不单如此,人们明确认定必须建立一门新的学科。

这门学科被命名为“粮食与营养政策规划”(Food and Nutrition Policy and Planning; FNPP)。这套策略如何于70年代初平地冒起,蓬勃发展,然后在短短十年间晦暗消逝,以及它如何在第三世界展开了一整个体系的知识、茫无止境的计划和新机构组织,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关系,正好构成一个理解“发展”究竟是如何运作的最佳例子。1971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举行的一个会议,“首次集中令国际关注到营养政策与规划活动需要特别的关注。”(Scrimshaw and Wallerstein 1982:xiii)这门新学科随着1973年出版的两册著作而明确定型;其中一册著作,就是根据上述会议写成。此后,直到该门学科在1982年寿终正寝为止,有关此课题的出版,最少还有另外六册著作和数之不尽的专门研究和学术期刊文章。⁵¹1972年秋季,在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和美国国际发展局(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的赞助下,麻省理工正式成立了一个国际营养规划计划(International Nutrition Planning Program)。在这项计划下,自然科学家、工程师和社会科学家首次共同探讨第三世界的粮食和营养问题。到了1975年,各国政府与国际性组织已经将粮食和营养政策规划的研究与培训定为优先项目;与此同时,英美多间大学亦开设相关的特别课程,让来自世

界各地的学生接受这门学科的训练。

基于同样的思路,数个联合国属下的组织于1971年在拉丁美洲成立了推广国家粮食和营养政策跨组织计划(the Inter-Agency Project for 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 Food and Nutrition Policies; PIA/PNAN),负责在拉美传播这门新理论。这个新组织为国家粮食和营养计划的制定准备了一部详尽的方法指引,并且不久就成为许多国家的规划师和营养学家的顾问,积极为他们指点迷津。到了1973年,哥伦比亚的一群年轻规划师已经在利马举行的一个PIA/PNAN区域性会议上,报告了拉美首个综合性国家粮食和营养计划的初稿。此项计划两年后得到政府认可,并获哥伦比亚政府拨款以及世界银行、加拿大国际发展局和美国国际发展局的贷款,于1976年正式推行。类似的计划不久便如雨后春笋般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发展起来。

哥伦比亚国家粮食和营养计划包括一揽子旨在影响“粮食系统”内主要组成部分的项目,经过精心策划,务求直达最受影响的人口。为了迎合世界银行的经济顾问代表团的要求,社会民生数据的搜集在境内所有大小城镇进行,之后再加以系统化的整理,调查规模之全面与数据之复杂程度为哥伦比亚前所未有的。这个计划还包括一项以小农为关注重点的综合性农村发展策略,以及各种各样关于健康、营养和粮食的计划(基本卫生、营养教育、粮票制度、家庭耕地等等)。基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可能对此项计划作出详细分析,故只能在我们有关发展政策实践的探讨中,突出这类性质的计划的几项普遍特征。

一般来说——就如在营养这个案例当中——一门分支学科(sub-discipline)的建立,是第一步,而新的学科,往往又要求建立特定的体制机器。当然,研究领域的界线勘定以及专家们对这些人为领域的割据瓜分,并非什么新鲜事物;学科的界定与专家的出

现,本身就是现代国家体制兴起和巩固过程的重要一环。然而,应当强调的是,体制性组织如何利用一系列的实践来建构它们宣称关注的问题,从而控制政策的主题,将议题分类、屏弃某些议题,和改变社会关系。在这些次学科和体制机器当中形成的问题,都是以这些次学科和体制机器所能掌握操控为归依的。举例来说,其中一种模式的实践是标签的生产(例如“小农”、“文盲农民”、“怀孕与授乳的女性”等)。这些标签的生产,是为了让特定计划能对症下药,加以改造。这些标签——以及那些维持这些标签的专业话语——无可避免地构造了机构与它的“服务对象”(比方农民)之间的接触,让前者超越后者的所在现实(local reality),甚至必须由前者来阐述这现实。在这个过程中,农民被发展机器(development apparatus)组织成生产者,或是可被替换,或被现代化,或可被“整合”到国家经济体系的元素。换句话说,他们被管理、被控制,只能在体制所划定的界限内被耍弄。⁽⁶⁾

根据政治经济学家的解释,第三世界粮食生产的危机——以及其主要表现形式,亦即贫穷与饥荒——源于世界性资本流动的规律。他们辩称农民的全面或部分无产化(proletarianization)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必要结果。他们甚至相信必须将农民转化为廉价劳动力的来源,才能造就资本累积的过程(可参考 Barkin 1987; de Janvry 1981)。然而,我们必须指出,纵使外周地区(the periphery)的资本主义需要廉价粮食与廉价劳工的不断供应,将农民变成这些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主角的,却是“发展”自身,亦即为干预和介入农民的现实世界而生产的一系列的话语和计划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农民的世界被专业化的机构与实践所组织;这些机构和实践,贯穿渗透了农民的世界,调节着乡村的社群关系(例如农民、商业耕作、大型综合农业公司之间的关系),影响了其他类别的关系(例如性别关系),并且使人对这些不同主体

间的互动关系的描述,只能在源自专业化话语的框架类别下进行。由此冒出的一个角度是:一群“营养不良”或“文盲农民”有待有效的发展计划去消除(例如通过“绿色革命”或“综合性农村发展”)。毋须赘言,在这些陈述当中,我们永远不会找到关于农民斗争的讨论,亦没有半点关于文化或反抗的关注。发展机器所构筑的布局,成功地遮掩了这些环节,使它们落在人们视线范围之外。

哥伦比亚的综合农村发展计划——作为国家粮食与营养计划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为当地的前线人员(外展人员、医疗保健人员、规划专家)与不同类别的农民,引入了新的互动关系。新的关系自动地受到相关的机构的官僚运作所制约,而发展机构则依据主要由世界银行与数间欧美大学所生产的 FNPP/农村发展话语来组织他们的活动。同样,波哥大的国家规划专家与世界银行之间的关系,基于前者要取得援助的需要,亦受制于世界银行的常规程序。这些不同层而的运作的具体结果,显著地重新界定和重新安排哥伦比亚的农业部门的结构。这被视为是理性实践、符合逻辑和普遍愿望的结果,此种观点几乎是毫无异议,不受挑战的。我希望强调的是,这些实践不但是非常政治性的,而且对人们有着十分实在的影响。假如我们要将发展计划理解为知识与权力的技术(techniques of power and knowledge),并且想寻求更理想的概念系统与实践,我们就必须先令发展的实践能够被看见(visible)。

到了80年代初期,大部分在 FNPP 话语的符咒下产生的计划都已被终止。只是简单的由两本书——一本的作者是一名世界银行高层人员,另一本则是由几名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教授受世界银行委托而撰写的——结束了粮食与营养政策规划的循环,并开始另一个新的循环,不过这次强调的不再是大包围式的计划,而是更讲求实效的措施。(Berg 1981; Timmer, Falcon and Pearson 1983)。我们认为粮食与营养政策规划的案例是“发展”

如何运作的典范例子；在发展的各个领域里，配备相应计划的分支学科多如牛毛。我们稍微详细地讨论了其中一个主导领域——发展经济学以及一门分支学科——粮食与营养政策规划。为了了解战后第三世界被建构定型的过程，类似的研究，其实可以在其他领域中进行，成为一个更广泛的研究策略的一部分。

将西方人类学化：反抗、发展与西方经济体系的民俗学

然而，要提供关于发展的更完整的图像，只从 1945 年开始研究是不够的。发展联系到别的一些现象，而这些现象往往早在发展被发明编造之前，就已经存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经济实践与理性的形成——即是我们现在习以为常地将它们跟“人是经济动物”(Homo Oeconomicus)挂钩的一些概念——以及它们在第三世界的发展，因为正是这些实践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血肉。^[7]

哥伦比亚社会学家博达(Orlando Fals Borda)曾经描述发生在哥伦比亚大西洋沿海区的 Tierras de Leba 的一个事件。早期的美国公司通过哥伦比亚进入该地区。它们引人众多新的实践，其中包括有刺铁丝网的使用。表面上看这是无伤大雅的事，但实质上对当地人民来说，却有重大的意义：

土地的共同使用是当地文化身份与本土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众所周知，外国公司固执地对此提出反对……它们更引入了有刺铁丝网(大概在 1875 年至 1880 年间首次引入)，鼓励人们在农业生产活动中使用这项它们认为是理性和

自然的实践。Loba 的农民却对此尤其感到不满，因为这跟他们本身的理性和生存逻辑不同；当他们看到公用土地和日常道路被有刺围网阻隔时，对这些原意是保卫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的东西，他们怒不可遏。（Fals Borda 1984；172B）

在另一个关于哥伦比亚西部的当代文化抗争的研究中，人类学家陶西格（Michael Taussig）就农民对某些践行的反应进行诠释：

有一些践行，在我们大多数生活在商品社会的人来说，是经济的日常运作，因而是人类世界中自然而然的做法；我们习以为常，视为理所当然。但同样的践行，农民却将它们描述为违反自然，甚至是万恶的现实。这种对现实的再现（representation），只有当农民被日渐变成无产阶级时才出现，而且也针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组织的生活方式；它从未在农民的生活方式中出现，也从不指涉农民本身的生活方式。（Taussig 1980：3）

这些伴随着一些对鬼怪的信仰出现的践行，根据陶西格的分析，是农民基于前资本主义的生活体验，对他们的世界日益为商品化所侵蚀而作出的反应。依据类似的分析，一些学者亦曾研究其他地区的反抗，例如危地马拉的“小商品”（petit-commodity）生产，如何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而屹立不倒，甚至成为与之抗衡的另类生产模式；又例如安底斯山脉的人民如何在商业和资本主义的人侵下保卫他们的社群（Mallon 1983；C. Smith 1984）。

近年来，第三世界中的社群面临资本主义的扩张而作出的反应，成为人类学的一个关注重点。不少关于反抗这个课题的著作，

一一面世。这些著作将历史进程、社会实践与符号中介(symbolic mediation)的探究交织融汇,以求理解像前述那样的回应(除了上述陶西格、博达和史密斯的著作外,还可参考 Comaroff 1985, Nash 1979, Scott 1985。关于人类学的这方向的评介,可参考 Marcus and Fischer 1986:第四章以及 Escobar 1988)。然而,这个现象应当以最广义的意义去理解。换句话说,这现象应被理解为现代文化所创造的一个生产性主体(producing subject),这个主体的特点是具有特定的行为,并且浸淫于某些实践中。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不应只限于生产层面(如政治经济学那样狭义地界定生产),而应该视之为三个系统组成的共同体——我们或许可称之为“西方经济体系”(the Western Economy)——的具体呈现。这三个系统在18世纪的西北欧洲合为一体,它们分别是:一个生产的系统(广义地说,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一个权力系统(规训性[disciplinary]与齐常化[normalizing]的机制),以及一个意义系统(system of signification)(意识形态、科学和现实再现,包括诸如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哲学流派,以及围绕劳动与生产这两个概念组织起来的一套主导符码[code])。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掌握西方经济体系的性质,以及它扩张至世界其他地区的意义。

对西方经济体系进行这种性质的探究,^[8]展示出现今主导的经济实践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才成为西方社会群体的集体财产,并被视为正常的和毋须解释的行为模式。今天,这些实践和理性,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通过发展而被引入第三世界。发展已经成为一套“大策略”,旨在改造拉丁美洲/第三世界那“还不太理性”的主体。就是这样,源远流长的文化实践和意义以及其处身的社会关系将被改变,其后果影响深远,甚至连社群的愿望和欲念的基础也将改变。因此,要了解发展所产生的效果,不应只看它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也要检视发展所破坏和改变的文化意义和践行,后

者可能是更重要的。

将西方经济体系理解为生产、权力和意义系统的结合体,能把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跟前述人类学所关注的人民反抗的课题联系起来。若然如此,我们可将某些社会支配关系,视为下述三个环节互相扣连所衍生的产物:有关经济的主导话语的引入、这些话语如何成为体制和实践的一部分(例如通过发展而达成)、以及这些话语对当地历史形势所产生的影响(包括这些话语和实践引起的反抗)。这种分析策略,不单可以依据拉比诺(Rabinow)所下的定义,“将西方人类学化”(anthropologize the West),亦即揭露那些在西方被视为理所当然、放诸四海皆准的思想领域(例如知识论和经济学),其实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Rabinow 1986: 241),更可以更好地理解身份认同与差异的地域/文化分布,以及此分布在不同人民之间的物质与文化关系上的含义。

毕竟,正如福柯指出^[9],有关现代性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modernity),其实是关乎人作为经济动物这个寻索确切真理的主体,实际上是被规范驯育的个体,而所建立的秩序,其实是特定理性和资本主义规律下的秩序。这样的现代性因此始终是一个欧洲的经验,尽管它力图成为普泛经验。当今对发展的最有希望的批判研究,明确探讨主体知识与权力等问题,并非没有意义。这些批判支持着日趋蓬勃的社会运动——即反对发展的经济主义性质的运动,对其他斗争(诸如环境、和平、女性与原住民等运动)保持敏锐触角、以及设法使用本地知识(local knowledge)去改变既存权力架构(architecture of power)。正是这些新兴运动旺盛的生命力,让人看到已届四十之龄的发展机器正在解体——虽然仍然在位却正逐步向瓦解——以及一个更多元、更少压迫的新纪元的来临。^[10]

注 释

- [1]关于“发展”和“第三世界”这些概念的源起,请参看 Arndt(1981),Binder(1986),Mintz(1976),Pletsh(1981),Wallerstein(1984),以及 Worsley(1984)。在对发展的批判中,立场与这篇文章相关的,可在 Gendzier(1985)及 Morande(1983)中找到。
- [2]关于“发展”出现的历史与政治背景,Gendzier(1985)作出了扼要的总结;亦可参考 Chomsky(1987),Little(1982),Meier(1984)和 Seers(1982)。
- [3]前往哥伦比亚,协助当地规划组织的外国专家顾问或代表团,比较重要的有:L. Currie / 世界银行,1949; A. Hirschman, 1950 代早期; Lebret, 1957; Watterson / 世界银行,1963-64; 一个哈佛大学的代表团,1960-70; 一个联合国(CEPAL)的代表团,1959-62; D. Avramovic / 世界银行,1970; D. Seers / ILO, 1970。所有这些顾问代表团,对于哥伦比亚发展规划的形成,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在这些“大型”的顾问代表团以外,数之不尽的顾问和代表团,曾以专家或技术顾问的身份,短暂停留哥伦比亚。
- [4]在五十年代这段期间,不同的经济学家提出不同的理论模型,当中包括 Nurkse(通过资本形成和“平衡增长”作为打破“贫穷之恶性循环”的方法),W. A. Lewis(他那著名的“二元经济”模型),P. Rosenstein Rodan(他强调投资“大驱策”[Big Push]从而动员起农村的失业人士投入工业化建设),H. Liebenstein(他假设了“低水平均衡陷阱”[Low-Level equilibrium trap]的存在),A. Hirschman(他强调工业化过程中的“后退——前进联系”)。当然,在许多方面来说,罗斯托(Rostow)的名著《经济增长的阶段论》(Rostow 1960),总结和发扬了上述的努力。50年代众多经济发展著作中,最杰出的论文辑录于 Agarwala and Singh(1985)。关于部分早期理论的讨论,可参见 Meier(1984)与及 Seers and Meier(1984)
- [5]作者于此所引述关于 FNPP 的研究,并不包括针对“综合农村发展”(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而写的大量著作。IRD 这项发展策略,由世界银行于 1973 年推出,我的博士论文(Escobar 1987)对它的话语策略(rhetoric)和具体实施,作出了细致的分析。

- [6]将发展政策和观念(观念)一套实践的体制(regime of practices)而作出的分析,可参看 Clay and Shaffer(1984)和 Wood(1985)。史密斯(D. Smith)就探讨体制性践行如何建构社会关系,提出了强有力的研究方法(参看 Smith 1974, 1984, 1986)。Muelder(1986, 1987)应用了史密斯的研究方法,采用“话语”和“践行”作为批判发展之分析工具,请同时参看 Escobar (1984-85)。
- [7]换句话说,我们应当采用“发展系谱”(genealogy of development)——借用福柯(Foucault)的见解——作为分析进路。关于系谱学的性质,福柯本人曾经简明陈述(Foucault 1985:3-24)。正如我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所论证,西方经济体系的建立,以及它的全球扩张,必须被理解为“发展系谱”中关键的一环。
- [8]少数当代的学者,通过本身内著作,为日后针对西方经济体系,从生产、权力和意义指涉等方面着手的研究奠定基础(他们主要是 K. Polanyi, J. Schumpeter, F. Braudel, L. Dumont, M. Foucault, I. Wallerstein, J. Baudrillard, P. Clastres)。基于他们的著作,以及另外几位研究资本主义历史的史学家的作品,我在博士论文中详细展述这个论点。
- [9]“至为重要的是,在 19 世纪伊始之时,一套新的知识排序(arrangement of knowledge),于然构成,同时容纳了经济学历史性质(historicity of economics)(相对于生产模式)、人类存在的局限(finite)(对于匮乏与劳动),以及历史终结的应验——不论是通过无了期的减缓(indefinite deceleration)的方式体现,还是以彻底颠倒(radical reversal)的方式进行。于是,历史、人类学、和发展的中止(suspension of development),连成一体,三者之间的关系,与 19 世纪思想的主要形态,并无异致……19 世纪的经济学,将被理解为一门人类学,如同是一套关于人之局限的话语”(Foucault 1970:262,257)。对福柯来说,正是这一点——以其对人之局限的分析,以及“经济学与历史的扣连接合”(Foucault 1970:255)——界定了现代性(modernity)。请同时参看 Vint(1986)。在经济学中,对于匮乏与理性这些概念的批判,可在 Caille(1986)和 Stikkers(1985)中找到。
- [10]对于这些新兴草根社会运动的初步反思,可参考 Esteva(1987), Falk (1987), Fais Borda(1985, 1988), Kohari(1984, 1987), Nandy(1987),

Rahnema(1986,1988),Sheth(1984,1987),Shiva(1986)。对这些著作的摘要和展述,可在我的博士论文结论部分中找到。

参 考 书 目

- Agarwala. A. N. and S. P. Singh 1958 *The Economics of Underdevelopment*.
Bomba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rdnt,H. W. 1981 Economic Development:A Semantic Histor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9(3):457 - 466.
- Barkin. D. 1987 The End to Food Self - sufficiency in Mexico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14(3):271 - 297.
- Berg . A. 1973 *The Nutrition Factor* . Washington. D. C. :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1981 *Malnourished People :A Policy View* . Washington, D. C. : The
World Bank.
- Berg. A. N. Scrimshaw. and D. Call. eds. 1973 *Nutrition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 Cambridge:MIT Press.
- Binder,L. 1986 The Natural History of Development Theor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8(1):3 - 33
- Cailic. A. 1986 The Two Myths: Scarcity and Rationality. *Development :
Seeds of Change* 1986(3):68 - 73
- Chomsky. N. 1987 *On Power and Ideology. The Managua Lectures* .
Boston:South End Press.
- Clay. E. J. .and B. Shaffer. eds. 1984 Room to Manoeuvre. *An Exploration
of Public Policy Planning i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
Rutherford. N. J.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 Comaroff Jean 1985 Body of Power. *Spirit of Resistance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a South African People*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 Janvry. A. 1981 *The Agrarian Question and Reformism in Latin*

-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Escobar, A. 1984 - 85 Discourse and Power: Michel Foucault and the Relevance of His Work for the Third World. *Alternatives* 10(3):377 - 400 .
- 1987 *Power and Visibility: The Invention and Management of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1988 *Post-War Development in Colombia: Implications for Anthropology*. Paper read at the Stanford University Anthropology Colloquium, March 11.
- Esteve, G. 1987 Regenerating People's Space. *Alternatives* 12(1):125 - 152.
- Falk, R. 1987 The Global Promise of Social Movements: Explorations at the Edge of Time. *Alternatives* 12(2):173 - 196.
- Fals Borda, O. 1984 Historia Doble de la Costa. Vol. 3. *Resistencia en el San Jorge*. Bogotá: Carlos Valencia Editores.
- 1988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Latin America. Regent's Lec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May 5.
- Foucault, Michel 1970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1980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I. An Introduction*. Robert Hurley, tra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1981 *Power/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1985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II. The Use of Pleasure*. Robert Hurley, tra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Frow, J. 1985 Discourse and Power. *Economy and Society* 14(2):193 - 214.
- Fuenzalida, E. 1983 The Reception of Scientific Sociology in Chile.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18(2):95 - 112 .
- 1985 *The Re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Institutions in Latin America*

- Between 1950 and 1980*.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Michel Foucault: History of the Pres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March 30.
- Galbraith, Kenneth 1979 *The Nature of Mass Pover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endzier, I. L. 1985 *Managing Political Change: Social Scientists and the Third World*.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1950 *The Basis of a Development Program for Colombi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Kohari, R. 1984 The Non-Party Political Proces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19(5):216 - 224.
- 1987 Masses, Classes, and the State. *Alternatives* 11(2): 167 - 184.
- Little, I. M. 1982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 Mallon, F. 1983 *The Defense of Community in Peru's Central Highland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arcus, George E., and Michael M. J. Fischer 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eier, G. 1984 *Emerging From Pover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ntz, S. W. 1976 On the Concept of a Third World.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1(4):377 - 382.
- Morandé, P. 1983 *Cultura y Modernización en América Latina*. Santiago: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Chile.
- Mueller, A. 1986 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Feminist Knowledge: The Case of Women in Development. *Resources for Feminist Research* 15(1):36 - 39.
- 1987 *Peasants and Professional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Women in*

- Development*.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 Nandy, A. 1987 *Cultural Frames for Social Transformation: A Credo*. *Alternatives* 12(1):113 - 124.
- Nash, June. 1979 *We Eat the Mines and the Mines Eat Us: Dependency and Exploitation in Bolivian Tin Min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Pietsch, C. F. 1981 The Three Worlds, or the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tific Labor, circa 1950 - 1975.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3(4):565 - 590.
- Rabinow, Paul 1986 Representations are Social Facts: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in Anthropology. In *Writing Culture*.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 Marcus, eds. pp. 234 - 26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ahnema, M. 1986 Under the Banner of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Seeds of Change* 1986(1/2):37 - 46.
- 1988 Power and Regenerative Processes in Micro-Space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in press).
- Rostow, W. W. 196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id, Edward 1979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Scott, J. C.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crimshaw, N., and M. B. Wallerstein 1982 *Nutri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New York: Plenum Press.
- Seers, D. 198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eers, D., and G. Meier 1984 *Pioneers in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heth, D. L. 1984 Grassroots Initiatives in Indi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 Weekly* 19(6):259 - 262 .
- 1987 Alternative Development as Political Practice. *Alternatives* 12(2): 115 - 172
- Shiva, V. 1986 Ecology Movements in India. *Alternatives* 11(2):255 - 273 .
- Smith, C. 1984 Local history in Global Context: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in Western Guatemal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6(2):193 - 228 .
- Smith, D. 1974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ocumentary Reality. *Sociological Inquiry* 44(4):257 - 268 .
- 1984 Textually Mediated Social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36(1):59 - 75 .
- 1986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 Feminist method. *Resources for Feminist Research* 15(1):6 - 13 .
- Stikkers, K. W. 1985 The Life-World Roots of Economy. *Journal of the British Society of Phenomenology* 16(2):167 - 176 .
- Taussig, Michael 1980 *The Devil and Commodity Fetishism in South America* .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Timmer, P. , W. Falcon, and S. R. Pearson 1983 *Food Policy Analysis* .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Vint, J. 1986 Foucault's Archaeology and Economic Thought.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Economics* 1:69 - 85 .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84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ood, G. 1985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Policy Labelling.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6:348 - 359 .
- Worsley, P. 1984 *The Three Worlds: Culture and World Development* .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 区域发展理论与受支配 的开采业边陲^{*}

◆ 邦克(Stephen G. Bunker) 著

◇ 萧永世 陈耀辉 谢德文译 许宝强 潘永忠 校

依附学说及世界体系学说研究低度发展地区的观点,是建基于不平等交易的模型之上。在本质上,它们假设是一些政治机制把边陲地区放置于各类贸易体系的不利位置上,从而使边陲地区受到支配。近年对霸权统识(hegemony)的研究(McMicheal 1984)阐明,核心国家往往通过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寡头垄断,建立和操纵全球性不平等贸易体系的机制。然而,如果没有边陲国家的默从及积极参与的话,这些体系实在无法运作下去。

霸权统识型体系,必须借助边陲国家政权,去规管及稳定出口生产。边陲国家政权默从这些对它们不利的贸易体系,可能会损害其公信力,尤其是当生产条件或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危害国内统治阶级的重要部门的利益,危害地区的社会构成(social

* 本文原题为“Regional Development Theory and the Subordination of Extractive Peripheries.” in *Comparative National Development - Society and Economy in the New Global Order*,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4, pp. 112 - 141.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formations)的时候。国际资本与国家政权因此往往会传播一些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用以掩盖当地及区域在不平等交易中所付出的代价。如果这些意识形态合乎主流学理认可的发展理论,它们将变得更为有效。

原材料的开采和出口,是依附学说的经典前提(Frank 1969)。可靠的原材料供应是工业增长的关键,因此核心国家及企业均积极试图操控出口资源的国家(Staley 1937; Girvan 1976)。资源开采所带来的环境和社会的代价,再加上从中所得的大部分利益,往往只由其他经济体所享受,因而造成了地区、国家和国际间的鲜明利益冲突。以开采和出口天然资源的经济活动为主导的地区经济,为剖视国际资本及国家政权如何建构和利用意识形态,提供了活生生的案例。在本文中,我将剖析发展理论中一个分支理论的演化,然后指出该理论在巴西的亚马逊地区如何化解批评,把对开采天然资源所导致不公平的利益与代价分配的当地抗议声音淹没。

世界经济中的开采业

就像在帝国主义全盛时期一样,对从事开采业的边陲地区的支配,于组织世界体系和构造不平衡发展,仍是非常重要的。旧有的国际分工,建基于资本在全球搜寻原材料;而新国际分工的叙事者,则关心资本如何在全球搜寻劳动力。然而,新的并没有取代旧的,反而加快及深化了原来资本在各地搜寻原材料。加工工业(transformative industry)的不断扩张及分散,对原材料不单增加需求,还要求分散其供应(Lipietz 1986)。由于与既存工业中心临近的许多矿区和部分辐射资源蕴藏区,多已花光耗尽或已严重枯竭,所以增加了开发新发现的和较偏远的蕴藏区的需要。在许多

开采过程中,采用了扩大的资本及技术的规模,这也要求开发更大和往往更偏远的蕴藏区。核心国家的官商联盟,为了分散重要矿物的供应(Girvan 1976;Bunker 1992),也使开采业经济伸展至新的较偏远地区。

资本对劳动力及原材料的全球性搜寻,导致投资在空间上的分散。然而在时间和空间上极不同的位置逻辑(logics of location),造成这两种投资引申出不同的社会效应和发展潜质。资本在物质上对原材料的完全依赖,以及资源稀少或供应中断对工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冲击,驱使核心国家的政权和企业,采取严厉的政治及经济手段,以确保固定的资源供应。这些措施包括了直接的帝国殖民,以及霸权统识型(hegemonic)的自由贸易体系,后者由国际金融机构所支持,用以稳定货币及规管贸易(Staley 1937;McMicheal 1984;Keohane 1984;Krasner 1976;Bunker and O'Hearn 1992)。这些手段要求对控制着重要天然资源的边陲国的支配,亦要求边陲国能有效地控制进行资源开采的空间。

为了维持这种控制,国际资本与[边陲国家的]国家政权往往压抑开采区内主导阶级的特殊诉求。要达到这一目的,最有效的就是引入否认[工业]生产与开采业之间的重要差异的发展意识形态。假如开采业被视为等同于工业的话,要求对环境和社会问题作出补偿的区域或地区团体,便会被抹黑为机会主义的地方主义分子,或是恋旧的墨守成规者,指责他们之所以反对工业发展,只是为求可以继续控制已不合时宜的超额利润(rent)形式。

主流的发展理论正好帮助了国家政权与国际资本混淆[工业]生产与开采业之间的差异。主流理论关于经济转变的模型,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工业转型的经验。在历史上,理论对工业发展的研究比对开采业经济的研究更丰富。在本文中,我会首先澄清工业和开采业之间的混淆,以及指出决定两者在时间、空间和地形上的

重大差异的因素备受忽视,并解释这些混淆和忽视如何在一些最具影响力的地区发展理论中,引起理论和实践上严重的谬误。我会展示这些谬误如何帮助国际资本与国家政权,建构各种意识形态,用以合理化国家与企业的策略,以支配开采区域,从而保证廉价和稳定的原材料供应。

我不会对区域发展理论作全面考察,或作思想史的研究。英尼斯(Harold Innis)曾在自己国家(加拿大)的边陲地区,作过大量有关开采业经济的研究。我会以他的学说为主线进行讨论,而他的学说曾被赫希曼(A. O. Hirschman)、诺思(D. North)和沃特金斯(M. Watkins)在一些极具影响力的区域发展论说中,被更改及在根本上扭曲。稍后,我会跟上述的学说一同回到另一个开采业边陲地区——70年代及80年代巴西的亚马逊,展示经过歪曲的英尼斯观点,如何使抗议政府所支持的开采业知识分子沉默无言。我也会展示这些知识分子所关注的,与英尼斯所关注的是何等相似。

这些工作是为了展示:(1)开采业与工业之间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区别;(2)从某些个别的原材料商品的某些特定历史中,直接抽象出一些发展模型,并假定其带有普适性的危险;以及(3)无论在学术构想中哪怕是公正无私或动机良好的发展理论,仍可被直接及实在(虽然时常不能预测)地,转变成为资本服务的工具,加速对自然生态和劳工的剥削,以及加强核心工业组织对边陲地区的支配。

开采业经济的位置动力

时间和空间在开采业和农业中的运作,不同于工业生产。假如生产是把能量转换成物质的话,那么工业生产的开始和完结时

间,便与投入劳动力的开始和完结时间一样。在农业里,大部分的生产过程是发生在劳动力改造生产条件之后,劳动力进行收割成品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在开采业,实质生产则是发生在人力投入之前,如矿床的形成,就比一般人力生产耗用长得多的时间。与现代工业经济极不一样的是,开采业与农业均固定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之上。天然资源只能在其发现地才可进行开采,而农业则依赖土壤的肥力、气候以及相对大面积的平面空间。资源在空间上的固定性,常常使开采企业孤立于其他企业,也隔离于各种位置优势(locational advantages),而这些位置优势造就了都市的聚结,并创造了共用的基础设施、劳工库(labour pools)以及政治动员和组织的可能性。

在互为强化的途径下,开采业与农业变得受工业支配;因与其他经济的低度连接而产生对外地市场及技术的依赖,因时间的差异和空间的孤立所造成的附加成本。在弹性极低的市场,价格接受者(price takers)不单在近似世界体系分析家的所有措辞比喻里被边缘化,也在空间上被边缘化。

在空间上的孤立,就等于孤立于其他经济活动。除了限制了联系或扩散的效应之外,这种孤立还使开采业经济尤其受到被开采的商品的特性所支配。在工业中,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生产的组织。但由于各种工业倾向集中在一起,因此没有任何单一的商品可以决定[当地]整个经济和政治组织。而在只开采单一商品的地方,尤其是当这开采地远离以前已建立的经济基础设施时,商品的物质特性便可能会对开采业的社会组织有深远的影响。

资源位置的僵硬性决定了运输的需要。与原材料加工业的投资比较,在开采业的投资中,运输成本所占的比重往往要高很多。地形可能是决定运输路线的重要因素,而技术则决定了它们对社会、人口及经济的影响。

因此,开采业的影响及其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往往直接随所开采的资源、开采地点和发现的时间而改变。开采业的问题,并非如旧有看法那样是仅仅依赖单一产品。问题其实在于商品本身是由自然生产,以及其生产的地点和开采期的长短,不受人力的决定支配。同时,交易需求却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完全地)受其他地方的市场所带动。所以,机遇和自然,而非人为力量,决定了是否存在替代的[原材料]商品,去适应不断转变的市场。

最后,不同的生产形式,存在着影响深远的时间差异。工业生产倾向制造及控制能够提升工人生产力的技术。虽然农业能从工业及开采业中,借来能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和物料,但它仍受着土地侵蚀及水质污染的制约。开采业(尤其是矿业)直接导致[蕴藏资源的]消耗,使工人的生产力不断递减。因此,只有工业才可以创造使自身加速发展,和使其工人生产力提高的手段,而开采业的发展则直接导致自身的衰落。农业或可凭藉工业生产的机械技术,或对生物过程的操控而提高生产力,但众所周知,这些转变过程极其缓慢。[植物的]种籽和根皆抗拒改变或控制(Kloppenburger 1988)。地区工业经济能把劳动力及资本集中于新产品上,以克服产品落伍的困局。但开采业经济则无法以转换产品的方式,解决资源枯竭或贸易条件恶化的问题,除非大自然早已在原来的开采区那里安放了别的资源,而外部市场恰巧又对这些资源有需求。

原材料加工业的所在地、生产率及销售周期,主要反映社群的决定及行动;而开采业的所在地、生产率及销售周期,却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地质、水文及生物因素。引申亚当(Richard Adam, 1975)的说法,假如力量(power)就是对身外环境的控制,那么工业社会对控制它们自身环境的能力,就比农业及开采业经济强。在工业中,人能够影响更大的范围,而有计划的经济转型前景也更好,速度更快。这些差别会随资本在规模和扩散上的增长而加大。

工业在空间位置的灵活性越来越高,而开采业经济即使是分布广泛,仍然越来越受特定的开采点所束缚。

开采业对自然因素或环境因素,以及对外部市场有较大的直接依赖。从工业经济中获得分析框架的分析家,其训练和偏好皆倾向社会性的解释,而并非物质性的解释。对于这些分析家来说,开采业经济面对的局限,便显得难以理解,也难与要求作一般性陈述的社会科学吻合。由于单一商品对这些局限起着极决定性的影响,故开采业经济之间的差异,就远远大于工业经济之间的差异。

这种情况,削弱了在开采地区的知识分子及社会行动者的[抗争]能力,使他们难以建构合适的理论,或从事直接的政治行动,以解释及防止由开采天然资源而强加于地区系统的特殊代价,包括在环境、社会及经济方面的代价。这种限制约束了地区的社会构成内的政治声音,使其难以对跨国企业或本国政权,在开采条件及分配资源的超额利润的问题上,作交涉或讨价还价。英尼斯的大量深入研究(Innis 1930, 1933, 1936, 1940, 1956),均旨在对这些问题寻求解决方法,但他的说法却被歪曲简化,并合到主流的地区发展理论中去,这样便有效地模糊化了英尼斯的研究,磨灭其对处身于并关注当代开采业经济的知识分子的相干性(relevance)。

英尼斯的学说、由地区发展理论家赋予他的学说的权威地位,和这些理论家(甚至是当他们借用他的权威时)不断对他的论文和方法所作出的误读,这三者在不平衡发展的研究中,彰显了原材料出口与地区不平等发展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个别性分析及普泛性分析之间的张力。英尼斯的主要贡献,是他紧盯着他称为主要原材料的东西,然后使用极广阔的分析框架,对它展开分析,把包含了对该原材料开采业的方式和结果有影响的任何和所有现象的过程,进行复杂细致的研究。这可能是研究开采业经济的最合适途径。但如果我们旨在作关于比较国际发展的一般性陈

述,而非就特定地方的特定开采过程作极仔细的说明,那么这种研究途径的实际局限便会很大。在以下各节,我会追溯英尼斯对开采业所作的特定而极精确的分析,如何受到各式各样的曲解,企图把注重个别性的(ideographic)陈述,并入成为强调普遍规律的(nomothetic)教条。

英尼斯及主要原材料的出口

英尼斯所关注的,是下列四个项目之间的所有复杂互动关系:采掘行动、生产主要原材料和塑造开采它的物质和社会关系的环境、把主要原材料转化为商品或最终产品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以及这些产品的市场。他以主要原材料本身作为组织其研究的重心,从它的物理特性出发,进行演绎研究。这些物理特性包括它的地理位置、再生产的空间及物质条件,以及它与(开采它和在当地加工所需的)生产因素之间的重量比例和体积比例等。同时,他又对在世界其他地区影响主要原材料的开采、运输及销售的各个方面,包括财务、技术、政治、人口学及市场的条件,进行归纳研究。在对毛皮(Innis 1930)和鳕鱼(Innis 1940)以及采矿(Innis 1936)和伐木(Innis 1933)的研究中,他清楚解释了地理及地形——既作为土地形态和水流的系统,又作为维持被经济活动转化为原材料的生命形态(life forms)的环境条件——决定了开采经济主要的当地形态。同时,时间、空间和全球性距离,也影响了下列各个方面所带来冲击:世界市场、开采业和运输技术的输入、用以支付引入技术面借入的资金的数额及来源,以及在每种主要原材料开发地点附近流入和定居的移民。

英尼斯解释了主要原材料出口所独有的位置问题,这些问题使运输变得必需和成本高昂。必需性及高成本,反过来造成压力,

要建立稳定和中央集权的政府系统,协调横跨广阔及地形多变的空间的各项运输基本建设,并担保有关建设的巨额外债,最后又要征收关税或货运费,以分期偿还借债。英尼斯又论证,正是原材料经济,及其对复杂昂贵的运输基本设施的需要的独特性质,使得当新开采业活动在某地出现,并接上了运输网络时,往往会导致另一地区的市场经济崩溃。在运输的基本设施的建设使用上,[原材料出口地区]与临近的出口地区之间的关系,往往是竞争对立,而非相辅相成。

运输的基本设施及其成本,是人类经济活动和空间这两者最关键的互动关系之一。然而要了解运输的各种影响及需要,则不可只把空间简单地看成是一种造成障碍或“摩擦”(friction)的距离,而应同时把它视作地形以及各种关键的生产资料和条件。无论在理解主要原材料的自然生产及再生产中的所有关系和过程,或理解它们的开采及运输,又或理解它们在国内及国际市场的角色,对英尼斯来说,空间都是一个关键的概念。对他而言,空间本身的表现及其引伸的结果,均是复杂、独特和多样的。在英尼斯的研究方法中,空间绝不可约化成可被替代的单一因素或变项。因此,他关于地区的观念,也是多形态的。

可是,诺思在一篇宣称是跟循英尼斯的论文中,却把空间概念约化为单一的变项。这篇论文影响极大,并成为“新经济史”(North 1961; North and Thomas 1973)的经典宣言。在他的论文“位置理论及区域经济增长”(North 1955)中,他以差不多完全乐观的“增长发动机”,及“剩余出路”的观点,去看待主要原材料的出口(见 Caves 1968)。他把原材料的出口,基本看成是为了获取外资(以出售和投资的形式)。他把放大的联动效应及随之而来当地工业的发展,说成是原材料经济增长的正常结果。他也提到资源的耗尽及市场的转移是可能出现的问题,但在描述“区域发展的途

径”及“出口基地在塑造区域经济的整个特质的重要性”的章节时，他并没有把这些问题包括在讨论之中(North 1955:338)。诺思心想从他自己对个别地区或国家历史的局部阅读中，推引出带普遍性质的一般性陈述，加上其根深蒂固的乐观态度，便道出了带这样语气的话：“历史上，在新建立的地区中，新的出口商品的建立或现存出口业的扩展，会导致资金注进了出口产业，和各种类型的被动性和支援性经济活动之中。……资金注回出口产业，到某程度便会饱和，然后累积了的资本将流向其他[经济]活动。”(North 1955:344)

诺思宣称“位置理论可用作解释一种产业如何成功地生产出商品”。在一个注释中，他说他的位置理论是源自伊萨德(Isard 1951)的“距离投入”(distance inputs)，“距离投入”“被认为是另一种生产因素，运输费就是其价格，而它与其他生产因素的最佳组织，可以由替代原则决定”(North 1955:337)。这样他不单把空间和地形约化为单一的变项，而且更是可以被其他生产因素所替代的变项。也就是说，空间和地形这个变项，与生产函数里任何其他生产因素的系数无异。这就把地形和运输需要的关联割断了，也使诺思及跟循他的地区发展理论家，把运输的需要看成正面的东西，原因是这些需要吸引巨额外资的注入。由于被看成和生产函数内的其他因素地位对等，因此运输可被设想成能够产生推动区域增长发动机的放大效应。因此，高成本的运输，从有问题的[物质]消耗和[资源]流损，转变成有利于获取资金和产生放大效应的因素。

诺思宣称“累积了的资本将流向其他[经济]活动”，因此他不理会由天然资源决定了位置所在而带来的缺点。资本往往追求最高的回报率。当开采业经济饱和时，资本便会跑到其他地区，除非“机缘巧合”(Perloff and Wingo, 1961:313)，这开采业经济正位于

其他资源的附近,又或正好位于有独立位置优势的地方。在世界上,匹兹堡、旧金山和鲁尔谷(Ruhr Valley)的开采业只是特例,而非常态。但是,它们在我们的脑海中却形象清晰,因为我们对它们了解甚多,却对许多已废弃或逐渐枯竭的开采区缺乏认识。

地区经济链接(linkage)与生产函数

《经济发展的策略》(*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1958; 中译本,徐育珠译,台北:台湾银行 1974)一书,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过重大的影响。赫希曼在此书中,将空间约化为经济变项之一,这实在是空间的错误界定。尽管该书的经济推论严密,而结论亦十分谨慎,它仍得出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将会趋同的极为肯定的推断。

在此书里,赫希曼提出一有力论据,为不平衡增长作辩护。作为对主流典范的大胆挑战,这一辩护糅合了理论和实践上的论证。赫希曼首先指出,为了达致平衡增长所需的资讯和操控,没有任何一个经济计划能够全部都考虑在内。接着,他运用(列昂节夫 Leontief 1906)有关生产函数的表述(1951),论证最富活力的经济部门,透过所衍生的需求(包括对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产品所激发的需求),将与其他相关经济部门“链接”起来,并会促进这些部门的投资。因此,他认为从务实和效率着眼,计划制订者应找出一些经济部门或企业,它们的不平衡或相对超前发展,预期将会带来最大限度的“链接的投资”(linked investment)。相对于链接性较少或较弱的部门,高度链接部门的投资,将具有更广泛和更迅速的影响力。从有选择的集中投资引发的不平等增长,不会带来什么问题,因为透过需求的链接,即对投入的后向需求和产品引生的前向需求,增长的动力将扩展到其他部门去。

在此书的中段(第六章,特别是110页),赫希曼谈到农业和矿业:由于其链接性极低,在投入和产出所衍生的需求亦少,因此也难以刺激进一步的投资。不过,在全书的结尾(第十章),他将有关经济部门不平衡发展的论述加以引申,先是作出一个审慎而肯定的乐观前瞻;但数页之后,又提出一个极为肯定的断言,说空间上的不平衡发展,将逐渐为“涓滴作用”或扩散效应所克服。从经济部门到区域的概念跳跃中,他忽略了如下事实,即采矿、伐木和农业大多集中于低度发展地区。纵使它们会从工业地区增长所衍生的需求中得到扩展,但是由于这些地区经济的链接水平偏低,这些行业对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只有甚小的贡献。

由于运输成本随着相关工业的集中而减低,根据赫希曼的链接模式,最富活力的经济在地理上有趋于集中的倾向。因此,链接性将显空间上的差异:高度链接工业集中的地区,链接性自会集中,反之,资源开采的地区,由于缺乏链接性,而导致经济停滞或日益贫困化。对大部分资源开采地区来说,外来需求的扩张只会加速资源耗尽,而并没有衍生出本地的或持续的链接效应。在矿业和木材业的巨大的资本密集的投资,只能带来极少的区域链接,却使那些为资金所垂青的资源加速耗尽。

根据赫希曼有关前向、后向链接及它们集中于某些行业的公式,企业家会认为在已发展地区会有最大的投资机会,而这一商业触觉通常是正确的。赫希曼称(Hirschman 1958:197)互补关系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些互补关系却强化了区域性的不平等,因为它们巩固了具有完全不同链接水平的经济类型的区域专门化。他声称会带来好处的地区专门化模式,实际只会使低链接性企业,在资源开采和农业地区长期存在下去,原因正是这些部门的链接性很弱。因此,以投资在部门之间扩散的趋向作为经济增长在空间之间扩散的论据,无疑是一个不恰当的类比。

在此书的最后一章里,没有对部门和地区作出区分,并断言虽然有一定的风险,但是不平衡增长所引起的压力、紧张和失衡是必要的,正面的和有创造力的(1958:208页)。这是危险的结论,尤其是当它引申出来的缓慢发展,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不可避免的。当那些维护国家和企业的工业利益的代言人,意图游说资源出口地区的居民的时候,赫希曼的逻辑提供了精巧而细致的论据,即虽然资源的开采目前似乎对那一地区只带来很少的好处,但是在一个理论上肯定而时限不确定的未来,它终会带来好处的,因此他们一定要耐心等待。(也可参看 Brookfield 1975:99)

由于赫希曼先为投资在经济部门间的扩散,提供了一个精确无误和论说有力的正式证明,然后才将他的结论从部门引申到空间范畴中去,因此,他的论证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赫希曼关于部门和空间的混淆是十分微妙而不易识破的,而工业位置理论的传统见解,又认为空间因素可以约化为生产函数(Isard 1951;North 1955),再加上有关地区增长的乐观的公式在政界和知识界中又很受欢迎。有了这三项条件,赫希曼的误释能如此迅速地被奉为区域发展理论的核心要素,就毫不奇怪了。

赫希曼的有影响力的法国同行——佩鲁(Francois Perroux)在这一时期(1955,1961)亦面对着近似的研究课题。在空间分析的问题上,他在两种处理方式中摇摆不定:将空间视为一明确的区域概念,或视为几何学上一个抽象的隐喻。佩鲁对区域发展理论的最著名的贡献,是从他有关“增长极”(growth pole)的概念引申出来的。“增长极”原本的概念是经济活动向量的代数收敛过程。空间作为向量代数背后的假设,只是在最含混和类比的层次上,与实际的地理空间相对应。但是,正如赫希曼一样,佩鲁在空间概念上过于轻率,并由此将自己有关几何的结论,引申到区域层次上去(较系统的总结,可参看 Gore 1984:175-80)。有人(Lasuen

1972)认为佩鲁的摇摆不定,源于他尝试将抽象的几何分析,用作区域规划的工具。

赫希曼(1958:183)借用了佩鲁“增长极”的概念,并全盘接收了其空间和对部门的混淆,说道“在关于这一题目的富有启发性和仍在发展的法文文献里,‘增长极’(pole de croissance)是描述带领增长的区域和部门的一个常用语”。在阐释他自己和佩鲁的观点的同一段落,赫希曼先是肯定经济增长必然会带来区域间的不平衡(183页),跟着又断言这种不平衡只是暂时现象(187页)。换言之,空间上的不平衡,既是必需的,也是有好处的。

从主要原材料的历史到 资源推动的经济增长

加拿大经济学者沃特金斯(Melville H. Watkins)发展了一个区域经济增长的模型。模型以英尼斯关于主要原材料的研究为基础,再将之代入到为赫希曼重塑的列昂节夫的经济模型的公式中去。赫希曼认为链接效应会由于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增长,带来正面作用。这一结论对沃特金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采用了赫希曼有关生产函数的投入产出的逻辑,并应用在如下情况:在新发展地区,自然资源是过剩的生产要素,而“剩余出路”可能维持其他生产要素(包括资金和劳动力)的输入,以达致生产要素的最优化或最有效率和均衡的运用。

沃特金斯视这些剩余的生产要素为大自然的恩赐,面对大自然为这些要素的开发所设定的制约,他则未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反之,他假设它们都是免费产品,并在他的资源出口推动的发展模型中,继续沿用这一假设。正如诺思一样,沃特金斯借助了英尼斯

的权威,但又忽略了在英尼斯的研究中,空间和生态的成本和制约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最明显的是,除了一处对“供应方面的递减回报”的隐晦的引用之外(Watkins 1963:149),沃特金斯甚至连英尼斯所重视的资源耗尽问题,也视若无睹。英尼斯有关所开采的自然资源的物产特性、地理位置和地形,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心得,沃特金斯亦未能理解。他从原有的模型中,将空间因素抽象出来。对他而言,运输的基本建设只是产生放大效应的一个附加因素,完全忽略英尼斯所关注的复杂的成本问题。

沃特金斯的主要原材料的增长理论,把赫希曼对空间和部门的混淆加以综合和系统化,使之成为一个动态模型,并把这些混淆嵌入一个研究区域资源经济的权威历史学者[即英尼斯]的研究范畴中,从而使这一混淆合理化。这一切都为引用赫希曼的辩护(或可进一步包括佩鲁在内)的做法提供了重要、权威和极度自信的支持,即在“新发展”地区,地理上孤立的、依靠运输系统的资源开采企业,将带来不平衡的区域经济增长,可是为了建立区域经济增长支柱,所需的投资亦是合理的。⁽¹⁾

依附理论和关于贸易条件恶化的解释,都认为原材料出口与低度发展存在一定的关系,而沃特金斯的理论正与这样的解释截然对立。罗默尔(Michael Roemer 1970)在有关秘鲁鲑鱼繁荣期的研究中,意图去证实沃特金斯的理论,以抗衡那些更具批判性的观点。罗默尔是过于热切要达致其结论,使他竟完全忽略了生态环境的制约因素。他要证明,秘鲁和外地人一窝蜂投入鲑鱼和其他鱼类市场,将创造出多层次的前向和后向的链接。他热情洋溢地报告:需求推动的链接十分强而有力,它甚至使得全无捕鱼或造船经验的人,也能轻易取得银行贷款。在罗默尔的研究里,似乎没有注意到繁荣期和热潮的性质,也没有考虑到过度投资及随之而来对所有参与者(不单只对过剩者或后来者)的损害的可能性。在

罗默尔的研究中,无论是对生态极限,还是过度捕捞,都没有作出明确的论述。事实上,他所描述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由于过度投资和过度开发,每一个参与者的回报都变得很低;要取回已投入的资金,惟有进一步加剧资源开发,因此就出现了一幅资源以日益增加的速率被过度开发的图景。虽然,罗默尔亦提及某些资源开发经济可能不会拥有很多有效的链接,或者这些链接只给本土以外地区带来好处,但是,他又认为这种障碍,只是来自某些生产过程(例如采铜业)高昂的入行成本和对专业劳动力的需求。

沃特金斯对赫希曼有关部门和空间的混淆所作的合理化,并最终引申为: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所需的那种链接,正可由资源开采活动来提供。这一结论反过来又为赫希曼所利用。在题为“链接的一般理论及其在主要原材料中的应用”(1977)的论文中,赫希曼总结并发挥他有关链接的观念。他称引用了沃特金斯关于英尼斯的研究的修正版本,并透过沃特金斯的文章,利用英尼斯的名声来支持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型。赫希曼在一个枝节问题上,引用了沃特金斯的“著名的文章”(但他称直接引自英尼斯),指出他的经济链接概念。

可以应用在一次产业中。而这个概念与主要原材料问题(the staple thesis)的密切关系,也日渐明显。由英尼斯首先提出的主要原材料问题[,]……尝试指出“新”发展国家的经济增长经验,如何受到某种特定的初级产品向世界市场的持续出口所塑造。它尝试发掘的细节是:透过对主要原材料的需求和影响,从交通运输设施到居所分布模式,再到新经济活动的出现等“一环接一环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Hirschman 1977:72)

赫希曼跟着企图将主要原材料的概念，“曲解”成一个实际是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模型，它是以获得国外资金的剩余出路为基础的。两组独立进行的研究[Caves 与 Holton (1959)、Perloff 与 Wingo (1961)]显示，主要原材料的出口的累积效应，是从多种因素和过程的偶然聚集所衍生的，然而，这些因素和过程却完全被赫希曼的“一环接一环”的综合概念所忽略。⁽²⁾当赫希曼尝试将链接概念引入主要原材料出口的区域经济体系的一个充满乐观气氛的场景时，沃特金斯为他提供了一个被误解的论证和一个被歪曲的权威，使得他自己错漏百出的推理可以维持下去。正如其他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学者一样，赫希曼借助了英尼斯的权威，但又没有接纳他关于空间错综复杂的涵义的意见。在赫希曼的眼中，空间始终只是一个抽象的函数。而在沃特金斯以赫希曼的概念去重塑英尼斯的思想时，情况也是一样。

赫希曼既混淆了主要原材料与制造业，又在跟循列昂节夫的研究方向时，引用了英尼斯。由此，他强化了如下的印象，即他的经济发展模型——关于部门间不平衡增长，将如何带来迅速而有效的经济发展——也可以解释区域不平衡发展，将会怎样被从发达地区向贫困地区的扩散和链接效应所逐渐克服。英尼斯关于主要原材料开采的长远结果，抱着深刻的悲观主义情绪，可是，这悲观情绪却给赫希曼用工业增长模型的扩张主义乐观情绪埋葬掉。放弃了英尼斯的模型中有关地理和历史的独特性的考虑，便为以下充满偏见的希望大开方便之门，即以为加拿大工业化最终的成功，是由开发自然资源的出口的一般规律所带来的，而其背后的理据是相对优势和“剩余出路”的传统智慧。但是，当地形及空间的考虑被删除以后，便完全看不到加拿大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是源自资源的分布位置和发现(历史与地质学上的巧合)以及技术和市场(其时间取决于外部条件)的独特的结合。

即使在思考较时间和空间简单的问题时,赫希曼的头脑也为自己的热情所冲昏了。他引用罗默尔有关鳕鱼热潮的研究,并视之为他的链接概念的成功应用。但是,他竟未有指出这一热潮在罗默尔的书出版后不久即已冷却,并为秘鲁沿海经济带来很坏的后果。

意义含糊、不够精确与过于复杂等特性,助长了学术工作里的机会主义诠释。但是,在为地区发展计划的诠释和辩护上,这些观念的政治化的套用,则更是机会主义的温床。计划工作者在引证资料方面,比学者要宽松得多,而且更没有必要假装他们的解释是合乎原意的。他们能够且已确实成功地利用研究中的含混之处,并带来了重要的影响。这种情况在80年代尤其明显,当时那些债务缠身的国家,期望重新依赖促进原材料的出口,以刺激经济复苏。认定那些高度资本化、大量负债和从事开采业的企业,能够提供链接效应的信誓旦旦的承诺,使得政客和计划工作者能够掩饰他们饮鸩止渴的计划,即为了暂时舒缓目前的国内经济危机,而为区域经济带来长期负面的后果。

在以下的章节,我将以巴西作为例子,说明巴西的政客和计划工作者如何运用扭曲了的赫希曼和佩鲁的模型,来为亚马逊的开采性发展计划辩护,以对抗人们的批评,而他们的恐惧和控诉,正与英尼斯在另一个国家边陲地区的场合有关开采活动的言论,互相呼应。这一案例将以事情实际进展的反而去作叙述,即英尼斯有关加拿大开采业发展的观点,被一般性的增长模型所扬弃了,而这模型的某一部分,又随之被引用来压制关于亚马逊开采性发展计划的当地知识分子的声音。英尼斯的研究取向,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先是被误释,跟着是被误置,而在再释再置之后,最终则被完全地头脚倒置了。

巴西的区域发展计划： 迷思与迷思的进程

自欧洲人大量移居到巴西亚马逊地区开始,采掘和出口原材料就成为该处区域经济的主要部分(Bunker 1985;Dean 1987)。在橡胶业大盛和采掘业蓬勃的年代,地区商人和政客均担心这些行业极易受价格的剧烈波动所影响(Weinstein 1983;Dean 1987)。巴西政府更不时尝试在这地区鼓励制造业的发展,但却时有反复,成效不大(Weinstein 1983;Mahar 1979;Bunker 1979,1985)。

然而在1974年,全国政府公布了以增长极为基础的新发展策略。虽然政府声称计划是全国性的,然而受计划影响最大的,却是两个最不发达的地区,即东北部和亚马逊地区。亚马逊地区的发展计划记录在普亚马逊尼亚计划(POLAMAZONIA,下称“亚马逊计划”)的文件内。这份文件的核心部分,为当地的资源采掘出谋献策,并提供认同性,当中没有任何提及有关制造业之处。亚马逊计划依次提倡发展下列行业:1.采矿业,2.林木业,3.牧业,4.渔业,5.农业,6.水力发电(SUDAM 1976:60-64)。在计划展开的头十年,最大量的补助金给投放在三个以矿藏为本的增长极之上。至目前为止,卡拉亚斯(Carajás)大铁矿一带的极区(pole),得到最多份额的补助(Santos 1986;Bunker 1986)。政府祭起以链接发展为前设的增长极理论,替大量投资于矿业找寻理据,尽管矿业是最难引发链接效应的经济活动。

“亚马逊计划”声称,凭借集中资源和资金投资,加快亚马逊地区对国内和国外市场的出口,经济发展就会随之而来。但是,亚马逊地区以往参与世界市场贸易的历史经验显示,集中资金、资源出

口往往与低度经济发展有紧密的关系(Bunker 1985)。因此亚马逊计划便需要复杂并具理论基础的解释,去说明为何把资金集中在原材料出口的地区,可以为地区和国家带来好处。而赫希曼和佩鲁有关区域性不平衡增长的模棱两可的辩解,正好为此提供了有用的概念和措辞工具。

“亚马逊计划”的文件和声明,乞灵于以比较优势和地区间的紧密联系为基础的区域互补性(SUDAM 1976:14-16)。所谓比较优势,是指亚马逊地区“极为”富饶的资源,这些“对发展现代文明至为关键的庞大致富潜能”(SUDAM 1976:16),将会“和谐地融合起来”,达到“提高农村地区[生活质素]”的目标。拥有自然资源这比较优势所带来的经济互补性,会“广延(*irradiacao*)发展的推动力量”(SUDAM,1976:66)。

在“亚马逊计划”提出前的几年,巴西国内有关不平衡增长和增长极策略的唯一综论,是托洛萨(Hamilton C. Tolosa)1972年在本地地区专集中发表的文章。该专集是由跟总统办公室有正式联系的国家调查研究部门,即经济及社会计划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Planning IPEA)筹办的。托洛萨有关增长极的文章的可观之处,是他对佩鲁和赫希曼的观点进行了综合的处理,几乎让人以为二者的看法同源共流,以及他把视点严格局限在工业/都市的分析。都市发展模式的例子和个案之中。我认为托洛萨[这一做法所包含]的两个隐含的假设,都是正确的,即在增长极理论提供可资采用的[发展]计划策略这一点上,可以对佩鲁和赫希曼的观点不加区别,以及分析只适用于对工业/都市的分析。批评亚马逊计划的当地人,并未抓住托洛萨所作的分析含义。巴西的某些知识分子很快就认清增长极的观念来自佩鲁的理论,但未能看透亚马逊计划这名称背后,受到赫希曼的链接观念的影响。当地有些知识分子对“亚马逊计划”那种再三强调采掘矿物的调子

感到不安,但并未质疑把这种基本上是一套工业/都市[发展]的模式套用在亚马逊的做法。

马哈尔(Dennis Mahar)受聘于经济及社会计划研究所从事研究时,在其出版的一部著作(Mahar 1979)中指出,“亚马逊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发展富饶的卡拉亚斯铁矿藏,而推动附近的基础建设。1975年发布的第二号亚马逊发展计划(Second Amazon Development Plan PDAM II,下称第二计划),正式采纳了增长极策略。马哈尔认为第二计划更清楚地把亚马逊地区的角色,指定为“资源[采掘]前线”:

[第二计划]本身比以往的地区[发展]计划有很大的进步,它不再将亚马逊地区视为像巴西东北部一般的贫弱地区。……作为前线策略的指引,第二计划采取的是所谓“不平衡的和纠正的”(unbalanced corrected)发展模型。“不平衡”是指第二计划会集中发展某些重点部门(例如:矿业、畜牧业、伐木业、现代农业、旅游业),这些部门都是较具潜力出口以赚取外汇,或借进口替代保留外汇。“纠正”是指这一发展模型会催生使亚马逊地区能保留合理份额利润的机制(例如联邦政府新的投资调度,在当地进行原材料加工,[立法]规定企业将所得利润在当地再行投资。(Mahar 1979:27)。

对比原来亚马逊计划的程式化铺陈,第二计划为工业化提供了更多的条件。但正如马哈尔所言(1979:28),这种种只是着眼于对地方上的原材料进行加工,而不是像较早前的区域发展计划那般致力于进口替代。

第二计划饶有信心地保证:拥有可供开发的矿藏意味着亚马逊地区不会贫困,而不平衡互补(unbalanced complementarity)策

略带来的区域专门分工的问题,可以借财政机制或财政调拨加以补偿。这种论调与赫希曼在1958年的《经济发展的策略》一书中的乐观结论相类似,而与他1977年有关普遍的链接效应的论文的逻辑更是紧密呼应。该论文糅合了沃特金斯对主要原材料的“剩余出路”的理解。在“亚马逊计划”草拟时,该论文尚未发表,但赫希曼在这些观点上举行过的研讨会和讨论,已有好些年头(Hirschman,1977:71)。耐人寻味的是,在该篇论文写就并以英文发表的前一年,即1976年,论文的译文已在巴西出现了。

当地的知识分子没有贬斥把增长极理论应用在偏僻矿藏区的做法,同时我认为他们并没有清楚认识这种做法的理论谬误。他们深谙亚马逊地区的历史,故此对采掘型经济的隐忧非常敏感。不过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尤其是经济学家)都在那个孕育了增长极概念的区域发展理论传统下受训练和熏陶。这使他们的践行与看法产生奇异的分裂:他们援引标准的区域发展理论,肯定亚马逊计划;但依据他们所拥有的资料和经验,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当地知识分子未能指出他们习得的思想的问题所在,或许显示了他们在政治和专业方面所处的边缘位置,也反映出他们工作的机构是何等容易为政治压力左右。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处身边缘位置的知识分子仍然不易当。70年代末的亚马逊地区较诸60年代末,情况虽然已有改善,但以该地在巴西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事务中所占的地位来看,绝对算不上是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最佳的工作环境。要对普遍的理论框架和亚马逊地区的特定处境同时进行连贯一致的分析(国家代理人做的就是前者应用在后者之上),当地知识分子面对的主要障碍,可能就在于以缺乏理论整理的有关采掘业的零碎经验,跟国家援引的高度理论化的主流工业生产模型对抗。主流理论之所以强而有力,还因为它为工业化地区达致趋同增长提供了解决之道,而从采掘经验发展出来的批判

理论,则只能预示衰退和停滞。

理论框架为人接受,据此而行的政策却受到反对,蒙科塔(Jose Marcelino Monteiro da Costa 1979)的一篇文章正好展示了这场有口难言的角逐的张力。蒙科塔家族一向控制亚马逊地区一个小角落的橡胶业(参看 Monteiro da Costa 1970a, 1970b)。蒙科塔在伯克莱加州大学经济系毕业前后,对橡胶业作过研究。与马哈尔和其他大部分为国家筹划的知识分子不一样,蒙科塔明显用非常不同的观点看待亚马逊计划。他(1979:62)直接引用亚马逊计划的框架文件(CDE:1974),赋予马哈尔所理解的“资源前线”更苛刻的意义。“时机已到,我们要利用亚马逊地区的潜力,使国民生产净值有可观的增长”。马哈尔认为亚马逊计划比过往的发展计划大有改善,而蒙科塔(1979:62)却干脆视之为官方对工业化了的南部中心地区剥削亚马逊地区进行“净化”的说辞。

蒙科塔的论据最发人深省之处,是他运用与英尼斯非常相似的说法,描述国家经济以何种模式统摄亚马逊地区,以及这种统摄的后果。虽然他同时援引诺思、赫希曼、沃尔金斯以致更悲观的迈德拉尔(Myrdal 1957)和弗里德曼(Friedman 1966)的著作,为他所运用的概念提供权威性,也承认这些人在相关领域上的卓越成就。蒙科塔跟英尼斯同是以边缘地区知识分子的身份写作。对于空间这一因素,以及采掘型经济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被压抑在工业型经济之下,蒙科塔都深具警觉。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关注,加上他对采掘型经济有极为具体的认识,使他的思考方式有别于那些他所援引的,从工业型经济模式中发展出来的抽象理论。“位处偏远地点的经济部门,在技术上会反映在该部门创造就业的能力低落、高度资金集约、大量消耗无法再生的资源这几个方面。如就采掘型经济而言,则将无可避免地变为肿瘤,脱离其身处的社会经济脉络。该部门所处的地区如果还有甚么剩下的话,就是所谓

的财政链接(fiscal linkages)。”(Monteiro da Costa 1979:60;关于“fiscal linkages”请参考 Hirschman 内的注解,1976)

蒙科塔接着解释动用较多劳动力的种植业,为什么在空间方面会如此分散,以致不能引发“区域进步”;即使以开采自然植物资源为目标、资本较密集而又有效分派劳动力的庄园系统,为什么亦总是[与其他经济部门]隔阂。在采掘并出口自然资源的区域互补性分工协作的前提下进行整合的后果,不单是不平等,而且是[经济和社会]解体。蒙科塔认为,透过建立出口导向的经济,把亚马逊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进行“生态地域整合”(physico-territorial integration),会直接造成“地区间和地区内的空间经济系统(inter-intraregional spatio-economic systems)的瓦解”、“内部团结解体”和“先存的维持生计方式崩溃”,而“[国家政权]却又不会着力为其所制造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法”。

这些描述慢慢合成一个精致的经济整合模式,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使用方面,显示出这模式自身具备自内殖民(internal colonialism)的诸种典型特征。

侵占策略以大型企业主导的大规模殖民为基础,对此策略的净化……在1974年9月15日,也就是说在通过了亚马逊计划后完成。该计划订下目标,在指定用作矿业、农牧业和农产品工业生产扩展的优先发展地区,创立15个“发展极”(poles of development)。(Monteiro da Costa 1979:62)

相比其他针对新开采计划的反对声音,蒙科塔的肺腑之言表达得更为具体精确和有条理,也不像其他的见解那样,顾虑重重地掩藏其在地方上受新计划的政治、经济安排威胁的特殊利益。蒙科塔拒绝承认作为亚马逊计划基础的经济模型的假设,这表示国

家计划人员和政客援引的理论框架,之所以被视为无懈可击,主要是因为这些理论框架,跟广受认同的经济增长模型非常相似。因而对这一基本模型的抨击,就被视为对区域发展和国家发展的抨击。同时,蒙科塔质疑这模型赖以建立的概念工具,亦等于在削弱自身所能宣称的专业权威和能力。

当时有关亚马逊计划的公众舆论,和数年之后就卡拉亚斯发展引起的激烈争论,遗下大量记录,从中可见政府操纵利用这一经济模型的行径,也可看到大型采掘计划的反对者,虽然尝试争逐对模型的部分诠释权,却又终于失败的过程(参阅 Hermes 1982; Pinto 1980, 1982)。国家代表经常责难反对者妨碍社会进步,反对者亦总是急忙澄清,要与阻碍发展的主张划清界限,这更清晰地证明“反发展”和“顽固分子”之类的标签,打击批评声音的威力。面对国家政权强行征收计划内巴拉(Pará)极区的土地与自然资源,该地区的州长、参议员和代表,纵使预料[计划会使]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社会要付出代价,并为此而发出强烈的批判,或对这些极区内财政投入的过失加以最深刻的抨击,但他们仍然总是公式地向公众表示:他们并不反对亚马逊计划或卡拉亚斯的发展计划,他们大力支持发展,他们并不会把地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3]

地区发展理论按诺思、赫希曼、佩鲁和沃特金斯这串理论家所制造的材料加以翻新,并为代表国家利益及从国家取得权力的计划者和政客所用,他们又以地区发展理论的立场与分析框架为依据,然后把他们的糖衣包在模型之上,借此把模型本身抽离争辩范围以外,以削弱反对者的论据。反对者只能从抽象理论的范围以外,在特定地区的历史和个别事件中寻求理据。

有关卡拉亚斯铁矿的争论,特别清楚地显示,国家计划人员和政客具有运用发展理论来界定论辩范畴的能力。铁矿附近的“增长极”发展计划,是规模最大和成本最高的计划,同时也对环境构

成最大威胁。1967年在巴拉州南面发现了180亿吨质量极佳的铁矿,该处被认为会是世上最大的矿场。附近地区接连发现规模较小的各类重要矿藏以后,巴拉州就敲锣打鼓地给冠上“矿省”的称号。

这些矿藏的基本问题,与英尼斯所描述的许多其他采掘企业的问题相似。它远离各市中心和像样的运输系统。另一方面,要兴建运输系统的成本非常高昂,同时会搞乱道路网络所覆盖地区的现存社会经济组织的平衡,也对道路未有延及的地区的经济不公平。而选择不同的运输工具,其实也是选择采用不同的技术,亦会造成差别甚大的后果。一种选择是把矿产沿托坎廷斯河(Tocantins River)运至贝伦(Belem),即巴拉州的首府,再从贝伦的河港把矿物转卸到较大(而非最大)的船只之上;另一选择是把矿产装在火车上运890公里,可是这条铁路得要贯穿茂密的森林,矿物才能沿铁路运至深水港圣路易斯(São Luis),即邻州马拉尼昂(Maranhão)的首府。然而由于新近发现大型铝土矿,[政府]因此有计划在托坎廷斯河兴建巨大的水力发电堤坝,为日本联营企业与国内合资的投资计划提供能源。这又使水路运输的选择更加复杂。负责开采铁矿的国营企业多西河谷矿业公司(CVRD Companhia do Vale do Rio Doce),就是日本联营企业在铝矿采掘项目中的伙伴。一家日本政府赞助的顾问公司,早已就该地区的矿藏和相关种植资源的采掘,拟定各类计划。

英尼斯述及外来操控的影响和庞大而又孤立的运输基建所带来的债务,并描述了运输路线使一地区的经济与另一地区形成对立。巴拉州的政治和经济团体,也要面对多重的威胁:既无法分享矿藏带来的大部分收益,又要面对托坎廷斯河从贝伦起始的航运中断问题,更可能要面对失去在这大片区域的政治和经济控制权。

早在1975年,地方上少数敢言的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展开了

一次运动,反对以铁路运输作为解决手段,强调兴建铁路的代价和将造成的破坏(Paes Lima 1975)。多西河谷矿业公司和国家政权几乎无视这一场论争,他们决定选择采用昂贵的铁路深水港方案。但论争的影响仍然存在。当与多西河谷矿业公司合作的美国钢铁公司(U. S. Steel)由于未能就投资比率的问题达成协议而退出,多西河谷矿业公司和政府费另觅资金发展矿藏。这连串事件使卡拉亚斯受到全国注目,同时令政府和多西河谷矿业公司动辄得咎,抨击的言论也影响外资投资的决心。区域发展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与最终后果,突然间受到重视(参阅 Pinto 1982)。早前地方上的批评声音,现在与全国的声音互相支援,关注大量投资于运输建设所造成的问题;开采过速、环境破坏,资源耗竭等,同时也使世界铁矿市场价格下降。(参阅 IBASE 1982)

这期间形势逐渐明朗,国家未能找到直接的投资者取代美国钢铁公司,因此必将从多边银行贷入资金。发展计划对运输的需求造成的衍生影响已渐渐为人察觉。移民流入卡拉亚斯一带,因为他们相信该处将有大量就业机会,更以为兴建新的道路和铁矿开拓可以提供定居的新土地。移民潮激化大量土地纷争,当地原住民族群亦明显受采矿计划带来的侵略所威胁。

国际压力迫使世界银行和欧洲共同体把保护环境和原住民的措施,纳入发展计划之中(Mahar 1989)。因争夺土地而引发的暴力事件、因资源枯竭和环境破坏招来的抨击、对可能被征用土地的抗议和因侵占原住民土地而引起的关注,使多边银行注资的可能性减低。军政府在回归文人执政的期间也受到压力,要容纳较开放的政治空间。

由于外债急剧膨胀,[国家]政府只好借短期巨额借贷以济燃眉之急,并寄望长远矿物出口收益可以偿清债务。债台高筑使国家政权有必要安抚国内的反对声音,和消除国际间债主的疑虑,因

此,亚马逊计划将如何纠正矿极(mineral poles)附近的不平衡增长的说法已不合时宜,[官方]需要更明确和宏伟的计划。这一次官方仍是从主流发展理论中,随意借来某些原则和概念,否认采掘业的问题。1980年,计划部部长正式宣布大卡拉亚斯方案(PGC),以“促使地区内利益以最高效率的方式内化”(PGC 1985: 3)。官方印发浮夸的宣传刊物,用大量的照片和地图夸示方案的目标,即“在国内广泛的地区间达致和谐增长、工业下放、创造新职位重新引导移民流向、偿付外债”(cf. Perloff and Wingo 1961: 313)。这些宏图所根据的,就是复杂多样的原材料和多西河谷矿业公司兴建的运输基础建设,再加上图库伊鲁堤坝(SEPLAN未注明日期)提供的电力等所谓“天作之合”(参见 Perloff and Wingo 1961:313)。这些宣传刊物强调,新开发的农林土地将与采掘矿业齐头并进,又重复大卡拉亚斯方案的构想是来自“政府缩小区域差距的决心”,以期“达致跨部门整合”。全国劳工将受法例保护,法例会限定原材料在出口之前,要经过某种最起码的加工。国家政权亦会借助为运输和能源基建所串连的各类自然资源,使矿、林、农业之间产生链接效应。大卡拉亚斯方案完全没有这类经济的相对孤立、资本集约和技术依赖的性质,也没有提到这些特质差不多必然导致这类经济极低的链接效应。国家政权只是简单地假设大卡拉亚斯方案本身,连同那些由矿物采掘带来的物质基建资源等,便能为该地区吸引私人投资。

大卡拉亚斯方案得靠两个机制实施;第一,利用公路搞好基建;第二,只要是经大卡拉亚斯方案的跨部门会议(Interministerial Council)批核的投资发展工程,在大卡拉亚斯方案地区(面积为90万平方公里)所得的利润,可免缴全部税项。这等于政府豁免大型建筑公司的税务,因为地区上的利润,主要由为资源采掘和出口而施工的基础建设工程公司所赚得。由此可见,

即使在分配财政诱因方面,运输依然是考虑因素之一。

惟一提出过或获批准的上游或下游链接的矿物计划,只有那些需要简单技术和对环境损害较大的矿物基本加工步骤,主要就是把铁矿石锻冶成生铁[的加工步骤]。享受财政和免税期优惠的建筑公司认为这些计划有吸引力,因为冶炼生铁の木炭可以在当地取材。而制造木炭的技术很简单,这些工作可以分包给当地的小企业和农民。然而这仅有的链接却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它加速伐林,同时使空气受到污染。人人以为这一带的土地有快钱可赚,激化了土地纷争,而个体木材供应商却因林木被砍光而陷入困境。蒙科塔所批评的空间分散而技术原始的种植业,制造木炭恰恰正是清楚的例子。大卡拉亚斯方案声称提供财政诱因可吸引投资,使开采矿藏的利益内化到地区中,借此缩小区域差距。事实刚好相反,为采掘矿藏兴建的铁路沿线的土地,由于财政诱因,变成一片片冒烟的荒地。木炭买卖稍稍提高了那些掌控林地的个体的收入以后,留下的是林木已被伐尽的林木地、地方枯竭的土壤和污染的水源。(Banker 1986)^[4]

巴拉州政府在处理地区发展理论的说辞和矿藏采掘的现实之际,面对特别棘手的两难处境。卡拉亚斯需要发展运输,成千上万无家无业的人就到那里寻找土地和就业机会。多年后当地或会因拥有矿藏而大幅增加赋税收人,但在此之前,土地占有权体制持续混乱而且不断恶化,移民流入更加剧了纷争。多西河谷矿业公司和大卡拉亚斯方案方面的人员指摘州政府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犹豫不决,又无力维持社会秩序,以此证明地方政府办事无能,进而合理化他们日渐增强对影响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决策的操控。标准的经济学智慧认为运输基建对区域发展有正面影响,所以巴拉州政府不能直言无忌,埋怨这个引起大规模移民的主要原因。其实巴拉州政府几经艰苦才摆脱压力,免于承担筑路通往煤矿的成

本(Bunker 1986)。冶炼生铁会为社会和环境带来恶劣的后果,但却是州政府使铁矿增值并可指望从中抽税的惟一指望,所以巴拉州的州长在批评财政诱因制度时小心翼翼,尽管这个制度向对冶炼毫无经验的建筑公司提供大量的补助。

普亚马逊尼亚计划提出含糊的保证,谓采掘型经济会藉着把亚马逊地区吸纳入国家经济而使当地得益。大卡拉亚斯方案把这些保证变为具体的机制,这些机制据说可以把一整列低度链接的资源采掘经济改变,变为增长极理论中最具动力的经济部门。没有几个当地的观察者相信建立农业和工业的计划可行,甚至没有几人认真考虑过这个计划(参阅 Pinto 1982; Kohlhipp 1987)。许多人放弃了先前对大卡拉亚斯方案的期望,改而用蒙科塔看待普亚马逊尼亚计划的观点,视之为对现存压迫和剥削模式漠然美化。他们不仅怀疑大卡拉亚斯方案声称可以达成的目标,也对这方案所预告的愈演愈烈的采掘感到恐惧。

亚马逊地区的知识分子和政客,只针对发展计划执行细节的问题作批评,两方而都没有对大卡拉亚斯方案作出综合的理论批判,而大卡拉亚斯方案就是利用发展模型为它的各种论调提供措辞,这些论调包括最后将达到平衡增长、缩小区域差距、借建立运输网络可以帮助工业缔造进一步的链接效应。发展的模型神圣不可侵犯,只有其微枝末节才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复杂细致的当地知识与对地区的关注,被视为与全国福祉对立,无论是政治的或是学理的论据都对这些本土的声音进行有力的扼杀。大卡拉亚斯方案和它提供的许多诱因,终于在 1990 年废止,但这是因为国家的财政危机,并非对于大卡拉亚斯方案的基本假设有所批判。

结 论

从地区的主要原材料去观察历史的方式,被改头换面、扭曲和简化,变成主要原材料的增长理论,最终演化成给地域性不平衡增长当借口的--般理论,这种理论没有认清采掘和生产的区别。这个理论的演化和扭曲的过程,显示历史的特定事件转移到抽象的经济学概念,再[把这些概念]回过头来在政治层面加以应用,这其中隐藏的危险。由于对采掘和生产两种经济形式无法辨识,又对这两种经济形式完全不同的空间动力学缺乏认识,导致那些被采掘型经济定性的地区产生严重混乱,也让人对采掘地区和生产地区之间达致最终趋同或对等,抱有过份乐观的估计。知识分子本来可以对边缘经济的个别问题提出解释,可是这些混乱之处却往往使他们缄口不言,这就为本国和国际间的政治和经济实体提供便利,巩固他们对自然资源的掌控。

对采掘型经济发展链接效应的潜力过分自信,可能会直接使公共投资以吸取矿藏口的链接利益为目标,但是[矿藏]位置带来的消极因素是如此巨大,实际上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这类投资才会具有竞争力。谢弗(Michael Shafer 1983)曾经讨论,强逼地方进行加工与其他链接为目标而推动的国有化所面对的多重困难,斯蒂芬斯(Evelyn Huber Stephens 1987)对铝和铜的比较,也解释了在为地区发展寻求“链接”的计划里,地理位置、物理特质和商品本身的技术要求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最近几个研究都或明(Firebaugh and Bullock 1986, 1987 Jaffee 1985)或暗(Jaffee and Stokes 1986; Smith and Nemeth 1988)地运用链接概念,尝试剖析出口前不同程度的加工对全国发展的影响,或检视不同的区域经济间商品流动的分类所产生的影响。把众多处理原材料的不同过

程,化约为可比较的指数,这只能是粗略的估计,即使作出这些估计也需要大量相当复杂的工作。然而这些研究没有把不同的经济种类混为一谈,反而全都指出各种经济类型的特点,在不同的程度上肯定了区分采掘和生产的重要性。

那些既忽略采掘业的特点,又试图增加采掘业给本地或区内利益的做法,已导致明显的失败,可是在讨论发展的文献中却鲜有人承认这个事实。贝克尔(David Becker 1983)看好“发展矿藏”(bonanza development),又肯定秘鲁政府控制采掘条件的能力。这种对采掘业一向以来面对的问题视而不见的态度,不过是在重弹罗默尔的老调而已。虽然有大量证据显示秘鲁的政治和经济都在走向崩溃,贝克尔的乐观言论仍然不断受正面的注意(参阅 Evans and Stephens 1988)。纵使我们的论据有力而准确,但也无法掩饰我们的结论与可观察的事实之间的分歧。不过采掘经济偏远孤立的特质,使人不易作出观察。这确是一个问题。

问题不在链接概念本身,也不在于对链接作一般性陈述,而在谬误百出、错而不改的类比和地域间的混乱,以及对采掘企业带动增长的潜力的盲目乐观的合理化。如果我们认清这种由工业延伸到非工业的类比,并在得出的结论误导我们时便放弃它,那么类比仍可发挥其助力。我们运用类比思考,从已经熟悉了解的情境中掌握规律,再把这种观测延伸到尚未认识的情境中去,许多最具创意和最优秀的思想观念就是这样出现的。假如推延可行,我们便不希望组成原来的模型的那些细节与新的模型混淆。但当我们发现实行这些抽象概念带来破坏性的后果,例如面对错漏百出、明显有害的地区发展计划时,那么我们便应该向以为是对的理論逐一怀疑(cf. Pierce 1877)。

检视从经验观察如何产生抽象概念的过程(这里的个案是从英尼斯到赫希曼以后的转变),不单可以找出我们模型中的盲点和

应用这些模型的潜在问题,也可以使我们看清在拟定发展计划这一充满大量争议的过程中,各种不同的运用概念的方式。我在此要说明的论点是:把对主要原材料的研究方向归入一般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型的尝试是错误的,这些模式使潜在的反对声音窒息,让本土系统的社会和环境付出沉重代价,屈从于目的是确保对原材料的控制的国家和国际策略。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国家政权和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发展理论达成其自身的目标。分析个别的采掘型经济,会感受到[地区的]意见表达的要求;而了解采掘地区如何构成全球互相依存的资本体系的部分,则是以寻求一般规律为目标。[我们所讲]的这个故事却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消解这二者之间的张力。

要建构新的模型,我们得回到细微的特定事件中去。这些事件可能显得别扭、没有代表性和过分仔细,然而对特定的主要原材料的采掘过程进行持续研究,将能对在全球工业扩张继续加速采掘的情况,提供必要的参照,以平衡我们对泛论陈述的需要。拒绝把个别[的经验]归属于一般法则,可能会使我们更加注意身处采掘边缘的知识分子的著述。如果我们的主要知识背景和个人经验都来自工业社会的话,那么牙买加人[Norman Girvan(1976)]有关铝的著作,以及尼日利亚人[Chibuzo Nnato Nwoke (1984, 1987)]有关矿藏经济收益的著作中的观点,就会变得难以理解。他们都以采掘和生产的区别为前设,提出有力的论证,认为收益分配应对本土民众更有利。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著述并不只是对理论的改良,而是介入和反对那些忽视采掘与生产之别、忽视两者间不可避免的不平等关系的主流发展理论。

注 释

- [1]对于经济学家引用英尼斯的不那么苛刻的评价,请参阅 Brookfield 1975: 94,170。
- [2]赫希曼(1977:90)实际上也意识到资源耗尽的可能性以及与进口产品竞争,并提到“各种极端不幸情况一起出现的可能性”,但是他除了轻轻带过之外,并没有发展这些意念。文章其他地方的调子基本上是乐观的。
- [3]这里提到的长达15年之久的公开论争和各种观点,在线将要出版的一本有关大卡拉亚斯的方案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的书中,有详细的分析。
- [4]即使这种相对较易掌握的方法,也并非如大卡拉亚斯方案原先设想的那样广泛地被应用,主要是因为公司似乎把经补助而得的资金投入到处。

参 考 书 目

- Adams, Richard N. 1975 *Energy and Structure: A Theory of Social Power*.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Becker, David G. 1983 *The New Bourgeoisie and the Limits of Dependency: Mining, Class, and Power in "Revolutionary" Peru*.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rookfield, Harold 1975 *Interdependent Development*. London: Methuen.
- Bunker, Stephen G. 1979 "Power structures and exchange between government agencies in the expansion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4(1):56-76.
- 1985 *Underdeveloping the Amazon: Extraction, Unequal Exchange, and the Failure of the Modern Stat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1986 "Extração e tributação: Problemas de Carajós." *Pará Desenvolvimento* 19:11-12.
- 1992 "Natural resource extraction and power differentials in a global economy." In *Understanding Economic Process*, edited by Satti Ortiz and

- Susan Lees, 61 - 84. Washington, D.C. : University Presses of America.
- Bunker, Stephen G., and Denis O' Hearn 1992 "Strategies of economic ascendants for access to raw materials: A comparison of the U. S. and Japan." In *Pacific Asi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System*, edited by Ravi Arvind Pajai, 83 - 102. Westport, Conn. : Greenwood Press.
- Bunyard, Peter 1987 "Dam building in the tropics: Som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In *The Geophysiology of Amazonia*, edited by R. E. Dickinson, 63 - 68.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 Caves, Richard E. 1968 "'Vent for surplus' models of trade and growth." In *Economics of Trade and Development*, edited by James E. Theberge, Chap. 11.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 Caves, Richard E., and Robert Holton 1959 *The Canadian Economy: Prospect and Retrospec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DE (Conselho de Desenvolvimento Econômico) 1974 *POLAMAZONIA: Exposição de motivos interministerial No. 15/74*. Brasília: CDE. Dean, Warren
- 1987 *Brazil and the Struggle for Rubber: A Study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vans, Peter, and John D. Stephens 1988 "Development and the world economy." In *Handbook of Sociology*, edited by Neil J. Smelser, 739 - 73. Newbury Park, Calif. : Sage.
- Firebaugh, Glenn, and Bradley Bullock 1986 "Levels of processing of exports: New estimates for 73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in 1970 and 1980."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0: 333 - 50.
- 1987 "Export upgrading, export concent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 cross - national study."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2(2): 87 - 109.
- Frank, Andre Gunder 1969 *Latin America: Underdevelopment or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1979 *Dependent Accumula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 New York:

- Monthly Review Press.
- Friedman, John 1966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A Case Study of Venezuel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Girvan, Norman 1976 *Corporate Imperialism: Conflict and Expropria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Gore, Charles 1984 *Regions in Questions: Space, Development Theory, and Regional Policy*. London: Methuen.
- Hermes, Gabriel 1982 *O Programa Grande Carajás: Sugestões e preocupações das classes empresariais*. Brasília: Senado Federal.
- Hirschman, Albert O. 1958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76 “Desenvolvimento em Cadeia: Uma abordagem generalizada.” *Estudos CEBRAP* (October - November - December).
- 1977 “A generalized linkage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tapl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5. Volume supplement, “Essay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in honor of Bert F. Hoselitz,” edited by Manning Nash.
- 1987 “Linkages.” In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edited by John Eatwell, Murray Milgate, and Peter Newman, 3:207 - 11. London: Macmillan.
- IBASE (Instituto Brasileiro de Análise Social e Econômica) 1982 *Carajás: O Brasil hipoteca seu futuro*. Rio de Janeiro: IBASE.
- Innis, Harold A. 1930 *The Fur Trade in Canada: An Introduction to Canada's Economic History* (rev. 1956).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1933 *Problems of Staple Production in Canada*. Toronto: Ryerson Press.
- 1936 *Settlement and the Mining Frontier*. Vol. 9, part 2, of *Canadian Frontiers of Settlement*. Toronto: Macmillan.
- 1940 *The Cod Fisheries: The History of an International Economy*

- (rev. 1954).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1956 *Essays in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 Edited by Mary Q. Inni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Isard, Walter 1951 "Distance inputs and the space economy. Part 1,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5 (May): 188 - 98.
- Jaffee, David 1985 "Export dependence and economic growth: A reformulation and respecification." *Social Forces* 64(1): 102 - 18.
- Jaffee, David, and Randall Stokes 1986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rade dependenc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7(4): 533 - 46.
- Kechane, Robert C.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loppenborg, Jack 1988 *First the Se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nt & Biotechnology, 1492 - 200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ohlhepp, Gerd 1987 "Problemas do planejamento regional e do desenvolvimento regional na area do programa grande Carajás no leste da Amazônia." *Tübingen Geographische Studien* 95: 313 - 45.
- Krasner, Stephen D. 1976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asuen, J. R. 1972 "On growth poles." In *Growth Centers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dited by Niles M. Hansen, 20 - 49. New York: Free Press.
- Leontief, Wassily W. 1951 *The Structur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1919 - 193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pietz, Alain 1986 "New tendenc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Regimes of Accumulation and Regimes of Regulation." In *Production, Work, and Territory: The Geographical Anatomy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edited by Allen J. Scott and Michael Storper, 16 - 40. Boston: Allen and Unwin.

- McMichael, Philip 1984 *Settlers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Foundations of Capitalism in Colonial Austral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har, Dennis 1979 *Frontier Development Policy in Brazil*. New York: Praeger.
- 1989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Deforestation in Brazil's Amazon Region*. Washington: World Bank.
- Monteiro da Costa, José Marcelino 1968 "Estudo sobre borracha vegetal." Belém: SUDAM mimeo.
- 1970a "Borracha vegetal: Análise da oferta." *Revista Econômica do BASA 1* (September - December): 37 - 51.
- 1970b *Diagnóstico econômico preliminar das áreas urbanas do Acre, Amapá, Roraima e R*.
- Moran, T. H. 1987 "Managing an oligopoly of would-be sovereigns: The dynamics of joint control and self-control in the international oil indust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 575 - 607.
- Myrdal, Gunnar 1957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 London: Duckworth.
- North, Douglas C. 1955 "Location theory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3(3): 243 - 58.
- 1961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 - 1860*, Chap. I. Englewood Heights, N.J.: Prentice Hall.
- North, Douglas C., and Robert Paul Thomas 1973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woke, Chibuzo Nnato 1984 "World mining rent: An extension of Marx's theories." *Review* 8: 29 - 89.
- 1987 *Third World Minerals and Global Pricing*. London: Zed Press.
- O'Connor, James 1991 "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gulf war."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2(2): 1 - 16.

- Pass Lima, J. 1975 "Escoamento do minério dos Carajás." *A Província do Pará*, August 3.
- Perloff, H. S., and L. Wingo 1961 "Natural resource endow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nomic Growth*, edited by J. J. Spengler, 191 - 212. Washington, D. C.: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 Perroux, F. 1955 "Note sur la notion de pôle de croissance." *Economie Appliquée* 1 - 2 (January - June): 307 - 20.
- 1961 "La firme motrice dans la région et la région motrice." In *Théorie et politique de l'expansion régionale*.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l'Institut de Science Economique de l'Université de Liège. Cited in Lasuen, 1972.
- PGC (Secretaria - Executiva do Programa Grande Carajás) 1985 "Programa Grande Carajás: Análise da situação atual e novas diretrizes." Brasília: mimeo.
- Pierce, Charles S. 1887 "The fixation of belief."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12:1 - 15.
- Pinto, Lucio Flavio 1980 *Amazônia: No rastro do saque*. São Paulo: Hucitec.
- 1982 *Carajás: O ataque ao Coração da Amazônia*. Rio de Janeiro: Editora Marea Zero.
- 1989 "Carajás: Jogo exclui a verdade." *Jornal Povo* 49:3 - 4.
- Roemer, Michael 1970 *Fishing for Growth: Export - Led Development in Peru, 1950 - 196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antos, Dalva Maria Vasconcelos dos 1986 "POLAMAZONIA: Elementos para uma avaliação." *Pará Desenvolvimento* 18:7 - 9.
- SEPLAN (Secretaria de Planejamento) n. d. *Programa Grande Carajás: Um desafio lançado a todos os segmentos da sociedade brasileira*. Brasília: SEPLAN.
- Shafer, Michael 1983 "Capturing the mineral multinationals: Advantage or disadvanta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7:1.
- Smith, David A., and Roger J. Nemeth 1988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 commodity ex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2:227 - 49.
- Staley, Eugene 1937 *Raw Materials in War Peace and War*.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Stephens, Evelyne Huber 1987 "Mineral strategies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tate, class, and the role of bauxite/aluminum and copper industries in Jamaica and Peru."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2(2):60 - 102.
- SUDAM(Supernitendência do Desenvolvimento da Amazônia) 1976 *Il plano nacional de desenvolvimento: Programa de ação do governo para a Amazônia*, 1975 - 79. Belém:SUDAM.
- Tolosa, Haroldo C. 1972 "Polos de crescimento: Teoria e Política econômica." In *Planejamento Regional: Métodos e Aplicação ao Caso Brasileiro*, edited by Paulo Roberto Haddad, 189 - 233. Rio de Janeiro: IPEA/INPES.
- Watkins, Melville H. 1963 "A stapl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9:141 - 58.
- Weinstein, Barbara 1983 *The Amazon Rubber Boom: 1850 - 1920*. Palo Alto,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6. 发展与知识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在第三世界发展中的社会角色的批判诠释^{*}

◆ 班努里(Tariq Banuri) 著

◇ 陈耀波 刘传伟 译 潘永忠 许宝强 校

1. 发展理论的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目睹一场规模前所未见的大型社会规划工程在第三世界展开。这些规划以工业化、现代化或发展等名义进行,^[1]基于西方优越的预设之上;认为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及价值体系较非西方的这些方面优越。西方优越信念在哲理上有两个根源:其一源自启蒙时期伦理——“以理性追求人类自由”;另一个源自殖民主义逻辑——“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当代的现代化理论皆在相对局部的基础上为自己建构认同性,使辩护更加容易:为了提高人均生产力(尤其是高产量的

-
- 本文原题为“Development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ocial Role of Modernization,” in *Decolonizing Knowledge—From Development to Dialogue*, pp. 249 - 278. Clarendon Press 1990.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工业部门),或者在满足种种“基本需要”——诸如正规教育、现代化医疗设施、自来水供应等方面,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西方科技不仅是切合时势的,亦是必须的。这个转移被说成需要由其他体制与结构的改变促进而成,如“国家建造”(state building,即在扩张国家权力的同时引进议会及民主的制度),以及向生活在传统社会的人灌输有利发展的特定“现代”(西方)价值观和习惯。

现代化工程展开之初,社会科学家深信他们能够协助第三世界人民解决多年积聚下来的困难,从一穷二白中建设新生活。^[2]即使是在这乐观无垠的年代里,却仍有三数异声,质疑此庞大规划是否睿智、是否恰当和是否可行。可是,现代化理论家坚信其规划,他们的妙方又得到普遍的信奉,使抱怀疑的人不是被申斥为恶意搬弄是非,就是非理性、受错误诱导的“怪胎”。同样地,当规划失败面临指责时,遭受责难的不是这些理论,而是理论在应用上的缺失。不是由于当地顽固落后的风尚、观念及制度,就是将责任推往效率低、惟利是图的政客和官僚身上。不过,情况已有改变。虽然现在就替发展理论题墓志铭未免言之尚早,但为一个盲目信奉发展的年代之消逝记一笔流水账,也是时候了。^[3]

今天,现代化理论已危机深重。以发展为题材的著作及期刊,对被南迪(Ashis Nandy)称之为“救赎的世俗理论”^[4]之宣称,扩大人类自由的应许,无不表示失望、不满,再不存幻想。^[5]

导至危机冒现的因素众多,最明显的莫过于发展带来的极端不平衡:富裕增加的同时,是贫者越贫;尽管生产不断上升,失业却日益严重。总之,亚、非穷国未能改善人民的生活。其次,是现代化及发展生态灾难关联日增:热带雨林及山区水文的破坏;巨型水坝和大规模水利工程对自然生态造成始料不及的祸害;沙漠化、水浸、土地盐碱化更令不少非、亚两洲的农民失去自力营生的耕地;对高耗能源工业和易出乱子的现代科技的依赖日增。同时,发展

亦在第三世界大部份地区造成严重的冲突和紧张。差不多在所有长时间进行发展计划的地区,战乱、社会动荡、民众及种族暴力、政治压迫、城市犯罪皆急剧增加。^[6]至于第四个原因,经济学和政治学——孕育发展理论的两个学科——开始陷入长期混乱状态,只在盲目摸索中觅寻新范式(paradigm)。^[7]

诚如卡尔多(Mary Kaldor)指出,发展能够创造公平和讲究人道社会的神话业已破产。^[8]尽管有上述各种重要原因,幻灭扩散最重要的理由似乎是对发展主义已经“死心”。正因这个觉醒,第三世界许多非西方(许多时是反西方)的社会、文化及政治运动的自我肯定日增,并且受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这些运动兴起的原因简单来说包括:

1. 越来越多人相信,地球的资源不足以让全球仿效/跟随西方诸国的消费模式。

2. 发展导致极多始料不及的社会和政治难题,使人意识到;即使“跟上西方”是可能的,但是,若企图在最短的时间来实现,对社会来说可能是有害的。

3. 第三世界人民渐渐熟悉西方的生活方式,遂对西方发展路线抱强烈的保留。类似的态度亦浮现于西方本土,无疑又加强了第三世界对西方模式的保留。

4. 水门事件、越战、石油禁运、经济不景气、城市生活败坏、西方国家中老年人及少数民族的困境等等发生于70年代的事故,进一步加速了这个怀疑与觉悟的过程,令到下述的迷信日益受到侵蚀:较诸第三世界,西方人民更能掌握自身的命运。

5. 当斯大林式政治清洗、其政权延伸操控生活领域、人民自由被全面否定等恶政公诸于世,人们对苏联模式的觉醒亦出现了。

6. 尽管民间发起普遍的抵制,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非理性军备竞赛的升级、加上随之而剧增的好战辞令,已令人们质疑理性模式

对保存人类种属生存的能力。

由于以上的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这两种西方宰制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想像的进步模式就此崩解,回归当地价值体系的转向变得有其认同性。

在这篇文章里,我以现代化理论引致的危机作为出发点,尝试论证这场危机印证了早前的疑虑绝非庸人自扰;危机暴现并不因为时至今日才突然发现到的种种社会代价,而是对发展付出的种种代价有了新的通盘了解。我试图证明,此一了解,转而又强化了针对现代化理论家诠释人类社会诸观点而生的深层不满。所以,要了解目前的危机,并且发掘其他合理而连贯一致的出路,有必要仔细考察现代化鼓吹者的视野及其知识、文化渊源。

2. 迈向一种知识社会学

当代的现代化理论由几条研究进路编织而成,虽则各自发展独有的论述和专业范畴,实际上每条进路的理论假设和研究结论,都在相互支持其他进路的假设和结论。这些论著共同拥有一个促因,就是要解释西方与第三世界在收入及生产方上的巨大差异,并且以这些解释为据,探求方法去消除这个差距。虽然近年已有点变化,但这些著作的目标仍旧以教化第三世界国家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变得近似西方”。它们的分歧仅止于对“西方”的定义、及对什么是达至现代化的有效途径抱不同理解。

现代化理论有几个次级学科:(1)作为最前线的发展经济学^[9]以及与它拮抗的其他范式:包括制度经济学的主流、新古典学派、结构学派^[10]等数个相互竞争的范式;^[11](2)——源自马克思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学^[12],包括世界体系的视角^[13]、依附理论学派^[14]及非依附理论马克思主义;^[15](3)政治发展理论——专注研究国家

建造^[16]的议题；最后是(4)社会现代化理论(social modernization theory)——将“正确”的社会价值和行为视作发展的先决条件。

尽管上述各派著述明显的存在重大歧异，却也分享一些共同立足点：

1. 单向直线历史观——认为西方在进步的通道上远远抛离第三世界；尽管学者对现今西方国家中种种社会状况是否可取，意见极不一致。

2. 对于西方经济戏剧性进展的最终原因众说纷纭，不过，相当广泛的意见认为个中原因乃由于不受局限的理性、应用科学到生产程序上、机械的社会关系观、效率越来越受到强调。

3. 关于核心价值的各项分析，诸如自由、公正、平等、创造性、甚至权力等，均以西方这些方面的经验与定义为依据。

4. 尽管差异极大，这些著述都隐藏着—项实证主义预设：认为达致社会目标的手段可以从目标本身分割开来；道德考虑通常只应用于目标上，而不在手段方面。

这篇文章要分析的正是这些共同点，要探讨的是：虽然鼓吹现代化的圈子内部存在巨大差异，然而在面对圈子以外的理论家和行动家有力兼具摧毁性的评论时，这些共同点是如何得以维护下来的。

为了描绘这个演变，我们必须对现代化理论作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分析；换句话说，即研究人们为何写他们所写的理论。在此，我采用理论家与评论者相互间之挑战与回应通用手法，来检视这些理论的进展。我将采用外部批评(external critique)这个概念来梳理这些复杂的理论；换言之，我将着重在现代化理论圈子以外的学者——他们对现代化理论者所拥抱的道德或学术观点都是不认同的——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

由是以观，理论的进展和革新端视乎理论家的三种创造性努

力:1.调整既有理论以适应新的形势;2.汲取新进思想以纳入自身的理论范式;3.抵御“外部批判”的挑战。^[19]但是,理论家提出的可行回应却受到他们的其他目标所制约。借用社会学家阿特威尔(Paul Attewell 1984)的研究进路,我认为这些互为制约的目标就是:“维护范式”(paradigm maintenance)、“规范相干性”(prescriptive relevance)以及“现代化的道德辩护”。这些目标之间的张力为理论的创新提供了主要的内在机制。^[20]为了达致规范的相干性的目标,论者须回应外部的批评,这回应却受到维护范式和为现代化辩护之需要的制约、限制,甚至窒息。

对“外部”批评最常见的回应就是建立“内部”的批评,即建立一个与现代化理论共享分析与认知取向的,也共担其道德的辩护的批评^[21];这个批评针对的只是被接受的观点中的种种假定或引伸。在短期内,这种内部批评可以引进范式的创新,在其上导致长时期的认知争论。有时候这些讨论可能产生新的范式,将理论家分化成两群人。^[22]然而,更常发生的情况是:由于正统派的种种监管整治(“policing” efforts),范式结果还是给维持了下来。理论的更新,最终被收编进既存的范式里面。当然,新的观念有时会被当作是没有根据或非理性的,匆匆的被排斥掉。

总而言之,上述讨论意味着当受到“外部”对正统理论的明显失败进行挑战时,“内部”批评成为了面对及吸纳这些挑战的工具。^[23]在这同时,相对于“外部”批评之攻击正统的道德依据、企图削弱及败坏其理论,“内部”批评则借“补足”以强化这理论,将它延扩到迄未触及的其他领域。对这两种批评的进一步考察当有助我们的讨论。

2.1 “外部”批评和“内部”批评

对现代化的“内部”批评,即接受现代化隐含的道德根据,因而

得以被纳入既存理论的批评形式,包括:

(1)“范式内”(intra-paradigmatic)的批评:质疑特定范式架构内的种种假定与倡议。^[24]

(2)“范式间”(inter-paradigmatic)的论辩:来自不同学科、参与争论的作者可能都共享受攻击范式的世界观,却不一定同意其原来的假设。

相反,“外部”或“另类”的批评,则拒绝被现代化理论收编。它们排斥现代化诸理论中隐含的关于行为与福利的种种概念,尤其是那些源自于把西方价值和建制当作是优越性的种种想法。这些批评可以纯然属于:

(3)对现代化的认知性的挑战;或是

(4)一些对占优势的理論的可信度造成损害的“社会/政治抗争”及抗议的具体例子。

认知性的挑战(即“另类”知识分子或学者对社会变动及进步的概念),除了以第三世界为焦点的著作之外,^[26]也包括一些并没有与第三世界困境有明显关系,而是纯粹探讨西方国家历经二三十年资本主义发展后难题暴露的著作。^[27]

社会/政治抗争一方面包括挑战那些支撑和强制现代性的态度及制度的政治动员、抵制及抗议,另一方面也包括一些社会心理上的机能障碍,或是公众对发展和现代化造成的结果所表达的广泛不满。这些抗议包括宗教和种族复兴运动、广泛的环保运动、争取社会保障运动、妇运以及各类牵涉文化诠释和扣连表述(articulation)的运动。^[28]

2.2 挑战与回应

这场讨论得出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对待发展可以有不同的研究进路。从主导范式的角度看,这些不同的进路便是不同层次

的批评。这体系的最外围是政治抵制、抗争和人民普遍对现代化的不满,以社群心理机能障碍表现出来。向内进一个层次是知识分子和学术界对现代化的批评——那些不认同发展理论隐含的福利和行为概念的人,挑战西方(价值体系和制度)优越论。再次的一层,要算是现代化理论世界观之下各个范式相互间的批评。最后的是在范式的窠臼之内的政策评论或为了简化方便而作的假设。^[29]

还要注意,每一个相邻层次的批评,均使论据更接近既定的范式。例如,“另类”理论家透过对普遍不满的诠释,使西方知识分子有可能了解这些不满;相近的范式能使外来的批评变得可以理解和可以应付;范式内批评提供了方法和手段,可以汲取和回应相近范式的批评。

从上述的讨论得知,所谓“外部”及“内部”乃是相对于分析的主题而言。就如我们检讨某一范式时,只有范式内批评才会被看待为“内部批评”。相反,当我们以整个学术界关于第三世界社会变迁的研究来衡量时,除了反建制的政治社会挑战之外,所有学术批评均应被视作“内部批评”。我的位置在两者之间,只分析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视之为一系列有创见的回应,以应付“外部”批评的挑战,不管批评是认知性的还是政治性的。

总而言之,社会理论家一方而受到许多批评的挑战,另一方面亦得而对某些预测上的明显失准。他们修补自身的理论假设或者吸收批评者的论点,创造性地回应这些挑战。这是个为理论体系带来动态和力量的过程,以现代化理论来说,出于理论家维护范式和为现代性辩护的需要,这过程因而备受局限和制肘。

占支配地位世界观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仰赖于它吸收或排拒外部批评的能力(将之打成不合逻辑、狂热或反动)。但是,随着越来越多针锋相对的理论和分析的著作问世,以及另类民众运动越

发肯定自身的价值,现代化理论容纳和吸收批评的能力更形紧绌,令占主导地位的模式出现危机。

2.3 现代化理论的回溯

在以下各节,我用“外部”批评这个概念来整理及导引我们去检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化理论的演化。这项工作需要建构一幅高度纲要式的图画,显示一系列认知性的批评和回应,其中分为以下阶段:(1)二元论;(2)价值的角色;(3)发展的意义;(4)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5)政治参与相对政治组织;(6)适切的科技与知识的社会角色;(7)生态、环境及自然资源上的难题;以及(8)文化上的批评。从政治到社会发展(或是早前挑战的更新)与/或“另类”学术批评,每一个阶段代表一种针对现代化理论的挑战,亦唤起不同的回应。表一列出一个简化了的演变过程。

虽然以下的描述难免给读者一种顺时序的感觉,但此非本文所愿。首先,特别是第五至第七个阶段,彼此或多或少同时并存,亦可以用其他方式排列。其次,作为概念的阶段仅代表某些思想受到广泛的认同或崇尚的时期,并非概念首次被提出的时间。知识社会学最感兴趣的,不在于为辩论寻找学术上的根源,反正某一争论的学术渊源常常可以追溯到很多早期文献,而是这些思想如何在某个专业领域里转化成为一个可资论辩的主题。^[30]这意味着,虽然一种大抵上顺着时间排列的次序,可以从学术论辩中看到(正如本文所说的一样),但在这些辩论中,并无一套显而易见的观念出现的次序。

表一以图解纲要的形式介绍各个阶段。第一阶段,认识到一个社会内部及各个社会之间(二元论)存在重大的社会文化差异,驱使一些作者尝试建构另类经济行为理论,与此同时,另有一些作者却要展示,现存的发展理论范式也能够容纳新近察觉到的差异。

表一 现代化理论的图像描述

阶段	主题	外部批评	政治事件	理论家的回应
1	二元论	波克 (Boeke), 弗尼瓦尔 (Furnivall), 文化人类学家	政治独立	和谐的(经济)二元论
2	价值的角色	亨格特 (Scott), 沃尔夫 (Wolf), 霍布斯鲍姆 (Hobsbawm), 米尔达尔 (Myrdal), 赫希曼	农民战争 社会不安 定	理性的农民 价值现代化
3	发展的意义	穆米达尔、哥列特 (Goulet), 舒马赫 (Schumacher), 伯杰 (Berger)	政治冲 突、内战	再分配政策, 消除贫困、基 本需要
4	政治发展	依附理论学者、政治人类学家	政治不稳 定、内战	政治发展、政 治稳定
5	异化、权利 剥夺	舒马赫, 伯杰, 格兰 (Gran), 葛兰西主义者	反统治运 动(非政 府组织)	政治发展、农 村发展、政治 参与
6	科技、知识 的社会角色	适当技术的文献, 格尔兹 (Geertz)	种族暴 力、失业、 非政府组 织成立	“错误的价 格”、科技人员 的选路、国家 的行动
7	环境与资源	生态学家、绿党、罗马俱乐部	生态运 动、反对 生物解剖 实验	界外现象 (externalities)、 管理主义者选 路、新法西斯 主义者选路
8	文化与抗争	南迥, 格尔兹, 龙伯罗 (Uberoi), 范农 (Fanon), 弗赖尔 (Freire), 杜蒙 (Dumont), 新结构主义者, 沙里亚提 (Shariati)	原住民复 兴运动	新古典药物、 四人帮的例 子, 为范式辨 护

在下一阶段,这些差异转变的本质和发生时间成为讨论对象。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假设传统社会存在不同的价值,并且论证这些价值当中一大部分需要被根除,由现代价值取代;只有少数人肯定另类价值本身就是重要的。对价值的争论,再加上一些重大的发展挫败引申出两个相关的问题:“发展的意义”和政治发展的优先性。接着,这些争论附以政治和学术方面的不满,终导致一种关于公众参与发展的论点,尤其是导致发展理论去扮演否定这种参与的角色。同样的忧虑也呈现在生态和自然资源的问题上,认为缺乏人民对相关决策的操控,并质疑侵夺公众的社会参与机会是否现代科技的内在本质。这些问题其后被总合为所谓对发展的文化批评,这在下一节再行讨论。

3. 二元论

二元论一直是发展理论用以理解和修整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在人口、消费和生产上巨大差距的关键组织概念。传统理解认为,在工业国家已充分地齐一化(homogeneous)的同时,那些被称为发展中国家却常处于“二元”社会状态,即同时并存一个传统“停滞”部门和一个“具活力”的现代部门,后者反映西方进步国家的形态。在此诠释底下,“发展”的意思就是现代部门逐渐扩张,直至完全取代传统部门为止。当前的发展论述皆在暗示传统存活模式是劣等的,这正是采用“二元论”观点的结果。

从最初开始,发展理论已经采用二元论述组织其思维,但二元论的规范性和政策性含义却经历过一些重要的转变。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点:第一,从“冲突的”走向“和谐的”二元论模式,后者更切合发展政策的迫切需要;第二,人们起初,以二元论描述非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及经济结构,其后它变得越来越与全球经济相关的

辩论扯上关系,因为现代与传统这类比正是以“工业国”与“第三世界”为参照。

3.1 冲突与和谐的二元论

“二元论”一词首见于荷兰经济学家波克(J. H. Boeke)有关印尼独立前的发展的研究上,用以指涉“输入外来社会系统与本土社会系统的对抗,而不是共存”(Boeke 1953: 5;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波克虽则为这种冲突命名,但是这种想法本身并不新颖。里特尔(Ian Little 1982)回溯至殖民经济学家,如弗尼瓦尔(J. S. Furnivall),发现差不多的概念已经被引用。与现代发展经济学家不一样,弗尼瓦尔认为“发展”(意即开发一个地域作经济上的采掘)不但与“原住民的福祉”相对立,而且简直就是祸害。^[31]

对现代化理论家来说,“二元主义”一词具有相对和谐的含义。他们将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对抗诠释为一种“置换”,就如布鲁顿(Henry Bruton)稍后所形容的,就是以动态和理想的生活方式取代落伍和不称意者。发展经济学家进一步改进这概念,从理解二元主义为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变成理解为两种不同的经济行为模式。两者得以共存,皆因先进和落后部门劳动力供应的差异(就如刘易斯[A. Lewis 1954]和兰尼斯—费景汉(Fei and Ranis 1964)的模式所述),或两种不同层次的技术水平或资源蕴藏(如乔根森[Jorgenson]1967模型)。很自然地,人们不再视传统转换到现代部门为冲突,而是一种不可避免、合宜以及和谐的过程。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农村人口被牵扯到城市里去。当外来资金和其他资源的输入,导致农村劳工短缺,经济理由使劳动力由城市回流农村。

二元论本来就是关注发展为原住民带来祸害而生出的“外部”批评,根源于文化上的冲突。现代化论者把它转变成一项“内部”批

评；“二元论”概念本来是要反映发展和福利之间矛盾，后来逐渐被诠释成为两者协调的关系。

特别有趣的是由“冲突”转向“和谐”的二元论发生在什么时间。这个转向与昔日殖民地成功独立同时出现，新生本土精英需要这样的理据，为发展这观念及其政策，对据说是被解放的同胞的种种影响作出辩解。这个转向的另一个不那么富讽刺的原因，是与下列事情相联系的：殖民地独立后，从前属于“落后”的本地精英，现在已是构成“现代”部门的一部分。是以，早期外国和本土的利益冲突问题，现已演变为根据少数精英的意愿而重新塑造社会的问题。

发展概念的“单面向线性化”在这处境里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发明，没有它的话，“冲突”二元主义不可能转化为“和谐”的二元主义。首先，发展概念单面向线性化与衡量发展程度的“尺度”出现有关，其中最重要者，首推库茨尼特(Simon Kuznet)在其早期著作中提及的国民收入或产量(output)的概念。^[32]容许单面向线性化量尺的建构毫不含糊地置工业化国家领先第三世界，而第三世界内“现代部门，又比“传统”部门先进。虽然没有同样的数学精确度，另一对发展单面向线性化具贡献的是罗斯托(Walt Rostow)的甚有影响力的增长阶段理论。

3.2 国际二元论

形形色色的二元主义继续成为主要的组织概念，可说是各个相互竞争的发展经济学派的滥觞。国际二元论(international dualism)其中一个“冲突”版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使新范式得以突破的理论基础，这次轮到马克思主义者的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它的分析单位并非一个民族国家，而是全世界，“第三世界”及“工业国家”成为对应于传统和现代部门的类比。据此，依附论者

论证第三世界的发展(或低度发展)是与工业世界的需要动态交流的结果,情况如同一个国家内的“传统”部门也是出于“现代”部门的需要。依附论者还提出很多重要的问题,以本土与外国精英的关系,以及周边国家的政权所扮演的角色最为显著。

与此相反,“制度”发展经济学可说是源自“和谐”版本国际二元主义的正统新古典主义的另类理论,它希望将文化和行为上的差异纳入经济理论和政策制订。但这种纳入以理论的严谨性为代价,因而引起两个倡议它的学派对于这革新的正确性展开一场旷日弥久、至今未了的争论。最后,新古典发展理论继续坚持第三世界与西方工业国的分别仅在其天然资源禀赋,而不是由于行为或理性上的分别。

4. 价值的角色

上述的论争构成了现代化理论演进至下一阶段的基础,也就是参与者和理论家的社会价值问题。不同学者,包括沃尔夫(Eric Wolf 1969)、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1963)⁽³³⁾,后来的斯各特(James Scott 1976)和印度的底层人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学派(参考 Renajit Guha 1982 及 1983),还有从另一角度出发的赫尔舒曼等,皆强调传统生活模式有其优越之处。沃尔夫和斯各特的论据是由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入手,目的在于重新发现传统(农村)经济的道德架构。他们推许这些价值,认为人与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主从类型的联系、乡村的企业性质、透过资源共享与互惠交换的社会机制保证成员享有经济和社会保障等,均负有极重要功能。这些有关农民经济的主张属于“人性的”文化地图分类,会于另文讨论,它意图批判那些不假思索就接纳现代性里的工具理性和非人性的思维。

“现代”制度和实践引入“传统”社会时所遭遇的强大抵抗,是这些“外部”批评的合法性的泉源,特别是被所谓和谐的变更过程掩盖着的农民“叛变”的反抗形式。这种抵抗——政治的及文化的——常见于东南亚国家(先是越南、柬埔寨、老挝,其后有菲律宾和印尼),亦可见于南亚及非洲。从另一个角度看对二元论的认知性批评,其实是一种尝试,使现代化理论家(学术上而言)理解到第三世界人民从种种形式的抗争中表达出的价值观和诉求。

除了显著的政治抗争之外,尚有许多分散的社会及文化抗争,使转变并非如设想般进展迅速。这类抗争包括:人民不愿送子女到学校(有时甚至会放火烧毁学校),或是抗拒政府提供的现代形式投资所带来的诱惑。

4.1 理性的农民

在现代化理论的领域里有三个不同的发展,去回应以上的批评。所谓“理性农民”学派(波波金[Sammuel Popkin 1979]、舒尔兹[Theodore Schultz 1964]、塔斯[Soe Tax 1953]、克里舒尼[Raj Krishna])试图将农民的行为和价值以一般经济理论加以诠释,进而指出农民的道德与其现代同行无异。这方面的文献沿着非人性及功能论脉络,尝试诠释非西方社会的行为和制度,借此吸收“外部”批评者(沃尔夫、斯各特)表述的关注。相反,虽然这些“外部”批评也坚持农民是“理性”的,但是他们宣称有不同形式的理性,各种形式无分轩輊,没有一种理性比另一种理性更基本。

4.2 社会现代化

一个稍为不同的回应来自“社会现代化学派”(哈根[Everett Hagen 1962]、麦克莱兰[David McClelland 1961]、英克尔斯和史密斯[Alex Inkeles 及 David Smith 1974]、荷塞利兹[Bertholt

Hoselitz 1960]、派伊和维巴[Lucian Pye 及 Sidney Verba 1965]), 专注于决定社会价值和其变迁的社会心理因素, 试图重新确立“现代性”在道德上的优越。追随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先决条件(Weber 1930)及其后帕森斯有关模式变数的开创性研究(Parsons 1951), 这些作者开出一纸“现代”价值清单,^[34]又援引社会心理学上的解释来证实它们存在于某种文化中。他们认为,“传统”社会固有的保守主义是阻延“现代”价值观得到采纳的原因, 反支配的文化抵抗与此无关。再者, 为了现代化的所谓共同目标, 这方面的文献暗地里为现代化价值被强殖进传统社会炮制理据。

荷塞利兹简单地认为基本的价值取向必然从个别转向普遍, 亦从天生的转向功能的。麦克莱兰和哈根则以儿童成长机制的概念去讨论这种转变如何发生。他们独立地提出在传统社会中孩童在安全行为上的体验导致顺从权威的态度, 而在现代社会中却孕育出一种好问的态度来。哈根进而解释这好问态度的产生, 是始于一些没有出路的少数儿童抗拒父辈的价值。由于这些文章认为转变的原因在于驯和的孩童经验和相对愉快的育儿习惯, 它们明显的规范影响因而受到局限。^[35]英克尔斯和史密斯(1947)却认为现代制度如学校、工厂、政治党派、城市本质上会导致现代价值在民众中建立起来, 而这些改变亦会在成年期发生。

一些持相反意见的作者, 如路易斯(John Lewis)和莫里斯(Morris Morris), 认为所有社会都已存在现代化所必需的文化因素, 不一定要改变才会带来发展。赫希曼(Hirschman 1965)更进一步主张那些所谓阻碍其实可能是资产, 或可以使阻碍变成资产。社会理论家建议的态度转变可能弄巧成拙, 因为这些态度转变会在人们生活里造成认知不协调(cognitive dissonance)。

4.3 理论家的价值观

最后,一些作者(米尔达尔[Gunnar Myrdal 1968]、赫希曼[Hirschman 1965])借助这论争,力陈需要一门发展理论的知识社会学,特别是为了让发展主义者建议价值转变,或者在制订政策时,意识到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兼且警觉到,往往是分享相同观念的人获得益处。这就是直接带引我们进入现代化理论演进的下一阶段,即提出问题:发展的意义是什么?社会科学家是否能够中立客观的看发展中社会人民的热望?

5. 发展的意义

从文化价值辩论中冒出的一众问题当中,最重要之一是理论家本人的价值相对主义。米尔达尔指出理论家在文化上的异化,可能是源于西方国家相对于第三世界的地缘政治处境,加上他们性急地把预定的进路应用到新发现的难题上。这些问题在60年代中期提出,那时正是一些发展中的经济(巴基斯坦、迦南、尼日利亚、巴西)^[36]面对着越来越多的政治冲突和张力的年代。由此而造成的动荡暴露了对社会转变的方向潜在的不满,而快速经济增长接着可能是自我毁灭的,如果增长接着会慢起来的话。对此情况,关于“发展的意义”的文献的第一项关注,就是发展政策假设的目标是否真正是人民的意愿,使他们得益?第二项关注带出第三世界国家政治演化的问题,与及“政治发展”这门新兴的次学科(将在下一节讨论)。

“发展的意义”论争的源头,超出米尔达尔批评的范围。除了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享有可观增长者)内的政治冲突和张力,这里还有政治上和传媒针对发展政策的目标和对象所表达的不满。

这些大多不出自经济学家的手笔,而且往往用通俗而非学术界的语言。^[37]再者,很多经济学家也挑战发展的不平均本质,如哈赫(Mahbub ul Haq)批评巴基斯坦的经济越来越集中,^[38]菲什洛(Aibert Fishlow)1972年的著作针对巴西的贫富不均,或马克思主义者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对称权力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收入与消费分配不平等。

我们再一次看到,外部政治批评首先被知识分子中介编译成反现代化和反发展的言论,继而变成反增长的言论。在学术界的层次上,这场“发展意义”论争植根于社会福利理论;它的探问很具启发性:是否收入增加会带来快乐的增加?如不,追求增长的目标又是否合理?刘易斯(Lewis 1955)视这些问题为发展的核心,认为快乐不是问题所在,而是发展使社会享有更多的选择。其他作者(弗赖尔[Paulo Freire 1970]、根拉特[Denis Gunlat 1971])问道:发展是否增强人民核心价值的途径?如果是的话,把价值视为追求发展的手段是否恰当?

在这层次上,这其实是一个关于自由、释放或解放的较大的价值问题。但是,当讨论进入发展经济学的领域内时,它差不多完全被编译为经济学术语。就这样,不再是讨论释放或解放等发展过程的问题,而只是讨论理想的结果,如收入分配、消除贫穷或人类的基本需要等。^[39]

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回应的另一个方面,可能不是有意的,那就是他们的讨论,似乎转移了原来引起辩论的敏感政治问题。把注意集中在不平等的非政治尺度,即收入多少的分布情况,而不是集中在一些如功能、地域或种族的收入分布的更政治敏感的尺度,这是很值得深思的。同样值得深思的是把重点转移至政治上分散的对象,如基本需要或消除贫困,以及把注意力放在某类人,这些人历来都是政治上被动,甚至抗拒社会的干预,例如有些国家

里的农村人口。换句话说,当有人挑战理论家是否有权干预第三世界社会的人民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理论家的回应就是改变目标、优先次序或对象群体,借以重新肯定干预的认受性。马格林(Marglin 1984)说得好:他指斥发展理论家驱除(外部批评释放出来的)魔鬼的办法,是把魔鬼不叫做魔鬼。

扼要地说,广泛政治反抗背后的原动力,是源于一些无限制的、有组织及非人化的制度大量介入人民的生活,这些制度包括市场和国家,当然也包括各种不同的外国人。批判理论家解释这些反抗正要针对不适当的政府政策。现代化论者将民众反抗的问题看成:需要寻找获更广泛支持(但要同样客观)的目标,这个目标可以由仁慈的政府达成,而这样做有助于重建政府的认受性。发展经济学家小心翼翼地引进一些既可令理论家满意的目标,而这些目标又不致成为联合的政治行动或防卫的主题。而且,这种做法还让他们找到一个道德基础,抗拒城市居民或者政治上活跃的压力团体的诉求,方法就是诉诸农村贫困。无怪乎,另类发展指标(平等、基本需要、生活素质)尽管经过沸沸扬扬的讨论和论争,仍旧得不到政策制订者的真正重视,即使在一般民众之中,似乎也不能引起关注(Bruton 1985)。

6. 政治发展

60年代政治动荡的一个结果,就是比较政治体制的一门新兴次学科分枝——政治发展——的崛起,处理第三世界国家政治演化的性质。这门分支的先锋(奥尔芒[Gabriel Almond 1956]、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1968]、派伊和维巴[Lucian Pye and Sidney Verba 1965])认为:经济发展自然带动政治环境向好的这种关于政治发展的乐观想法,由于成长中的第三世界经济里产生

的矛盾和不稳定而没有实现,因此,有必要分析稳定政治演化的决定性因素。

有利的政治演化在这个文献里的意思,就是朝着西方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洛克和休谟等人构思的“理想型”推进,此中包括议会选举民主、专业官僚体制和政治稳定。但很多时这个“理想型”会被认为跟西方现行的政治制度相一致,最显著的例子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这意味着,单单从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是不足够的,还需要额外的条件。米尔达尔把政权分为“软”和“硬”(Myrdal 1968:895—900),后者是指欠缺现代化所必需的“社会纪律”(social discipline)。米尔达尔认为,基于文化或历史的缘故,即“无政府主义态度的传统,加上自抵抗殖民强权的恩忆而衍生的意识形态及感性力量”(p.897),许多亚洲国家的政权都是“软”的,使“推动调整发展的工作变得极为困难”(p.899)。据米尔达尔认为,在亚洲只有日本和中国是例外。^[41]其他属于政治发展理论传统的作者则从制度方面,而不是从文化方面的差异察看,暗示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可以透过体制改革来创造。

据此,政治发展理论逐渐将焦点聚集到国家建造(state-building)上,它包括建立使政权在社会中的“权力”^[42]得以“膨胀”的体制,以及增强行使权力的认同性的体制。^[43]权力“膨胀”要求强化官僚机器,不仅要强化它的强制活动,并且也要强化在技术上的效率、方法、过程、选择和训练等方面。要使权力具有认受性,公众对政权行使的权力须有霍布斯主义式的接纳。公务员招募机制的组织的改进和广被接受,将在这方面有所帮助。在宏观的层次上,扩大公众参与或者精英主导皆可以增强认受性,视乎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

韦纳(Myron Weiner 1965)偏离这种政权发展线性看法,指出两股迥异的政治文化——“精英”和“群众”——在印度独立后涌

现,两者在不同的社会层面运作,^[44]各自有其长处和缺点。特别要留意的是,这个“政治二元论”研究清楚指出,理性和非人性化的“精英”文化曲向权威主义,而讲求关系和人性化的“大众”文化却反而具备民主的可能性。然而,可以说虽然韦纳在其专业圈子中具有崇高个人地位,他在这个方面理论的富争论性的含义,并没得到关于发展的主流文献跟进。

另一个使到政治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原动力来自马克思主义者和依附理论家的著作(Paul Baran 1952 和 1957、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1972、Celso Furtado 1970、Andre Gunder Frank 1967)。他们探讨“核心”国家与“边陲”国家权力分配不平等的状况,以及后者的政治转变受到扭曲的问题。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观点相反,他们视政权本身为一个冲突的场域,以及权力在社会上分布情况的反映,而不是整个国家的福祉或者人民的需要和诉求的守护者。

政治发展文献的规范内容是有限的,这部分是出于如米尔达尔指出的文化因素,但也有其他原因。这些有限的规范内容,包括强化政权体制的建议(统治集团必欣然接纳)和建立稳定的权力转移机制(可能引起抗拒),再加上对民众灌输“正确的”态度和行为(可能不太可行)。正如亨廷顿稍后的《选择不易》(Huntington 及 Nelson 1976)一书的名字所显视,预测并不乐观。

其中确有影响的规范内容,就是旨在增加政策认同性,或在政治不稳定国家增强政权稳定性的那些内容,从而增加国家的“强度”。举两个例子便足够了。一些人主要针对农村政治不稳,引入“抗衡农村群体”的概念,这些抗衡农村群体,可以由现代化精英扶持、委任,以抗衡原来农村群体的权力,这是路易·波拿巴对普鲁士政府建议引入全民投票的翻版,他认为“在这种制度下,保守的农村人口可以使城市的自由派在投票里输掉”(引自 Bardhan 1984:

76)。同样地,不时提出关注“集中在农村地区的真正贫困者”的利益,虽然并不能成功消除“农村贫困”,却(可能不是有意的)成功地使不平等的城市政策具有认受性。

另有一些作者,例如伯尔基(Shahid Jared Burki 1976),主张倾向有效率但看来不平等的农业政策,因为他们支持利润极大化的“中农”——中农是个在实证或者理论上皆存疑的概念——去对抗“政治极大化”(political maximizing)的富农,即使这些政策损害“小农”的利益(对伯尔基的讨论和方法论的批评,可参看 Alavi 1976)。

让我为刚才的两个小节做一个撮要。从现代化社会内权利被剥夺的团体推动的政治反抗和抗议,社会理论家得出两个不同的推论。第一,政府的策划者选用的发展目标不为广大人民接受;第二,政治不稳定能破坏发展政策带来的成果。第一个推论招致一场关于发展的意义的争论,因而要寻觅客观而站得住脚的目标。从这个方向引起了一连串有趣的政策改革(顾及平等的增长,基本人类需要、农村发展),使专家颇为满意;但是这些改革未能真正处理人民不满的原因,所以人民的批评和反抗依然持续。这就证明了,不满的真正源头,可能更多是因为政府制订决策的过程,而不是其目标。

第二个推论显示,经济学家错误在专注纯经济的效果,疏忽了他们开出的处方所引发的政治后果。由于有先锋政治学者适时创立政治发展这门次学科去处理这个问题,令经济学家省却不少气力。不过,情况并不令人满意,政治发展提供的解困方案不多,而这些方案即使能产生些微成效,也可以被理解成是替统治精英招人指摘的所作所为寻找合法性的行径。

犹有进者,关于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的议论带出另一个迄今备受忽略的议题:人民对公共或政治事务的参与并没有随民族国

家的建立而扩张,即使引入选举民主也没有增加参与。这些关注更被强化,因为新兴的压制性极权政府多采用增长取向的政策,社会科学家便乐于替其提供认受性。所有这些关注皆出自“另类”理论家,用以挑战主流理论的根本假设。

7. 参与还是组织?

对政权的政治反抗可以有略为不同的诠释。我们可以视它为一项就政权的中央集权化、非人化及科层化组织作出根本的质疑,而不是反对个别国家的政策、个别政权甚至是政权更迭的系统的运作。政治发展理论只注意个别政权的病态,而不是民族国家概念本身。在第三世界涌现的冲突和不稳定,也以不同方式归咎于“不完全的”现代化:缺乏必需的政治制度、缺乏牢固的传统行为模式等,而非对抗因为走向西方民族国家模式而导致社会存在中的理性化及非人化。

这一套另类诠释(在西方和现时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地方均成为大量著述的主旨),质疑现代民族国家剥夺人民参与权利的潜在倾向。“无政府主义”者论述就是一个经典例子(包括戈德温[William Godwin]、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巴枯宁[Michael Bakunin]等人),^[46]尽管他们对个人主义的偏向制造了好些悖论和冲突。^[47]虽然无政府主义者(尤其是蒲鲁东)与马克思有严重分歧,这一路思想仍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安排中的自我异化(self-alienation)的概念上得到回响。而马克斯·韦伯更将争论延续下去,预言资本主义社会难免科层化,因为科层化社会组织具有效率。

踏入 20 世纪,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哲学(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48]，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和他的追随者(如布兰查[Nico Poulantzas 1978])^[49]与激进经济学者马格林[Stephen Marglin (1974)]及鲍尔斯和金蒂斯[Samuel Bowles 和 Herbert Gintis (1986)]等人在这—线上发展出重要理论。以第三世界为脉络，最早表达这些概念的作者有克鲁泡特金^[50]、甘地(M. K. Gandhi)及蒙福德(Lewis Mumford)^[51]和其后的伯杰[Peter Berger(1976)]、克拉斯特斯[Pierre Clastres(1977)]、格兰[Guy Gran(1983)]、伊里奇[Ivan Illich(1981)]、南迪[Ashis Nandy(1984 和 1987)]、舒马赫[E. F. Schumacher (1973)]与瑟维斯[Elman Service (1975)]。

这些著作试图重新启开西方政治理论中关于参与和责任等已有定论的问题。虽然论据不一，但其共同点就是反对霍布斯式关于自然状态的概念，即“人与人之间的全面战争”，因而同样反对现今被看成是必须的大型及集权组织，作为保障公众福祉的手段，并且批判这类组织剥夺公民参与权利。另一主题是区别政权与文化(或是葛兰西所谓的民间社会)作为社会规训的不同手段，并否定政权是较可取的规训手段。

这些批判从第三世界社会中持续的、正在升级的政治冲突和反抗得到认受性，尽管有种种尝试要强化国家机器。持续的紧张和冲突其后以沃勒斯坦(Wallerstein 1974)所说的第三世界反统治运动(anti-systemic movements)延续了下来。^[52]

现代化理论家对此批评的回应可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内部批评。他们坚称政府介入经济领域是不恰当的，理由是这样做会造成明显的低效率，以及其对社会的威权含义。这就导致把对发展理论各项争论，化约为单一的问题：透过市场自由化造就交易自由。与这个转折相关的几个面向将会在本文

第 10.5 节再行讨论。这里只须指出一种吊诡：那些追随“自由市场”发展路线的政权常常是第三世界当中最独裁的。事实证明，没有威权政权作为政治基础，是不能执行自由市场路线（参看 Sheahan 1980 和 Hirschman 1981b）。也许事出无心，这些例子确曾被引用来建议其余发展中国家建立独裁的政治模式。

第二，主流发展理论家提出的评论（例如 Tony Killick 1976），⁽⁵³⁾批评经济理论隐含的过分简单的政权和政策概念，希望能以较全面的表述以取代之。部分是这些批评的结果，机械化的规划程序和社会成本效益分析虽然一度在 60 年代被看做经济学的利刃，但近年已变得过时了。规划逐渐被看做“经济决策过程的投入”，而不是“产出”（用克力克 [Killick] 的语言）。与新古典学派推崇“硬”政权的批评不同，这方面的批评质疑理论家的全能全知，从而削弱政权的“硬度”。

最后，有一些作者有点儿自相矛盾地希望重新肯定，在一般情况下，西方模式政治发展的优越性，特别是其对社会问题的管理进路（the managerial approach）。它能否实现，取决于增加社会和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增加参与可以透过政府鼓励（参看 Huntington 1968）、更新科层组织的取向、⁽⁵⁴⁾提升政府决策的效率、⁽⁵⁵⁾将发展的焦点转移到至今仍受忽略的方面。⁽⁵⁶⁾其主要论据是，引进适当的制衡，能令官僚（或非人化的）机器回应人民的需要，这样做不仅是可能的，而事实上也是捍卫自由和主权的最佳方法。

我们再一次看到，这方面的文献可被看是两者的结合，其中一方是对现代化的外部批评，另一方是面对这些批评的范式维护和对现代性道德辩护的需要。挑战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国家的民主或民粹主义运动，对抗引入理性—科层政府（虽然这种政府据说可以更佳地带来快速经济增长）。“内部”批评主要集中在市场自由，或是政治稳定的问题，而不是关于参与和自由的更广泛问题。

8. 科技与知识

民间的抗争和抗议亦有其他的诠释,特别是为了针对引入现代科技及随之而至的制度所产生的影响。除了显而易见的、有组织的工业行动之外,反抗的例子还包括有广泛基础的政治行动,以对抗经济实力强大的集团;反对个别工程或行动(如兴建大型水坝、核电厂等)的抗议运动;人民普遍不愿意或者没能力接受工业生产的规限、控制。很多人把这样或那样的行动诠释为向现代化过程提出的控诉。

这些抵抗可以被诠释为对现代社会中工作的性质及过程的抗议,也可以被诠释为对此等过程的结果表示不接受。可以说,“另类”批判强调前者,而现代化“内部”批评的焦点则是后者。

马克思是这些批判的先行者。他就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跟产品和生产过程的异化提出细致的论证。^[57]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资本主义技术分工使工人无法控制工作的性质、生产的节奏和劳动强度,而工人丧失对工作的控制,被视为社会和政治反抗的最有力的理由(参考马格林[1974])。正如可以论证官僚政权这概念可以减少人民参与政治,集中化和科层化形态的经济组织当然亦难以脱身。其实这就是发展和现代化辩论的核心,因为现代文化往往被认为是一个比传统文化更有效地组织人民、资源、或思想的方法。从这方面来说,现代组织就是剥夺人民参与政治的手段的说法,正好击中现代化理论的核心。^[58]

法兰克福学派作者(马尔库塞[1964]、弗洛姆[Erich Fromm 1942]、哈贝马斯[1984])进一步发挥马克思的论证,质疑现代性的社会基础,即它在科技和组织上的必要性,不独是在生产的必要性,也包括在消费、分配以及知识及资讯的创造和散播的过程的必

要性。马格林将另文进一步运用这点论证,挑战支撑这些制度化形式的知识体系。

在第三世界的环境下,尤伯罗(J. S. Uberoi 1978)、南迪(Ashis Nandy 1984 及 1987)、伊力图(Reymaldo Iletto, n. d.)、F. 马格林(Frederique Apffel Marglin)和维斯范纳凡(Shiv Visvanathan)等人认为,循对知识的“科学的”进路不但距离完美甚远,更会导致一些“人道主义”进路可以避免的问题。持这种观点的人批评现代科学,认为现代科学理解世界的途径在性质上是粗暴和不民主的。这个进路经常被引用来批评现代科学和技术并非是为人民的需要服务。由于现代化进路建基于这样的假设,认为理解和操控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科学方法在本质性上是优越的,因此上述的另类视野对现代化的认同性,正面提出挑战。

现代化理论家的回应是典型的。他们并不把抗争看成是针对经济和社会组织过程,或者是不满支撑这些过程的知识体系。相反,他们把精神集中在这些过程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者”版本,在这儿是一股非常强而有力的内部批评。从它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的问题主要是在分配(有关消费和闲暇)和失业方面,因而建立一个确保全民就业和更平均分配收入的社会主义政权,便是出路。这些论证正是现代福利国家得以成立的部分原因。

真正承认民间抗拒现代工业组织的是一群管理专家。可以预见,他们视之为一个管理问题。当中最脍炙人口的要算是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要的等级”提法,以生命生存的需要凌驾一切其他需要之上,例如尊严和自我实现。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积累愤懑,皆因人民已经能够满足最低等的需要,因而希望在需要的阶梯拾级而上,满足更高层次的需要,而在这过程中,产生更高期望。[期望没有实现,因而产生不满。]据此,管理精英以管理主义的口吻提出解救的方法:增加职位等级;提供奖赏、

荣誉、消闲活动；或其他令工人在工作间内得享“较高”层次需要的方法。

另有一个回应，是特定地属于第三世界背景的“适当的技术”学派。所谓“适当的技术”，意即某种对一个国家的资源基础来说是恰当的技术，它不会令劳动力过剩国家的失业问题恶化。很多人认为欠缺合适的科技是构成第三世界失业问题的一个原因。一些作家却唱反调，认为问题不在于科学、技术或者知识，而是欠缺了鼓励企业发展的社会及文化因素。由于“最好的方法”只得一个，故此，究竟科技是适当还是不适当的，这个问题尚悬而未决。

那些身属新古典派者，认为问题在于“错误的”价格，即因政府的指令或者其他政治行动，而影响市场均衡。他们认为，只要令到价格正确（往往透过降低工资及提高利息和汇率），问题就可以纠正过来，“适当的价格”便会使“适当的科技”出现。政策应全神贯注在价格的问题上，而不是科技。第三种论证由“技术主义者”倡导，他们认为适当技术带来的得益是分散的，从而会窒碍研究与发展，所以，解决方法就是由政府资助研究和发展。

据雷迪（A. K. N. Reddy 1978）及巴赫罗（Rudolf Bahro 1986）的研究，这些回应与另类视野的对比出于人民对主权概念的分歧。另类观点认为，只当技术是由受技术影响的人民直接控制，或是由与受影响人民生活直接有关的人控制时，技术才是适当的。现代化论者回应说道，市场竞争、政府控制或法律补足（legal remedies），应该而且充分可以代替人民的控制。这里，这个论争与人民参与的联系是很明显的，就像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明显联系一样。

9. 天然资源和环境

对主权的丧失的关注,也表现在社会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即与环境破坏有关的官僚控制,代替社群和社会的控制形式。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快速耗尽,也有相类似的关注(Meadows *et al.* 1972)。依据古哈(Ramachandra Guha 1985)的研究,我们可以把批评家分为两类:“理想主义者”(怀特[Lynn White 1972]、罗斯扎克[Theodor Roszak 1969]、巴胡古拿[Sunderlal Bahuguna 1982]、巴赫罗[Rudolf Bahro 1985])和“生态社会主义者”(康芒纳[Barry Commoner 1971]、雷迪[A. K. N. Reddy 1978]和巴特[C. P. Bhatt 1984])。两类人皆指责现代世界观的本质,认为它对自然界抱着工具性、非人化和活体解剖(vivisectionist)的态度,形成今日得见的难题。“理想主义者”视这些态度来自西方犹太—基督教伦理,“生态社会主义者”则认为它们源自西方科技的本质,以及造就此科技的不平等社会关系。相对于现代化论者的社会秩序观,我们可以将这些评论界定为“外部”批评。

另类著述往往将环境破坏视为暴力的一种。只须留意暴力与过量、超越某个极限的关系,便会明白为什么可以把环境破坏视作暴力。从现代的非人化世界观的行为主义角度看来,人们的内在制约(关系或处境的限制)被外在制约(市场、政权)取代。但是,除非这些外在制约普遍存在,否则市场失效或者政府失效的情况便会出现。在各种社会活动的众多失效例子中,最显著的莫如自然环境遭受破坏。根据这一论证,只要主导价值仍然是外在制约的一部分,环境就不可能受到保护。

知识分子对现代化带来祸害的批评,与很多有广泛支持的环保运动有关,而且得到它们的支持。这些运动包括西方各类反核

运动和德国的绿党以及第三世界的运动,如印度的拯救纳尔马达河运动,以及一些亚洲及非洲的反巨型水坝或核电站运动。

捍卫现代化的回应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否定资源耗尽的批评,相信科技进步或者价格调节可以处理资源消耗的问题。第二类是“管理主义者”(梅多斯[Meadows 编 1972],埃利希[Paul Ehrlich 编 1977]和沃赫拉[B. B. Vohra 1980]),他们替综合环境管理和技术官僚控制说项,亦即主张增加外在制约。第三类建议与原型法西斯主义者(见 Garrett Hardin 1968)类似,提出施加惩罚以控制人口增长,减轻对资源需求的压力,特别是要针对穷人及第三世界国家实施惩罚性限制。

我们又一次有如下论证:对现代化在环境和资源造成影响的批评,源自一种建基于人与土地及自然结合的更个人关系的世界观(理想主义者的观点)。现代化理论家吸收了批判的知识分子元素,把这些元素翻译成管理和纯经济的问题,并提出各项解答。这些解答只回应了部分批评,同时延续他们介入异化的社会和自然环境的认受性。

10. 文化批评:最后阶段

本文自始就隐含着—个念头:芸芸众多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其实都有几个共同主题。可是,由于这些评论出自个别思考和行动空间,它们可能被局部收编,又或因为与主导分析模型不一致而受到孤立或逐个排斥。“文化批评”—词,显示对不同论据背后的一致性的觉醒和确认,企图揭开所谓“大阴谋”(Aquarian Conspiracy,见 Ferguson 1980)。在我看来,非西方人民渐渐肯定本身的价值体系,既是此—汇聚的因,也是它的果,尤以那些力图向学术界解释这些世界观的知识分子为然。

此一汇聚的出现,应被视为一个源远流长的思想和实践传统的壮大。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从文化角度对现代化展开学术和知识分子的批评。他们的影响力正在增加,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很多问题,均源自隐含在现代化角度的人和人的福祉的概念本身。他们认为核心问题在于第三世界现代化精英所用的理论(及隐藏其后的现代西方文化),这些理论为强加到人民头上的不可接受和不可取的政策和情况寻觅根据。这些作者要批评的正是发展的最基本论据——质疑被设想成较优越的西方社会的价值、体制和成就。

三个原因导致这些评论找到新的拥护者和更多的读者。第一,无论在北方或南方,出现越来越多社会运作不良的情况,无法从现有的理论得到满意的解释;第二,主导思想模式零星的修补已惹起怨愤;最后,强大的反统制及反西方的社会和政治文化复兴运动,已在第三世界及一些西方国家涌现。

10.1 社会运作不良

文化批评茁壮起来,主要是因为急剧现代化的社会里,社会运作不良的情况迅速地增加。一整片本来和平宁静的地域,由于内战、种族冲突、政治动荡、军事化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压迫、城市生活恶化、贫富悬殊、暴力和罪案上升、环境污染、沙漠化、水浸、气候反常、森林消失等等天灾人祸蔓延不绝,再无净土。第三世界内西化区域的人民,似乎也越来越多被社会心理问题困扰,这些问题并已迅速的蔓延到其他地方去。

另一个反对现代化的相关论点,就是西方国家也涌现了相类似的问题,这些问题加起来,恐怕可以用煽情的标题:“西方的没落”来形容。越战、水门事件、石油禁运、宏观经济问题(失业、通货膨胀)、微观社会问题(城市破落、老人生活素质、妇女地位、少数族

裔地位)等,动摇了西方世界人民比那些生活在“落后”社会的人民更能掌握自身命运的迷思。当第三世界人民越来越熟悉西方的生活方式时,自然越来越不崇拜西方。在80年代早期一部名为《我的美国大叔》(Mon Oncle d’Amérique)的法国电影之中,一个人物这样说:“美国并不存在。我曾到过那儿。”

改革前的苏联模式同样叫人失望。斯大林式清党、政权对人民生活严格控制和自由普遍地得不到承认等被公开以后,人民对其他“西方”景观下呈现的美好社会亦生出警觉。

结果,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不再钟情这两个西方主流进步模式,本土的价值体系的认受性日渐得到确立。

10.2 对现存理论的不满

另一个使知识分子日益失望的原因,就是零碎的挑战并不能对正统理论有任何影响。本文所勾勒的发展理论批判和争论,不但没能消除现有的偏见,反而使这些偏见更巩固、更具认受性。因此,批评的焦点便从个别论争或问题,移到更深层次的问题。难怪社会学家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会这样说:“社会科学从不解决难题,而只教人对问题厌恶。”反省现代化理论的机会,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出现,也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消失,可是却对以后讨论的内容和方向,没有半点影响。

10.3 社会政治抗争

强化文化批评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人民透过直接政治行动的影响来反抗现代化,同时肯定传统与宗教的世界观和生活模式。“另类”评论家诠释和翻译给西方读者的,正是这些反抗形式。

伊斯兰国家转向宗教价值,正是近年受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极为关注的这些反抗形式的一个例子。在我看来,为它抹上戏剧、

悲剧、甚至国家行为的色彩,又将之视为个别事件也好,都忽视了三个重要的考虑。第一,这些本土复兴运动并不限于伊斯兰国家,虽然因地缘政治和近代历史的缘故,后者最为吸引西方传媒的注意。其实,反统制运动正寻求“第三路向”,常常引用本土宗教和传统价值系统,力图摆脱困境。类似的运动活跃于世界各地,甚至在西方国家亦然。^[52]

第二,虽然这些运动往往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资本主义,但大部分并未倒向马克思主义,皆因在他们看来,他们要反对的西方概念似乎也包括正统马克思主义在内。

第三,无论是伊斯兰社会还是其他的地方,用上“复兴”一词可能有点误导,因为大部分的人民从未完全放弃传统价值或传统的思想模式。这些运动只是把源远流长的信念和价值,用当代的语言确认一次。只有少数西化了的人才有态度上的转变,因他们已从传统价值中疏离出来,又或故意抗拒传统价值。^[62]

这个例子表明,应该把最近在第三世界的多处地方进行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看作是对“理性—技术”模式的不安,甚至是明确的唾弃,而这个模式正是西方和发展中世界的人民曾寄以厚望,借以建立人道和公平的社会的。

在众多伊斯兰国家的西方化精英当中,这种情况以伊斯兰价值和理想重新获得尊崇的方式显示出来。除了宗教和种族复兴运动,值得一提的还有环保运动,最著名的是印度的拯救纳尔马达河运动;世界各地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当中包括各类社会福利运动、妇女运动或文化的诠释和扣连运动,例如印度的洛卡扬(Lokayan)运动;和拉丁美洲围绕解放神学教义形成的“基础社群”(base communities)。

10.4 认知上的挑战

无论第三世界还是西方,鲜有社会科学家具备足够的信心,全盘扬弃孕育他们的学科分析框架和理论假设,也没有多个愿意以另类、“落后”、“传统”或宗教论述作为他们沟通的媒介。不过,在反统制群众运动的影响下,情况正经历急剧转变。^[64]

一如较早前曾提及,现时向学术正统发出挑战的人,在知识上有根可寻。光是在 20 世纪,便有一大堆对现代化规划的各方面持批评态度的文献问世。虽然这些评论各有各的进路,议题之多也无法在此概述,不过,还是可以理出一个共同主题,那就是这些作者倾向将现代化和社会经济恶化的联系,^[65]归因于内生的因素,与外来的因素无关,这联系还以“中立”的社会科学家提供的认受性来支持和强化。由于这些考虑,这群作者集中分析现代化规划和社会运作不良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值得重申的是,不同的评论者虽然表面上十分不同,但在深层结构层次上,却拥有共同的另类视野,当中包括对各种关于人类行为、福利、进展以及知识的角色等的观察。

我说的西方论著,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学派(阿多诺 [Theodor Adorno]、弗洛姆、哈贝马斯、霍克海默 [Max Horkheimer] 和马尔库塞——请看 [Bottomore 1984 博顿默] 的简介、后维特根斯坦社会哲学家(艾尔斯特尔 [1979]、戈德利亚 [Maurice Godelier 1972] 和罗蒂 [1979])、新结构主义者和符号学家(费耶阿本德 [Paul Feyerabend 1975]、福柯 [Michel Foucault 1980]、雷斯尼克和沃尔夫 [Stephen Resnick 和 Richard Wolff 1982])、关心现代社会中的异化和社会心理失衡问题的心理学家(拉希 [Christopher Lasch 1979]、贝拉 [Robert Bellah *et. al* 1979]、希尔曼 [James Hillman 1976]、斯莱特 [Phillip Slater 1970]

和艾卢[Jacques Ellul 1964])以及专门研究现代西方价值和制度之文化独特性的文化人类学家(杜蒙[Louis Dumont 1977]、格尔兹[Clifford Geertz 1973]、塞林斯[Marshall Sahlins 1972]和坦比亚[Stanley Tambiah 1985])。

相较而言,专注第三世界的比较文献却远为松散。但却仍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现代化和发展的成果均抱怀疑态度。这些著述包括“人道主义发展”学派福尔克([Richard Falk 1983]、哥列特[Denis Goulet 1971]、格兰[Guy Gran 1983]、伊力奇[Ivan Illich 1981]和舒马赫[E. F. Schumacher 1973]);将新殖民发展主义与政治殖民主义心理效应联系起来的作者(西泽[Aimé Césaire 1972]、范农[Franz Fanon 1968]和南迪[Ashis Nandy 1983]);提倡以文化为本进路去处理福利和进步及政治冲突的概念,以及知识论和方法学的问题(亚柏达兰尼[Arjun Appadurai]、弗赖尔[Paolo Freire 1970]、伊力图[Reynaldo Ileto]、南迪[1987]和龙伯罗[1978]);此外,尚有不同宗教传统的作者,尤其是伊斯兰教(拉曼[Fazlur Rahman 1979、1982]和沙里亚堤[Ali Shariati 1979]),以及天主教解放神学学派(哥列特[Denis Goulet 1971、1980]和古堤阿里斯[Gustavo Gutierrez 1973])。

10.5 新古典学派的回应

正当大部分现代化专家继续沿着预定的路径上前行时,部分却选择迎接批评者的挑战,并试图将之吸纳在他们的世界观之内。到了今天,如本章开首一节所述,虽然到处都有人表示混乱和觉悟,但勇于投入建设的却没几个。吊诡的是,最广为发展专业采纳的应付招数,就是倒向天秤的另一面,变成新古典学派的忠实信徒,重拾一度因迁就另类观点而丧失掉的意识形态纯洁性。

这种回应通常来自新古典理论家,他们再度表白对市场的信

心。拉尔(Deepak Lal 1983)以论战口吻宣称,发展经济学(意指主流理论,非新古典版本)已死,它的实践跟意图背道而驰。^[66]类似的论点由另一些新古典作者鲍尔(Peter Bauer 1981)、克鲁格(Ann Krueger 1986)和利特尔(Little 1982)等提出,他们论证相对详尽,但论战性则稍逊。

这些论著有一个共通点:解释东亚“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惊人发展,用以证明自由市场政策的神效,藉此指责非新古典主义进路操控市场的处方。这些地方的经济后来被称为“出口带动增长”,部分是用来彰显这些地方出色的出口和增长表现,部分则是用来指出贸易和汇率政策的重要性,这些政策据说带来可取的结果。我已在其他文章里批评过这种论调,^[67]指出他们对证据的选择性阅读,既刻意忽略韩国和台湾经济体系受到操控的层面(参看 Stewart 1985 和 Toye 1985),又对因仿效四小龙自由市场政策而弄得灰头土脸的政权熟视无睹。^[68]

就本文的目的而论,较要紧的工作应着眼于新古典理论的复兴对整个发展主义论述的影响。人们将四小龙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归因于它们宏观的贸易和汇率政策,因而人们逐渐以为发展经济学里惟一相关的问题,就是贸易和汇率体制的开放,是否医治一切发展毛病的灵丹妙药,正如新古典经济学家宣称的一样。今天,贸易理论已经称霸发展经济学。随着贸易理论进占发展论述的中心,其他议题受关注的程度便相应下降,除非这些议题与开放程度有关。^[69]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这个趋势进一步加强,当时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抵不住众多外来的冲击而陷入困境,被迫作出调整。新古典理论家(特别是与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会有联系的那一群)宣称,在调控上出现困难的经济体系,皆属于内向型的型态,以前提议过的同样的自由化政策,正是对症的药

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向求财若渴的政权提供资助计划,促使她们采纳这些理论。

10.6 主流的回应

正当即使对文化差异较敏感的制度学派亦不免遭受外部批评的责难时,新古典理论却于此时复兴,着实令人诧异。新古典理论以外的发展经济学家虽然处于守势,尚未完全噤声。如前所述,贸易理论家与新古典学派站在同一阵线,确认那些据说可以带来利益的贸易自由化和其他新古典措施。其他人则试图辨别更大危机的根源,寻求处理的方法。

这些回应当中,最有趣者要算是布鲁顿(Bruton 1985)、斯特里顿(Streeten 1984)、赫希曼(1981、1984)或森(Sen 1983)等人对主流发展理论的内部批评。他们异口同声,主张发展经济学非来一个彻底的革新不可,尤其是它那些宣告为“单一议题经济学”(mono-economics)的次级学科。他们亦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广泛的现代化批评所表达的关怀。他们特别针对现代化理论上的绝对可信性,提出有效的质疑;而现代化政策的推行者,往往对理论毫不怀疑,以致把政策推到不智的极端。这些批评者的忠告,在关注发展的圈子里得到充分注意,也引起反思,尤其是对那些认为需要理解经济行为及制度的非经济基础的人,更觉发人深省。不过,这些思考虽说来得及时,目前仍只处于发展专业的边缘位置。

11. 结论

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曾说:“对外行人来说,一切专业尽皆阴谋。”严格地说,这项指控可能有点偏颇,可是,若论发展专业,此话多少有点道理:这个专业不断硬搬一切事情套进它的思

维方式,减损其他可供我们选择的认知、分析、解决问题的模式,并且抑压第三世界本土自发的政治、社会、经济改革的潜在动力。我现在要表达的是,现时发展理论显得不安,其实是早期冲突的延续,源自其他模式遭受排挤而引起的反抗。

我认为,现代化计划之所以对第三世界人民的福祉造成损害,并非因为顾问们建议的政策差劲,或者他们安坏心肠,也非因为忽略了新古典的智慧;真正的问题是,现代化工程迫使本土居民将精神气力从“正面”追求本上意义上的社会变迁,转移耗费在反抗由西方主导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等“负面”目标之上。若要第三世界人民的福祉得到改善,必须抛弃只有“我们”才能为“他们”完成现代化的信念,停止量化和量度“生活质素”(或其他“发展”指标),因为这些尺度变成“我们”介入“他们”生活的许可证,认为“我们”客观和毫无疑问地知道什么会“对他们好”。

问题在于,这些定义具备减低第三世界人民参与的能力,使他们的意愿变成没必要听取的意见,叫他们面临艰困仍改不了优先次序。当然,即使本土居民可在毫无制肘的情况下为福利和进步下定义,亦难保不犯错误,与发展专业犯错一样。但是,与后者不一样的,他们能够从错误中学习,让行为得以调整,而不是不新把错误合理化,或者为自己的行径、特权和介入的权利寻找根据。正如寓言故事里面猎犬对野兔的一番说话:“你一定要比我快。我只为一顿晚餐面跑,你则须为活命而奔。”

这种批评隐含的一种看法,就是认为现代化乃是一种特殊的“观看世界的方法”,它不断与众多的本土居民另类视野起冲突。理论家的工作经常是代替本土居民说话,将他们的观点翻译成现代化采用的语言,并且利用这些翻译使更深人的干预具有认同性。这些行径已带来持续不断的动荡及超乎想像的愤怒,我们从中得到教训:替别人说话是可耻的——这是迪让士(Gilles Deleuze)

的话,用来形容福柯对我们理解社会过程的贡献(引自 Sheridan 1980: 114)。

这就是批评抵达的尽头。在主导文化的假设里,批评仅能到此为止。只要这些假设仍然被接受的话,外来的理论家或顾问(包括本土的“外来者”)便只是“替别人说话”,根据所谓掌握更多的知识而去干预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环境,没有为使用那些所谓知识而产生的问题的新表现而作防备。追索此一重要问题的答案,须分析“现代”和“另类”视野的差别,我将另文详述。我的观点是,这两个视野之间最重要的分别在其表述形式背后的文化基础。我将以“人性的”和“非人性的”地图(maps)概念(或由所有文明提供的理解世界的途径)去论证,本土的进路倾向在两幅地图之间维持平衡,而现代性则以“非人的”优越性和普遍性凌驾于“人性的”地图。我称这项信念为现代性的非人性假定,并认为不管在南方或北方,要寻觅一个更好的世界,定须重新回复人性(humanness)两半之间的平衡。

注 释

- [1]西化(Westernization)或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等词汇,可带出这个过程的其他相关面向。我们采用“现代化”一词来概括地指称社会变迁的全部过程,其中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面向。
- [2]科学家的自信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民族化精英(nationalizing elites)的无条件支持(例如印度总理尼赫鲁),这些人对西方理性的好处则更深信不疑的。
- [3]有关这段希望破灭时期(period of disillusionment)的起始,各家各派提出了不同的日期(有些早至1960年),我们则视70年代中至后期为分水岭。一连串事件,如越战、石油禁运、水门事件、长期的萧条等,都有助摧毁西方永远是优越的神话。

- [4] WIDER 于 1985 年 7 月在赫尔新基举行的“第三世界科技转移：另类视野”会议上作出的评语。亦可参看 Nandy 1987:20-1。
- [5] 在这些批评当中，最重要的包括著名专家的著作（如布鲁顿 [Henry Bruton 1985]、赫希曼 [Albert Hirschman 1981a]、森 [Amartya Sen 1983]）及他们援引的参考资料。受注意程度稍次，但重要性不遑多让的，是在深具影响力的发展理论教科书中所表达的醒觉：迈耶 (Meier) 在 1984 年 (第 4 版) 的著作里，一开篇就论及“近 30 年来的发展工作带来的结果中产生的不满。” (第 5 页)；带着类似的心情，尤图普洛斯 (Yotopoulos) 及纽金特 (Nugent) (1976) 以“经济发展的记录和对发展经济学的失望”为题，为其教科书第 1 章命名。
- [6] 类似的情况亦可见于工业化国家里，尤以美国为最。
- [7] 正如阿特威尔 (Attewell 1984) 所论证，在近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潮里，亦出现重新定义范式的情形。
- [8] 1985 年 12 月在“只要世界和平” (Just World Peace) 会议上发表的评论。
- [9] 发展经济学焦点集中在经济上的因素，一心要提高第三世界人均生产量，并且假定其他有利西化的因素自会应运而生。
- [10] 这几个学派不独在中期目标上有别，还在外在性和内在性的假设上见到歧异。新古典学派主张不受干预的市场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制度学派及结构学派可没那么乐观，建议政府的直接介入。
- [11] 这些学派之间的张力借次级策略 (substrategies) 的形式予以搁置，它们也各自都获取了范式的地位 (例如基本需要说、顾及再分配的或长、进口替代、促进外销或乡郊发展等)。这种次级策略是尝试将发展之目标改装成广大人民的需要，意图令发展工程在政治上比较易于被接受，增加可行性。
- [12] 对诸个主流理论的批判，大部分虽由政治经济学派提出 (因此它应列入“另类”观点的范围里)，不过政治经济学正统派亦赞成主流理论著作看待进步的单向线性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正在沿着工业化国家开辟的道路上演进。认识到这种情况，我将著述分别归类为现代化派的一组，以及批判的一方。
- [13] 以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1974) 年的开创性著作作为先锋，世界

体系的进路从依附理论的基础上建设起来。它的特点在于力图摆脱将“民族国家”作为一个自然而然的分析单位,而视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发展为一个全球现象。

- [14] 依附理论的特色,是以区分“中心”及“周边”国家这组相对关系,来理解北方已发展国家和南方低度发展国家同时并存的现象。
- [15] 与上述其余两个马克思主义范式不同,非依附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解释社会演变时较为着重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而非其他外在因素。
- [16] 沿袭自(西方的)规范政治哲学,政治发展论的规范性内涵就是提倡西方的“优越”政治制度,包括:高效率的科层架构、议会民主的形式、政党政治和多元主义的组织,及对种种抽象政治权利的肯定等等。理论上说,它将论题浓缩为极力在社会上运作的两个面向,即是权力的膨胀和认受性问题。前者的产生,主要由官僚机器的效率增强,导致更有效的政策性介入。在后者而言,不管是透过选举,抑或利用传媒游说,还是由精英主导,都要确保不能以牺牲未来的政治稳定(与及未来政策的有效性),也不能以社会和政治参与的权利为代价。此说可见于派伊的著作(Pye 1965)。
- [17] 这方面包括韦伯的新教伦理的教诲(以及它的现代版本,如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模式变数、麦克莱兰[Meelelland]的“成就需要”、英克尔斯[Inkeles]和史密斯[Smith]的一般现代化指标),熊彼德的企业价值,或克羅班菲尔德(Banfield)所说的“非伦理家族主义”,以及荷塞利兹指出的“先天关系和后天功能名分”。这些著作考虑的因素均被认为是外在性的,并认为只要消除了必要因素缺失所产生的障碍,就可以打破其他瓶颈,带来经济增长。
- [18] 有关发展的主流与基进论述之间共同立足点的另一种看法,可参看 Wilber 和 Jameson (1984)。
- [19] 库恩(Thomas Kuhn)的影响在这篇讨论里是非常明显的。库恩引进了好些概念,例如“范式的优先性”(the priority of the paradigm),“作为课题解答的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 as puzzlesolving)以及在理论发展过程中当中的异常和危机等等,这些概念都成为知识社会学探究的重要思考泉源。参看 Kuhn (1970),特别是第4至8章。

- [20]在这篇文章里,“维护范式”、“规范的相干性”及“现代化的道德辩护”等术语的含义与阿特威尔的观点略有不同。参阅 Attewell(1984)第 17—36 页有助澄清这些概念。
- [21]我仅仅在比喻的层面或者“深层结构”的层次(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使之流行的用语)之上,将众多的文章归类为“现代化的道德辩护”。它们的“表层结构”可能有极大的差异。
- [22]“凯恩斯革命”正是此中经典:革新的力量为经济学专业带来一个持久的分裂。
- [23]但须要指出一点:在许多情况下,两种批判的判别可能带点任意,尤以赫希曼、斯特里顿(Paul Streeten)及森等喜欢抨击传统观念的学者的著述为然。他们一方面批评,另一面把批评汲取进理论,两者合得很好。
- [24]“范式内”批评一语说不定是不解自明的。发展经济学其中一个例子,是在传统社会中影响人类行为的、具独特文化色彩的制度(例如伸延性家庭)。一些学者提出争辩,认为这些制度的存在是参数性的(parametric),经济理论应被修改,以包容这些制度在行为和福利方面的效果;其他人则在功能主义进路上走得更远,认为这些制度服膺一个“理性的”目的,应该是衍生自理性的公理(axioms)。再者,这些制度的存在理由将会随着现代化的进展而消失。
- [25]例子包括政治学家和发展经济学者之间就政权(state)的角色和功能的争论,或者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关于正确分析制度的分歧,甚至是正统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与折衷派之间的争议。
- [26]包括“人道发展”学派、对现代科技的暴力和权利剥夺性质,以及它对社会秩序或自然生态的影响的批评、将新殖民发展主义连系上政治殖民主义心理效应的作者、以文化为本进路看待福利、进步和政治冲突观念,以至知识论及方法学上问题的倡议者,以及一些来自不同宗教传统的作者。参阅本文 3.8 段可获更详细的资料。
- [27]包括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学派、以不受约束理性的独特性为焦点的社会哲学家(艾尔斯特尔[Jon Elster]及罗蒂[Richard Rorty])、质疑民族国家观念被用作合理化社会操控的葛兰西主义者和其他政治学及政治人类学家、凸显科学和科学方法的霸权角色的新结构主义者和符号

学家、提出异化和社会心理失衡问题的心理学家、指出现代西方价值体系和制度的文化独特性的文化人类学家。参阅本文3.8段可获更详细的资料。

- [28]这些运动在西方类似运动中得到回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妇女运动、欧洲的和平运动、西德的绿色运动。
- [29]各种评论之间的区别只是为了作清晰的分类,并不表示被归类的某个作者甚或某篇文章完全等同于某一个特定分类,虽然有相当多的个案是如斯吻合。正如先前所提及的“喜欢抨击传统的”作者(例如赫希曼、斯特里顿或森),就经常被划入多个分类中,甚至单篇文章也是如此。
- [30]让我以另一个经济学部门为类加以说明。作为当时的经济理论失败的回应,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崛起于70年代末。知识社会学家欲了解宏观经济学的演变,便要记着70年代末这个日子,尽管“理性预期”观念早在1959年已出现于穆特(John Muth)的著作里。
- [31]参看利特尔(1982:385ff)。“自由经济学家把“发展”吸纳为“福利”的一部分,形成一套有说服力的话语,这比较二次大战前的福利经济学家和作者来得新颖。”
- [32]库茨涅特在1941年首先提倡以国民收入(National Income)作为社会繁荣的尺度,并把这概念应用于第三世界(Kuznet 1971)。
- [33]霍布斯鲍姆并不完全契合这一组别。虽然他赞扬造反者的英勇行径,但同时又以“原始”——《原始的造反者》(Primitive Rebels 1936)这个书名就是明证——去形容他们搞的社会运动不但过时,并且“违反”历史,注定失败告终,最后只会为阶级意识的发展带来障碍。
- [34]这些包括麦克莱兰的“成就的需要”:即守时、效率、远见、进取卓越等,荷兰利兹的构思/建制基于柏森斯著名的模式变数:承袭/成就、普世主义/个别主义、独特性/散播性,如派伊和维巴所谓对民族国家的忠信,而非人际关系。大多数著作明显轻视传统价值,虽然这种态度招致讽刺的后果。例如:英克尔斯和史密斯(1974)为现代性美言一番后,提及他们宁用“现代”来标签这一套价值,而非“科层”或“组织”,因为后者(虽然并非不恰当)带有贬义。
- [35]然而,这些文章可能对理论家和决策者的想法有颇重要的影响。这里只

- 举一个例子，哈顿的“没有出路的少数理论，可能在政策上没有什么干扰性，但是现代化理论及其支援性制度（学校、传媒、政权）所提供的认受性的结果，可以被看成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制造了“没有出路的多数”，而他们的价值和想法，被他们的孩子认为与他们面对的问题毫不相干。
- [36]在60年代，每一个非洲国家都曾发生政变或某种形式社会动乱，拉丁美洲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参看以下各篇文章(Uphoff & Hchman 1973)，特别是 Nulty 与 Nulty, 和 Zolberg 的文章。
- [37]这包括诸如东巴基斯坦(现在的孟加拉)人民的不满政治上和自发的表达。
- [38]当哈顿还是巴基斯坦政府首席经济学顾问时，于1968年4月在喀拉蚩一个公众演讲上首次提出这些问题。参看 ul Haq 1976:5。
- [39]考虑到经济学家经常声称不懂处理非经济学的问题时，这就没有什么稀奇了。
- [40]相类似的“非政治化”回应，也可以在其他领域见到。这种回应是某种“技术问题，技术解决”的结果，认为经济问题是区别于政治问题的。关于对发展的环境保护批评的技术回应，可以参看 Enzenberger 1974。
- [41]穆尔达尔的资料来自一个“行旅者的报告”。就印度的情况而言，批判这个概念者有巴尔德汉(Bardhan 1984)，特别留意第9章。
- [42]这里，权力“膨胀”一词意谓“理性”政权左右社会决策的能力的提升。在政治发展论著当中，一个常见的看法认为：传统社会只有少量权力，但却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现代社会拥有大量权力，但权力分布则较广泛。
- [43]举个例，亨廷顿1968年尝试论证政治不稳是公众蜂拥参与政治的结果（由于城市化、工业化和教育的扩展），政治体制并没有足够容量，可以吸纳那么多的新的参与者。
- [44]韦纳避免称两种文化为“现代”和“传统”，因为他认为这是过份简化，而且基于他对现代化完全支持，因而这样做会得出“现代文化”是好、“传统文化”是坏的不妥当的价值判断。
- [45]在第三世界的情况下，这意味着与“核心”国家有关的群体，与纯粹本土的群体发生冲突。
- [46]沃德科克(Woodcock 1986)就19世纪欧洲无政府主义论著做了一个精

彩的概述,指出人们一般都将无正义主义与暴力或恐怖事件联想在一起,使这一股思潮遭到排斥。

[47]其中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卢梭在讨论一般意志(*general will*)时,判别代表(*representation*)和参与(*participation*)的分野的格言。无政府主义完全接受个人主义和非人性,不但将之视作价值,还视之为人类基本性格,因而跟大部分第三世界有关参与的著述分别开来。克鲁泡特金是其中一个在这题材上抱另类观点的无政府主义者。参看 Woodcock 1986:11-31。

[48]尤其要参考 Marcuse 1964 和 Harbermas 1984。此外,波图摩尔 (Bottomore 1984)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说和影响有一个浓缩的描述。

[49]近年对葛兰西的著述及它们在政治、学术上的影响,可参看 Mouffe 1979 收录的各篇文章。

[50]继蒲鲁东之后,克鲁泡特金成为无政府主义或反权威主义传统最重要的作家。在其经典《互助:演进的一个原因》一书里,克鲁泡特金与后来大行其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唱反调,罗列史学及人类学上的证据来论证,守望相助是民间的重要力量,政权的强制武力妨碍它的运作。

[51]蒙福德[Mumford (1961)]的经典研究追溯城市的发展,从文明初期到20世纪才出现的巨型都会政体。对政治集权化与现代性共谋下人民受到压制和权力被侵占的情况,此书提供了一个具破坏力的批判。参看第568至576页。

[52]当中包括非政府组织的社会运动,如世界各地的妇女运动在印度的洛卡扬(Lokayan)的运动、被解放神学赞许的拉丁美洲的“基础社群”(base communities),和已在非洲各国展开的回归农村现象。

[53]克里克(1976)认为,经济学家应该放弃他们对社会和政权抱有的单纯观点。而要承认社会和政权充满张力与分化,政策只是平衡的举措,而非全能宽厚政体的措施。

[54]欲了解非集中化的发展经验,可参看 Rondinelli *et al.* 1983 的评论。

[55]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引入更精致的经济及政治操作的模式,以解决旧模式不妥善的地方。例如,昔日简单的宏观经济模式,业已被庞然巨物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取代。

- [56] 李普顿(Lipton 1977)提供了一个原住民角度的解释,认为农村持续贫困皆因国家精英的“城市偏向”。
- [57] 有一点必须在此加以澄清;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异化不单只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不过,生产方面的异化确实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增加。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参看 Josephson and Josephson 1962。
- [58] 不过,马格林(1974)的论证指出,如果以输入不变而输出增加谓之有效率,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演化为一个不大有效率的体系。它只是以更多的输入来使产量增加而已。换句话说,它基本上是一种从劳动者身上榨取更多劳力(及剩余)的手段。
- [59] 例如伊朗革命、两伊战争、石油禁运和其他石油出口国家的行动。
- [60] 萨达特(Sadat)遇刺、黎巴嫩危机。
- [61] 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律法、印度尼西亚的 Panchsila approach、试图在利比亚建立伊斯兰社会的努力。
- [62] 例子包括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参看 Gutierrez 1973)、印度的甘地主义者、环保分子、和印度的文化复兴运动的推动者(参看 Nandy 1984)以及西德的绿色运动(参看 Bahro 1986),还有很多其他例子。例如《世界发展》期刊就曾花了一整期的篇幅来探讨“宗教价值与发展”。关于另类运动的角色讨论和文献回顾,请参阅(Nerfin 1985)。
- [63] 较早前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有不少,在阿富汗有受到 Jamal - al - Din Afghani 启发,在印度有 Syed Ahmed Shaheed,在苏丹有 Sansui 及 Mahdi 等运动。莫蒂默(Mortimer 1982)对这些运动做了一个扼要的介绍。正如之前所提及,这些原住民复兴运动有不少共通处。各地的非洲国民运动(African nationalist movements)独特的传统风味,已耗用了许多作者笔墨;印度教复兴运动可说是巨而后力拒西方文化的思想先驱。不过,洞悉殖民主义影响的南迪[Nandy(1983)]指出,这些运动当中有不少思想领袖,在力拒殖民主义宰制的同时,却倾向接受殖民者的规范,与甘地的路向十分不同。
- [64] 这里只举一个例子。直至 60 年代以前,如巴基斯坦的回教国家里的基进知识分子,把宗教看做是与他们的价值和原则完全对立的。今天,这些国家很多基进知识分子,他们强烈反对教条的宗教政党和政党领袖、

或是反对这些政党的亲政权言论,却会在他们自己的政治见解里加进回教格言,或明确指出宗教和传统在决定他们的理想的角色。换句话说,这些知识分子不再在一般的层次上接受现代化,或只在具体、个别层面批评它;反之,他们是寻找另类架构,把不同的批评统一起来。

[65]例如:政治不稳定;种族暴力;日益集权化政权的政治压迫;人民参与日减,不只因为政府,还因为引入新技术和不受人民监管的体制;令人忧虑的自然环境破坏;急速都市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解体和败坏的沉重代价。

[66]拉尔对主流发展学的论争,可参考 Stewart 1985 和 Toye 1985。

[67]Amadeo & Banuri 1990,也要参考那些文章所引的文献,特别是 Taylor 1987, Pack & Westphal 1986, Hughes & Singh 1987, Fcshlov 1987 和 Aghazoeh & Evar 1985。

[68]有关在智利新古典主义实验的失败,请参看 Foxleg 1982。

[69]这里不是说没有著作是有关其他问题的,而是说贸易理论问题是每个人的中心注意点,也是在专业圈子里获得声誉的方法。

参 考 书 目

Alavi, H. (1976) 'The Rural Elite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Pakistan', in R. Stevens, H. Alavi, and P. Bertocci (eds.), *Rural Development in Pakistan and Bangladesh*, Honolulu, Hawaii: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Almond, Gabriel (1956) '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s', in Heinz Eilau, S. J. Eldersvald, and M. Janowitz (eds.), *Political Behavior: A Reader in Theory and Research*,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pp. 34-42.

Attewell, Paul (1984)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Since The Sixties: A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alysi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Amadeo, Edward, and Banuri, Tarig (1990) 'Policy, Governance, and the

- Management of Conflict', in Tariq Banuri (e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No Panace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Bahuguna, Sunderlal (1983) *Walking with the Chipko Message*, Silyara (Tehri Garhwal, India): Chipko Information Centre.
- Bahro, Rudolph (1986) *Building the Green Movement*, Philadelphia: New Society Publishers
- Balassa, Bela (1982)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Semi - Industrial Econom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Banuri, Tariq, and Amadeo, Edward (1990) 'Worlds Within the Third World', in Tariq Banuri (ed.) (1990),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No Panace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Baran, Paul (1952)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ackwardness', *Manchester School* (Jan.), 20:66 - 84.
- (195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Bardhan, Pranab (198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in India*,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Bauer, P. T. (1981) *Equality, The Third World, and Economic Delusion*, London: Methuen.
- Bellah, R. N., et al. (1985) *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Berger, Peter (1976) *Pyramids of Sacrifice*, New York: Doubleday.
- Bhatt, C. P. (1984) *Himalaya Kshetra ka Niyojan Gopeshwar*, India, mimeographed (in Hindi).
- Boeke, J. H. (1953)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of Dual Societies*,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 Bottomore, Tom (1984) *The Frankfurt School* London: Tavistock.
- Bowles, S., and Gintis, H. (1986)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Property, Community,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 Social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 Bruton, Henry (1985) 'The Search For A Development Economics', *World Development*, 13:1099-1124.
- Burki, S. J. (1976) 'The Development of Pakistan's Agriculture: An Interdisciplinary Explanation', in R. Stevens, H. Alavi, and P. Bertocci (eds.), *Rural Development in Pakistan and Bangladesh*, Honolulu, Hawaii: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 Gardoso, Fernando Henrique (1972)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Left Review*, 74:83-95.
- Cesaire, Aimé (1972) *Discourse on Coloni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Clastres, P. (1977) *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 The Leader as Servant and the Human Uses of Power Among the Indians of The Americas*,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Unizen Books.
- Commoner, Barry (1971) *The Closing Circle*, New York: Alfred Knopf.
- Dumont, Louis (1977) *From Mandeville to Marx*,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hrlich, Paul R., Ehrlich, A. H., and Holdren, J. P. (1977) *Ecoscience: Population, Resources, Environment*,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 Ellul, Jacques (1964)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Elster, Jon (1979) *Ulysses and the Sirens: Studies in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nzenberger, H. M. (1974)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logy', *New Left Review*, 84:3-31.
- Falk, Richard (1983) 'Satisfying Human Needs in a World of Sovereign States: Rhetoric, Reality, and Vision', in Charles K. Wilber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Third Edi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 Fanon, Franz (1968)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Press.

- Fei, John C., and Ranis, Gustav (1964) *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Surplus Economy; Theory and Policy*, Homewood, Ill.: Irwin.
- Ferguson, Marilyn (1980) *The Aquarian Conspiracy; Person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1980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Feyerabend, Paul (1975) *Against Method*. London: Verso.
- Fishlow, Albert (1972) 'Brazilian Siz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ER* (May), 62:391-402.
- (1990) 'Some Reflections on Comparative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ariq Banuri (e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No Panace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Fo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 - 77*, trans. Colin Gordon et al., Brighton, Sussex: Harvester Press.
- Foxley, Alejandro (1982) 'Towards a Free Market Economy: Chile 1974 - 79',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Feb.), 10:3-29.
- Frank, Andre Gunder (1967)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Freire, P. (1970)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trans. Myra Bergman Ramos,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 Fromm, Erich (1942) *The Fear of Freedo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Furtado, Celso (1970)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Godelier, Maurice (1972)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in Economic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Goulet, Denis (1971) "'Development" ... or Liberati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view* (Sept.) 13/3:6/10.
- (1980) 'Development Experts: The One - Eyed Giants', *World*

- Development*, 8/7-8: 481-90.
- Gran, Guy (1983) *Development By People: Citizen Construction of a Just World*, New York: Praeger.
- Guha, Ramachandra (1985) 'Eco - Development Debate: A Critical Review', *South Asian Anthropologist*, 6/1:15-24.
- Guha, Ranajit, ed. (1982) *Subaltern Studies: Writings on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Society*, New Delhi: Oxford.
- (1983) *Elementar: Aspects of Peasant Insurgency in Colonial India*,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utierrez, G. (1973) *A Theology of Liberation*, New York: Orbis Press.
- Habermas, Jürgen (1984)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 Hagen, Everett (1962)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 How Economic Growth Begins*, Homewood, Ill.: Dorsey Press.
- Hallowell, A. Irving (1955) 'The Self and Its Behavioral Environment', *Culture and Experienc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Haq, Mahbub ul (1976) *The Poverty Curtain: Choices for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ardin, Garrett (1968)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3 Dec.), 162:1243-8.
- Hillman, James (1976) *Re-Visioning Psychology*, New York: Harper & Row.
- Hirschman, A. O. (1965) 'Obstacles to Development: A Classification and a Quasi - Vanishing Ac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7/4:385-9.
- (1981a)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Essays in Trespass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24.
- (1981b) 'The Turn to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search For Economic Determinants', *Essays in Trespass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98-135.

- (1984) *Getting Ahead Collectively: Grassroots Experiments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Pergamon.
- Hobsawm, Eric J. (1963) *Primitive Rebels*, New York: Praeger.
- Hoselitz, Bertholt (1960) *Sociological Aspects of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Huntington, Samuel P.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 and Joan M. Nelson (1976) *No Easy Choic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Ileto, Reynaldo C. (n. d.) 'An Alternative to Developmentalist Historiography in the Philippines', Manila: De La Salle University (mimeo).
- Illich, Ivan (1981) *Shadow Work*, Boston: marion Boyars.
- Inkeles, Alex, and Smith, David (1974) *Becoming Moder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Jorgenson, Dale W. (1967) '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ur and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288 - 312.
- Josephson, Eric, and Josephson, Mary, eds. (1962) *Man Alone: Alienation i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Doubleday.
- Killick, T. (1976) 'The Possibilities of Development Planning', *Oxford Economic Papers*, 41 - 4:161 - 84.
- Kropotkin, Peter (1902) *Mutual Aid: A Factor in Evolution*, New York: McClure Phillips.
- Krueger, Anne (1986) 'Problems of Liberalization', in Armeane Choksi and Demetris Papageorgiou (eds.),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Kuhn, Thomas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ition, Chicago, Il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uznets, Simon (1941) *National Income and its Composition*, 1919 - 38, New York: NBER.

- (1971)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Total Output and Production Struc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al, Deepak (1983) *The Poverty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 Lasch, Christopher (1979) *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American Life in an Age of Diminishing Expectations*, New York: W. W. Norton.
- Lewis, W. Arthur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Manchester School* (May), 22/2: 131-91 (widely abridged and reprinted).
- (1955) 'Is Economic Growth Desirable?',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Homewood, Ill.: Irwin.
- Lewis, John (1962) *Quiet Crisis in Indi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 Lipton, Michael (1977) *Why Poor People Stay Poor: A Study of Urban Bias in World Development*, London: Maurice Temple Smith.
- Little, Ian M. D. (1982)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 McClelland, David (1961) *The Achieving Society*, Princeton: D. Van Nostrand.
- Marcuse, Herbert (1964) *One Dimensional Man*, Boston: Beacon Press.
- Marglin, Stephen A. (1974) 'What Do Bosses Do? The Origins and Functions of Hierarchy in Capitalist Production, Part 1'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612:60-112.
- (1984) 'The Wealth of Nations',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9 July), 41-4.
- Meadows, Donella H., Meadows, Dennis L., Randers, Jorgen, and Behrens, William W. III (1972) *Limits to Growth*,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 Meier, Gerald M. (1984) *Leading Issu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4th ed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rtimer, Edward (1982) *Faith and Power: The Politics of Islam*, New

- York: Vintage Books.
- Mouffe, Chantal, ed. (1979)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Mumford, Lewis (1961)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anovich.
- Myrdal, G. (1968) 'The Beam in Our Eyes', in *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Wealth of Nations*,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Books, pp.5-35.
- Nandy, Ashis (1983) *The Intimate Enemy*,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4) 'Culture, State, and the Rediscovery of Indian Politic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Dec.), 8:207B-83.
- (1987) 'Towards A Third World Utopia', in *Traditions, Tyrannies, and Utopias: Essays in the Politics of Awareness*,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erfin, Marc, ed. (1977) *Another Development: Approaches and Strategies*, Uppsala: Dag Hammarskiöld Foundation.
- Parsons, Talcott (1951)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Popkin, Samuel (1979) *The Rational Peasant*,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oulantzas, Nicos (1978) *State, Power, Socialism*, trans. Patrick Camiller, London: NLB.
- Pye, Lucian (1965) 'Introduction: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L.Pye and S. Verba (eds.), *op.cit.*, pp.3-26.
- and Verba, S. (1965)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ahman, F. (1979) *Islam*, 2nd edn. Chicago, Il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2) *Islam and Modernity: Transformation of an Intellectual*

- Tradition, Chicago, Il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eddy, A.K.N. (1978) 'The Transfer, Transformation and Generation of Technology for Rural Development' in K.D. Sharma and M.A. Qureshi (ed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Essays in Honour of A. Rahman*, 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 Resnick, Stephen, and Wolff, Richard (1982) 'Marxist Epistemology: The Critique of Economic Determinism', *Social Text*, 6:31 - 72.
- Rondinelli, D. A., et al. (1983) *Decentralis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review of Recent Experienc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Staff Working Paper No. 581.
- Rorty, Richard (1979)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oszak, Theodor (1969) *The Making of a Counter Culture*, New York: Doubleday.
- Sahlins, Marshall (1972) *Stone Age Economics*, New York: Aldine.
- Schultz, Theodore (1964)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chumacher, E. F. (1973) *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 New York: Harper & Row.
- Scott, James (1976)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 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eers, D. (1969) 'The Meaning of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view* (Dec.) II:1 - 16.
- Sen, Amartya (1983) 'Development: Which Way Now?', *Economic Journal* (Dec.), 93:745 - 62.
- Service, Elman (1975)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Sheridan, A. (1980) *Michel Foucault: The Will to Truth*,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Ltd.
- Shariati, A. (1979) *On The Sociology of Islam*, trans. Hamid Algar.

- Berkeley, Calif.: Mizan Press.
- Sheahan, John (1980) 'Market - Oriented Economic Policies and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Latin Americ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Jan.), 28/2: 267 - 91.
- Slater, Philip (1970) *The Pursuit of Loneliness: American Culture at the Breaking Point*, Boston: Beacon Press.
- Stewart, Frances (1985) 'The Fragile Foundations of the Neoclassical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Jan.), 21: 282 - 92.
- Streeten, Paul (1982) 'A Cool Look at Outward - Look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World Economy* (Sept.), 5: 159 - 69.
- (1984) 'Development Dichotomies', in Gerald M. Meier and Dudley Seers (eds.), *Pioneers in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37 - 61.
- Tambiah, Stanley, J (1985) 'An Anthropologist's Creed', Harvard University, Anthropology Department (mimeo).
- Tax, Sol (1953) *Penny Capitalism: A Guatemalan Indian Economy*,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 Toye, John (1985) 'Dirigisme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Mar.), 9: ~ 14.
- Uberoi, J. S. (1978) *Science and Culture*,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Uphoff, N. L., and Ilchman, W. F. (197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Vohra, B. B. (1980) *A Land and Water Policy for India*, New Delhi: Sardar Patel Memorial Lecture.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4)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in the 16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Weber, Max (1930)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 trans. T. Parson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Weiner, Myron (1965) 'India: Two Political Cultures' in L. Pye and S. Verba (eds.), *op. cit.*, pp. 199 - 244.
- White, Lynn (1972)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in Robert Nisbet (e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Harper & Row, pp. 101 - 29.
- Wilber, C. K., and Jameson, K. P. (1984) 'paradig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eyond', in Charles K. Wilber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3rd edn., New York: Random House, pp. 4 - 25.
- Wolf, Eric (1969)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 Row.
- Woodcock, George (1986) *Anarchism: a History of Libertarian Ideas and Movements*,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 Yotopoulos, Pan A., and Nugent, Jeffrey B. (1976)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7. 印度西部农村技术与价值的再生产

◆ 阿帕杜雷(Arjun Appadurai) 著

◇ 叶沛瑜 萧润仪 译 黄燕堃 许宝强 校

1. 引言:道德、政治与技术转变

评估任何社会经济改变所付出的代价,是道德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说它是道德问题,是因为它包含自发和强制的问题,以及跨文化和社会内部关于价值的辩论。说它是政治问题,是因为它涉及到以谁的偏爱为准,以什么标准去评估这些偏爱;又怎样能为坦诚地辩论发展问题,建立可接受的基础。

本文章主要描述一个非常具体的环境——印度西部的一个农村,和一项十分具体的技术转变——传统露天的口井的电气化。但这一特定的事件,深藏着许多范围更大的变化过程和更为广泛的问题。虽然我对上一个世纪[印度的]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下简称马邦)农业商业化的诠释,在一定程度上决

-
- 本文原题为:“Technology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values in Rural Western India,” in Frédérique Apffel - Marglin and Stephen A. Marglin, *Dominating Knowledge - Development, Culture, and Resista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pp. 185 - 216.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定了我的论述,但我仍会在本引言中先提出其包含的一般的假设。

任何关于技术转变的道德和政治评估,都会遇到以下进退两难的困境:技术改变是采用欧美功利主义的各种形式,还是屈从激进的相对文化保护主义?在评估两者的利弊时,是否可找到任何合理的中间点?要走出这个困境,我的策略如下:我坚决反对任何关于福利的技术性计算,倘若其运算的标准完全不容于社群的道德和文化价值观,但风险却由这社群承担。我的立场是基于以下的看法:外间强加的改变,引伸而言,包括外间强加的用以评估转变的标准,因为(按最一般的说法)这是反民主的,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接受。但是在农村社区里,至少有一些人渴望抓紧由新技术所提供的机会,我们又该怎样评估技术转变的价值呢?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方法所采取的,基本上是一种分配的取向,要考虑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应该怎样广泛和深入的分配技术转变所带来的成果。采用这个方法的问题是,它只是一种版本的功利主义式解决方法,完全没有考虑到该社群的道德和文化结构自身的价值(按我的说法,是一种最重要的价值)。相反,它依赖的是一些或明或隐的偏好的集成,最终还是以个人的选择、偏爱和利益为依归。下面我将会很快便谈到个人主义这个问题。

我也同样反对那些我称之为激进文化保护主义的立场,它认为保存任何连贯一致的文化系统就是最重要的价值,无须进一步的论证。我反对的原因有二:第一,此论点本身是以对文化差异的赞扬作为其目的。这种赞扬源自较近期的欧美取向,它虚构其他社群的真确性,以此来奴役其他社群。就是说,在后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与非西方世界接触的产物之一,是一连串的人类学和原型人类学方面的探讨,为创造真正的土著(authentic natives)这构思,以示有别于那些由于接触了外面世界而被认为已遭腐蚀的人。这种招人反感的对比,常常成为讨论其他文化相对真确性的基础,

讨论的原则又离不开西方的观察目光所厘定的标准。总之,真实性只不过是一种只有甚短历史的西方的关注。

第二,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除了具有价值的,还有各种不人道、令人不快的文化践行。此论点可能,也正被用来为后者辩解。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曾经说过的关于功能主义的话,可以借用来指出任何文化都有价值这说法自必然是对的,但认为任何文化所包含的一切内容都是有价值的,则是荒谬的。那么,我们到底可以怎样从道德的角度来评估转变?

要进一步找出答案,就要探讨以下两者的关系:用以评估技术改变较狭义的经济主义的标准和以再现社会核心文化价值观为中心、较广义和“全面的”标准。虽然,这两种标准在分析上的区别是相当清楚的,但在有些情况下,这两种标准不仅会带来相似的评估方法,而且有必要这样做。当技术改变与原住民的知识的失传同时出现,就有可能发生这两种评估的结合。我讨论的经验案例,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如果要找出这种结合的条件,就必须说明经济主义和“全面的”这两种评估技术改变的标准之间的重大差异。首先让我们注意两者的重要相似之处。两者都以价值来衡量技术改变,都声称最终是以集体的福利为依归,都以某种道德普世论(moral universalism)为基础。然而,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各自对个人的相对重要性的看法。在各种经济主义的评估(不论有多广泛的代表性)之中,个人是同时被视作行为载体的重要核心(crucial locus of agency)和主要的道德价值;而在较为整体性的框架中,重要的价值是社群的再生产,而行动的核心通常是各类的团体和组织。个人主义是以欧洲思想体系(及其跨文化含义)的道德取向面出现,它构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课题,这里很难作全面的探讨。关于(历史悠久的)自我的观念、个体的兴起、商业气质的形成和市场文

化的兴起之间的各式各样联系(与差异),即使在西方世界里依然未曾完全探讨清楚。

当我们以比较的角度看这问题,情况更为隐晦。我们有理由相信,欧美近期对个人价值的评价,跟许多其他社群的道德理念有抵触。但我们同时不能否认的是,在许多这些非欧美的社群中,商业文化早已存在,甚至在跟西方接触以前就有复杂的、以赚钱为目的的计算模式。要明白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就得要仔细区分自我或个人这些不同的观念,区分商业的文化组成的不同表现方式,分辨各种不同的计算形式和市场取向的不同模式,这是一件刚开展但又是非常重要的任务。为了说明我的观点,我将会谈到上一世纪在印度西部商业化经验中所产生的那种个人主义。这并不排除在上一世纪,不同形式的个人主义在印度西部早已存在或产生的可能性,更不否认在印度西部,或是世界其他地方,上一世纪以前市场与乡村早已存在重要的联系。我这儿所关心的,只是一种特定的关于“个人”的扣连表述(articulation),及一种特定的商业化经验。

既然我的不言而喻的起点是再生产的价值(作为所有人类社群的应得权利),所以准确指出一个社群所再生产的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它所再生产的是中心的社群形式,体现为其核心的价值。支持再生产的价值跟我早前所提出的反对激进文化保护主义的论点并不矛盾,因为后者总是利用一些外在的角度,并且是建立在那些由外界所强加的价值观和原则之上。而前者则建立于(至少在原则上)致力发掘社群再生产的内在准则。然而,从我的观点来看,在实践上,这两种立场中较为理想的一种,总会把我们引到不那么理想的那种立场之上,而这又是我们必须冒的风险。

我主要的资料源自印度西部农村社群,当地的核心价值观及从而得出的核心社群形式,均是围绕社群性(sociality)自身这个概

念。这并不是简单引用涂尔干(Durkheim)关于社群重于个人这个一般理论的又一例子,这理论大概适用于所有的社群,它的系谱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相反,我想指出的是在这个社群(及其他跟其同类的社群)里,其成员所视为有价值的,及看似是这社群生活的传统形式的支柱,多数是人和组织之间的各种联系,这些联系不仅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手段,而且也被视为是目的。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能证明社群性的基本价值被某一特定的技术改变过程所侵蚀,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这种改变,不利于社群的再生产。

批评技术改变的(整体)理由,跟任何一些较为狭窄的、更为经济主义的理由的汇合点,在于知识和技术改变之间的关系。在许多传统的农业社会(很可能也包括一些非农业社会),要明确区分技术知识跟受更广泛的规范及社会目的制约的知识,是非常困难的。在这些社会里,techne(技艺)与 episteme(学识)(借用马格林所用的希腊名词),两者均同时嵌入在广泛的社群、宗教和知识论的领域和语境中。这从而使人想到把各种技术从它们原有的文化背景及传统分离(decoupling)出来,并移植到新的文化背景中的问题(见 Marglin & Marglin eds. 1990:第一章),对于这些问题,应首先在知识的层面而不是在实践或组织的层而上作出批评。

从这个观点出发,上一世纪在印度西部的农业商业化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客观事实是,在技术知识及其较广阔的知识论语境之间创造出一种新的分割。一种脱离了较为广泛的农业论述的农学学识的出现,正好代表了这类知识与其语境的分离。在分离的过程中,相应的技艺就被淘汰掉。与此同时,社群自身的知识论结构,亦同时被视作落伍,只能在式微的状态下生存。

这是社群性这主要价值被侵蚀反映在知识论上的先兆,技术改变创造了技术知识和较广泛的认知模式之间一种(原是无意义的)差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用来评估这种改变的功利主

义标准,还是以文化再生产这个范围更广的标准去评估,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因为这种改变,总会同时涉及个人和团体的选择的减少(和风险的增加),也导致中心文化价值被侵蚀。在阐述印度西部的农业商业化的过程中,我将要说明这种双重的破坏。

2. 马邦的农业

位于印度西部的马邦,是在英属印度的孟买管区分裂成两个语言不同的邦(马邦和古吉拉特邦[Gujarat])以后,于1960年成立的。但马邦作为一个语言、宗教和文化区,其身份认同可追溯到至少800年前,并形成了马邦今天文化体系的基础。马邦是一个有趣的邦,因为它是三个不同经济领域的联合体:相对先进的工业部门(生产肥料、重型机械、药品、纺织品和机动车辆);以孟买为中心、高度发展的金融及商业部门;以及较为贫困、落后的农业部门。

马邦的农业部门的历史,深受其生态和历史条件的限制。马邦大概可分为两部分,一个是狭窄的沿岸地带,另一个是大高原(德干高原[Deccan plateau]的一部分),位于西高止山脉(Western Ghats)的另一边。沿岸地带人口密度很高,雨量充沛,主要生产稻米。高原的特点则是雨量稀少,人口密度低,主要生产小米(高粱和珍珠稗)和豆类植物。生态上十分明显的反差,自然会掩盖更细微的区别。特别是在高原地区,城市化的程度、集市中心的数目和可达性、土壤的质素和降雨量等方面,都有着差异。由于这些及其他的差异,商业化的力量在渗入不同农村社群的历史和性质也有所不同。

我在那儿从事研究的农村(在下一节详述),位于这个乾旱农业地区的西部边缘,邻近普纳城(Poona),距离孟买只有六个小时

的车程(公共汽车和火车),它是普纳地区的一部份。与其他许多干旱地区相比,往城市工作的男性数目(家属仍留在农村)等各方面,普纳地区的情况更呈多样化。虽然普纳有些分区雨量不足,主要是种植赖以糊口的五谷类作物,但它同时还有许多高度商业化的小块农业区。需要指出的是,这地区是马邦甘蔗生产的主要产地,而在全印度的甘蔗生产中,马邦又是举足轻重的。普纳地区所生产的蔬菜和豆类植物在地区市场上占很大的比重,而所生产的小麦和稻米在马邦也占十分重要的份额,所以普纳地区所展示的是一幅复杂的农业图像,农业商业化的进程由来已久。我们将会看到我所研究的农村,在某些重要方面反映了这个历史进程。

就像南亚其他许多雨量不足的地方一样,马邦农业的极度商业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引进了人为的灌溉技术,其中最主要的是用来灌溉的水渠和水井。在我的印象里,水井对于马邦的商业化农业,比对印度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重要。我们将会看到,水井是马邦农村整个农业世界的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部分,水井技术的改变的历史语境,超出技术的范围,涉及上一世纪在印度西部出现的农学话语。

3. 商业化与农业的话语

在乡村层面上寻找可靠的历史资料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那些会随科技演变而出现的知识论上和道德上的转移的领域,农业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大部分的历史资料来自殖民地的记录和报告,它们都有一套特定的知识论和话语结构(Saumarez Smith 1985),这些对于我要做的文化分析并没有太大的帮助。不过有一类文件,总算能够让我粗略地勾画出原住民意识形态的改变,怎样成为了科技演变的一种概念上的代价(conceptual costs)。在马邦

这个例子里,我幸运地发现了一些 19 世纪的农业小册子。这些小册子提供了一个基准,让我可以跟目前有关农业的官方论述,例如刊印在农民杂志、为农民制作的刊物、由一些农业大学生产或者为这些大学生生产的文本等,作出比较。这些小册子(全部以马邦的文字“Marathi”写成),使我能够对马邦的农业思想,在知识论层面上的演变,作出粗略的勾画。^[1]

有一点很重要,这些资料只包括了不同种类的官方意识形态,我们无法从中接触到农民的直接声音,尤其是小农的声音。事实上,它们都着力说服马邦的农民采用新式的农业技术,所以这些资料的结构,都是修饰的辞令,由此亦反映出商业化的力量,如何在语言和概念上影响农民。我们很难知道,从古到今,有多少农民读过(或是间接接触过)这些资料,所以过分地推断它们对农民的影响,实属不智。这些小册子描绘了官方的农业意识形态的假设如何转变,以及一个原住民农学(indigenous agronomy)的形成,并如何重塑、选取和排拒某些在乡村层面上非常重要的农业知识。对这些不断变化的假设作出分析,能够为我在本文将会谈到的文化演变的例子,提供一个粗略的证明。[这分析]也在语言学上更准确地说明商业化是如何被制造成一个为本地接受的、不可逆转的过程。

我以阿姆敦高(Amruttungal 1852)的文本作为基准,它的内容是两个人的对话,一个是受过教育、周游各地的布拉姆明(Brahmin);另一个是在奥兰加巴德区(Aurangabad)派坦城(Paithan)的昆比(Kunbi)农民;派坦城是马邦农村地区其中一个最为乾旱和最少现代化建设的地区。这文本并没有对其主要假设提供足够证明,就理所当然的认为那个四海为家的布拉姆明,可以教授昆比农民和他的四个儿子很多东西。而昆比农民和他的儿子,则被描绘成在[微薄的]财产下挣扎求存的人。此文本对 19 世

纪中期的一些马邦人眼中的农村商业化新潮,有十分引人入胜的描写。

这文本最叫人惊异之处,是它证实了一套数量庞大的商业用词,早已广泛应用在农业领域。这些商业词汇主要是围绕成本(kharcha)、减低成本、增加产量(utpanna),以及关于商品(jinnas)的概念;而利润(nafā)和亏本(thōtā)这两个概念的应用,也颇为频繁。这些用词同时被置放在专家布拉姆明和昆比农民的用句里,藉以表达此文本的核心修辞目的——增加农产量和增加收入。另外,此文本用了大部份章节来推广商业化的好处;介绍种植本地农作物(例如甘蔗)的新品种的主要技巧;介绍欧洲新农作物,例如马铃薯和牲畜的草料;以及推广饲养动物的重要性,例如马匹和山羊。

对于这个在修辞上强调新农业机会和技巧的文本(跟上述的商业用语紧紧扣连),一个值得细味的地方,是文中并没有用到进步的或现代的(ādḥūnik)这些概念来形容农民,而只是用聪明的和有能力的(hushar)作为形容词。除此以外,此文本还透过概括性的、传教式的口吻,颂扬欧洲政治体系的好处,并以此来述说农业。例如有数个章节就被用来谈论读写能力的重要性,以及颂扬基督教的好处(这小册子很明显是由一个本地的信徒所写的)。另外有一叫人讶异的分章,尝试透过赞扬标准化、自由交易、剔除中间人等好处,来驱除农民对于东印度公司这个新近引入的名词的恐惧。因此,我们看到,至少在这个阶段,农业的商业化只是出现在教育、宗教和商贸的领域里,被视为农村生活理性化的一部分。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看它的商业化词汇和整个知识论架构,就会发现这小册子跟后期的官方小册子有很大的不同。例如资本(bhāndval)这概念并没有在这册子中出现,虽然这个概念很可能在19世纪中期马邦其他的商业语境中被应用,但它好像并未成为

推广农业商业化的修辞的一个主要概念。在这个早期的文本里，资本这概念只是简单的被视为是一种成本和与之相连的回报，这与后期的文本不同。后期的文本显示一些[商业行为]的改进，已经以资本的概念[对早期的农业论述]提出重要的挑战。由此推论，在早期的话语中，农业仍未被视为一种商业企业，一种把投资、储蓄和资本化视为制造利润的推动器[的企业]。利润只被视为一个资本主义原型的(proto-capitalistic)会计项目，是减低成本的事宜，并且以增加产量和利用农作物和动物的新品种，来争取制造更大利润的机会。

最后，值得玩味的是，一些小农认为是问题的事，在这小册子里只是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农业场境中不成问题的事情。尽管其中提到种植甘蔗需要大量水分，但却不曾提及水井和水井管理，亦没有谈及普遍的水源短缺问题。册中对于土地的描述颇为隐晦，只视之为扩展中的资源。对于工人的问题虽有简略的描述，但整体来说，这是一个家庭式耕作的模型，雇工的问题仍未出现。最后是关于信贷方面，用作农业投资的借贷，仍未被理解为农业经济的主要问题，虽然在谈论货币的部分中，信贷曾经出现过，但只被视为是放债者和遥距地主(absentee landlords)邪恶压迫的工具。所以，信贷仍然是倚赖和债务世界中的一部分，而不被视为投资和商业的进取架构的一部分。

总的来说，我们从1852年这文本所得到的图像，是一个刚刚开始商业化、刚刚接触新品种的农作物、新模式的货币、宗教和读写方面的知识的农业社会，而不是一个进取式的企业化农业世界。虽然这小册子是一个由利润和亏损等概念所构成的话语，但这些只是全面经济化的精神特质的一个开始。它所描绘的小农是不愿冒险、为生存挣扎、对新的农业和商业的技巧和工具存疑的一群。

这情况在19世纪后期有了很大的转变。我所参考的卡亚尔

(Khare 1882)和阿普特(Apte 1890)这两个文本,对农耕过程和与之有关的商业面向,都有一些更为复杂的看法。这并不值得惊讶,因为直至1880年,由于修筑铁路的影响,以及马邦的许多农村在甘蔗、棉花、稻米和小麦方面,跟其他地区以至世界市场的联系,使很多巨大的转变随之产生。另外,马邦在1870年至1920年这段时期的人口增长、农业扩展和商业机会的攫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的场境。^[2]

首先是卡亚尔的文本,它一方面论及马邦农民的悲惨境况,以及他/她如何受到城市人、放债者和国家的剥削;另一方面它亦是一个关于进取的农业技巧和目标的范本。所以这文本可说是预测了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初期,在马邦发生的、带有反城市和活跃分子精神特质的强大农民运动。另外,这文本对于外来的商业利益,尤其是关于商人(baniyas)和其他来自北部的商人的批判,向我们丰富地展示1875年德于暴动(Deccan riots)的意识形态精神特质。

这文本名义上是为受压迫的农民提供一个强而有力的辩护,但其实质的中心假设,是农民的无知:缺乏知识(gyān)是导致他/她们贫困的主要原因。这个农民不懂得他/她们必须懂得的看法(早已隐含在1852年的小册子中),现在终于清楚明白的表现出来,亦正式宣布了这个地区的官方农学知识,跟农民的传统知识的差距。更概括的说,我们在这期间看到的,是一个原住民农学话语的形成,农民的知识被吸纳到一个更强大、更理性化的话语里,被关于新技术和新目标的资讯和规劝所框限。这些新的小册子,只是以大量的篇幅去将一些既有的知识描述和编码,并不时加插一些新的可能性。举一个例子,在1882年的小册子中,有一简短的章节谈及动物粪便的用途,指出农民早已懂得利用牛粪做肥料的好处,但他/她们却不懂得利用牛尿制作化肥,而这方法在英格兰

(viloyat)经已被采用。更重要是整套关于农业的知识,已开始被转化,成为一张由技术性的资讯所织成的天衣无缝的网,当中农民已知的(亦因此无需告诉他/她们的)和农民不懂得界限越益模糊。在论述的层面上来说,将实际应用的知识转化成农学知识,就是商业化过程的主要特徵。

19世纪后期的小册子文学(以 Khare 1882 为代表)的其中一个特徵,基本上是带有民粹主义、反放债者、支持农民的腔调。而技术和农学方面,则只占其修辞的次要地位。另一方面,这小册子主要借放债者和农民的关系,来表述在其架构当中的商业(vyapar)世界。在这个分析架构里,农民被描绘成干粗活、贫穷、无知和被剥削的;而地主/放债者(通常都被描绘成原籍古吉拉特邦和拉贾斯坦邦[Rajasthan],种姓上属于商业社群的马娃迪[marvadi]或百利亚[baniya]的成员)则被视为是贪财、有读写能力、计较和冷酷无情的。这里所描述的农民,虽然都是被谆谆告诫有关工作(udyog)、[工作的]效用(fayda, labh)和有组织地利用闲暇(vishranti)的好处,但他/她基本上还没有被理解为一个企业家。事实上,在这个文本里,耕作(shethi)和商业(vyapar)是互相冲突的活动,而农民(shetkari)跟放债者(savkar)的关系虽然十分恶劣,但却被认为是无可避免的共生体。一些商业用语如贷款(karja)、利息(vyaj)、资金数量(rakkam)、贷款抵押(vasul)等,都是以改善(而不是转化)这种关系来进入此文本的脉络。这文本惟一一次用到资本(bhandval)这名词,是用在放债者身上。虽然这并不表示在1880年代,马邦的农民并没有进行商业化的农业活动,但此文本至少提出在当时的官方话语里,农民仍然没有被视为资本家(bhandvaldar)。

但在1890年一本题为《最优秀的农民》(Uttama Shetkari)的小册子里,我们发现早期小册子的浪漫和民粹主义的腔调,经已让

位予更为商业、技术性和专业的处理。这小册子对于农地面积、雇用工人和地主参与农业之间的关系作出了仔细分析,而它对于如何最有效利用不同形式的地主—工人关系,亦提出了一个颇为复杂的概念。

这小册子同时也是把时间看成是农业的商业化资源的一个非常早期的文本。文章开首即肯定说出时间(vēl)在农业的重要性(mōl),只有少数的商业活动可堪类比,另外它亦提出了一连串例子,说明多种会妨碍农业正常活动的时间安排,因而导致农民亏损(nuksān, thōtā)的可能性。在这幅关于时间安排的迫切性的图像里,有一些地方特别值得留意:它并没有提到人为的水源短缺问题(虽然有提及不稳定的降雨量),并且暗示各式各样仪式习俗上的义务,往往都是(及应该是)优先于农业上遇到的问题 and 压力。

另外,这文本把农作物视为货物(māl),而文中提到的例子,都带有暗示农村企业的赚取利润的性质。所以对于一个拥有一对水牛——耕地(“one pair” holding,相当于两只水牛能够耕作的地方,面积大约是16—20公顷),并且雇用了些粗心大意的工人作帮工的农民而言,外面的人可能会认为他/她十分富有,但他/她实际的生活大概不会很好。小农(lahān shēth karnārā 这名词可能也是在这个官方话语里,新近出现的技术性用词)被视为缺乏现金资本(paishāchā bhāndval),而且被描绘成错置在一连串规模效益之外,因此小农永远都是缺乏现金(paishāchī tanchāi)的受害者。

1890年的这个文本,强力支持小农之间的合伙关系和分成安排(bhāgīdāri, sarkati),而农业资本的概念,在这语境里以一个完全成熟的姿态出现。这文本更明确的表示耕作所需的资本不只包括现金(bhāndval),其他如种籽、动物饲料,和用作播种、培植和收成的工具等等,亦是资本的不同形式。合伙关系被视作一种可积聚更多资本的途径,而资本庞大的企业,则被说成能以较低成本运

作(mōryā bhāndvālachē vyāpārath kharcha kamī lāgtō)。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资本越多,利润越高(jitke bhāndval mōtkhē tirka fāydā mōihā)。分工(shrama - vibhaga)的好处则被视为从属于小规模农业中的合伙关系。

概括地说,充斥这小册子是一个充分发展的概念:视农业为一种资本导向的企业,以及省约的好处——特别是从小农之间的合伙关系的观点出发。值得注意的是,水井在这册子里仍未被视为[农民的]合作控制,或拥有[形式]的主要焦点,而只是被理所当然的视为农业地形的一部分。就如早期的小册子一样,这册子只是以不稳定的雨量来谈及有关水源方面的问题。

因此,1890年,一个主要由官僚架构的下级官僚形构,并以马邦的文字写成的农学话语,已经成熟。这些小册子让我们看到在农学话语里,一种初步的商业意识的形成。不过,这些小册子(包括1890年这本)仍然把农业视为一个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把农民和耕作视作为一个由关系、群体和取向所组成的世界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农学话语成为一个技术性的或狭隘的科学话语,仍不是一个缺乏社会分析、政治意见和文化争议的话语。

在转向以1981年的农民日志为代表的较为近期的官方农学话语例子之前,我们应该留意到,马邦的农村景观,在1890年至1980年这段期间,发生了很多在社会、经济和技术方面的重要改变。就算只是撮写这些改变,仍跟本章的讨论范围相去甚远,但其中最重要的改变,还是需要记下。在1880年至1920年这段耕种迅速扩展的期间,有着高速发展时期的某些特徵:农产品价格上升、生产力的提高和对大部分可耕地和水源的吸纳。紧接着这段时期的低潮,一直延续到30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当中只有微不足道的经济增长。但自40年代开始,到我写这论文的期间(80年代后期),一个重要的农业科技革命正在萌芽,重要的特徵

包括:化学肥料的广泛应用,新品种的种籽、供多种农业运作之用的机械化工具,以及燃油和电力被用作为新的能源。但要强调的是,这次农业革命并没有在马邦的农村社会深为散播,但它清晰显示了将来的事物的科技上的形态。

1981年的这本农民日记(Krishival Dāyiri, ed. H. L. Nipunge)(集合了美国式农民年历和日用记事本的特征),由普纳城的一家出版社出版,售价为10卢比,以当时的汇价算,折合约1美元多些,对很多农民来说,这是笔大数目,只有富有的农民才负担得起。这日记的内容和售价,清楚显示它的对象是马邦最上层的农民。这日记包括了差不多170页以小字印刷的文本,接着是为数不多的空白页,作为记事之用。这日记充斥着种籽、肥料和农业机器等公司的广告。而在马邦进步的或现代的耕作的每个重要方面,这文本是一个极为详尽的和在技术上面的指引。因此,这日记毫无疑问地展现了一套今天在马邦的农业学院、农业企业(agribusiness),以及其他从事各种农业工作的工人所共用的词汇。从早前讨论过的1890年的小册子,到这本1981年的日记,在这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期间,农业教育和农业企业都有稳定的发展,因此,这文本完全视农业的商业逻辑和结构为理所当然,并且主要集中在技术和农学细节的层面上,来谈论泥土、种籽、现代化的种植技巧、水分和应用于不同商业作物的肥料都不会使人惊奇。甘蔗和洋葱这两种马邦的重要商业作物,在日记里各占一章,其他的章节则用来谈论水果、花、现代机器、种籽和肥料。这日记由始至终都强调采取新培植的混杂种籽,以及各式各样的化学肥料。虽然对于这个包含了农学话语的文本,其词汇和精神特质,有很多地方可以拿来讨论,但我只会集中讨论跟本篇论题有重要关系的几点。

这文本最引人注意之处,是它实际上完全取缔了粗略的估算

方法,而代之以极为精确的(主要是西方的)度量方法。不论是地下水的深度、对不同农作物所施用的肥料分量、某种农作物需要灌溉的次数、该邦农作物的平均收成量,或其他种种,这文本一律给予精确的量度数字。我将会谈到在原住民的农业论述里,量度主要依靠粗略估算的、关系性的和跟语境紧扣的方法,所以这些精确的计算,可说是反映了技术化和商业化渗入原住民农业话语里的积累过程。如果从这个观点回看早期的小册子,我们会发现这些关于量度的精确用词,在1852年还未出现,它们只是在1882年和1890年的小册子才开始出现。就算在这些文本里,较为粗略和实用取向的量度方法,仍然跟那些新的和较为技术性的形式共存。但在1981年的原住民农学话语里,很明显已经再容不下粗略的或跟语境紧扣的量度方法。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1981年这文本的整个架构,都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整篇都没有提及在马邦农村的富农之间,或在富农与贫农之间的合作和相互依赖的复杂形式。这样说来,我们不只看到企业的和个人主义式的精神特质,如何为成熟的农学话语定调,而随着这种话语日渐技术化,它亦因此越少社会性的性质。换句话说,这个1981年的农学话语,已不再关心农业里的关系,而只是视农业为一种完全技术性的企业。

在这个文本里,农村原用的月历也同时被消解了其神秘性,那些跟农业活动有关的仪式和周期,亦已被取消。虽然用于形容气候季节的三个名词(*unhāla*, *pāvsalā*, *hivāla*),以及形容耕作季节的两种结构(*kharif*, *rabi*),在这个文本仍有出现,但主要的改变是,一些源用旧历星象(*nakshatras*)进行主要农业活动的民间团体,在这个文本已经不再出现,代之而起的是英式月历,以不同的日数表示不同作业相隔的时间。而早期的小册子,则全部参照旧历星象,以安排主要作业的时间,就如今天在娃迪或马邦其他地方

的农民所采用的一样。更重要的是(也预告了我在本篇下一节的讨论),整个文本清楚的显示,农业活动才是月历背后的主要动力,农业活动亦应该尽量利用时间,并且完全独立于仪式习俗和其他的社会时节。这文本可算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印证我们称为农学时间的概念(*agronomic time*, 借用 E.P. Thompson 的概念)。

在有关银行贷款的一章里,清楚的说明了只有那些用来改善(*sudhārnā*)耕种、增加产量(*utpādan vadhisāthi*)的贷款才值得重视。这章同时是惟一章用挖掘新水井或挖深旧井来作为银行会有兴趣作出贷款的其中一些例子。这文本清楚的表明,银行不会对用作满足消费需要的贷款有兴趣,也警告农民不要把他/她们借来用作改善农业生产的贷款,转用作即时的消费。总而言之,关于银行贷款的这一章,再次肯定了整个文本的腔调,就是一本模范(*ādarsh*)农民的技术手册,这个模范农民信赖新的技术和农作物,他/她基本上相信市场主导,并且独立于农村生活的社会关系和仪式习俗的月历的时间步伐。这样的农民显然仍未在马邦的农村出现,但他/她就是新农学的模范(和意识形态上的目标)。

这个关于马邦农业话语变化的概要描绘,是对过去一个世纪所发生的变化中的一个具体补充。它亦使我们获得一个较佳的诠释位置,把在实践上和在意形态上十分独特的改变,置放回语境里,我即将以一个农村为例子,对此作出讨论。今天的马邦跟昨天的一样,在生态、商业化和社会分化的模式上仍带有极端空间分化(*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lesworth 1985: 142-55)的特色,显著的差异不只发生在邦、地区、分区(*talukas*)内的不同区域,亦会在只相距数里的村落之间出现。因此,我们不易从宏观的资料中寻找微观讯息,但我在此部分谈到的这个区域的农学话语的形成,仍然可以作为我即将讨论的例子的背景资料。

4. 民俗学的轨迹

我把那个村叫瓦迪(化名)。它位于普纳区的普兰达分区(Purandhar taluka)内的普纳城的东南面大约 25 英里,从沿海城孟买往内陆走,约 130 公里。本文所引用的资料来自那里。它处于德干高原雨量递减的梯度上。瓦迪村在大部分年份的降雨量大概少于 25 英寸,而且是极端季节性的。常年雨量的高峰期在 6—9 月,占总雨量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10 月和 11 月一般占总雨量的百分之十五,12 至 3 月占百分之三,4 至 5 月占百分之七。

这些只是约数,因为每年的雨量可能有明显的变化。这村子离分区总部萨斯沃德(Saswad)大概是 2.5 英里,是连接普纳和孟买的主要公共汽车中继站。邦内交通系统的公共汽车,和从瓦迪等乡村运菜到普纳和孟买的运输公司货车,都得使用那条贯穿村子的道路。

瓦迪的人口在 1981 年大约有 900 人,共 193 个家庭,从某种意义上看,大约百分之三十的家庭是联合(ekatra)家庭,而其余百分之七十是核心(vibharkte)家庭。耕种总面积大约是 880 英亩,其中 280 英亩(少于 33%)是在没有雨水时,也能获得水源的湿地。每户的平均土地面积为 4.5 英亩,其中干地的面积为 3.1 英亩,湿田为 1.4 英亩。

瓦迪与外界有一整套有效的联络网。在 193 个家庭中,104 户有一个(通常也多于一个)家庭成员在外地,一般到孟买或普纳谋生。但无论怎样,瓦迪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汇款经济('remittance' economy),因为这些赚取工资的人都得供养他们城里的家属,其他的由于各种原因,也只有特殊的情况下,才寄钱回村。

所以并不足为奇的是,与出售现金作物、出卖家庭劳力,与自己田地的农产品所得的收入相比,只有33个家庭认为工资是他们的的主要生计来源。

瓦迪的种姓结构是比较简单的。193户中,有174户是马拉地人(Maratha),其余分布在不同的低下服务阶层,包括一些被称为贱民的阶层。若村民说这是个马拉地人的乡村,那也不为过,马拉地人家族本身由四个主要家族(bhauki)和三个次要家族组成。每个家族内的家庭均是同姓的。而其中两个主要马拉地家族共用相同的姓,这在民俗学的角度看来也许有点奇怪。其他种姓阶层的家庭也能从相同的姓氏辨认出来。

我在前文提过耕地的平均面积很小,生产供自用和出售的农作物,是村民的主要经济活动。村民赖以谋生的主要农作物是高粱(jowar)和小米(bajri),大部分村民至少每样作物都种植一些。除此之外,他们还大量种植其他的农作品种,也种植少量的小麦和稻米。主要的商品作物是甘蔗、洋葱和豌豆。还有各类扁豆和豆子、花生、多种青菜和少量蕃茄、甘笋、无花果、饲料、花、草。但大部分是自用的。无论主要是用以出售的农作物(以洋葱和豆为主),还是自用的蔬菜,都需要引水浇地。

主要的种植季节有两个:作物于秋末收割的季节(kharif)——由6至10月(依赖季候风带来的雨水),和11至2月早春的作物的季节(rabi)(或冬季),这时候,依赖灌溉,市场为本的农耕工作已完毕。3至5月的夏季(unhala)耕作最繁重,因为天气炎热,又缺水。但是那些能够在这个季节里取得水源的农民,便会浇田种植蔬菜。夏季也是修理农具、修整农地以迎接6月雨季来临,并且是举行结婚典礼和庆祝其他乡村节日的季节。夏季是很多家庭消费高收入低的时期。

虽然农业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传统的技术,但其经济体系已不

是那么传统的了。牛只和犁仍然是农业的主要耕具,而扬谷、除草、收割、播种、脱粒和收割也仍然使用基本上源自古代的传统耕具⁽³⁾。不过,重大的变化确实发生了,尤其是在种植商品作物时,农民已普遍使用化肥和杀虫剂,很少使用粪肥了。农业劳动几乎完全以现金支付,而且对于不同的工种、季节和性别都有明确的工资。瓦迪是个劳力过剩的乡村,即使无地的家庭不多,但是因支付土地税而寻致经济困难的家庭也为数不少。就算有了从城间歇汇款而来的收入,也不足以维持生活。因此这些家庭除了管理他们自己的小块农地外,都要出卖劳力,所以瓦迪农民雇用外地劳工并不常见。

1981—1982年间,瓦迪在各方面都高度货币化,甚至最贫穷的家庭也逃不出现金交易的罗网。这些农民认为一个家庭至少每月需要几百个印度卢比才足以应付开支(当时9卢比等于1美元),否则大部分家庭就会崩溃。在一个以现金交易为主导的世界里,要改善自己的处境,便要进入农业商品市场,不仅要成为工人(工人前景暗淡),而是同时成为生产者。就是说,农民无论怎样困难,也必须获得有水灌溉的田地。在讨论当地商业化的农业知识的变化之前,有必要先描述瓦迪农业灌溉的基本情况。

5. 瓦迪的灌溉技术和社会学

1981—1982年间,瓦迪有74个使用中的水井,这些水井的基本技术结构可追溯到至少1000年前,在土地上挖出20—60英尺(大约6—18米)深,直径15—30尺(3—9米)⁽⁴⁾不等的洞。传统量度水井深度的单位为帕拉斯(paras)或普鲁什(purush),即一个成年男子的高度,但实际上大概是7英尺(2米)。虽然挖水井的工作一般由家庭劳力或村民承担,但专业的挖井阶层在印度西部

跟南部都有悠久的历史。过去,水井内壁是以石头和石灰完成,配以木制的支架,以容许在水井内皮革水桶升降。汲水时,把水桶吊起及提水要靠两头或4头牛只来完成。

瓦迪的水井在70年代已有新的面貌,虽然仍保留了它的基本设计。井壁表面的石灰已多被混凝土所取代。钢制水桶(môt)取代了皮革水桶:有些水井甚至用租来的钻机代替人力挖掘。虽然大约有12个水井仍然使用畜力,但已被视为过时。纵使还有大概五个水井仍使用柴油机,电力已成为首选的能源。就是说,大约57个水井在使用3或5匹马力的电力发动机。有些现代化水井用不同长度的水管,从井口输水到田地,但更普遍的是以传统的水渠输水。由于大多数水井在有电力供应前已建好,因此这些水井只能算是将传统的露天(open-surface)水井电气化。因此,水井所使用的可称为混合的而非传统的技术。

尽管水井只是瓦迪细小和零散的农地的部分写照,却正好说明灌溉田占总耕地面积的比重不少(百分之三十三),而1975—1976年整个邦的灌溉地只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一。1981年,瓦迪142个农户共有约280亩湿地,其中百分之三十三农户拥有的湿地,少于1公顷,大约百分之六十的农户拥有少于2亩,大约百分之八十少于3亩。其中只有11户是每户拥有多于5亩的灌溉田,只有一户有25亩,也是瓦迪湿地中最大的一块。我引用这些数字是想说明灌溉田的面积,总的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大部分农民拥有几块(tukde)湿地。这些土地一般都不是相连的,就是说,农民一般都是一个水井以上的股东(hissedar, vatekari)。尽管有24个水井只有一个井主,另13个水井为二人共有,但拥有这些水井的农民也兼有其他水井的一些“股份”,水井的“股东”数目由3个至情况最复杂的31个不等。私人占有土地零散疏落,加上纵横交叉的水井共有制使情况更为错综复杂。水

井的“股份”通常跟与水井有关的土地相连,在瓦迪,购买或继承一块土地的同时,也继承了用以灌溉的水井的“股份”。然而,水井的“股份”并不一定与某块土地紧密相连,因为水井可能会被弃置,一个水井(理论上是灌溉特定土地)的“股东”也可能把水引向别处,用以灌溉与该水井无关的土地。水井的共有制也可能暂时中止,与水井有关的土地会由“股东”从其他也有份的水井引水灌溉。

然而,水井“股份”毕竟还是跟土地紧密相连。水井的“股东”要想拥用相关的土地,主要得靠继承父业,这反映出很多水井的“股东”都是父系亲属(同姓氏)的男士,有时候他们是同一父亲的儿子。这种父子相传的情况是相当持久的,假若水井有混杂的家族成员,或异姓者,那么便不难追溯到以下几个来源:世系成员因经济困难而卖地(连水井“股份”)给外人;以土地作押(taron)向外人借贷,逾时未能偿还。少数情况是这样:土地是妻子的嫁妆,丈夫死后土地归还妻子,这时候,“股东”行列中便有了女性,她是世系亲属中的寡妇成员。

大约33%的水井有一至四个股东,他们在分配水源时,并不需要一个复杂的制度;其余的百分之六十六,每个水井有5—31个股东,那便需要复杂的时间分配制度。要弄懂这些分配制度,便先要了解水井在农业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现在以及过去的经验都证明了,在雨水最少的冬、夏两季,灌溉良好的耕地,对种植大部分农作物是很重要的。很少水井一年12个月都有水,正是这些数量很少的12个月均有水的井(baramahi),使水井的拥用者得以种植全年都需要充足水分的甘蔗。大部分的水井都是八月井(atmah)。这些水井大约在6月中旬至2月中旬才有水,最适合种植洋葱和绿豆(两种主要的商品作物)、用以出售或自用的各种蔬菜和水果,以及少量的稻米和小麦。

有四五个“股东”以上的那些水井,采用相当复杂的轮流(pali)

灌溉制度,因为“股东”们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内,在其一小块耕地上,种植相同的商品作物(例如洋葱)。根据不同的“股东”数目、(特别在炎热天气时)水井的储水能力、“股东”所种植的农作物、和该水井灌溉的土地范围,这些轮流灌溉制度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轮流灌溉制度以12日或8日为一周期,灌溉的时间(一日、两日或一日内的某时段)则按“股东”的土地面积而定。在炎热的季节,井水下降,商品作物有水才能为农民带来利润。这时候,轮流灌溉制度便开始实施。这时候如果农民自己拥有水井,或能从股东少的水井引水,便占有最大的优势。

总的说来,很少水井是百分之百用于被称为是由它们“掌管”(vihirikhali)的土地上,部分原因是水井灌溉的都是零散的农地,加上这些农民的本钱又不多,名义上与水井相连的土地经常地只有三分之一种上作物,这说明水井“股东”缺乏劳力和资金,无法充分利用与水井相连的农地。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名义上的灌溉地之所以使用不足,正反映了这种种不利的因素,而不仅是水井本身的条件限制。合并土地是最有效运用水井的关键,但大多数农民的土地除了面积小外,土地与土地之间还相隔甚远。富农经常通过以下的方法取得他们附近的土地:直接购买或当他人用土地抵押的借贷逾时未能偿还时兼并。

瓦迪没有水井“股份”的农民都想得到水井“股份”;已拥有水井“股份”的又想得到电气化的“股份”。我说的是电气化“股份”而非电气化水井,是因为有一些水井“股东”会投资在发动机上,供他们取水时使用。其他无力投资的“股东”就不能使用发动机,因此轮到他们使用水井的时候,他们只能用牛力取水,有些则会租用手提柴油机。而农民都希望有自己的水井,最好是电气化的,那就不用与其他农民合资买机器,也无须与他人轮流使用。一个传统上重视社群性的价值的社区,为什么会厌恶合作制?这问题将在本

章总结中讨论。

1981年,一个3匹马力的发动机的价钱为5000卢比(555美元),一个5匹马力的发动机约8000卢比(888美元),明显超出了大多数农民的经济能力,这可以从电气化水井均由多个“股东”联合经营的事实中,清楚反映出来。然而要作出一个联合投资发掘新水井的决定,要比在一个现有的水井上联合投资新发动机更困难。新水井的成本,连开挖、装发动机,或者再安装水管等,由2万卢比(2222美元)到4万卢比(4444美元)不等。这是一笔数目极大的投资,因为大多数小农的每年平均总收入(包括各方面的收入)不可能超过5000卢比。鉴于私人农地的面积细小、有些水井的“股东”可能无力为扩大灌溉地的使用投入资金,或者因为经济困难而偿还不了他们应负责的那部份银行借贷,或支付不了电费等等原因,我们不难理解1981年以前5年内开挖的新水井中,除一个以外,全是个体农民的企业。农民也曾经合资把现有水井电气化,但好几个以失败告终。其他的虽然实现了电气化,但使用不足,特别是那些水井的“股东”是比较贫穷的农民。

6. 在地(locality)的知识转移

让我们整合一下在本文的简介里提到有关认识论转变的讨论。我提出上一个世纪的农业商业化,产生了一种新的农学学识,以致淘汰了大部份既存的农业技艺。我将会以一连串例子,展示农业商业化如何导致彻底的知识论的转移。这些例子当中,三个涉及知识的内容,其余三个则涉及知识的风格。

6.1 知识的流失

第一,有关如何建造、保养和有效率地使用非机械化水井的知

识,很快便会被淘汰;正如有关使用皮制水桶来汲井水的知识,已随着金属水桶的出现而基本消失。为什么我们要担心这些知识的流失呢?毕竟,人们可能会宣称,这些以动物作动力的传统水井,只属于一种既无效率又正在迅速消失的生产方式,而且越来越多农民看来将会(也是值得欣喜的)有份使用机械化水井,或更大的现代配水系统。那么,哀悼传统知识的流失,是否只是都市人对农村生活的浪漫情怀?

事实上,在印度很多干燥的地方,例如马邦,为数众多的农民在面对农业濒于商业化时,仍然依靠取用由牛只汲来的井水维持生计。对他们来说,明了传统水井的应用和[运作]条件,是绝对必要的。再者,购买电力发动机来汲取井水,对很多农民来说,是一件冒险的事情。有时候,由于合伙失败或经济突变,他们得要卖掉水井的股份。在这种情况下,若农民没法获取传统的水井技术和知识的话,他们便很可能完完全全地被逐出(需要汲水灌溉的)现金作物的市场之外。在当前的过渡环境里,农民财富的起伏会更为激烈。故此,除非所有农民都获得广泛而可靠的电力来汲取井水,否则用牛只来汲取井水的知识,便不应被淘汰。最后,由于以牛只为动力运作的水井,往往采用共用牛只制度,推使贫农之间建立合伙关系。若然取消这种共用牛只的制度,便等如结束农民之间的某种合作方式。让我再次指出,除非我们绝对清楚,对于脱离合作关系的农民来说,自主独立是安全的和能够令人满足地维持生计,否则,这样的转变,尤其对于贫农来说,是侵蚀农民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危险做法。

至于由皮革水桶到金属水桶的演变,[我的看法]就更简单了。这样的转变无情地迫使农民更依赖大型市场,更易因价格变动和市场供应的不稳定等而受害。如果金属货品价格有大转变,购买金属水桶便会使很多农民负上更大的债务。此外,制造皮革水桶

是位处最低阶层的反革工人的重要生计,水桶技术的改变,迫使他们难以在大都会的市场上买卖服务和货品,进一步危害农村的经济自主。

第二,随着农民(甚至小农)越来越依赖工业生产的化肥,用动物粪便来生产农作物的知识,便只有老一代才能掌握,并且将会消失。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要对此忧虑呢?首先,大量的证据证明,动物粪便在复杂的自然生态系统里,是非常合用的,因为动物粪便和农业生产率、耕作成本、相对的自给自足〔状态〕,以及对泥土的影响,均有微妙的关系。在马邦我从事研究的地方,主要的问题是于上次(1972年)的严重旱灾的期间,大量的牛只被卖掉,以致本地牛只无法回复以前的数量。再加上来自政府、农业企业和外界专家要求农民转用工业肥料的压力(工业肥料是扩增中的农学学识的一部份,我在本文第三部份描述过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便可看出,为何农民,甚至是小农户都被引诱放弃使用动物粪便施肥,同时也放弃与此有关的传统知识程序。很多农民被迫去赚取数目不少的短期的资金(以维持越来越多只有用资金才能应付的生计需要),导致过份使用化学肥料,对土壤造成长久的灾害。正如印度其他地方一样,马邦的人们普遍觉得化学肥料会过份燃烧泥土,所以农民在扬弃旧有施肥技术的同时,也丧失回复使用旧有技术的能力,而这种技术在某环境下,可能对于他们和他们的田地更有好处。在农作技术的案例中,知识的流失也就是弃绝选择。

第三,随着农业生产越来越依赖政府的地质学家和其他现代专家来确定地下水源的位置,对于水源占卜师的需求便相对减少。在马邦的农业社会里,每当要判断新水井位置的时候,农民便经常依靠这些称为帕恩哈达(Pardhadi)的水源占卜师,无论这种占卜方法的客观作用如何(我对这问题持开放的态度),他们确在开挖水井时,肩负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马邦一些我熟悉的农村地方,

开挖水井是昂贵、冒险和费时的,其中牵涉家庭的主要资源的投入,通常涉及与其他本地农民[建立]的契约合作关系、向银行或合作社借贷,以及投入大量和不确定的家庭时间来监督工作。这些开挖水井的成本和潜在好处,使它成为一项重要的决定,但也是令人忧心的事情。而决定在何处开挖水井,便是主要的问题。农民依据本身对村的了解、现存(新和旧)的水井位置、朋友和邻居的建议,对于开发水源的更佳方位,有自己的判断。而那些使用西方科学技术的政府地质学家,对于地下水位和水井最理想的位置,则抱有不同的概念。到目前为止,农民都能够作出他们以为是最可靠的决定。凭着平衡三种不同的估算,然后作出一个最能切合其中两种或全部三种估算的抉择。失去了水源占卜师这专业知识,我们不单只损失一门重要的传统生态技术,还损失了一个可以让农民在作出复杂和冒险的决定时,所采取的多层次判断的其中一个环节。这里再一次说明,知识的损失,是一种对认识论的复杂性和选择的削减。

对物质技术来说是对的东西,对生态知识来说却未必正确。农民有关雨量、土壤和水源这些大自然系统里的知识,看来在印度很多地方仍然能够立足生存。但这些本土知识,迟早会被收音机和电视里面的农业知识,以及其他都会式的农业专家[的知识]排除。当然,有关人、神灵、宇宙大地变化、祭典时历和循环的知识仍不易改变,在这些方面来说,传统农村知识看来受到最少的影响。可是,知识(尤其是在农村环境下的)并不能清楚界分,整个知识库很可能开始被结构性地改造,虽然我们难以得知这将会在何时和如何地发生。

6.2 认知方法的转移

我已讲述过有关农业知识的内容或存库,并指出这方面的改

变是相当快和广泛的。但认知的传统方法和传统农村的认识论又怎样呢？在第三节中，我指出在上世纪出现的农学话语其中的一些重要方面，怎样重新定义农民世界，我尤其指出刚出现的商业环境，如何改变了量度的术语和对时间的管理。在下面，我会把这些转变放置在瓦迪农耕世界的具体语境，以及其认识论的风格(epistemological style)之中。无论在何种社群里，认识论的风格都有几种面向，而其中三个面向是最重要的：(一)评估某些现象的典型方式，或可称之为分析方式；(二)知识如何在社群里被分享和分配的典型的方法，亦即该社群关于专业的政治经济学；(三)不同知识(包括经验)部门之间的策略性关系，这决定了那一种知识比较优先。这最后的面向，正是知识触及价值问题最清晰之处。我现在将会描述，瓦迪农民在认识论上的风格的每一个面向的一些例子，以及由这些例子所见证的转变。

建基于马邦的资料，我从前提到(在一份有关农村量度技术的文章, Appadurai 1989)⁽⁵⁾，当代西方度量衡的术语跟非西方农村的分别，不仅是在语汇上的分野，通过翻译便能处理。相反，农村的度量衡的术语展现了一些假设：数字和数量的关系、量度与量度标准的关系、对粗略估算而非精确计算的认受、以及各种社会力量如何争持量度方法的重要性。这些假设基本上偏离当代科学制度所追求的抽象、抽离和精确的规范。所以，当农民审视其土地、产量、本地人口、分组人口、生产需要和其他的东西时，他们所采用的术语不单只在表面上有异于我们的，更包含和反映出对“度量衡是什么”的一种很不同的理解。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重要的不同之处便行了。从事种植(主要在市场售卖的)洋葱的农民，往往要向其他农民购买洋葱种籽。他们在讨价还价时，用作量度的字眼称为瓦发(vafa)，即大概是一个标准的苗床。买家出价购买某一瓦发(或一批瓦发)的种籽，然

后卖家还价,到最后成交,这看似是对一个数量明确的东西的价格,进行标准的讨价还价过程,但实际上却是对数量本身的讨价还价,价钱只是习惯用语而已。由于这些苗床的形状和大小各异,而种籽数目只能凭肉眼估计,所以买家和卖家商议的,是他们对数量的各自估计,而以价钱(出价和反价)来量度,这种数量估算、略数和价值之间的关系,涵盖了马邦农作区的各种活动。

可是,由于世界愈来愈是由金钱、市场和刻度在外的度量工具如时钟、日历和度量尺来定义,此类[与旧有的量度习惯]十分不同的方法,与农村生活越来越相关。新度量方式具有精确和拍离具体语境的量度工具,包含一种不容商榷的绝对度量结果,而且以精确取替约数。虽然传统的量度方法仍是常用的,但转移去采用新的量度方式的形迹,却随处可见。农民若需要使用流动资金、在工业或准工业的环境下工作,以及应官僚需索以寻求现金、借贷、电力或健康和医疗的需要,便始终须要学习新方法,以量度他们的世界,至少也要以此来表达对事物的估计。再一次,传统分析方式备受侵蚀,这不仅是一种不幸,更反映农民(通常他们的选择会被忽略)是怎样被迫堕入一种大规模、大都会式的交往、语境和思维方式之中。这样被并合至更大的系统,[对农民来说]既不愉快,也非出于自愿的选择,因此带来的认识论的代价基本上必定是巨大的。

关于专业的政治经济学,则有理由假设,农业知识在社群和地区之内和互相之间,越来越见不平等。如查尔斯沃思(Charlesworth 1985)和其他人所说,空间和社会分化便是农业加剧发展的众多后果之一。由于市场压力和机会,某些农作物(如甘蔗)要永久占有耕地的需求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地区被限定于种植某种农作物。举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在越来越多的社群里,能够将全部(或大部分)土地用作生产商业农作物的富有农民,与只能将其拥有的细小耕地用于种植维生作物的小农之间,存在着一个

极明显的差距。

这渐增的分化当然没有知识分配的直接含义,因为贫农通常在富农的商用耕地上工作,而富农也仍然以部分土地耕种一些用来满足基本生活的农作物,以应付市场的突变。然而农业运作的知识,尤其对于维持生计的全面策略,现时在农民之间的分布,无疑是更加错综复杂的:较早前所讨论的农学话语,在瓦迪不是公平地为不同阶层的农民所掌握。今天比较富有的农民,会使用风险(khartrō)、投资(kharcha)、资金(bhāndva)、计划(vichār)这些语言,直接反映出他们对(公共或私人的)肥料公司、银行高级职员、大型农业贸易商和发展专家的话语的兴趣和接触程度。前面论及的那本1981年的农民日记,便反映了这些用法。对比起来,贫农虽然也偶尔会谈及资金、naḥā - thōtā(利润和损失)等,却并不主动或经常使用农业企业的语言。

这种语言上的分析,反映出知识分布中更深更微妙的差异,似乎证明了在经过一段长时间之后,在知识层面上,像华莱士(Anthony Wallace)所称之同一性的复制(replication of uniformity),或涂尔干(Durkheim)所说的机械性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正在减少;而华莱士所谓的多元纷杂的组织(organization of diversity),和涂尔干所谓的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则不断增加(Wallace 1970; Durkheim 1960)。简单来说,农民所知的越来越零碎,与分割了的技术和环境,以及社会和经济分层的知识刚好相符。越来越多乡村社群内的人,之所以连在一起,是因为各别的人和群体对农业行为认知的差异,而非因他们对此认知的相同。不用说,这种不公平的知识分布,能够并确实已强化了印度乡村地区的不平等和支配结构。虽然这趋势仍未占主导地位,但其方向是很清楚的,就是渐渐趋向那种赋予世界各地复杂的现代社群特征的认识论上的劳动分工。

这不同知识部门之间的策略性关系,是农业社群的认识论风格最难以把握的方面,但却可能是最重要的。在任何认识论的体系内,总有些东西框限其他的东西;总有些东西被视为比较理所当然的;总有些问题和视点影响其他事物的理解、讨论和规限方式,这些关于任何认知和言说的系统,正是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构成(discursive formation)这概念所要探求的。

这里再次根据我在娃迪的田野考察,[可以看到]印度乡村话语构成的其中一个主要转移,涉及乡村经验中对时间这面向的经历和处理。时间是所有专业社群的核心资源,印度也不例外。时间是被体验为各种宇宙天地、生态、仪式和经济的规律节奏和周期的持续互动。而决定在何时进行农业活动,便反映出在各种周期之间非常复杂的争持和妥协。我曾在别处指出,在分配时间这种农业资源时,贫农处于一个十分特殊的不利位置^[6]。

但我想在这里提出一个比较概括的论点。虽然仪式和生态周期在过去曾决定生产、消费和再生产的节奏。以及界定知识和信仰的架构,从中确立和追寻生产目标(上文讨论过的所有19世纪的小册子都支持这看法)。但是,这种实践上跟认识论上的优先次序正在逆转。如上所述,时间本身越来越受到势不可挡的市场压力和商业化的逻辑所支配,即是说,农业生命的节奏越来越由劳动、金钱和商业农作物的需求高潮所决定。这不但影响那些根度投入农业商品市场的富农,同时亦影响那些在农业深化和商业化过程中,提供劳动和作为其顾客的贫农。正如我在前面提及,农学时间的逻辑开始订立一个有限的社会日历,订立生活节奏,以及令仪式和生态的周期更边缘化。

让我以一个民俗学的例子作出说明。马邦西部的主要商业农作物是甘蔗、洋葱和豌豆。总括来说,这些农作物已硬插入先前以种植高粱和黍(小米)为主的农耕周期,高粱和黍是在两个长季节

(雨季和冬季)种植,之间隔着一个低活动量的炎热季节。在这情况下,不但有更长的农闲季节,同时每一种农作物亦不会密集、精确和频繁的需索农民的时间。虽然黍种植区的维生农作物需要在特定时间内进行特定的耕作,但季节的长度和内部活动架构,仍使耕作时间有相当的弹性。可是当主要的现金农作物,尤其是洋葱、豌豆和甘蔗(在某程度上)到来以后,这弹性便消失了。商业农作物的种植周期横切入先存的日历周期,在此日历周期内,大部分农民都需求时间来种植维生农作物。商业农作物的种植周期亦延伸至炎热的、本来是农闲的季节。再者,蔬菜类的现金农作物通常需要更密集和小心编排时间,以应付繁重的除草、灌溉和施肥的工作。最后,他们之间的种植和收割周期,与它们和主要维生农作物间的周期,互相重叠,结果,对农民尤其是那些自力更生,依靠家庭劳动的农民来说,一年大部分的时间都要赶忙应付这些不同农作物的耕作周期。事实上,他们大部分都至少会留少许耕地,来种植一些现金农作物。

由于农作物的季候性(crop seasonalities)开始互相争夺和塞满农民的时间,其他周期性的活动便经常沦为附庸。结婚庆典再不是根据印度教的年历,安排在良辰吉日,而要让位于富农的农业日程。朝圣活动在以前是有很大的自由度来进行的,现在只有以更慎重的态度来安排;或是选择一路程较短的行程,或在外少留宿数天;又或留下劳动力的主要成员。主要的乡村节日和仪式似乎不再能够真正决定农村日历的节奏和结构,而是成为了急促流动的生产活动的隐定世界之中的孤岛。即使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妇女会发现,她们经常在赶往别人的田地工作之间,在取水或拾木柴途中,或在饲养山羊或绵羊这些家畜的时候,履行重要的仪式。简单来说,仪式和生态周期的传统互动节奏,现在已越来越被与农业商业化有关的劳动、能量、现金和市场需求渗入和框限,这似乎

不是像瓦迪农民谈论及他们的生活和在经历时间流动时,[所理解和感受的]一个临时性转移,从他们所说和所做的来判断,这看来是一个不能逆转的改变。

7. 总结

本文说了一个包含两个层面的故事;第一个层面所关注的,是在马拉赛(Marathi)的语境内,农学话语的展开;第二个层面则是比较近期、描述详细的故事,说的是瓦迪在农业灌溉技术上的转变。接下来要讨论的是这个故事的总的含义。回到本文在引言里提出的主要的道德问题:我们应该怎样评估这事例中技术转变的好处?

我提出了一个我的不言而喻的准则,就是任何人类社群的再生产的价值;我也提出了维持这价值的主要条件:核心价值的再生产。我的意思是,我们艰巨的任务,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把我们的观点和被研究者的洞见结合起来,再生产出社群本身所需要再生产的核心价值,不一定以不变的方式,而是以一个能够保存其特殊社群生活的方式来进行再生产。

我相信在瓦迪和一些像瓦迪那样的社群里,农业和社群生活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联系¹⁷。这些关联有着多重的形态,但它们主要体现为形形色色我称之为向心的(centripetal)社群形态。在仪式、农作、男的劳动队伍和女的劳动队伍、仪式化了的劳务交换关系,以及富农之间、富农和贫农之间、贫农之间的关系中,都有多种丰富的联系。这些联系不一定由持久、起多种作用的和建基于友好关系的种姓地位或亲属关系所决定。用外在的准则来说,部份这些关系(例如地主和佃户之间、欠债人和债主之间、富农和贫农之间的关系)看起来可能是剥削性的,但它们与其他交往互动模

式纵横相交,且是后者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以剥削这种语言来表述看来并不适用。总的来说,这些向心形式显示了社群的核心价值正是社群性(sociality)本身。就是说,虽然社群性的形态已随时间改变,但是从实际与农民的交谈的具体例子显示,普遍仍认为围绕向心拉力的社群生活方式仍是社群的核心价值。

正如我在本文所述,正是这核心价值受到商业化的威胁。在话语的层面上,我尝试概述农学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过程,或从广义上说是农业从农村关系中分离的过程。更具体地说,在新话语规范的中心概念中,农民是被视为技术成熟、寻求信贷,以及以市场为导向的人,而且其目标(从现时的商业性质来说)是求取最高的产量、利润和收入。虽然在马邦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合作运动,尤其是在甘蔗的种植业中,但这并不会扭转新商业化意识形态总的趋势,就是渴求创造一个脱离复杂的在地联系(local ties)的农民,这样的农民顺应主要是商业化了的离心拉力(centrifugal pulls),这种拉力使他们离开农村生活的社群要求。

瓦迪农民在实践和交谈的层面,复杂地反映了在形成农业话语的宏观层面上什么是真确的。正如我在另外一篇文章(Appadurai 1984)里指出,瓦迪的小农如果想在农业商业化过程中获得机会,他们便得被迫参与合伙和合股的安排,尽管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安排是可取的。他们所渴求的,是变成大农,这样他们就可以不用依赖复杂的合作安排,凭自己的实力进入商业化农业的领域。

在这里,区分作为一种价值的合作与作为一种策略的合作是很重要的。在传统的体制里,我所理解的社群性的主要价值体现为各种向心的社群形态,许多是涉及合作的。但随着上世纪商业化进程完成它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性的侵袭后,这种向心的社群形态受到腐蚀,合作已约化成为一种维持生计的策略。农民(尤其是

贫农)背离合作经营,反映出他们对合作减弱的极其矛盾的心态。当看到眼前的世界越来越缺乏他们赖以生存的保障,农民是愿意寻求这种伙伴关系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抗拒这种关系,因为这只是一种策略,而且有一定风险,又不再体现或意味着更广更深的社群联系。因此解决这矛盾的方法,不是简单制造某些机制以缓解微观动机与总体结果之间的冲突(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就是这种冲突的典型),而是在商业化不可抗拒的冲击下,建立其他制度上的可能性的,只有这样的可能性方能够将合作回复为一种价值而不仅是一种策略。

合作由价值约化为策略的这种观察,使我能阐明上世纪商业化和个人主义的关系,这种关系有三个特点:(一)虽然印度西部农民和市场的关系历史悠久,远早于上世纪之前便存在,但现在这种关系已在更多的农村出现,并成为这些农村的交易中的普遍要素,而且这些农村越来越多村民受其影响,所以与市场导向有关的个人主义正在激增;(二)对于一些农民来说,这意味着耕作开始有真正资本主义的性质:农业生产的目标就是储蓄、投资和利润;(三)所有农民,无论贫富,生产的社群关系越来越被视为是与其他个体之间的策略性互动(无论这是为了生存或利润),而并非社群性的价值的体现。在我看来,这个最后的转变是上世纪印度西部农村的个人主义极其重要的特征。到目前为止,虽然这主要见于生产的范围内,但恐怕很快会影响到消费的道德观。

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反对现时的情况呢?为什么不可把它视为坚持个人自主、以市场为导向、追求利润的农民,正在抓紧新的经济机会,重新组织其社群生活,这样一个美好新世界的出现呢?这里有三个答案:第一,正如我早已提示过,对于很多这样的农民来说,部分这些转变所带来的知识流逝(以及随之而来的社群联系的流失)所引起的是一种极坏的风险,因为他们可能被完

全踢出商业范围之外,被赶回仅可维持生计的领域之内,当中这些商业化知识并不那么适用。第二,这些转变涉及不断削弱作为经济领域的农村的相对自主性,从整体看,无论对国家,或者大部分乡民来说,这都并非绝对是一件好事。然而第三个原因才是最重要的。大部分小农梦寐以求在农业商品市场上分一杯羹(哪怕只是很小的一份),并不是因为人人都有天生的创业的冲动,而是像瓦迪这样的地方,现金前所未有地成了维持生计之钥匙。就是说,销售、生产、分工和货币化的大规模变革造成了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农民赖以生为的交易需要以金钱作媒介。正是由于对金钱的极度渴求,驱使小农就算要冒被打回原形的极大风险,也力求在农业商场上占一小席位。对于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踏足农业商场并不是通向累积资金、增加收入和跻身大农地位的道路,而是在极度货币化的世界上生存的先决条件。

在这语境下,农村生活的社群性和风险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远的转变。过去无论是那一类的伙伴关系(以及一般的社群性),都构成价值以及避免风险的保障;但在新的农业商业化环境下,伙伴关系(以及一般的社群性)被视为策略和负担,甚至是农业企业的风险来源。因此,很多贫农正陷于困境:他们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被迫参与农业商业化活动,不得不脱离旧有复杂的社群联系。然而,这压力给他们带来的,经常不是新的财富,而是在严重货币化的社会里朝不保夕的生活。从瓦迪的再生产的价值及价值的再生产的角度来看,正是商业化对技术的需求,(在意识形态和实际上)带来了这离心性的双重危机。

注 释

[1]我在本文所用的马邦文本,包括 Amruttungal 1852; Khare 1882; Apte

- 1890; Nijunge 1981, 都可以在印度官方图书馆(伦敦)找到。
- [2]我对过去一个世纪在南亚发生,有关农业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的认识,主要来自以下四个系列的论文集: Bayliss-Smith and Wanmali 1984; Chaudhari and Dewey 1979; Desai, Rudolph, and Rudra 1984; and D. Kumar 1983. 而有关马邦的农耕改革,我从以下的文本获益良多: Attwood 1984, 1980; Banaji 1977; Catanach 1970; Charlesworth 1985; Fukazawa 1983; Keatinge 1912, 1921; R. Kumar 1968; Mann 1917; Mann and Kanitkar 1921; McAlpin 1983; Perlin 1978.
- [3]对于印度西部农业技术的整体转变,需要作出前所未有的小心探究。这个转变无疑始于19世纪,但有证据显示,是到了本世纪初在农业企业和乡村商业利益的刺激下才起飞的(参看 Mann and Kanitka 1921)。但在新近增加的重型机械、作物新品种、肥料及灌溉技术等出现以前,最主要的技术转变极有可能是在原先纯木制农具中加入金属。至于水井,井壁从泥土转为砖石结构,很可能是在两次浪潮中出现的:第一次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是当时商业机会出现的反响。第二次发生在1880至1920年期间,是政府推行借贷计划的结果。
- [4]有关讨论见 Appadurai 1984:3-14。
- [5]此文将收入作者最近编纂的论文集。
- [6]南亚洲修读农业生活的学生一直没有注视这重要的题目,阿明(Amin 1982)对这题目的注视是一个重要的例外。
- [7]请参看 Schlesinger(1981:233-74)对这些关联的研究。

参 考 书 目

- Amin, 'Shahid' (1982) 'Small Peasant Commodity Production and Rural Indebtedness: The Culture of Sugarcane in Eastern U. P., c. 1800-1920', in Ranajit Guha (ed.), *Subaltern Studies*, 1;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mruttungal, Ramachandra (1852) *Jāgtijōt*, Poona: Board of Education.

- Apadurai, Arjun (1984) 'Wells in Western India: Irrig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an Agricultural Society', *Expedi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6/3: 3-14.
- (1989) 'Transformations in the Culture of Agriculture', in Carla Borden (ed.), *Contemporary Indian Traditions*,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 (forthcoming) 'Dietary Improvisation in an Agricultural Situation', in Anne Sharman *et al.* (eds.) *Diet and Domestic Life in Socie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Apte, Chintaman Moreswar (1890) *Uttama Shetkari*, Akols: Vidharba Press.
- Attwood, D. W. (1980) 'Irrigation and Imperialism: Water Distribution and the Origin of Enclave Capitalism in Rural Western India' (unpublished).
- (1984) 'Capital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arian Class Systems: Sugar Production in India', in Dessi, Meghnad, Rudolph, S. H., and Rudra, A., (eds.) *Agrarian Power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South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anaji, J. (1977) 'Small Peasantry and Capitalist Domination: Deccan District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7/33-4: 1275-404.
- Bayliss-Smith, T., and Wanmali, S., eds. (1984) *Understanding Green Revolutions: Agrarian Change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South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tanach, I. J. (1970) *Rural Credit in Western India, 1875 - 193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arlesworth, N. (1985) *Peasants and Imperial Rule: Agriculture and Agrarian Society in the Bombay Presidency, 1850 - 193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audhari, K. N., and Dewey, C., eds. (1979) *Economy and Society: Essays in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 Press.
- Durkheim, E. (1960)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trans. G. Simpson, Glencoe, Ill.: Free Press (French original 1893).
- Fukuzawa, H. (1983) 'Agrarian Relations: Western India', in Kumar (ed.)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y, David, ed. (1986) *Foucault: A Critical Read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Kcatinge, G. (1912) *Rural Economy in the Bombay Deccan*, London: Longmans Green.
- (1921) *Agricultural Progress in Western India*, London: Longmans Green.
- Khare, Kasinath Trimbak (1892) *Hindustānātāl Shetkaryanchi Sthithi va Shētkichitūchi Kāmēn*, Gyanprakash Press.
- Kumar, R. (1968) *Western Ind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Study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maharashtra*,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McAlpin, M. (1983) *Subject to Famine: Food Crises and Economic Change in Western India, 1860 - 192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ann, H. H. (1917) *Economic Progress of the Land and Labour in a Deccan Village, No. 1*, London and Bombay: Humphrey Mil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d Kanitkar, N. V. (1921) *Land and Labour in a Deccan Village, No. 2*, London and Bombay: Humphrey Mil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ipunge, H. L., ed. (1981) *Krishival Dāyiri 1981*, Poona: Pusphak Prakashan.
- Perlin, F. (1978) 'Of White Whale and Countryme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aratha Decan: Extended Class Relations, Rights and the Problem of Rural Autonomy under the Old Regim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Jan.), 5/2: 172 - 237.

- Saumarez Smith ,Richard (1985) 'Rule-by -records and Rule-by-reports: Complementary Aspects of the British Imperial Rule of Law ',
Contributions to Indian Sociology ,NS 19 1:153 - 76 .
- Schlesinger, Lee(1981) 'Agri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Maharashtra, India',
in George Dalton (ed.) *Research in Economic Anthropology* , Vol. iv,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 Wallace, Anthony (1970)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 2nd edn. , New York:
Random House.

8. 农民、种籽商和科学家：农业体系与知识体系

◆ 马格林(Stephen A. Marglin) 著^[1]

◇ 卜永坚 译 潘永忠 校

一、高科技农业

1. 科学得到胜利？还是正在形成灾难？

本章从知识的角度来考察农业。高科技农业是科学的胜利？还是正在形成的灾难？还是两者兼有？克服高科技农业缺点的答案，是更多的科学吗？还是将传统农业的优点结合到农业科学的知识体系之中？而这又是否可行？

为了处理这些问题，本文将重述一遍高科技农业及其扩散全球的故事。人们对这故事的梗概是够熟悉的了。高科技农业始于本世纪头 30 年间美国对杂交玉米的研究；在 30 年代，高科技农业开始商业化；在 40 和 50 年代间，杂交农作物已几乎完全取代传统

* 本文原题为“Farmers, Seedsmen, and Scientists: Systems of Agriculture and systems of knowledge”, in *Decolonizing Knowledge—From Development to Dialogue*, pp. 185 - 247,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农作物。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改造农作物种籽的这种思想,于40年代早期从美国的“玉米地带”传到墨西哥。50年代在墨西哥发展出来的各种杂交小麦,成为绿色革命最大生产成就的基础。不仅在墨西哥如此,在印度的旁遮普邦与巴基斯坦也如此。同时,由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1960年联手在菲律宾成立的国际稻米研究所,也开始研究改造稻米种籽,就好像诺贝尔奖得主波洛格(Norman Borlaug)及其同事曾在墨西哥研究改造小麦种籽一样。两者的共同思路,是研制合成新品种,它们在合适的条件下,能够对大量化肥产生良好反应,产量大大高于农民那些经过千百年实践而培植出来的“上生土长的品种”。

当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杂交玉米已很明显地取得成功,但这成功只是个开始。杂交玉米的原则一旦被掌握后,人们便会操纵玉米,使其服务于其他目的。早在1925年,华莱士(Henry A. Wallace)在其杂志《华莱士农书》(Wallace's Farmer)就提出,近亲繁殖的杂交农作物(in-breds),由于其形状整齐,更适合机械收割(Crabb 1947: 172)。杂交农作物形状整齐这个特点,成为长期指导育种专家(plant breeders)研究的原则之一。但是,因二战期间弹药生产扩张而附带出现的氮肥工业,方使杂交农作物的潜力得到最戏剧性的发挥。传统农作物^[2]对于氮肥的反应是有限度的,若氮肥施用过量,这些农作物就会变得体型过大,令其枝茎不胜负荷而倒下(术语称为“倒伏”‘Podge’),增加了收割的困难,也使农作物易受风雨的损害。但是,通过对农作物择优育种,可以增强根部,并降低茎的高度,因此显著提高它们对于氮肥的承受限度,也增加了农作物种植的密度。一代接一代的杂交农作物,其种植密度越来越高,所施用的化肥也越来越多,而产量仍然继续攀升(Duvick 1984)。

美国的高科技农业演变成绿色革命,对于农作物择优育种这

—原则也成为绿色革命的原则。改造小麦和改造稻米这两项计划的关键策略,是合成新的农作物枝茎,使农作物能够吸收大量氮肥而不倒伏。在1960年和1975年间,第三世界的化肥使用量年增长率达到12.4%;在接着的十年内,年增长率达7.1%,就是这一努力的证明(Alexandratos 1988:表4.6)。首先在墨西哥,其次在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部的小麦产量的增长,以及在印尼的稻米产量的增长,就是这策略在合适条件下取得成功的证明。

粮食生产无疑是大幅增加了,但却是有代价的。第一,农作物品种数目显著减少了,因为少数杂交农作物品种取代了大量基因成分迥异的传统农作物品种。第二,这些新品种需要大量水分、化肥和农药。第三,从农场以外购入的物料,它们所起的作用加重,因此导致农村经济关系产生变化。农作物品种数目减少,引起农作物抗灾能力减弱的问题;大量使用水分、化肥和农药,引起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耗尽的问题;农村经济关系的演变,引起政治不稳的问题。这三堆问题都可归纳到一个大问题之下: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

“可持续性”是个比较新的字眼,但问题本身却不新鲜。卡尔森的著作《寂静的春天》(Carson 1962)引起公众对于农药破坏环境的关注,堪称转折点。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Meadows et al. 1973)引发公众对于资源耗尽的恐惧,这本书的出版正巧碰上第一次石油危机,因此,对于人们怎样看待利用矿物燃料支撑农业,即以矿物燃料发动农业机械设备和生产化肥和农药,产生了重大的冲击。由于杂交玉米品种基因结构相似,玉米枯萎病几乎成为灾难(详见下文),高科技农业减少农作物品种数目这个问题因此也引起高度关注(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 1972)。最后,对于把农业生计(agriculture)转变为农业生意(agribusiness),贝里(Berry 1977)质疑其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后果。贝里认为,高

科技农业切断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危害了社会的基本结构,故无论效率提高了多少,都不能弥补这个损失。

格里芬(Griffin 1974)、德·阿尔坎塔拉(Hewitt de Alcantara 1976)、皮尔斯(Pearse 1980)等论者,都批评高科技农业的第三世界版本,即所谓绿色革命。他们的主要理由是:由于第三世界的农村土地分配及信贷供应都不平均,农业发展的好处大都归于富人,而如果绿色革命的发明是以机械化为主,则穷人,尤其是那些没有土地靠出卖劳力维生的人,境况将绝对恶化。

在80年代,批评高科技农业的人改变了批评重点。他们不再质疑绿色革命的发明对农村一些阶层有利而对另一些阶层有害,而是质疑农业科学本身是否中立。奥萨和詹宁斯(Oasa & Jennings 1982, Jennings 1988)、小克洛本伯格(Kloppenburger Jr.)、安德森、列维和莫里森(Anderson, Levy, & Morrison 1991)等论者发挥了这个观点。他们认为,无论个别科学家意识到与否,科学的应用,都是受到政治和经济因素左右的;而且在推行绿色革命时起着重作用的私人基金会,有其制度性的偏颇,而这种偏颇,就是由这些私人基金会所属的社群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造成的。

本文由两部分组成,会广泛地引用上述各种批评(尤其是在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综合了安德森等人、小克洛本伯格、和奥萨与詹宁斯等论者提出的各种看法,尝试衡量高科技农业的好处和坏处。本文新颖之处是强调农业的知识体系基础,特别强调在不同的农业体系中农业专家的学识(*episteme*)与农民的技艺(*techne*)^[3]的互动。

2.“我们为你们买来了时间”

要评定高科技农业的功过是困难的。支持者声称,高科技农

业防止了马尔萨斯人口论噩梦的实现。例如,印度、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的人口,在过去40年内增加了一倍以上,尽管营养不良甚至饥饿的情况持续,但两倍于40年前的人,吃得至少不比40年前差,也许比他们的祖父母的时代,即印度独立与巴基斯坦分裂的时代,吃得还要好。

同样的情况也在中国、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出现,只有非洲是个显著的例外。但非洲的问题究竟是缺乏绿色革命还是绿色革命不恰当,至今仍无定论。所谓缺乏绿色革命,指迄今尚未能发明出适合热带半干燥和干燥地区的高科技农业。关于绿色革命不恰当的观点,请参考多门的论著(Dommen 1988)。

支持者最具说服力的观点是:高科技农业是权宜之计,是因第三世界每个角落人口剧增而必须采取的紧急措施。波洛格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墨西哥进行高科技农业改革的代表,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写信回应一位批评者时,就明确提出这个观点。这封信被引用于一篇支持他的文章。当环保人士批评绿色革命的声音越来越大时,这篇刊在《大西洋月刊》的文章(Bourjaily 1973: 75)回应道:

你们弄错目标了:真正的问题是人口增长。为什么却要批评绿色革命呢?……我知道不可能马上制止人口爆炸……必须依靠教育……那怎么办呢?难道全世界人饿死而我们袖手旁观吗?我可不能袖手旁观!……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会和平地等候饿死吗?稍为懂得一点动物行为的生物学家都不会那么天真。

我一辈子的工作都致力于增加全球粮食产量……并通过这个过程买来了时间——也许是二三十年——有了这段时间,就能使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变得更加有效和积极。

自上帝创世那天积聚至今的社会问题,难道都要由绿色革命来纠正,并且在连上帝都要休息的创世第七天连人口问题也予以解决吗?受过教育的人可以是多么愚蠢啊!在人口过多、理论过头、电脑化过度的所谓美国知识阶层里,常识这个不可或缺的罕有的特质到哪里去了?

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内,粮食生产可能不再是首要的问题,我们已经为你们买来了时间,好好地利用这段光阴吧……宣传控制人口的需要吧。

我肯定,我的同事都和我一样,觉得对我们最不公正的批评,就是……说我们制造的问题比我们解决的问题多、也许是的,但我们也为绝望的境地带来了希望。

注意,这个观点并不需要把农业产量的增加全归功于高科技农业。即使没有高科技农业,人口增长也会使产量增加:每多一张嘴,也就多了一双手,因此没有新种籽、不增加化肥,等等,产量也仍会增加。

对此,马尔萨斯本人也会基本上同意。但马尔萨斯的论点并非认为农业生产停滞,而是认为农业生产无法追上人口增长。随着每一张嘴而多出来的每一双手,都逃不出马尔萨斯预示的悲观结局,因为虽然多了一双手,但是农具、农地以及水源的分配却没有按比例增加。

“买来时间”论的更严重漏洞,是认为人口增长全属外在因素决定。但我并不是要强调受高科技农业本身影响而使人口增长的一些内在因素,例如,由于粮食增加,婴儿夭折率几乎一定会下降。这些次要的内在因素和主要的外在因素是同步前进的,这些外在因素包括清洁的食水、种牛痘等,世界上的波洛格之流认为他们就是来应付这些问题的。

但是,在另一个更基本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口增长是受内在因素决定的。人口爆炸有可能是现代化发展过程本身触发的。任何地区的现代化都意味着地方原有制度的完全破坏,如果传统的人口控制模式能够躲过现代化的无坚不摧的破坏力量,才是怪事。^[4]但这破坏对于人口增长的影响,我们却知之甚少。它的影响也许和生活物质水平提高对于人口增长的影响同样大。假如人口增长是传统人口控制方法遭到瓦解的结果,而这瓦解又是基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所导致,则“高科技农业是权宜之计”论就明显要大打折扣了。

过去的20年[的发展]对于波洛格的“买来时间”论是很仁慈的。第三世界部分地区的人口增长率显著下降,这些地区的农业也因绿色革命而增长强劲。亚洲和拉丁美洲在1965至1990年这四分一世纪期间,总体生育率(每名妇女诞下子女的平均数目)显著下降,而在1965至1980年间,这两地区的农业增长率也比较高。

相反,在同期,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Sub-Saharan Africa)农业生产增长较亚洲和拉丁美洲缓慢,总体生育率的下降比这两地区较缓慢。只有中东和北非是个例外,这里的农业产量剧增,但生育率的下降却很缓慢(World Bank 1992,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21, 271, 表2和27)。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尝试超越对于人口爆炸的传统解释。人们往往提出公共卫生的改善、医疗的改善等因素,来解释本世纪头三分二时段内人口增长速度的加剧。撇开这些因素,人口爆炸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算是现代化本身的结果呢?这才真值得我们探究。

传统社区结构遭破坏,因而造成人口爆炸,其责任也许大于一般人所愿承认的。而绿色革命至少可说是破坏传统社区的帮凶。

其实,许多人口学家认为,非现代社会都能把生育率和死亡率控制在远远低于自然极限的水平(但考德威尔等已反驳过这看法[Caldwell et al. 1987])。以现代化之前的欧洲为例,论者已指出迟婚和独身等是社会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它们也就是马尔萨斯所说的“预防措施”。假如现代化之前的欧洲真的利用种种社会规范来节制人口增长,则这些传统规范在现代化的压力下如何演变,就成了一个有意义的问题。诚如马尔萨斯本人所说(Malthus 1976:34-5),在过去,控制结婚年龄的主要手段是传统对财产的要求:结婚双方必须具备足够的财产,使他们婚后以及后代的生活能够符合他们所属阶层和社会地位的认可水平,否则这段婚姻便为人所不齿。那么,我们应该问:当代人口的急剧增长,究竟是因为这传统规范之故(意即随着社会不断繁荣,新人储蓄财产较易,令其婚姻得到尊重,因此婚姻率提高)?还是因为现代化无坚不摧的力量破坏传统规范之故?

假如答案是传统规范受到破坏之故,则我们看到第三世界相类似的演变时,就不会感到奇怪了。但无论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人口增长是上述两种原因中孰者所致,对于当今人口增长充其量也只能是种猜度。而我们对于当今非西方社会节制人口增长的措施所知甚少,颇令人惊讶。举例而言,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产后禁欲这一传统的习俗,究竟是节制人口增长的手段?还是由此令儿童生存率提高,所以是增加出生率的手段?至今还搞不清楚(Caldwell et al. 1987:31)。

虽然传统规范及其破坏对于人口增长的影响这问题,迄今仍无定论,但我们都同意人口爆炸是真正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我们大概应该感谢绿色革命对于抵抗这威胁所作的贡献。但就波洛格对于绿色革命的辩护,我们可以提出两点批评,指出其不成熟之处。首先,波洛格认为人口增长造成生态灾难的看法,至少还是有

争论的。就耗用资源和制造污染而言,例如就消耗石油之类无法再生产的资源以及处置废物而言,富裕工业化国家的第一世界以及无效率得可怕的苏维埃帝国第二世界所占的分量,比第三世界所占的分量要多好多倍。而在第一和第二世界,人口增长既稳定又缓慢,人口数目也远比第三世界少。

其次,除非绿色革命是可持续的,否则这20年只是借来而非买来的,这正是波洛格和其批评者争论的焦点。如果农业产量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则根据波洛格本人的逻辑,马尔萨斯的悲观结局也只是延后而非得到征服。绿色革命的成果若只是暂时的,则马尔萨斯仍将发出最后的胜利笑声。

3. 付出了什么代价?

高科技农业得到高度称赞的第二个功绩,就是将数目庞大的农民释放出来,让他们进入工业领域工作:“每个美国农民供养56个美国人。”

这观点引发了许多问题。首先,它预设了贝里马上对美国农业部长巴茨(Butz)的质疑的答案:释放农民出来是为了什么?为了工业生产——仅向工人提供一张周末工资支票,换取沉闷、愚蠢,以及最糟糕的是无意义的工作(Marglin 1990)?

矛盾的是,70年代仍留在农场的4%美国农民(目前这比例已降至2%以下),在农业转向工业化的过程中,比那些因工业化而变成冗员的农民生活得更好。高科技农业的推广,不仅需要新式耕种,也需要新式农民。的确,使农业技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条件之一,就是使农民的心理状态也工业化和现代化。

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本身也是建基于政治和心理转变的基础之上的。塑造农业社会以及代表农业社会存在的政治组织假如不被摧毁,则工业化和现代化是无法推行的。事

实上,自19世纪末期开始,民粹政治运动不时如燎原之火,席卷美国,而工业化和现代化就被视为针对民粹运动的纠正措施(Kimmelman 1987:23)。

斗争主要集中于农村的学校和教堂。改革者大多数来自都市,他们认为这些组织无效率以及落后,不适应20世纪美国农民全体参与的需要(Bowers 1974, Danbom 1979)。最后,改革者赢了,区域性学校和市镇教堂取代了单一教室学校和教堂这些一直凝聚认同、久经考验、表达意见的本地社区组织。打破这些社区纽带,对于改变农民的身份认同,使其接受新的农业技术,有显著的贡献。由于没有了为社区赋予意义的组织,农耕渐渐变成了谋生方式,而非生活方式;农民也就成为了农业商人。

这说得太简单了。说得准确一点,我们应该区分两类农民:第一类是受过教育的、有技术的、有财有势的、进取的“醒目仔”,第二类是普普通通的“泥腿子”。产生出高科技农业的政治、技术和经济革命,对于这两类农民有着非常不同的影响。这场革命使第一类农民富裕以及强壮起来,却将第二类农民淘汰出局。第一类农民拥有信贷渠道、拥有资本、或具备推行现代技术的能力与知识、或具备在市场上运用这些技术的资源,因此与政府、工业界、和金融界的官僚和技术官僚平起平坐,这些农业商人们成了炙手可热的新贵。正如一个拥有及经营价值百万元“家庭农场”的家族的成员告诉我,这种新的分工和专业化解放了他的兄弟,使他们能做他们最擅长的工作:管理。

同时,第二类农民却大体上从美国的舞台上消失。就是这一群人,他们抛弃了锄犁,换得工厂的生产线;离开了乡村,移到城市。一旦农耕不再是生活方式,他们的离开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要么他们仍留在农村,将自身改造为农业商人。无论如何,泥腿子们是步向消亡的,也没有多少人觉得可惜。

常言道：历史重复着自己。当然，20世纪美国农业的转变，与近代早期历史上英国农业的转变、即所谓“圈地运动”，二者相似之处又何止于表面！“圈地”这名字把形式误当成实质，因为用一排灌木或其他物质标记来圈地，只是一出戏剧的最后一幕。圈地运动的实质，是发明、建构和强制执行强势者的现代拥有权，借此来消灭传统土地拥有权的复杂格局。传统的土地拥有权，是社区的每一分子都有份的，各种要求(claims)、责任、和权利(rights)共同存在又互相重复。随着土地拥有权的传统格局被消灭，“誊本保有权者”(copyholders)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也就被摧毁了(所谓“誊本保有权者”，是指那些靠庄园法庭的法律卷轴的副本来证明其土地权的人)。在当时的英语用法中，“圈地”(enclosing)与“侵占”(engrossing)同义，大体相当于垄断。实际上，在当时批评者的眼中，侵占才是首恶，因为这是强权和侵略的表现，而圈地不过是为这盖上一物质印记而已。在这齣戏剧的末尾，英国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小地主成了现代的自由民和丧失土地的劳动者。但小地主中有少部分留在农村，成了大地主；而自由民和丧失土地的劳动者，因为与土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纽带被切断，其生存意义也受侵蚀，因而成了第一代“农村无产阶级”，全因主人勉强同意，才能留在农村里。他们从那里转化成英国工业化劳动力的“失业后备军”，所需要的社会步伐只是很小的一步，无论这一步在地理上可以是多远(Lazonick 1974)。

克拉布(A. Richard Crabb)是杂交玉米历史的专家，也是杂交玉米的发明者、改良者和推广者。他认为杂交玉米之功，在于促进改变美国农民，使他们被动地依赖农工企业集团(Crabb 1947: 286)：

杂交玉米有助于使农民形成接受新事物的性格。当他们

的镇代表、国家农业实验站、种籽商或任何取得他们信任的其他组织,提出一新产品,例如新的杂交燕麦、新筛选的小麦或新的杂交鸡或杂交猪时,农民马上接受,随时愿意对这些新产品进行彻底的实验。

贝利(Liberty Hyde Bailey)是农作物育种专家、农业科学的鼓吹者,本世纪初康奈尔大学农业科学院的院长,美国总统罗斯福临下台前指派他为农村生活委员会主席。他不但预示了专家对于农村生活每个层面的入侵,也活着见证了克拉布所写的转变。农民与土地的联系,是一张多面的网络,相互依赖性⁽⁵⁾是非常重要的。尽管贝利对此很敏感,但他不认为专家会破坏这种联系。农村生活委员会递交报告后不久,贝利就兴致勃勃地描述专家王国的到来:“我们会在郊野中安排植物病专家、育种专家、土壤专家、健康专家、剪枝和农药喷洒专家、……家务专家……以便应付提供特别建议和指导的需要。”(Bailey 1911:203, 转引自 Kimmelman 1987:360)

贝利虽重视农耕生活的精神和宗教层面(Bailey 1919:24, 32-3),但显然认为土地可以同时容纳上帝的仆人和财神的仆人。贝利论及农业不可持续,以及需要以道德理想填补这缺失时说:

一套令人满意的农耕方式,应可世世代代延续下去,不造成损失、不因化肥而践踏了土地,从而补充我们的欠缺。这种耕作方式,也许我们尚未发展出来。更重要的是,这问题应该被提升到政策和道德的领域中去。(Bailey 1919:26-7)

但贝利的答案并非是耕农的共和国,在他有关调控“神圣土地”(这是他1919年一篇短论的题目,第53—44页)的计划中,他

小心翼翼地为农业企业留下一个席位：

但是，我们不应把社会想像为完全建基于细小而分散的块块，或者说建基于“家庭农场”，生活在其中的人，仅足糊口。因为这意味着所有农民其实都是劳动者。我们需要很多留在农地上的人，拥有庞大组织能力，他们是管理人，敢于处理事务。假如这样的人才无法在农业中找到机会而被迫转向其他职业，就会产生极负面的社会和精神影响。

很明显，贝利希望农村由管理层精英来领导，使农村社区仍然不失为社区。讽刺得很，在由高科技农业产生的转变中，惟一留下来的就是白理心目中的领导人，被领导的都不见了，至多只能在农村中靠非农业工作而生存。

当然，管理层精英也是要有所依赖的，这种依赖是鼓吹杰弗逊式自立自足的人所完全不能接受的。但这种依赖并不会腐蚀管理层精英的精神。为价值百万元的农场工作的管理人，可以依靠银行家提供信贷，依靠厂商供应化肥、农药、拖拉机及其他设备，依靠政府顾问提供建议，不但包括有关农耕的建议，也包括遵守复杂的政府规条的建议。这种依赖，是至少可以和追求平等的愿望共存的。首先，这是一种互相的依赖：农业商人对于银行家、厂商和政府的依赖，是作为生产者在复杂的社会分工中的依赖。说这种依赖类似于屠夫、面包商和蜡烛制造商之间的互相依赖，是不会错到哪里去的。

其次，在这种依赖中，农业商人对于产品仍有一定的控制，对于生产过程仍有较大的控制。他们是名副其实自己的主人翁，自己指挥自己每天的工作。他们不一定真的可以和银行家或官僚平起平坐，但他们也不是屈服于银行家或官僚的支配。

农业商人的这种依赖,与在生产线工作的工人、处理文件的职员和雇工的依赖,真可说天壤之别。这后一种的依赖,是以从属和等级为标志的。正如我曾说过(Marglin 1974, 1979, 1984, 1990),工业生产的结构本身恰恰就反映了雇主的目標:把工人对于生产过程和产品的控制权收归雇主手上,最好还让工人依赖和从属于工作制度,工人在这制度里工作,除了换取工资支票这工具性质的意义外,再不能得到任何意义,而这制度也不容许工人通过工作来创造自己的意义。就此而言,雇主是资本家还是党委书记,并不重要。

与绿色革命一样,高科技农业也从美国传播到其他地方,但高科技农业对于农民的影响却很不一样。墨西哥农业计划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第一个输出海外的高科技农业项目,这计划是受美国杂交玉米革命的启发而推出的,但成效远低于预期。大部分墨西哥农民种植玉米时,依靠的是雨水而非灌溉,对于各类土生土长的玉米种籽以及从外界引入的事物,他们也进行了自己的实验(Wellhausen 1978:80-1)。而在墨西哥的自然条件下,杂交玉米的产量并不显著高于墨西哥农民的传统玉米。于是,墨西哥农业计划很快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小麦。在墨西哥,小麦大部分是依靠灌溉的。

但是,过分强调这个转变的技术因素是错误的,杂交玉米之所以腾飞于美国,就是在罕见的1934年大旱中,杂交玉米的抗旱能力证明强于传统玉米。在墨西哥,小麦较易受到操纵,原因也并不止于技术层面,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种植小麦的是农业商人,他们对于农业的态度完全是工具性质的。本地农民社区的韧性,阻碍了玉米生产的改进,尤其是当农业商人想加强农民对于外来者的依赖时。

可以破坏的农民社区都破坏了,人们对此可说心安理得。他

们认为这些社区是落后、迷信、无知和懒惰的遗迹。1940年12月,卡马乔(Avila Camacho)接替墨西哥民粹主义者卡德纳斯(Lazaro Cardenas)继任总统,美国农业部长兼候任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Wallace)参加了就职典礼。他发现,不但以新总统为代表的右翼势力认为墨西哥的前途在于工业化,左翼势力也持相同看法。^[6]无论左右翼对于策略有多大的分歧,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而他们也私底下同意农业要在这个过程中扮演工具性质的角色。就此而言,自1940年至今,并无多大改变。

高科技农业在美国国内外的表现有一重大分别,这就是变化的速度。在美国,农业理性化在两代人的时间内,就使80%的农民不再务农,农业人口由3000万降至不足500万。相反,绿色革命虽使农业人口的比例下降,却使其绝对数目上升。以印度为例,与独立时比较,目前务农人口增加了约50%。

在美国,农业竞争压力确使适者生存。在竞争中留下来的农民,仍可以在重大问题上自己作主,仍可以控制自然和人力资源,因此他们和农业改革者的交往,大致上是平等的。美国农民仍可能在工作、土地和其他事物里找到意义,他们仍保有有尊严的位置,他们仍是有尊严的人。

在第三世界,竞争淘汰的过程并不那么严厉,而农业理性化就把农民从一个人降格为致富过程的一个部分。农民成了信贷、高科技投入的供应和政府专家意见的附庸,一言蔽之,农民成了农工业机器的一颗螺丝钉。由于农民依赖和从属于银行家和官僚,他对于土地、小气候和他的世界里的其他细节的知识,都在高科技农业内部具备的标准化的要求下,变得不合用或不相干了。农民也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和马克思在《资本论》所说的那样,越来越像工厂工人了。亚当·斯密如是说(1776:734):

分工进步,依劳动为生者的大部分职业,也就是大多数人民的职业,就局限于极少数极单纯的操作,往往单纯到只有一两种操作。可是人类大部分智力的养成,必由于其日常职业。一个人如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而且这些操作所产生的影响,又是相同的或极其相同的,那么,他就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或运用他的发明才能来寻找解除困难的方法,因为他永远不会碰到困难。这一来,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⁷⁾

马克思如是说(1867:i,645):

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变成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女儿都抛到资本的轧格纳特车轮下。……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⁸⁾

同理,无论高科技农业为第三世界农民增加了多少经济收益,他们还是陷入悲惨处境。在美国,农业迈向工业化的这种转变,使农业生产转变成农业生意,使仍留在农村的农民转变成农业商人;而在第三世界,这种转变则将农民转变成农业无产阶级,正如16世纪英国的现代化把普本保有权者转变成丧失土地的劳动者一

样。如果以控制/独立性为衡量标准,那么这看法可说虽不中亦不远。

4. 高科技农业不可持续论可持续吗?

我上述对于高科技农业的批评,有别于更常见的“不可持续”论的取向。批评高科技农业不可持续的论点很多:高科技农业依赖无法再生的资源(尤其是能源),因此不可持续;高科技农业污染环境,因此不可持续;高科技农业缩窄了农作物的基因面,因此不可持续;高科技农业使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危害农村社会的稳定,因此不可持续;等等。我是刻意避免强调这些论点的。高科技农业对于环境的污染,无论从道德上和美学上来说多么可悲,我却不太相信会不可收拾;有关高科技农业耗尽资源的论点,我认为至少有点夸大了;缩小农作物品种数目到底有何影响,我们其实知道得很少;至于说高科技农业的效益分配,偏袒富人,证据也并不强。

我认为,高科技农业耗用的能源,是微不足道而非多不胜数的。让我们看看数字。在80年代末期,以氮、磷(P_2O_5)、钾(K_2O)为代表的全球化肥每年使用量达到高峰,接近1.5亿吨(Worldwatch Institute 1994: Fertiliz. WK1),其中半数用于第三世界。生产1.5亿吨化肥,需要6 000PJ(1PJ=10焦耳)的能源,相当于10亿桶石油。这似乎是个大数目,但就像所有数字那样,即使10亿也是相对的。例如,相对于美国的一年能源消耗量,10亿桶石油其实只是8%,是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也就是说,全球一年用于生产化肥的能源,只相当于美国一个月所耗的能源。

从另一角度考察农业所用能源,我们不妨比较农作物种植以及农作物加工这两个程序中的能源耗用量。数字惊人得很:70年代中期(这是我仅有的数字),美国家庭里煮食所耗用的能源,竟多于美国农庄种植农作物所耗用的能源,前者为3 000PJ,后者为

2 200F]。总体而言,土地上的能源消耗,直接的也好(例如拖拉机所用的燃料),间接的也好(如生产化肥和农药的能源),加起来不超过农作物种植、加工和煮食所用的能源总量的 20%,也只相当于美国耗用能源总量的 3%(Lovins et al. 1984:table 2)。不少人相信矿物燃料有耗尽的一天,我也相信这是个真正的危机,但我们如何种植农作物,对于拖延这一天的到来并无太大意义,相反,我们的生活方式,例如我们占用的空间、消耗的热量、驾驶汽车习惯等等,才更有影响。无论农业生产方式如何改变,都不会显著影响能源的情况。

也有人从水源问题来批评高科技农业,我觉得这个论点比上述有关高科技农业耗用能源的论点更具说服力。论者指出,高科技农业的农作物,只有在理想条件下才表现良好,例如必须有充足的水源、化肥和农药等。高科技农业输出海外时,对这些条件的依赖就更加强烈。这些条件很多时是互相补足的,但水源则是绿色革命不可或缺的条件。80 年代初期,全球半数以上的小麦和食米是依靠灌溉而生长的,以灌溉方式生产这些主粮和其他农作物的比例,估计在不久的将来还会上升(Alexandratos 1988:fig. 4.5)。

高科技农业耗水的问题是很复杂的。不储存水源,仅将河流分流来灌溉农作物,这种方法的潜力早已被挖尽了。而池而水能够被储存起来的,早已被储存起来了。因此,全球地面水的增量成本(incremental cost)都急剧上升(Posiel 1989:9-10)。同时,大型水坝和水库的兴建,也令工程所在地的人民的反对行动越来越剧烈,因为这些工程将使当地人民流离失所。地面水被耗用的速度,远高于其自然补充的速度,其中部分,即所谓“矿物”储水层,则完全得不到补充(NRC 1989: tables 2-9, Postel 1989: table 3)。我们并不缺水,但水的成本确是在暴增。如果水的供应得不到保证,而高科技农业对水源的依靠还像过去半个世纪那样强烈,那

么,高科技农业就不是一个经济的方案,至少在温带以外不可行。

且不论高科技农业的资源基础是否足够,人们严厉批评高科技农业,是因为它破坏环境。水源的品质就是个大问题,地面和地下水都被残余的化肥和农药污染,这也许是最令人担忧的情况(NRC 1989: 98-108)。但是,因水土流失,甚至因正常农田灌溉而流入河流或其他水道的沉淀物以及盐分,也不容轻视(NRC 1989, Postel 1989: 15ff.)。

在碱性的沙漠土地上进行灌溉,也造成问题。波斯特尔(Postel 1989: 表 2)估计,在全球农田灌溉面积最大的五个国家中,平均四分之一农田因盐碱化而遭破坏,其中,印度为 36%、中国为 15%、美国为 27%、巴基斯坦为 20%、前苏联为 12%。在印度,除有 2 000 万公顷农田因盐碱化而遭破坏之外,还有 700 万公顷农田因盐碱化而被丢荒(Postel 1989: 16)。

人们也指责高科技农业令水土流失恶化,并用更大量的化肥来掩饰其对于农田生产力的破坏。使用动物粪便、推行轮耕、以及其他改善土壤的措施,在高科技农业里竟完全不见了。就连高科技农业的推行者们有时也对此表示关注。杂交玉米的杰出研究者菲斯特(Lester Pfister)曾说(转引自 Crabb 1947:243):

使我最担心的,是我们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土壤。杂交玉米可以说是人类迄今发明的最厉害的采矿机器。它能迅速提取土壤的养分,提高粮食产量,这在二次大战期间不啻是天赐妙方。现在大战已结束了,我们是否需要制订适当的计划,来维持和改善我们的土地条件呢?

你们知道,我爷爷哈斯(Haas)来到此地,用四头公牛和一张犁开垦了 80 公顷处女地。如果他有拖拉机和农业机械设备和杂交玉米,他可以将每公顷的玉米产量提高到 120 担。

今天(40年代中期),玉米的每公顷产量平均约为60担,60年之后,每公顷产量又会增加多少?我们的最大问题是维持土地的肥力。不仅玉米地带的未来,就是美国的未来,也都取决于我们如何处理这问题。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再好的土地,也是可以坏掉的。

环保人士对于高科技农业的最严厉批评,是说它助长了全球温度上升和温室效应。这批评也许是个虚构的罪名,和有关高科技农业耗用能源的批评,可说是一个铜钱的两面,因此也同样欠缺说服力。我不是要求大家就高科技农业是否导致全球温度上升这问题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场,而是要提醒大家,既然高科技农业在能耗消耗中所占的份额并不大,因此在任何与能源有关的问题上,高科技农业的角色也不会大到哪里去。

高科技农业的农作物基因抗灾力弱这一点,更加值得商榷。^[9]1970年,这问题曾在美国造成千钧一发的危机。那年,美国玉米遭到非常严重的枯萎病的侵袭。人们追查病因时发现,八至九成的患病玉米中,都有一种共同的基因特征,这是科学家为方便进行植物杂交而培植进去的,使它们具有独特的细胞质雄性不育T型特征(cytoplasmic male sterility [cmsT])(Steele 1978:37-8)。最近,我们又发现,在印尼也差点出现一场灾难,不过较少为人知而已。1986年,由于灌溉和施用农药过度,加上新稻米基因而狭窄;又由于全年灌溉,使休耕季节取消了,因此蝗虫的生命周期没有受到打断;而农药对于蝗虫天敌和寄生虫的危害,大于对蝗虫本身的危害(Sterba 1990: A10),结果发生了一场近乎毁灭性的蝗灾。

最后还不得不提有关高科技农业经济效益分配不公的批评,否则对于批评高科技农业的综述,就不完整。这方面的文献可说汗牛充栋。支持高科技农业的人总认为,绿色革命的农业措施对

于农田规模并没有特别要求,但批评者却指出,由于高科技农业需要信贷、技术知识和实物投入,因此高科技农业的实质效益往往为田土面积大和富裕的农民所独享(Pearse 1980)。支持者反驳说,绿色革命增加对农业生产所有阶段的劳动力的需求,从栽种到收割均如此,这对农村穷人中最穷的人,即没有土地耕作者,也是有好处的。双方都能够而且都已经运用统计数字来支持自己的论点,结果似乎是双方都僵持不下。

对此我自己有个感觉,因为太属于印象性质,当不上论点二字。我这感觉与顿宫及鲁丹的分析相吻合(Hayami & Ruttan 1985:341-5)。那就是:绿色革命的经济效益分配不均,只是早期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无论如何还是会普及的。这意味着,在不同农民阶层均种植同一农作物的地区,例如在孟加拉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Ganges-Brahmaputra)三角洲地区种植稻米的农民,高科技农业对于农民收入分配,长期影响比短期影响更好。但是,技术普及也仍受到农作物和地理条件局限:墨西哥索诺特拉(Sonora)和新那罗阿(Sinaloa)的小麦农民就不能与全国其他地区的贫穷农民分享些什么。

无论如何,高科技农业的首要任务,似乎并不是要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正如上文所说,在绿色革命的摇篮地墨西哥,虽然政坛左右翼有许多分歧,但都同意农业只是促进工业化的手段。其实,根据竞争性经济的逻辑,提高农业生产力也就只能是一种手段。由众多小生产者组成的农业,将使市场扮演主导角色,这种主导程度是在比较集中的和寡头的工业所见不到的。因此,农业生产的改进本身能为耕作者带来的,只是短暂的繁荣,除非这改进过程受到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局限。没有这些局限,竞争将损害农民,因为增加产量只会降低市场价格。如果农业生产的改进局限于一地区,则地主将因地租上升而获益,无论这增幅是账而的还是实质

的。但如果农业生产的改进是可以推广的和可被模仿的,则地租就根本不会上升。在这两种情况下,对劳动力的回报还是会停留在原先的水平。

这并不是说没有人会获益。在墨西哥这类国家,粮食价格降低,有助于工业化的进程,而低廉的食物价格就意味着低廉工资。首先获益的是工业资本家,尽管最终而言,如果全面工业化普遍提高生产力的话,工人和农民也会获益,因为他们也是消费者。

因此,农民就和其他群体一样,只要具备足够的政治力量,就会阻挡和限制市场,例如利用价格补贴、津贴、限额等,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方式,但目的是相同的。就第三世界的情况而言,问题表现为一系列矛盾:要以低成本增加市场化的剩余(或为出口或为供应城市),又要提高农产品价格以惠及农民;无土地的劳动者希望有稳定的就业;小业主希望维持其基本生存权外,还想维持其社会和经济的生存权;最后而并非不重要的是,农业工业集团希望扩大种籽、化肥、农药和农机的市场。要调和这些矛盾,就像缘木求鱼。结果毫不奇怪,经济学家眼中的“黄金定律”就适用了:有黄金者定其律。

我想,批评者对于高科技农业所能够做到的,最多也不过是下一“苏格兰式裁判”(Scots verdict),即存疑,因为高科技农业有功亦有过。也许高科技农业正在毒害水源,而我们的土地和水源基础并不足以长期支撑高科技农业的扩展;也许我们迄今都能避免农作物基因问题引起的灾难,但这并不是说,农作物品种数目减少就不再是个问题;也许我对于高科技农业耗用能源的问题过于乐观,也许高科技农业耗用矿物能源的分量,比我推算的更大;最后,绿色革命对于收入分配和政治的影响,也许比我的效益扩散论所显示的更大。

对于高科技农业的批判者而言,这个存疑的结论就是帕斯卡

所说的不应进行的赌局(Pascal's wager),^[10]足以令高科技农业不应再继续,因为未知数太多了。但高科技农业的支持者却要求证据,孰是孰非要说清楚。从他们的立场而言,不轻易改弦更张有很好的理由:“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11]

首先,我认为,高科技农业的批评者误会了历史过程的性质。高科技农业并不是一次性的技术方案。科学家们一直知道,尽管问题需要解决,但解决问题时又制造了问题。永久警惕,不但是自由的代价,也是可持续[农业]的代价。曼格尔斯多夫(Paul Mangelsdorf)是玉米育种专家、哈佛大学教授、洛克菲勒基金会制订农业计划时的顾问,他为《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撰写有关小麦进化的一篇回顾文章时写道(Mangelsdorf 1953:59):“在大面积农田上种植农作物新品种,会增加它们患病的危险。结果是小麦育种专家和农作物病菌之间要打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曼氏没写出来的,是他有信心,不,应该说他肯定小麦育种专家会胜出。曼氏这篇文章于1953年发表,当时科学家们显然在知识界控制大局。但在美属三哩岛、印度博帕尔(Bhopal)、前苏联切尔诺贝尔等事件发生后,更不用说酸雨、臭氧层破损以及其他科学技术引发的问题暴露出来之后,情况便不再那么一面倒了。大概最可怕的类似事件是抗生素。当医学界宣称成功地以抗生素战胜传染病菌时,却发现病菌产生变体,使抗生素效力大打折扣。同样,在抗生素这个案例里,科学家有信心的,是与病菌作战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的灵丹妙药。正如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报道(Begley 1994:46-51)引述爱奥华(Iowa)大学的研究员温策尔(Richard Wenzel)说:“人类与微生物一直都在赛跑。”但科学家能否保持领先?人们开始信心动摇,即使科学家也如此。且听温策尔博士:“目前微生物正处上风。它们毕竟比我们老得多……而且聪明得多。”

科学家相信,虽然他们解决问题时会引发出新问题,但他们总能领先一步。而批评者相信,科学家早晚会拿不出解决方案。应该说,双方的立场都只是立足于信心之上而已。它们建基于一些假设,而这些假设除了信心之外便没有甚么根据。

5. 科学胜利,资本胜利

农业科学家的信心是怎么来的呢?要回答这问题,我们就要回到文章开头关于杂交玉米的故事。舒尔(George Schull)、伊斯特(Edward East)以及琼斯(Donald Jones)等人努力奋斗,要应用孟德尔遗传学(Mendelian genetics)以解决人类的实际需要。这段事迹,虽然不及亚瑟王传说,也是够传奇的了,而也像所有神话故事那样,并非完全虚假。

但杂交玉米并不完全是科学胜利的结果,伯兰和卢温廷的分析(Lewontin & Berlan 1986, Berlan & Lewontin 1988)也不无道理。他们认为,杂交玉米是种籽商为介入生产程序而发明出来的。他们的观点为杂交玉米是科学胜利结果这一观点提供一个视点。他们的主要观点是,杂交农作物(尤其是玉米)的后代,基因结构很不稳定,而且产量远不及传统农作物,因此,杂交农作物的每一代种籽,都要在受控制的环境中培植,这就意味着种籽商的角色重要性,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事实上,像瓦勒斯的“先锋高育公司”(Pioneer Hi-Bred)这类种籽商,通过杂交玉米发了大财,而也就是这同一个华莱士,在1940年参加墨西哥总统卡尔那楚就职典礼时,首先提倡向墨西哥输出种籽革命。当时华莱士是农业部长兼候任副总统,证据开始得到加强了。

华莱士是爱奥华州一个显赫农庄世家的后代。他的祖父“亨利大叔”(“Uncle Henry” Wallace)创办了《华莱士农书》杂志,这

杂志是鼓吹农业科技改造的喉舌,他本人也加入了由贝里当主席的著名的农村生活委员会。华莱士的父亲(Henry C. Wallace)继续经营《华莱士农书》杂志,并成为总统哈丁(Warren Harding)任内的农业部长,直至1924年逝世,不久哈丁也逝世。

这里有一段故事。委任华莱士父亲为农业部长的决定还未公布,华莱士就被父亲派到农业部在华盛顿的总部里,(秘密)审查哈特利(C. P. Hartley)和他的下属的工作。哈特利是首席农艺师,负责为农业部谷物调查室研究玉米问题。他较早时试验玉米杂交工作,结论是“杂交并不能改善玉米品种”(Crabb 1947:98),并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年轻的华莱士早已对农作物杂交的潜力深信不疑,对于哈特利的结论至少可以说是大为扫兴的。他欣赏的是里奇(F. D. Richey),因为里奇已经研究农作物杂交有好几年了。一待时机成熟,农业部长、华莱士的父亲,便于1922年2月16日指派里奇代替了哈特利。此后,哈特利在美国农业部的职业生涯落得个相当糟糕和可悲的结局:他饱受打击之余,在20年代中又因违抗命令而被开除。

对于相信阴谋论的人来说,事情的发展是再自然不过了。里奇与华莱士父子形成了密切的关系。用克拉布的话来说(Crabb 1947:190-1):

里奇的杂交玉米计划之所以在爱奥华州进行,是自然不过的。原因有几个,首先,新上任的农业部长、华莱士的父亲,是爱奥华州人,他把里奇提拔到从前哈特利担任的职位上,因为他认为里奇能够为联邦政府有关杂交农作物的研究带来新气象。此外,受人敬重的农学家、爱奥华州立学院教授休斯(H. D. Hughes)[也是克拉布该书序言的作者],是里奇在密苏里大学读书时的老师,这可以说为他们在阿姆斯(Ames)的

有效合作铺平了道路。还有,华莱士本人与里奇交上了朋友,他与爱奥华州立学院有联系,也与《华莱士农书》关系密切,因此可以说为里奇提供了大力的支持。

实际上,华莱士成立了先锋高育公司,成为将杂交玉米商业化的创始人。而华莱士出售的第一代种籽的种苗,恰恰正是由美国农业部的里奇供应的。

相对于其他农业改进措施,杂交农作物对于种籽培育者带来更多好处,研究者并非不知道这一点。将杂交玉米不断再杂交(因此称为“双交”[double-cross],伯兰与卢温廷却认为这代号甚为不祥),并推向市场以图利,人们普遍将此归功于琼斯。琼斯于1919年写道(East & Jones 1919:224,转引自 Becker 1976:2):

种籽培育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杂交农作物。事实上,种籽培育者通过自行改进种籽或购买其他种籽而能够得到全部利益,这在农业历史里还是第一次。发明鞋油盒开关的人,或发明在照相机底片签名的技术的人,能够将其发明注册成为专利,他们的发明能力因而获得充分的奖励。但是,培育新农作物品种、对全国可能作出无法估计的贡献的人,他们的辛劳却得不到任何奖励,连名誉都没有,而这些新农作物也可以被任何人继续繁殖。因此,培育改良农作物的物质诱因就比较少。但是,利用首代杂交农作物,只出售杂交种籽,继续繁殖这些种籽却不可能达到良好效果。这就可以使发明者维持其专利发明。

请注意琼斯说这番话的时代,和我们现在的时代非常不同,那时保护专利权的问题还完全未引起种籽培育者及其律师的注意。

1970年,美国实施“农作物品种保护法案”(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Act),它为美国的种籽培育者提供了两项重要的特权(Butler & Marion 1983,转引自 Knudson & Ruttan 1988:55):

“一、对于获注册的新农作物以及这些农作物的繁殖物,注册者可全权出售、全权做广告、全权发牌照予他人来出售;二、对于出售或使用已根据该法案注册的新农作物的人,注册者有权制定和征收专利使用费。”最近,这些特权还被扩大到国际条约中。在最近缔结的关贸条约乌拉圭回合谈判协议中,美国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保护所谓知识产权,种籽商的权利就是其中之一。随着新的关贸条约的通过,保护种籽商的科学贡献的工作,又跨出了重要一步。但是,无数无名的耕作者,几百年来甚至几千年来耐心地劳动,改善了不少天然作物,他们的贡献却得不到任何保护。

故事还有下文。甚至早在杂交玉米横行玉米地带以前,新兴的种籽工业就与农业部发展出连今天的军工企业集团也忌妒不已的密切关系。克拉布漫不经心地告诉我们(Crabb 1947:119ff),1918年,美国农业部在芬克兄弟种籽公司(Funk Bros. Seed Company)的农场建立了一个实验站:

芬克兄弟的其中一人,曾于一次大战借钱给农业部。主要是他从国会争取到一笔特别拨款,在玉米地带多建六个实验站以研究玉米疾病问题。第一个就设在芬克兄弟的农场,可说是为嘉奖芬克兄弟对此问题的积极态度。(p.120)

私人种籽商和美国农业部的互利共生关系,就这样开始了。

通过这关系,种籽商得以从杂交玉米的好处中分一大杯羹。以霍尔伯特(James Ransom Holbert)为例,他从芬克兄弟公司过档到美国农业部的实验站,这转动并不费劲,因为正如我们所见,实验站就设在芬克兄弟的物业内。1937年,联邦政府在芬克兄弟农场的实验站关闭了。用克拉布的话来说(Crabb 1947:138),这实验站不但“达到了原先设立的目的,而且还做出更多成绩。……由于发展出产量高抗病力强的杂交玉米,玉米疾病不再是个主要问题了。”霍尔伯特“重返”芬克兄弟公司,成为专责研究的副总裁!

菲斯特是与政府实验站紧密合作而获益的另一例子。菲斯特长期从事杂交玉米的实验,因受到邻居的讪笑,几乎要把自己的实验隐藏起来。可是,当他用自己培育出来的一代杂交玉米(single cross),与霍尔伯特提供的两种一代杂交玉米再次杂交时,便终于得到幸运之神垂青。克拉布告诉我们(Crabb 1947:243):“1934年还是代号‘伊利诺 360’与‘伊利诺 366’的实验杂交玉米,到了1935年就变成菲斯特 360和366。这是直至当时为止美国中部和中北部地区研制出的两种最优秀杂交玉米,而菲斯特一人就成为它们的拥有者。”不用说,菲斯特的银行存款也有显著的进账,他在邻居心目中的地位大概也水涨船高。

最后,我们还可以提出一点来质疑杂交玉米是科学胜利这一神话。我们认为,杂交玉米的长处也许被夸张了。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格里格斯(Zvi Griliches)估计,就效益和成本之比而言,杂交玉米为传统玉米的7倍。但是,西蒙斯在十年前一篇有关农作物育种的回顾文章中就指出(Simmonds 1983:12):

从玉米的证据显示,把农作物分群改良,也可获得极好的经济效益,但几十年来没人有时间和财力进行庞大的分群实验。杂交玉米的成功,也需要几十年来大规模的工作。假如

分群改良的方法也得到如同杂交玉米方法所得到的支持,情况又会怎样?

由于分群改良方案所必须进行的实验从未进行,这种比较也只能停留在假设层面。但分群改良方案是有其可行性的。例如,1950年代内布拉斯加大学加德纳(C.O. Gardner)的研究就显示,通过杂交农作物所达到的产量增幅,也可通过几种重复筛选的品种改良方案来达到。他的实验显示,经过连续十代的重复筛选之后,农作物产量增幅达三至四成(Gardner 1978:213-22),这是格里格斯计算的杂交农作物产量增幅的两倍。虽然这结果是在实验条件下达到的,在农田上实际能够达到的产量增幅尽管没有那么大,但比起杂交农作物大概仍是可观的。

但这个比较可能有漏洞。杜维克告诉我:“加德纳的品种群未能达到农田所需的优良水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尤其是它们的根部和枝干很弱。”无论如何,就提高农作物产量增幅而言,分群改良方案可以和农作物杂交方案一较高下,对此杜维克表示同意,但却坚决认为在20年代并不具备进行分群改良方案的条件(个人通信,1993):

分群改良方案是培育杂交玉米时的意外收获,几乎是由斯普拉格(George Sprague)一手发明。由于得到新兴的量化基因学的大力帮助,他和其他基因学家发明了分群改良玉米的实际方法,所获得的产量增幅,与杂交玉米同样快速。我也发表过部分实验结果,用以示范。但他的成就是受到杂交玉米成功的推动而达到的,研究经费也来自杂交玉米的研究,这在20年代根本就无法进行。而且,若非杂交玉米培育的需要推动了研究,因而发展出新的分群改良方法,他也许根本不会

有这番成就。

但杜维克这番话仍未回应西蒙斯的基本问题：“假如分群改良的方法也得到如同杂交玉米方法所得到的支持，情况又会怎样？”伯兰和卢温廷认为，分群改良方案之所以在 20 年代得不到同等的支持，并非出于技术原因，而是因为种籽商要利用杂交玉米来主导生产过程。

因此，用阴谋论来解释杂交玉米的出现，是可以成立的。这番解释对于我这类人颇有吸引力。我一向认为，技术的发明既是对控制的需要，也是针对效率的需要，有时是追求控制多于追求效率。我尤其认为，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资本家要在生产过程中为自己安排一个角色，并且维持这个角色 (Marglin 1974)。但是，伯兰和卢温廷并不需要用阴谋论来支持他们的论点。他们只需证明，种籽商通过杂交农作物种籽需要每一代重新培育这种特殊策略，阻挡了其他潜在的竞争者，包括农民，因此而坐享巨利。用这种特殊杂交技术培植农作物种籽，相对于用分群改良方法来改良传统农作物种籽，会使种籽培育者占据有利位置。毫无疑问，芬克兄弟和华莱士之流，是深明乎此的。

当然，说杂交农作物技术为种籽商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角色，是过于夸张（尽管华莱士的先锋高育公司是个例外）。例如，早于杂交玉米打开市场之前，芬克兄弟就已经营多时。而在 1920 年，由芬克兄弟研制和售卖的“芬克 176A”，“正逐步成为该公司有史以来、研制和售卖的最出色和最受欢迎的传统玉米种籽” (Crabb 1947:119)。绿色革命的主要农作物是稻米和小麦，它们的种籽仍是传统种籽。最近，提高这些农作物产量的策略，已经有所改变，即将基因结构稳定的品种合成，而剔除那些不稳定的品种。但是，这些经挑选的品种在农田的生命周期仍然很短，因为它

们抵抗不了传统品种所能抵抗的害虫和病菌的侵袭,因此,每隔几年就要用新挑选出来品种取代旧品种,这就使种籽商生意滔滔不绝。以小麦为例,新品种在农田的寿命竟只有五年(Myers 1983: 34)。

甚至早于杂交农作物而世以前,哈特利(即被里奇取代的那个人)就已经鼓励农民专职种植玉米,而把种籽问题留给种籽商处理(Hartley 1920:5):

妥善的玉米种籽培育工作,需要特别方法,农民一般没时间应用。假如你所在的地区有玉米种籽商,而他确能证明他的玉米种籽是良种的话,你值得花重金予以购买。在正常情况下,花5美元买1蒲式耳⁽¹²⁾良种[凡年后杂交玉米市价高至每蒲式耳8美元],对买卖双方都有利。种籽商正在改良各类玉米品种,正如乳牛配种专家在改良各类乳牛品种一样,他们都是用最佳品种进行培育的。

普通农民是生产者,而非玉米育种专家。育种专家从农民种出来的玉米中,挑选出产量高的苗子,加以培育,而农民则因此获益。但是,农民必须记着,从种籽商购买来的玉米种籽,不一定比天然种籽好。种籽商出售的种籽,有些确实优良,但也许大部分都比天然种籽差。玉米本身不断地产生新变,因此我们可以因利乘便予以改良,或者任由其自行“完蛋”。

还有,杂交技术促进了种籽培育者和农民之间的分工,但却不必然导致这种分工。克拉布说(Crabb 1947:267):“生产和处理玉米种籽的方法起了一场彻底的革命。从前任何精明的农民,只要有些特别的设备,都能培育玉米种籽。现在,这工作成为一种高精

尖工作,所需要具备的知识和设备,超出一般农民的能力。”克拉布是有所夸张了,因为他刚刚才告诉我们(Crabb 1947:206ff),在威斯康辛州,曾有人尝试把杂交玉米种籽生产技术应用到小农场。也许受到该州进步传统的间接影响,该州的育种专家不但“制订了行政程序,还发明了特别的机械设备,使生产优质杂交玉米种籽成为小规模农场的工作,农民自己也做得来”(Crabb 1947:107,也请参考 Kloppenburger 1988:106 及其参考书目)。

正如克洛本伯格所强调,技术并非最决定性的因素。借用爱德华兹(Edwards 1979)在另一场合所用的话,种籽生产也是一个“必争之地”(contested terrain)。比培育杂交玉米技术本身更加重要的是美国农业部在推广该技术时所采用的政策。由于农业部用公帑研究杂交玉米,然后容许种籽商染指这些研究成果,所以这政策至少在实际上是偏袒种籽商的。

但即使如此,这种做法和华莱士和菲斯特的实际成绩比较,却是小巫见大巫。杜维克长期从事育种工作,在华莱士的先锋高育公司担任高级副总裁,专责研究部门的工作。他于1990年退休。他对我说(私人通讯,1993年12月31日):“在先锋高育公司中仍然流传着一个故事,这故事道出了所有早期的杂交玉米专家的底蕴。这故事是:华莱士创立该公司,为的是赚足够的钱,好让他对于杂交玉米的热情得以维持下去。”直至30年代中期,杂交玉米还远远谈不上是成功。1935年,美国玉米田中,种植杂交玉米的占不到半个百分点,即每200公顷中才占1公顷(Kloppenburger 1988: table 5.1)。华莱士任内,美国农业部热心的专家所开发出来的杂交玉米,其产量比传统品种仅高出一成。这微小的增幅,实在不足以说服农民改种杂交玉米,因为相对而言,改种杂交玉米的增量成本太高了。以爱奥华州为例,一成的玉米产量增幅,大概等于每公顷多收割3至4蒲式耳玉米,按1935年美国季节平均价格

计算,每蒲式耳玉米售价为 0.66 美元,^[13]亦即每公顷多赚 2 至 2.5 美元。可是,杂交玉米种籽每蒲式耳售价 2.95 美元,^[14]按每公顷播种 6 至 7 磅计算(Berlan & Lewontin 1988:30),杂交玉米种籽的成本是每公顷 1 美元,^[15]因此,假如实验成功的话,杂交玉米带给农民的盈利增幅,不过是每公顷多赚 1 至 1.5 美元。以每蒲式耳玉米售价 0.66 美元计算,农民每公顷收入大约是 20 至 25 美元,这增幅不过是稍微大于 5%。后来,杂交玉米的产量增幅有所提高,这笔账也不同了,但那是后话。

简言之,迟至 30 年代中期,杂交玉米的商业前景应该是很渺茫的,尽管它后来的实际表现出人意表。在这种情况下,公私两方对于杂交玉米的支持者和研究者大概都团结一致,因而互通消息成为双方重要的活动,也用不着隐瞒。以菲斯特为例,他不仅接受政府资助研究经费,他本人也提供资助(Crabb 1947:236-7)。1932 年,他将自己培育出来的杂交玉米种苗交给里奇,这种苗被迅速交给实验站,然后提供给农民。

随着杂交玉米的实际潜力发挥出来,事情也起了变化。^[16]使“灰盘”(dustbowl)成了日常用语的 1934 年特大旱灾,促进了杂交玉米的扩散。在爱奥华玉米实验区,杂交玉米产量比传统玉米高出 15% 以上。到了 1940 年,美国玉米田中,种植杂交玉米的已占 15%,五年之后该比例更升至一半以上。一如所料,杂交玉米身价日昂,侵害了它的学术价值。以至于在 1936 年,美国农业部负责玉米研究的首席农艺师詹金斯(Merle Jenkins)投诉道(1936:479):

(M)

西

有关私人种籽商研制出的杂交玉米品种的资料非常缺乏,甚至没有收进[在杂交玉米品种的主要名单里]。私人种籽商和杂交玉米生产者关系开始紧张起来,因为私人种籽商

把杂交玉米品种和其谱系视为商业秘密,拒绝公开,因而阻碍了目前搜集完整资讯的工作。这种做法可说异常短视,日后有必要修改,令购买杂交玉米种籽的人能够得到所购买的种籽的所有资讯。

詹金斯正确地指出症结所在,但其解决方案却不对。正如上文所述,在当时,即使最富想像力的企业家和律师,都完全没有想过要用专利制度来保护基因工程。

其实,我真希望能就杂交玉米提供另一个解释。假如我能证明,杂交玉米不过是像华莱士之类的企业家为打人生生产过程而使用的手段,则我既批判高科技农业又批判高科技农业的批判者的工作,就会简单得多。然而,尽管历史可以是虚构,但却不是自由的虚构。历史事实是有约束力的,而历史事实并不能证明伯兰和卢温廷的观点。我们虽然可以否定杂交玉米完全是科学胜利这种论点,但却无法否认科学在这个事件中担当相当重要的角色。事实上,科学的美誉为杂交农作物研究提供了无法估计的推动力。从前的育种专家,不过是个拙劣的工匠,成败多凭运气。但科学把育种专家变成了遗传学家。是科学的美誉,使研究顺着科学的研究方向进行,这有别于将农作物分群,并重复筛选以改良这种比较经验性的研究方向。

谁 谁会介意杂交农作物技术的成败实际上也都取决于运气?作为科学家,舒尔和其同事宣称他们继承遗传学家孟德尔(Mendel)的衣钵,这就使原来在学术界位次最低或接近最低的学科声价大增(Kimmelman 1987: chs. 1, 7)。有些时候,转变几乎是雷发的⁽¹⁷⁾。1912年以前,巴博克(Ernest Brown Babcock)已经在加州大学农学院开课教授农学和植物病理学,并且刚开始在园艺学分部下开设农作物育种的课程,尽管他没在这方而受过系统

的训练。1914年,巴博克作为新设立的遗传学分部的主任,在学术界平步青云,此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加州大学巴克莱分校里度过(Kimmelman 1987:308-38)。他甚至埋怨行政工作阻碍了他的遗传学研究,“这才是我应该做的工作”(转引自 Kimmelman 1987:353-4)。我想,杂交农作物专家希望得到的,是认同、地位和荣誉,而非物质报酬。上文引述琼斯有关技术发明遭侵权的话,也应该这样去理解。

此外,遗传学也确是当时得令的科学。20世纪初,人类对于蒸汽机、电力、电报、电话和新近的内燃机等发明的胜利记忆犹新,因此干预自然、操纵自然是当时的时代精神,遗传学正符合这种精神。既然农作物杂交技术有如此巨大的改良能力,人们很容易为它献身和牺牲:它成了一项超然的事业(Kimmelman 1987:377)。

因此,农作物杂交技术本身,还有其研究模式,传入墨西哥,然后传入亚洲,是多么顺理成章的事情!尽管其他因素也很重要,科学外衣却是关键的。科学才是现代神坛中被全球供奉的真神。不论持何种经济观的人——支持资本主义也好、支持共产主义也罢——都对科学顶礼膜拜;不论持何种政治观的人——主张民粹政治也好、主张贵族政治也好——也对科学顶礼膜拜。连肤色也不是障碍,在科学神坛前的信徒,有黑皮肤的、有黄皮肤的、也有黧黑皮肤的。

迎,如翠

员委回则

金基刻,言

6. 高科技农业扩散全球: 饿殍的美梦

由此可见,人们会很自然地认为绿色革命是中立的、科学的、无政治色彩的事业。“农业无他,正是应用生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原理来种植食物”(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洛克菲勒基金会顾问委员会报告,1951年6月21日,转引自 Anderson et al. 1991:32),这种说法不会触怒任何人。啊!应该说还是有一全族操人给触怒

了。正如下文将指出,他们“抱残守缺”,反对绿色革命对于农村的破坏。但整体而言,科学和进步都是左右逢源的旗帜,一方面赢得第三世界政府和精英的合作,一方面也令不肯承担帝国责任的美国有借口进行全球扩张。

随着冷战逐渐成为陈年往事,人们容易低估冷战的影响,但低估冷战的影响是错误的。要知道:绿色革命是在美苏两大帝国较量这种背景下炮制的。为了争取第三世界的人心(更不用说市场和资源),食物就成了重要的武器。美国为其扩张行动找借口时,就不断提出这个论据。194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斯泰克曼(E. C. Stakman)、布拉德菲尔德(Richard Bradfield)、曼格尔斯多夫等三人,经过一个夏天的田野调查后,为该基金会的墨西哥农业计划撰写纲领。十年后,1951年,这三人为该基金会写了一份文件,其中一段就是反映了典型的冷战思维(转引自 Oasa & Jennings 1982:39):“饥饿的人易受各种诺言的诱惑,但实际行动可以把他们争取过来。共产主义为饥饿的人提出了美丽的承诺,民主不但要提出同样美丽的承诺,还要实现承诺。”

在这种情况下,批评高科技农业,就等于站在不爱国的一边。不过,尽管洛克菲勒基金会使用科学的措辞,但假如遇到政治问题,该基金会领导层还是予以正视的。正当墨西哥计划的研究出现进展时,顾问们却建议基金会放弃墨西哥计划。1951年,基金会的顾问委员会还宣称农业是对于生物学和自然科学的应用,但两年后,该基金会的信托人之一、达特茂斯学院院长迪基(John Sloan Dickey)在访问墨西哥之后,就建议基金会在“一些相当麻烦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演变成政治风暴之前,撤出墨西哥,以免受到牵连。迪基继续说^[16]:

(Cf. 1951)

迪基说:“我完全肯定,在三五年内,该计划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问

题,即该计划的成果由哪一方政治势力控制呢?此外,假如这些成果如期实现,而墨西哥土地政策不变的话,则这些成果将会加剧墨西哥经济的贫富差距,尤其是农村的贫富差距。这将会造成政治问题,对此,大部分墨西哥人至今丝毫尚未察觉。……假如我的想法大致不错,则我们有很充分的理由现在就积极部署,在可见的未来内有条不紊地终止该计划。

迪基也承认,终止计划会造成行政问题,因为该计划所累积的“人才和经验”,是很宝贵的“资产”。假如放弃该计划,这些资产也将失去。迪基意属的解决方法是发起另一个类似计划,而且最好在拉丁美洲,以便该基金会通过墨西哥计划而掌握到的拉丁美洲语言和文化的知识有其用武之地。如果这样不行,则利用“该计划的大部分人才在世界其他地区推行大同小异的农业计划,对这些地区将是很有好处的。”把高科技农业扩散全球,这一想法已经出现,虽然仍需要多等十年之后,狄奇才灵机一动,通过洛克菲勒与福特基金会的合作,创立国际稻米研究所。

7. 隔靴搔痒:索尔对绿色革命的有先见之明的批判^[19]

行文至此,还有两个问题未予回答。一、我对于绿色革命的批评是否后见之明?二、实际上,除高科技农业之外,是否有另类出路?本节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则在本文第二部分予以回答。

质疑高科技农业是否适合墨西哥和亚洲的人确实很少。但的确曾有人对输出高科技农业提出警告,而且他们还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委员会成员。其中一人就是索尔(Carl Sauer)。索尔是加州大学贝克莱分校地理系主任,曾任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主席,并赢得美国地理学会的戴利奖章(Charles P. Daly Medal),也是古根

海姆奖学金(Guggenheim Fellowships)评审委员会成员。华莱士(这时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副总裁)建议介入墨西哥农业后,基金会几乎是第一个咨询索尔。当时索尔休假,人在墨西哥,他提醒洛克菲勒社会科学部主任威利茨(Joseph Willits)^[20]:

这是一项庞大的计划,如果失败,其损害是无法补救的。第一,要在经济地理方面入手。……要弄清楚所有本土农作物品种的分布和用途,以及它们在墨西哥人饮食和种植习惯中的地位(土壤、气候、播种和收割时的季节性劳动力、农作物抗灾抗虫能力)。第二,确保收集所有遗传结构不同的农作物,而且每一种的收集数量必须足够,以供实验之用。第三,设立育种中心,培育良种。请注意:墨西哥玉米和豆类等农作物的遗传面,远远广于美国育种专家所知道者。仅是像玉米这一种“植物”,在墨西哥,其用途就比我们商业化的农业所知道的用途多得多;墨西哥有大量本土农作物品种,是美国所无的;墨西哥有大量旧世界地中海农作物^[21]。通过筛选来改良农作物品种,潜力是巨大的,但筛选必须从本地农作物开始,让一帮子咄咄逼人的美国农学家和育种专家推广美国的商业化农作物品种,有可能完全摧毁本地的资源。实验站那些人正是犯了这个错误。他们引进美国农作物品种,却不理会适应本地生态环境的本地农作物。除非由得力之人来主持这项工作,否则极可能对本地农作物品种造成灾难性的破坏。使墨西哥农业朝着只种植少数经济作物的单一方向发展,势必对墨西哥的农村经济与文化造成无以复加的破坏。把爱奥华州的经验用在墨西哥,是危险不过的。除非美国人明白这一点,否则他们最好别碰这个国家。进行这项工作的出发点,必须认识到,本地经济基本上是健全的。

1941年1月,华莱士从墨西哥回国,与威利茨一起提出了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墨西哥制订健康、营养和农业计划的想法。威利茨就找索尔评估一下华莱士的建议。威利茨自1934年就认识索尔,当时二人在社会科学研究会(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属下的一个委员会共过事(West 1979:97n.)。大概威利茨早知道索尔会有什么回应,因此对于上文大幅引述的信件并不感到惊讶。威利茨本人对该计划也抱怀疑态度,也许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这帮热心人中惟一抱怀疑态度者。这究竟是因受索尔意见的影响还是因自己的某些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在1941年2月18日的工作会议上,提到对墨西哥的技术援助,应包括杂交农作物技术以及“展示现有技术”;威利茨对此的回应是:应该谨慎行事。根据会议的记录:“威利茨:建议墨西哥计划全面出台之前,听取索尔应本会正式邀请而作出的批评^[22],并对本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农业,表示完全理解。”

基金会有否正式实行威利茨的建议,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基金会一代表团1941年3月访墨西哥前,的确就农业计划咨询索尔,而索尔再次写了封长信给威利茨。索尔首先指出,华莱士的建议有政治色彩:^[23]

华莱士先生及美国农业部(接替他的人仍然是他的得力助手)要展开他们的计划,对此我确有个看法。在华莱士的领导下,美国农业部对于农业发展出一套咄咄逼人的政治哲学,似乎如今这套哲学要给延伸到我们的拉丁美洲邻居了。美国农业部的农业哲学,并非始于华莱士。但在过去几年,农业部出色的年轻人们,都给前所未有的动员起来,并训练成为精英兵团。我想,他们现在会认为,自己已经知道理想社会应是怎

样,以及如何进入这理想社会。我喜欢他们的计划的很多部分,但我想有必要清楚说明,今天的农业部,首先就是一个政治组织。

美国农业部似乎在一步步渗透拉丁美洲。先有农业专员、继有个人以及顾问团研究个别国家的农业问题。这些人似乎是被派去当传教士,而非因为他们有经验或者对于这些地区有兴趣而无私心。从政治上来说,这些措施也许是好的。但是,这种做法只能使我们影响别国,以服务于我国利益。此外,我实在看不出这种做法可以怎样让我们了解其他生活方式。影响别国以服务于我国利益也许是有价值的、甚至是必须的目标,但这属于政治,而非研究的范畴。

假如农业部现在希望调查整个拉丁美洲的农业问题,它可以轻易地以全球危机为名,斥责推行拉丁美洲计划,……农业部要做就让它做吧,何必由一个基金会来做呢?

接着,索尔清楚而有力地重申自己的立场:

我也不希望看到拉丁美洲加速美国化。现在的美国化速度已经快得使我不能接受了。在墨西哥这里,汽车、收音机和电影普及之快,真吓坏了我。有钱的都成了汽车经纪的掮客。人们只要还能凑够 10 比索,就会乖乖送到收音机商人手中。本应用于食物的购买力,被花在电影票上了。现在美国就是模范,就像在革命之前法国就是模范一样。……墨西哥人认为我们每一件事都做得比他们好得多,如果政府大力推动的话,他们甚至会过度模仿我们的农业。我以前就说过,我害怕本土农作物品种会因急速美国化而遭到无可补救的损失。太仓促地引透美国的农耕设备和方法,会对本地土壤造成巨大

的破坏。且看我们在波多黎各所做的好事！也许本土农民的保守固执足以保护他们，但对于这类国家来说，美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太高，要么耗损土地肥力太甚，要么改善土质的成本太高（化肥、工程等开支），均远非这类国家所能承受。就拿畜牧业来说，在美国，这是最简单的土质保养方法，但在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这方法却碰上全新的问题。他们应该把农业建基于保育和批判地继承自己的农业耕作经验，并缓慢而小心地吸收外来的技术。美国化可能会破坏本土文化，但能够意识到这种危险的美国农业科学家，绝无仅有。因为他们受到压力，要在短期内拿出成绩。要明白本土农民的方法能够真正解决本土问题，是要花一辈子时间的，他们可没那么多工夫，也许因为，他们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就像外星人一样。

威利茨一定是很支持索尔的。他批准基金会继续赞助索尔对拉丁美洲的考察。美国宣布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久，索尔就沿南美洲西岸（智利、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进行了一次漫长的考察。此行并没有软化索尔对于农业现代化的批判态度。关于农业，索尔写道^[24]：

我们在智利南部的主要一站是奇洛埃岛（Chiloe），此地可说是南美洲的赫布里底斯群岛（Hebrides）。我们遇上了今年的两个晴天，其余的日子则大雨滂沱。奇洛埃岛民是白人与另一种印第安人混血的后裔，有着不同的殖民地历史。往奇洛埃岛的航程长达一天，到达之后可以乘大车游览该岛，这种大车的铁道宽60厘米，或者可乘小帆船沿岸航行。我们一直走到远至卡斯特罗（Castro），它已非常接近农业的南半球极限线。奇洛埃岛和奇洛埃岛民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对象，

它们是岛屿隔绝型的小生态系统。这里应该就是我们北半球所有爱尔兰系马铃薯的原产地,也可说是现代草莓的原产地。在岛上以及邻近的南美洲大陆生长的马铃薯,种类之多,令人目眩。大型草莓则生长在沙滩内缘。马和牛都非常矮小,除非从南美洲大陆输入新种,否则无法改变这种情形。大海喂养岛上所有生灵。猪和鸡在落潮后露出地面的浅滩觅食,海藻则是岛民的最重要肥料,部分海藻还是岛民的重要食物,生的、熟的均可。该国文化中的本地特色丝毫未被破坏。在安诺德(Anoud),有运作良好的农业学校和农业实验站,正如乔纳森^[25]所说,就像在威斯康辛北部那么好。当地有大量优良而茁壮的马铃薯品种,但实验站的人却努力研究加拿大马铃薯的种苗。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他们的加拿大马铃薯计划失败了。我相信这是正常的关于农业的想法。这里是所有非安第斯系马铃薯的老家,蕴藏着无数马铃薯品种。可是他们来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引进大商业地区的农作物,毁灭本地的宝藏,而这一切并非因为他们手头上的农作物品种有任何不足之处。一叶知秋,假如把足够多的康奈尔大学和加州大学训练出来的农业科学家弄来南美洲这里,恐怕就会把南美洲人民几千年育种的成果连根拔起。幸好奇洛埃岛人与其他智利人不一样,有相当强的文化抵抗力,亦即所谓“不进步”。我所属的循道教会(Methodist Church)在智利谷的南部设立了一个“优良”的农业学校和农作物推广中心,全是从美国移植过来的,他们甚至印制了一份详细的农作物清单,从美国的金美牌苹果(Golden Delicious apple)到里德牌玉米(Reid's Yellow Dent Corn),应有尽有。有人说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不接受这种看法,因为那些可怜的智利玉米品种连被农业科学家看看好不好机会都没有。我真希望那些向我

们出售埃尔伯特牌桃子(Elberta peach)的农业商人寝食不安,但谩骂就此为止。

对南美洲的大学,索尔从玻利维亚写来的信写道:⁽²⁶⁾

假如此行现在就结束,我一定要到苏克雷(Sucre)走一趟。本来我想从拉巴斯(La Paz)出发到那里去,但却被玻利维亚政府有关道路的告示误导了。……在苏克雷的丘基萨卡大学(University of Chuquisaca)非常古老,它受教会的影响很深,历史学和社会学是它的强项。目前正在成立之中的社会学研究中心,是值得一看的。那里是国家档案和国家图书馆之所在,也是宗教首都(大主教席位)之所在,错失了这个国家里最有趣的学术地点,我深感遗憾。

至于拉巴斯大学我没什么可说的。校长查勒斯(Ormachea Zalles)显然是个手握大权的行政人员,也是个财政天才。六年之间,他就把该大学的经费从24万玻币增至1600万玻币。在这个空地还相当多的城市,他们正在兴建一座16层高的大楼,这将在未来许多年内,仍是全国最高的建筑物。查勒斯担任财政部长时就设计了这个大学的蓝图,当时他还是个年轻人。他也为玻利维亚制订了从小学一年级到博士班的课程。他是全国首席社会科学家,自称数理经济学家。他英语相当流利,完全可以到美国当个成功的校长或院长。他态度友善,目标清晰,肯定有商业头脑。……他笑容满面地说,在目前和不久的将来,研究还不适合成为该大学关心的问题;该大学的教育下一代的课程还有待建立,而这个课程必须达到专业水平。……话题转到讨论哪些教科书最能照顾哪一科目的需要。我感到,谈话的气氛和在美国许多商学

院甚至文理学院的气氛很相似。我想我这感觉是对的。那16层高的摩天大厦就是查勒斯等人的事业象征，参观了拉巴斯大学这美国某某名牌大学的南美洲版本之后，我更加后悔未能探访丘基萨卡大学。另一位报道者也许会有相反的感受。

有两个问题需要解答。第一，为何索尔和其他人这么不同？他是个地理学家，还是个历史地理学家，这可能使他的观点与众不同。索尔从1930年代起，就多次推荐苏联植物学家瓦威洛夫(Nikolai Vavilov)有关农作物主要起源地点的著作，但有多少育种专家(对不起，应该说是遗传专家)读过呢？我猜读过的人并不多，而且能够欣赏瓦威洛夫著作针对高科技农业的重要性的讨论的人更少。然而，是地理学家与否并不能完全解释对高科技农业的支持或反对。如果没有成群结队的地理学家故意高唱高科技农业的赞歌，那才真的是怪事！

第二个问题更重要：尽管索尔的观察如此独到、议论如此谨慎，为什么在制订政策时他却是如此无关轻重？我想，部分原因，是人们错误地认为他抱残守缺、反对现代化。在这种错误的理解下，索尔的观点就显得自相矛盾甚至自打嘴巴了。其实，索尔首次评估华莱士有关墨西哥农业计划的建议时，就已经指出墨西哥存在的问题是经济、政治问题，而非文化问题。墨西哥人是贫穷和受到压迫，而非懒惰和无知。公共卫生差、营养不足以及农业落后等问题，是贫穷和受到压迫的结果，而非因为愚昧或无知。对于公共卫生和营养，索尔写道^[27]：

一、公共卫生问题。按美国的标准，墨西哥的公共卫生当然很糟糕。但是……主要的障碍是经济和政治障碍。……他

们需要的是社会化的医疗服务。但是政府财政不允许，因为钱首先付给了军人，军人组成的宪兵队(gandarmerie)统治国家，并且支撑政府，因此钱首先支付给将军和他们的手下。

要强调的是贫穷，而非无知。

主要的问题是经济问题。只要能有所谓公共卫生的经费，墨西哥人就能好好利用。请注意，“只要我们教教他们，他们就会向我们学习”的态度是要不得的。

二、营养问题。意见还是一样……墨西哥人的食谱营养非常丰富，营养不良是经济因素所致，而非文化问题。……别以为只要有营养专家教导他们，他们就会吃得好些。我对墨西哥食谱很感兴趣，我还不知道有哪一国家的食谱，在财力容许的条件下，比墨西哥食谱更注重营养。

但是，如果公共卫生差和营养不良等问题其实都是经济问题，而现代化又等同于经济发展，而传统又是现代化的反面，则传统本身也成了问题。发展变成惟一能解决贫穷之路，而贫穷则导致公共卫生差和营养不良。

此外，像索尔这样的人反对高科技农业，其动机也是可质疑的。40年代末，安德森(Edgar Anderson)向洛克菲勒基金会自然科学部主任威弗尔批评墨西哥农业计划。安德森是位于圣路易(St Louis)的密苏里植物园(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s)的植物学家，是“全美国玉米权威之一”(West 1979:18)，也是索尔的好朋友与同事。威弗尔对于安德森的批评非常紧张，询问曼格尔多夫如何处置。他回答^[26]：

安德森说我们的墨西哥计划“进展不佳”，我想，我能明白他的真正意思。我和他一起读研究院，有一年我们其实还是

同室。我和他仍保持紧密联系，下次我写信给他时，我会相当随便地问他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他会给我一个答案。

我还未咨询他，但我敢说，他受了索尔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反对墨西哥计划。他的观点大致如下：假如计划失败，不但浪费巨额金钱，而且还会对墨西哥人造成伤害。假如计划“成功”，这意味着人类学家极感兴趣的许多墨西哥玉米品种和其他农作物品种将被消灭，随之消逝的也许还有不少田园风光。换言之，对于安德森和索尔来说，墨西哥就像个神圣的蚂蚁窝，他们正在加以研究。他们痛恨任何“改良”蚂蚁的努力，他们希望研究现在这个模样的蚂蚁。

这并不是对于索尔立场的正确描述，而是漫画化。索尔似乎已预见到曼格尔多夫的误解，早在几年前就提出很不同的观点。1945年初，他从瓦哈卡(Oaxaca)致函威利茨时，就指出比起犁田种植法，“密耙”种植法(milpa)的产量更高，防止水土流失更有效。所谓“密耙”种植法，就是以人手对于小块田地进行了精耕密作，并同时种植玉米、南瓜和豆类。他说：“科学家几乎不知道这一点。”他又指出种植甘蔗对于社会的危害：“就我所知，甘蔗真是可恶的东西……甘蔗扰乱社区，甚至毁灭社区……甘蔗种植所需的劳动力很不平均，农忙时引进大量临时工。他们生活条件恶劣，尽管收入可能很高。他们也不感觉到自己属于一个永恒的社区。”他也描述了南瓜作为食物和文化扩散中心的角色，以及土著的悲惨生活：“人们应该鼓励他们，使他们明白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健全的。人们也要保护他们，使他们免受剥削。”在该信结尾，他说：^[29]

我感兴趣的，不是作为博物馆摆设的印第安人。对于印第安人以外的群体，只要他们有自身的独特文化，我也感兴趣

趣。但是,今天从都市中心散发出来的标准化倾向,正在剥夺这些群体的优点和人才,使它们在文化上,并且往往在经济上,陷入赤贫

我们的选择,不一定要么固守传统,要么是没有反省的现代化。还有第三条道路。正如索尔早于1941年所说:“他们应该把农业建基于保育和批判地继承自己的农业耕作经验,并缓慢而小心地吸收外来的技术。”^[30]索尔比曼格尔多夫更加了解传统。传统不是固定不变的,传统既可以,实际上也是能够被主动建构的,是动态的;除非人们被封闭得无路可走,僵化在古老的模式中。对于索尔来说,任务是要保留空间,使本土文化能够比较自主地转化,而非把文化当成静态的系统来保存。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还是面对同样的任务。

二、另类农业

1. 寻求另类农业出路的经济考虑

农业有另类出路吗?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技术,它既能生产足够粮食喂养全球人口,又不耗尽资源,又不破坏环境,又不缩小农作物品种数巨。同样重要的是,对于包含在人类多元文化中应付、认识和感受世界的各种方法,也不会加以破坏。有这样的农业技术吗?就此问题而言,美国国家研究所1989年出版《另类农业》(Alternative Agriculture),便是很值得注意的事情。该书强烈主张以人力、人类智慧和机械能源代替农药、化肥以及其他从外界购买的投入。这些观点本身并不新鲜,因为美国农民遇到问题已非一日,而高科技农业成本高昂,因此寻求另类出路,也有其经济价

值。

几个数字就能说明问题(本段和下段数字出自《1991年美国
总统经济报告》表B—95至表B—97),按当年价格计算,从1947
年到1989年,农场总收入增加了6倍,但纯收入仅增长3倍,因为
同期生产成本增长9倍。农业越来越不像农业而像商业;食物的
价值越来越靠农场以外的加工来支撑,来自农场的价值份额越来
越小。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1980年代中期,农场纯收入中,政府
津贴占了五分之一到一半不等。

农业生产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与农用化学物有关。廉价能
源和庞大的化工生产力,是美国二次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军工业
的结果,因此从大战结束到50年代,农用化学物的产量急剧增长、
价格长期低廉,60年代,化肥的价格其实还下降了。结果,从1947
到1972年,农业产量增加50%,同期化肥使用量却增长了400%。
在70年代,化肥跟随能源一道涨价,化肥使用量因此没有继续增
长。到了80年代,化肥使用量竟出现了二战以来的首次下跌。从
第一次能源危机算起,化肥使用量基本与农业产量同步增长,与二
战之后到美国第一帝国结束这四分之一世纪化肥使用量的急速增
长,形成鲜明对照。

第三世界的变化趋势和幅度也类似美国。农场以外的投入
(肥料、种籽、化肥、农药、燃料和其他农业机械操作成本、灌溉成
本)这个开支项目,在1947年以前几乎不存在,但在1982至1984
年间,却相当于第三世界农业产值的四分之一,而在第一世界,该
比例则为二分之一(Alexandratos 1988:134 & 表4.5)。80年代
末,第三世界氮肥使用量约为全球使用量的一半(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FAO]1989:表2)。但是,与第一世界的情况一样,近年第
三世界氮肥使用量的增幅也放缓了。1961至1975年间,化肥使
用量年均增幅为12.4%,但1975至1985则“仅”为7.1%,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估计,在本世纪之内,增长率还会继续下降到 4.6%。

任何关心农业的人,即使仅仅留意《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有关农业的报道,都不会被上面这些数字吓倒。《另类农业》一书令人惊讶的不是其内容而是其出版者。出版该书的,不是洛代尔研究所(Rodale Institute)或者新炼金术研究所(New Alchemy Institute),而是国家研究所。该书前面一个启示告诉我们,国家研究所的理事会成员,是从“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学院、以及医学研究所”中拣选的(NRC 1989:ii)。该书作者仿佛觉得还需要更多证据证明该书值得尊重,又特别强调:“这项研究计划、也就是本报告的主题,得到理事会的批准”,又说:“挑选负责该报告的小组成员时,考虑到他们的特殊研究才能,也考虑到平衡观点的需要。”诚然,负责撰写《另类农业》的小组成员,是由国家研究所农业局主席布朗(William L. Brown)委任的,而布朗则来自先锋高育公司。看吧!真是故人再相逢,英雄又聚义!

另类农业,已经从“旁门左道”成为炙手可热的建制。但是建制的眼光,仍不离利润。该书支持另类农业的理由,不是全新的对于土地的道德观,也不是贝里(Berry 1977)有关以养育代替剥削的建议。该书的立场,既非女性主义的立场,也非保护生态者的立场,当然更不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立场。该书反复强调,另类农业的推动者都是有硬功夫、真本事的人,而不是骗子。例如(NRC 1989:263):

斯普雷兄弟(Spray brothers)停止使用化学除草剂,不是因为担心除草剂危害人类健康和环境,而是因为除草剂正在改变杂草的品种结构,使从前不成问题的杂草现在反成了问题。

我们很可能夸大了斯普雷兄弟之流的牟利动机。推动另类农业的人,最初也许是看中了另类农业补救滥用农药和化肥所造成的灾难这一点。然而,一旦参与另类农业,我敢说,农民就能够通过与土地的联系而得到满足感和意义,而高科技农业却使农民难以获得满足感和意义。该书综述的个案研究清楚显示,另类农业带来的真正转变,是以农民的亲身技术和知识,代替标志着高科技农业的有关化肥和农药的技术和知识。这肯定会改变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无论农民多么不愿意承认自己改变了信仰。

不要忘记:《另类农业》是针对美国而写的。美国的情况是:农田的供应比较充足,资本的筹集比较容易。例如,在农田比较充足的情况下,轮番种植玉米、豆类和燕麦,是可行的;在资本筹集比较容易的情况下,以机械方法代替化学方法除草,也是可行的。

但是,适合第三世界情况的另类农业是否存在,那很难说了。所谓第三世界的情况,指农地供应稀少和资本筹集困难。以低科技农业代替高科技农业,在北美洲可能行得通,但对于印度或印尼就没有多大参考价值。对于本节在开始时提出的问题,假装可以提供正面的答案,是没有用的。真正的情况是:就第三世界人口的吃饭问题而言,甚至连发展另类出路的基础都没有。另一方面,把农业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高科技农业之上,这种做法是否明智?谨慎的读者对于上一节提出的这个问题,自然会起了疑问。

2. 另类农业的问题:农民会用谁的头脑来思考?

无论如何,我从《另类农业》一书得到的启示,不是细枝末节,而是以农民的智慧代替育种专家、化学家或工程师的智慧。农民的智慧是植根于农田劳动的,而那些专家的智慧却是植根于实验室或实验田的。这个启示无远弗届,对于农业问题如此,对于政

治、经济、或气候问题也如此。结合农民的和专家的农业技术是否可行？对此我们当然可以质疑，但我们无需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场。

其实，自80年代以来，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传统知识的重要性。贝里就明确提出该看法(Berry 1984:25,28)：

人们从工业的眼光看农业，以为农民在耕作时遇到的连串问题，年年都一样，每个问题也有同样的解决方法。因此，工业的解决方法可以轻易而安全地取代农民的解决方法。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一个农场，由于气候或其他所谓的变数，每年出现的连串问题都不太一样，甚至个别的问题也不是年年重复。好的农民，就像艺术家、橄榄球赛中指挥反攻的四分卫和政治家一样，必须懂得多种应变方法，而且要在压力之下选择应变方法，在适当的地点和适当的时机运用这应变方法。这需要水平超卓的知识、技术、智慧、经验和想像力；如果农耕是一种艺术的话，则这样的头脑结合活生生的传统时，大概才可以发挥得最好。

我认为，在一些关键的意义上来说，农民的头脑不是教科书或专家意见可以企及的。应该说，教科书和专家意见对于农民是有帮助的，但只能通过翻译，把抽象的翻译为具体的，这虽困难，仍是可能的。但专家进行这翻译的话，便一定会心怀优越感，而且会过分简化，结果会把专家和农民的思想和工作都贬低、最终毁灭。对于教科书作者或专家来说，农庄是运用知识的地方，必然是暂时性和理论性的，而他们的设想必然要在一般情况下适用的。但是，对于农民来说，运用其知识之地是极为独特的，不是普通农庄而是这一个农庄、我的农庄，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如果经营这农庄时缺乏对于这农庄的紧密而独特的知识，把这农庄当成是任意一个农庄，则等于违反

这农庄的规律,损害这农庄,最终毁灭它。农民直觉上意识到这危险。

因此,说不可能完全描述农民的头脑,原因之一,就是农民与其农庄无法分割;或者,反过来说,农场是人造的,与创造、利用它的头脑分不开。二者浑然一体,破坏这联合,就是从根本上破坏人类文化。

贝里的观点在第三世界得到很大反响,尤其在非洲。“土技术土知识”成了一面旗帜,催生了不少著作,其中布罗肯萨等人1980年出版的《本土知识体系和发展》(Brokensha et al. 1980)一书,即使不是最早的成果的话,也是早期的重要著作。该书的观点一般比贝里的观点温和,认为土技术土知识是对外来专家知识的补充,而非与之对立。但是,把两套知识相提并论就已经够大胆了,对于未受教育的以及往往是文盲的农民,该书坚持认为他们对于乡土的独特知识是有价值的,这已经大幅背离了农业知识教条。

可是,在主流以外,这观点却甚为古老。索尔坚持认为墨西哥的问题源于贫穷和政治压迫,就是因为他相信农民适应各种生活情况的高度能力,这种适应能力是以聪明智慧为前提的,而非愚昧无知。

经济学家对于土技术土知识不知所措。他们习惯了将算计和极大化作为理性的行为规范,如果肯定农民行为背后的知识,则势必也要肯定许多非理性行为。但这又把经济学家推到矛盾的另一端:发展的理由到底要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如果发展不是意味着用科学知识取代落后的传统和迷信,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

舒尔策(Theodore Schultz)巧施妙计解决了这个矛盾。他既肯定了农民知识的价值,又肯定了要超越农民知识的必要,这番左右逢源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奖。根据他的《改革传统农业》一书

(Schultz 1964),传统的农民原来也像我们一样,是个精明的经济人,时刻算计和极大化。农民的问题是盈利机会少,缺乏资源、包括经济学家喜谈的矛盾用语“人力资本”(到此为止索尔仍不会反对)。在传统农业的古老背景下,农民的知识足以使他们采取理性行动和追求效益,但在现代农业的背景下农民知识就无关痛痒了。新的机会需要新的知识。

因此,发展还是必需的,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附带条件:我们完全不必担心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问题。作为经济人,农民会一如既往地适应新环境,聪明地利用资源和机会,创造最佳经济效益。

言下之意,像舒尔策这样的经济学家,是预期专家知识和农民智慧快乐地结合起来。专家提出各种方案,而农民则择善而行,也就是说择其有利可图者而行之。我却没那么乐观。

3. 一个典型的故事:混合种植法的衰亡与复兴

混合种植法,就是在同一块耕地上种植多种农作物。我正好用它的兴衰历史来反映我的疑虑。粗略考察,这故事似乎是土技术土知识衰亡和复兴的例子,因此支持了舒尔策的观点。但对我而言,这故事典型之处正好相反:它反映出,将土技术土知识结合到农业学识(episteme)的计划是有局限的。我们首先从那著名的农业异端霍华德爵士(Sir Albert Howard)开始,他一生的事业都花在对印度农业的研究上,并在1940年出版了《农经》(Agricultural Testament)一书,该书已经成为另类农业派的圣经之一。他说(Howard 1940:13):

混合种植农作物是常规方法。从这一点讲,东方的耕作者跟了这个在原始森林里发现的自然定律。在以谷类为主要农作物的地区,混合种植法大概是最普遍的种植法。农民

种植谷子、小麦、大麦、和玉米这类农作物时，也同时混合一种辅助性的豆类，这种豆类有时比谷类晚熟得多。在恒河流域冲积地带的豆类作物中，⁽³¹⁾最重要的也许就是印度木豆，农民要么把它与谷子混合种植，要么把它与玉米混合种植。混合种植谷类和豆类，似乎对两者都有益。当两种作物一同生长时，生长的情况也改善了。是否两种作物的根部排出有益对方的物质？这些排出物质，是否与热带豆类的和谷类的根部发现的菌根共生体(mycorrhizal association)有关？科学目前还未能回答这些问题，研究这些问题还是刚刚开始。西方科学所刚刚开始发现的问题，东方农民已经预见到、并且已经拿出解决方法，这又是一例。为何搭配适当，农作物就能生长得最好？无论原因是什么，混合种植法一般比单一种植法收效更佳，这却是事实。

尽管有霍华德的这些看法，但绿色革命 60 年代初的开路先锋却把混合种植法视为落后的象征。记得接近 30 年前，我首次接触印度西北部农村，当地所有农民都混合种植鹰嘴豆和芥菜，就其原因我既询问了农民，也询问了专家。农民要么说不出个所以然（“我们一向都这么做”），要么说这样可以保险（“假如雨量不足，至少其中一种能活下来”）。在专家眼中，为保险而混合种植是不成理由的，因为要分散雨量不足的风险的话，两块耕地而种植同一种农作物，与一块耕地而种植多种农作物，其效果都是一样的。专家们也就很轻易地认定传统做法全无理由。60 年代的科学，在解答霍华德的问题方面，比霍华德身处的 40 年代并没有多大的进展，也许因为科学家认为他们已经有了答案，因此心满意足。我翻查了福特基金会印度司整个 60 年代的档案，发现惟一提及混合种植法的，是一位农业顾问（我恰巧认识他）。他对混合种植法非常不

屑：“所谓混合种植法，就是将两种农作物同时播种，它们在成长季节互相剧烈竞争。一般说来，混合种植法与密集型农业的概念是无法相容的。”^[32]

有趣的是，印度的农业科学家却抱比较同情的看法（也许他们比起英美的同行们更加科学）。艾耶尔（A. K. Narayan Aiyer）受印度农业研究委员会委托，撰写了一份长达百页以上的报告，并发表于《印度农业科学学报》（Ind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上，他首先提出（pp. 439, 446）：

将农作物混合种植这种做法……是印度独特的而又是印度农民广泛实行的种植方法。我们甚至可以说它使印度农业迥异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农业。由于它如此普及，由于它牵涉的农作物品种如此繁多、耕作条件变化如此巨大，我们应该把它作为一个科学考察和研究的项目来处理，它的重要性至少不亚于迄今为止已经成为科研对象的许多事物。

外人对于混合种植法的态度，取决于他们的习性。他们要么脱斥混合种植法，说这是因为印度农民无知，不懂得轮耕；要么视之为适应印度需要的聪明透顶的发明，它充满着农民通过实践而得的智慧，值得深入研究。

艾耶尔只有一次改变立场。他报告一次实验成果时引述科尔曼（Leslie Coleman p. 473）说：^[33]

在迈索尔邦[Mysore]，人们普遍相信，混合种植农作物，是因为其产量高于单独种植个别农作物。但我们进行的少数实验完全不能支持这种看法。事实上，当我们把原来混合种植的农作物分开种植后，其产量高于混合种植所得的产量，有

时这差别还相当显著。

艾耶尔补充说：“当然，值得考虑的是：我们的实验只为期两年，而当地农民对于混合种植法的信心，却建立在多年经验之上。”艾耶尔的文章说，他们再次对于同类农作物进行混合种植与单一种植的比较实验，这一次并且将实验年期稍微延长。他直接引述科尔曼说：“结果相当清楚地显示，混合种植比单一种植更加有利可图。假如撇开稻草不算的话，单一种植所得的每公顷平均产值为18卢比，而混合种植所得的每公顷平均产量为25卢比。”但科尔曼仍不肯服输：

尽管存在明显的产量差异，但是，只有单一种植法才能让农民提早犁地，而提早犁地可以提高产量，因此单一种植法仍然有可能借此比混合种植法获得更高产量。不过这应该是未来研究的题目。

艾耶尔又重新检视了有关混合种植法的一系列问题，包括豆类吸收氮元素的能力、以及非豆类作物能否通过混合种植而吸收氮元素；混合种植法对于土壤水分的影响以及吸收；混合种植法对于防虫和防病的作用等等。报告的末章探讨了混合种植法的经济效益问题。他认为支持和反对混合种植法的证据远不充分，结果是对于混合种植法下一“苏格兰式裁决”，即存疑，这也是意料中事。

同时，耕作者继续实行混合种植法，而只有在偶然的、很偶然的情况下，专家才会留意。马瑟(P. N. Mathur)就是其中一人，他注意到混合种植法的普遍性及其优良经济效益(1963:40)。但有一个支持混合种植法的马瑟，就有一个反对混合种植法的特伦

巴斯(Brian Trenbath),他在1947年重申难以判断混合种植法的优劣,但他对混合种植法颇多微词,兹长篇引述如下(1974: 205):

在大部分情况下,把两类农作物混合种植所得的产量,都在把它们分开单独种植所得产量的水平之间,……这……可说是意料中事,因为我们假设两类农作物在竞争同一资源。……这意味着混合种植法所得的相对总产量……其价值接近于单独种植所得的总产量。……实际上也是如此。

在少数情况下,把两类农作物混合种植所得的产量,……却在把它们分开单独种植所得产量的水平之上。这显示上述的比例模式并不总是正确。但是,由于往往没有重复实验,而混合种植法产量高于单独种植法的幅度很小,因此我们无法论断……这是出于实验误差还是出于真正差别。我们可以提出一系机制,使混合种植的农作物互利互惠,则我们观察到的混合种植法产量高于单独种植法产量的情况,应该是由这些机制造成的,至少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我把这最后一句画上着重号,是因为我认为这句话引出一个重要问题:习俗以及附属于这些习俗的知识,当无法被西方科学找出可信的机制时,这些习俗的地位如何?这些知识还会被认为有价值吗?我下文还会谈到这个问题。这问题对于特伦巴斯尤其有关系,因为他在同一页下面就承认了科学的局限,至少是现有科学模式的局限(pp.205-6):“由于许多农业生态系统复杂而难以预测,人类宣称掌握它们,其实只是表面上的掌握而已。”

混合种植法这种印度本土的习俗,受到专家的忽略、冷淡对

待,甚至敌视。这过程同时也在非洲重演。诺尔曼(David Norman)说:“由于这种混合种植法往往与‘挣扎求存’的农民联系在一起,它不值得成为严肃研究的对象。”(1974:4)他马上进行补救,说他自己非常严肃的研究,是要“显示农民不愿转向单一种植法,是有其技术上、社会学上和经济上的好理由的”(p.17)。

尽管诺尔曼意在维护传统习俗,但他更接近特伦巴斯的立场,尽管双方也许都不愿承认。对于诺尔曼来说,“好理由”是西方观察者或者受西方训练的观察者所能够接受的理由。其论调不单是维护性的,而且也是操控性的。诺尔曼认为,发展混合种植法,可以使农业改革者在农村的大门找到一立足点(p.17):

一旦农民接受了与他目前传统面貌不太相冲突的发明,例如,继续混合种植法但提高了产量,则农业改革者建议实行更激进改革时便比较容易,例如,在技术条件改良后,若证据显示单一种植法对农民有利,便可建议实行单一种植法。

克拉布的阴影又出现了——克拉布也赞扬杂交玉米,说它是在农村推行更激进改革的起步点!

诺尔曼也许不自知,但他其实参加了一场运动。70年代末,英国苏萨克斯大学(Sussex University)发展研究所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贝尔肖(Deryke Belshaw)发表了文章,题目非常有意思:《严肃对待土技术:东非混合种植技术之个案》。贝尔肖对于东非混合种植法的态度,与比他早一代的霍华德和艾耶尔对印度混合种植法的态度相似。贝尔肖还记录了官方对于优先维护本土习俗的冷淡反应甚至敌意(尤其参考 Belshaw 1979:25 n.1)。

但大约在这会议召开的同时,官方的态度也正起变化。早于1975年,美国农业科学学会就赞助召开了一个有关多元种植的学

术会议,对混合种植法持同情态度。会议文章还被该学会特别结集出版(Papendick et al., 1976)。1979年1月,位于印度海得拉巴(Hyderabad)附近的亚热带农作物国际研究所(ICRISAT),召开了国际会议,检视了从巴西到非洲(西非和东非)到印度的混合种植法,检视的角度也是多方面的:植物生理学问题、农作物抗虫病问题、混合种植法的经济效益和管理问题等等。有人批评,专家把注意力集中在靠人工灌溉的农作物上,而忽略了在边缘地带和干旱地带的农民。对于靠人工灌溉的农作物如新培植出来的杂交麦子和稻米,专家致力于提高它们对于化肥的吸收力。如果灌溉不足,高科技农业所要求的大量化肥就很容易使农作物减产,甚至造成灾难。这次会议,就是建制对这个批评的回答。

因此这个会议绝不是普通的学术会议,而是官方对于土技术土知识的正式肯定,尽管专家们对于传统知识的潜在肯定,都还大部分被归人注脚,例如乔德哈(N. S. Jodha)的这个脚注(1981: 289):

混合种植法被推广至极至,……部分原因是传统,根据这传统,农民至少要在—块耕地上种植九种农作物。农民实行这个名为“九粮”(Nava Dhanyam)的仪式,是因为相信自己有责任保存天赐的种质(germplasm)。这个习俗在印度几个地区非常流行,但现在则因为耕作越趋专业化而迅速消失。

科学建制终于认识到传统习俗的价值,并且科学地处理它们,把传统价值带进现代性的大伞之下。这转变也许迟了,但总比不转变好。1986年,弗朗西斯(Charles Francis)把有关多元种植的各方面文章结集出版,对于混合种植法相当推崇。1989年还出现了一本完全用数学模式研究混合种植法的专著(Vandermeer

1989)。

现在,我们可否期望传统和现代的知识体系不但和平共处,而且互利互惠?我认为是不可以的。我将首先提出简短的论据,然后用本文剩下的篇幅来解释我的答案。

4. 知识的体系

我的简短答案就是:西方知识的意识形态阻止了传统和现代的知识体系和平共处。成为西方科学根基的知识体系,在理论上可以和其他知识体系共存,但在实践上,意识形态使西方的知识体系提出全面的和排他的要求,因而排除了和平共处的可能。西方学识的政治效果,使西方知识体系对于自己无法理解和利用的事物,不但不会欣赏,甚至不能容忍。的确,在西方知识体系中,凡不能被拥有的,就连知识的地位也无法获得。这已经够糟糕了,但更糟糕的还在后头。因为所有知识体系都不完整,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必有所遗漏。凡是无法被化约为西方科学语言的,就不算知识,因而被完全遗忘。就现代知识与土技术土知识的接触而言,真正的危险不是现代知识挪用土技术土知识,而是挪用得不完全,然后再将这破碎的知识作为从迷信和谬误中提炼出的金科玉律还给农民。处于现代知识和土技术土知识接触面以外的事物,就有完全消亡之虞。

让我说明我这种恐惧的理由。我在另一篇文章中(Marglin 1990)曾把学识(episteme)和技艺(techne)作为观察、理解和经验现实的两种独特体系。我提出两点看法。第一,知识和行动是基于学识和技艺的搭配与综合,有时是基于两者之间的张力。第二,尽管实践上学识和技艺互相依赖,但西方文化在意识形态上把学识地位抬高,以至于有时候技艺不但被视为劣等知识,而且根本就算不上是知识。除非技艺可被学识解释,否则技艺仍然是迷信、信

仰或偏见。我认为,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等级制严重影响了学识和技艺的真正接触,使技术性的知识名不正言不顺,甚至无法被看见。

我要首先强调,我不是要批评学识这种知识体系。相反,可以说,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掌握了学识。但问题在于,知识被完全等同于学识,因而使学识产生独尊趋势,排斥其他同等重要的知识体系。人之所以为人,固然因为学识,也因为技艺。正因为我们能够将学识和技艺相结合,我们才有别于动物和电脑。动物有技艺,机器有学识,但只有人类才兼学识和技艺而有之⁽³⁴⁾。不用说,我这种对于人类知识的看法,使我怀疑人工智能的可能性。除非我们对人类怎样结合学识和技艺有更多了解,否则我们难以在机器上结合学识和技艺。

但言归正传。我要说明什么是学识和技艺,否则就无法很好地探讨知识体系间的关系。首先,让我说明知识体系不是什么。知识体系不是指任何一个专门的知识领域。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工程师和人事部经理,他们都与不同的知识领域打交道,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拥有共同的行规,或者说,他们对于自己使用的知识体系,都有共同的意识形态。

所谓知识体系,我指的是从四方面组织知识的方法。这四方面是:知识论、传授、改进和权力。每个知识体系,都有自己关于知识的理论;关于获取和分享知识的规则;关于改变知识的内容的独特方法;最后,还有关于制御体系内部以及制定体系内外沟通的法则。

我用“体系”一词,目的有二。第一,该词显示出:知识论、传授、改进和权力⁽³⁵⁾这四方面,不是一般知识的特色,而是不同认知方法(ways of knowing)的特点。知识论并非只有一种,每种独特的认知方法都各有独特的知识论。同样,每种认知方法都各有在

长时期内传授和修正知识的方法。在分享知识的人之间,在体系成员和非成员之间,有各种权力关系,而独特的认知方法,可以与这些权力关系共存。

第二,“体系”一词显示出,这四方面是互相联系的。我们如何认知、如何学习和传授,我们如何改进知识、如何与权力发生联系——这四方面而是互动的。同时,每种独特的认知方法的建构过程,也与这四方面互动。

我已举出两个知识体系,并命名为学识和技艺。我会在这两个体系的背景下阐释上述看法,希望能说个明白。在这过程中我也会解释这两个古希腊字眼所指为何。的确,我会指出它们在知识论、传授、改进和权力这四方面的对立之处,从而解释它们,而不是为某种古老语言中的两个字眼找寻适当的英语同义词。运用这两个字眼,意在引起争鸣,而非一锤定音。

学识这种知识,是从不证自明的第一原则中逻辑地演绎出来的。学识因此结合了演绎和归纳。归纳在决定第一原则时扮演重要角色,而演绎则用于从这些第一原则中经过一番推论后达到结论。“逻辑演绎”是一小步一小步进行的,不会放过任何小节,不会让概率或想像力有用武之地。西方知识论的理想知识模型,就是欧几里德几何,尽管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发现欧几里德的公理并非如从前以为的那样不证自明。现在我们有很多种不同的几何,各自有自己的公理基础。除了数学定理之外,我能够想到的西方知识论的理想知识模型,就是电脑程式。

西方知识论下的知识,是分析性的。它把知识的整体化解、拆除,得出其元素。因此,它是可以直接和立刻可以还原的。它是完全横铺直叙的。在学识之内,可以说,凡是不能被铺陈叙述的,就根本不能被算作知识。学识是否潜在地放诸四海而皆准,尚无定论。但毫无疑问,许多人,尤其在西方,往往不认为学识只是众多

知识体系之一,而认为学识就是纯粹和干脆的知识。我的看法是,学识有这种性质,并非学识本身的特点所致,亦至少不是学识的知识论的特点所致,而是西方知识的政治的特点所致。西方知识论下的知识,是纯粹大脑的知识,思维与身体是分开的,而学识则只为思维服务。“我感到你所说的有点不妥”这句话,等于说:“我感到有点不妥,但我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样的话在学识里是没有分量的。

即使在应用上,学识也是理论性的。我们一旦承认原理是假设和暂时的,则学识的陈述必然是假设。我们不必自寻烦恼,卷入波普尔(Popper 1968)与其对手的论战(Kuhn 1970, Lakatos 1970, Putnam 1974),但我们确实可以说,学识最终的发展,就是证伪和证实。学识的程序,强调一小步一小步紧密而直接相连,这程序本身就预先排除了发现和创造。要通过学识来发现或创造,就像猴子抄写莎士比亚的名著:也许它有天能够做到,不过却是非常困难的。

最后,学识是不近人情的知识。就像基督教的上帝一样(罗马书第2章第14节),学识是不偏不倚的,原则上任何人都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接触它。因此学识不但是理论性的知识,还变成了理论上平等的人的理论性的知识。到此为止还好吧,谁不赞成迈向平等呢?问题是:基督教的上帝,从犹太部落的神升为宇宙神,这段历史,使基督徒排除了异教徒得到救赎的可能性。同样,学识升上意识形态的优越地位,也使其他非西方的知识体系遭到排斥。由此而宣称学识适用于全球,是很容易的政治任务,再由此而认为缺乏学识就是缺乏知识,也是再容易不过的。

学识从不证自明的原理上进行逻辑演绎。与此相反,技艺的基础很多元,从师傅(男女均可)的权威见解到自己的直觉都有。无论怎样,最重要的还是经验。学识着重一小步一小步的推理,与

此相反,技艺则既依赖老规矩,又依赖想像的飞跃,一举解决难题。约定俗成的老规矩和想像力飞跃都是对整体的知识,难以被拆解成元素。因此,学识是分析性的,而技艺却是不可分解的。

铺陈技艺不是不可能,但却非常困难。拥有技艺的人一般都知道自己拥有特殊的知识,但他们的知识不是显明的,而是潜藏的。它是在织布时、画画时、进行仪式时和预测经济活动时显示出来的,而非写在教科书上,供织布学徒、艺术家、祭师、或经济学家来学习。无论学识是否放诸四海皆准,技艺的立场是很明确的:技艺并不适用全球。技艺与本质就是特定的,与时空紧密相连。技艺总是为手头上一个特别目的而设的,技艺是有具体背景的。

意志和身体的二元对立,是学识的基本特点,但技艺却否定这种二元对立。在技艺里,我们除了用自己的头脑认知之外,也用我们的手、眼睛和感觉^[36]来认知。对于凯恩斯(Keynes 1936:161)所说的动物精神,对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和A.森(Amartya Sen)所说的“情绪的认知作用”(1989:316),技艺都予以同样重视。技艺也是靠触摸而得的知识。感觉,无论是感受的意思,还是知觉的意思,^[37]都是技艺的关键。技艺是既属于触觉的,又属于情绪的。

技艺是极端着重实践的,以致只能在实践中显示出来,这我在上文也已提到。这不是说技艺背后没有理论,但它的理论是潜藏的而非外露的,使用技艺的人不一定掌握理论,甚至往往没有接触过这些理论。技艺这种知识是服务于创造和发现,而非服务于证实。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数学定理也是技艺的产物,尽管数学定理的证明过程必须以学识的方式进行,这是数学所属的知识体系的要求本身造成的。最后,学识是不近人情的,而技艺则并非不近人情,也不可能不近人情。技艺一般存在于各种关系网络中,脱离这些关系,则无法传授,甚至无法维持。技艺的普通传授渠道,例如

父母与子女之间、师傅与徒弟之间、宗教导师和信徒^[38]之间等,都是很有人情味的。

这些关系,一般不是以平等为基础的关系,而是包含着以年龄、权力和知识为基础的等级关系。但应该指出,这种等级不是金字塔式的,而主要是线性的,底层和顶层都同样大小。底层的人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攀升至顶层,并非痴心妄想。技艺的等级,是行会式的等级,在这里每个学徒都有希望成为师傅;而非工厂式的等级,在这里只有很少工人能够成为工头,更遑论经理了。技艺的等级也可以建基于性别^[39]。

由于技艺承认了自己的时间、空间和目的方面的局限,它不能像学识那样可被轻易地运用到知识政治上,以拥有知识与否来划分世界。就对外关系而言,技艺当然在本质上不是平等的,但至少是多元的。

从我提出的、区分知识体系的四方面来看,学识和技艺的差别是惊人的。就知识论方面而言,只有那些从公理根据逻辑法则演绎出来的,学识才承认是知识,而这些公理又必需为不证自明的第一原则所接受。相反,技艺则容许知识可以多途并进,可以从权威而来,可以从直接经验而来,考验知识的是实践上能否行得通。

就传授方面而言,学识和技艺在传授方面的差异,不下于在知识论方面的差异。学识这种知识原则上可以通过推论而获得,但实际上学识一般都是通过正式教育来传授的。的确,在西方,知识越来越被等同于学校所教的东西,而学校教育也以学识为主,以至于我的一个侄儿建议用“书本知识”和“街头知识”二词来代替学识和技艺二词。但也有例外。^[40]

而传授技艺的典型方法,正如我指出,是通过师傅——学徒这种人际关系来进行的。师傅主要是以身作则来教导学徒,而非通过什么规条,学徒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学习。几乎任何人都能借此

掌握一门手艺的基本功,但水平高低则取决于领悟力高低,取决于多年实践而培养出的敏锐触觉和感觉。

就发明方面而言,通过学识来进行发明,会导致说一套做一套的情况。在理论上,学识的模式只容许我们以正确的逻辑推论,更正错误的逻辑推论,或者修改假设。我们可以补充现有的公理,或者用新的公理取代现有的公理,犹如牛顿修正其前人以及爱因斯坦修正牛顿一样,尽管这种情形比较罕见。有了新公理,我们就可以用老方法迈向新理论,因为新的定理不过是新假设的逻辑推论结果。但在实践上,正如我所指出,即使我们用学识进行发明时,也在相当大程度上混合了技艺,因为发明者必须知道其方向,但指示方向的不是逻辑而是直觉。技艺的发明基本上是试错的结果。这不是说技艺就是含糊不清,而是说技艺的发明的基础结构,就像因技艺的发明而被修正的技艺一样,往往连发明者自己也不大清楚的。

如果知识是个文本的话,学识发明的主要形式就是批评,学识发明的形式是直接攻击,挑战其逻辑或其第一原则。相反,技艺发明的主要形式是对文本进行评论、修正和解释。前人的权威不会被挑战,只会被重新诠释。因此之故,学识的发明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兴盛,因为在平等的基础上,个人权威才不会被过分推崇。阿贝尔拉德(Peter Abelard)挑战教宗和圣徒在经文方面的权威,引起了极大的重视,这就反映出,西方在12世纪就已经认为宗教知识是学识性质的知识。

就对内和对外权力关系而言,学识和技艺刚好相反。我已说过,学识是以平等为基础的,至少也需要平等的基础来发展,在西方,这个内部平等的集团也宣称其知识优越,因而使他们个人也好、集体也好,都优越于集团以外的人。但如果知识主要是植根于技艺的话,鞋匠、农民或经济学家组成的社区,便可以以不同方式

与其他社区交往。这个社区有时比外界拥有更多知识,因此获得更多权力;有时则拥有较少知识,因此获得较少权力,视具体情况而定。

应该指出,学识和技艺都是理想型(ideal types)而已。学识(episteme)与许多人所说的“科学”(science)意思相近。“科学”也的确是古希腊文学识的翻译之一,另一个翻译是“知识”(knowledge),这反映出学识宣称适用全球由来已久。技艺(techne)则较难把握,正如其词根显示,它有“技”的成分,因此把它译为“艺”能够捉着几分神髓。但当代的学者将这二词全部翻译成“科学”,对我来说也许更加适当,因为这样能够强调这二词的共同之处。学识也许是科学书写的形式,但技艺才是科学工作的方法。

我已经说明,学识和技艺是独立的、独特的知识体系,正如我不少得意的“原创性”看法一样,我这种看法处处找到共鸣。类似看法中最著名者,也许是皮尔锡(Robert Pirsig 1976)在《禅与摩托车维修的艺术》(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对于“古典”和“浪漫”知识的划分。其中细节不同,但他所说的古典知识,明显对应于我所说的学识,而他所说的浪漫知识,则对应于我所说的技艺。^[4]波兰尼(Michael Polanyi)谈到“心领神会”的知识,说在这种独特的认知过程中,触摸和感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58)。这在技艺中也是如此。在另一篇文章中,布鲁纳(Jerome Bruner)区分“右手”和“左手”知识,说“右手”知识立足于逻辑,“左手”知识立足于直觉。这也是学识和技艺的分野。

5. 从历史考察西方对于知识的意识形态

西方文化对学识的推崇,由来已久。学识这字眼,和技艺一样,当然是古希腊文,但在古希腊不同时期内和不同人之间,这两

个词汇的用法和意思如何演变？研究古希腊文明的学者莫衷一是。亚里士多德曾在《尼可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中对于这两个词汇作出类似于本文的正式区分，但亚里士多德的划分，其重要之处不在于清楚划分二者，而是推崇学识，贬抑技艺(1934:1139b, 14·20a, 24)。但应该指出，亚里士多德对于这两个词汇的用法并不一致(Nussbaum 1986:444)，比他更早的学者，包括柏拉图，似乎把这两个词汇混为一谈，至少在关乎本文的情况下是如此(Lyons 1969, Nussbaum 1986:444)。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是努斯鲍姆指出，在古希腊，技艺一词有众多含义，这些含义不但类似于我对学识一词的形容，也是区分二者的关键。

技艺受到贬抑，当然首先是阶级政治的后果。只要技艺指的是工匠的生产知识，则技艺随工匠本身地位低微而受到贬抑，是意料中事。但如果柏拉图的看法有任何指导意义的话，则古希腊上层阶级对于工匠的态度应该是含糊的。工匠在柏拉图有关原初的神话中，角色显著。创造本身就是创造主(demiurgos)的工作，而创造主就是工匠。而工匠的技艺是有目的的知识的模范，这看法在柏拉图对话录中一再出现(Klosko 1986:28, 41; Vidal-Naquet 1981:293)。这种含糊的态度，也许产生于现实中工匠角色的矛盾。一方面工匠的工作和知识，对于古希腊城邦的福祉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工匠的地位又非常卑微(Vidal-Naquet 1981:289-316)。

但比权力政治更重要的是古希腊有关知识的理论。弗南特(Jean-Pierre Vernant)指出，古希腊有关知识的理论使技术性知识，即工匠的技艺，受到贬抑。根据这种理论，工匠的生产有其无法预测的因素，因而污染了处理恒久不变和确定情况的纯粹知识。与学识不同，技术性知识处理的是近似(approximation)，近似“既用不着精密的测量，也用不上准确的计算”(Vernant 1965:ii,

51), 因此,

工匠的技艺不是真正的知识。工匠的……技艺基于对传统的忠诚。这个传统不属于科学,而存在于科学之外,使工匠屈服于偶然。经验并不能教导工匠些什么,因为工匠面对的处境,是在理性知识和偶然性(suche)之间,既没有理论可用,也没有可以检验理论的事实,根本就没有正确意义上的经验。工匠的手艺产生了一套严格的规则,根据这些规则,工匠盲目地模仿理性程序的严密和精确,但工匠也必须依靠长年工作而培养出的智慧,来适应无法预测的和偶然的因素,这些因素,或多或少存在于工匠的材料中。(Vernant 1965:ii, 59)

亚里士多德引用诗人阿伽松(Agathon)的诗句,精简地概括了问题:“技艺追随幸运,幸运追随技艺”(《尼可马可伦理学》1140a20)^[43]。假如我们接受弗南特的诠释,则技艺的地位必然因此受到贬抑。

在古希腊思想和社会制度的演变中,有序和无序之辩这问题,已得到维达尔-纳奎特(Pierre Vidal - Naquet)的详尽说明。技艺和偶然性的联系,使我们想起他的观点。由于古希腊人缺乏概率理论,他们把偶然等同于无序,而有关随机变化的知识根本就不算是知识(Hacking 1973)。可以说,对于古希腊人而言,学识不仅是知识的科学体系,而且是唯一的知识体系,也是社会秩序。学识吸引人之处,就是稳定吸引人之处。借用维达尔-纳奎特在另一场合用过的句子,工匠及其技艺代表着“无序和个人追求”(1981: 174)。

更糟糕的是,技艺,当然是工匠的技艺,是与经验(emperia)混在一起的,所以,因接触具体的和实用的事物而受到进一步污染。

“Emperia, 经验, ……既非实验, 也非实验性的思想, 而是在具体物质中取得的实用知识. 理论(即学识)就丧失其活力, 并且不再是理论了. 理论不是被运用到事实上, 而是在事实中被贬抑”(Vernant 1982:52)。的确, 我描述手工业生产的特点, 冠之以技艺一词, 而柏拉图则似乎冠之以“经验”一词。在《高尔吉亚篇》(Gorgias)中, 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谈及烹饪术: “我认为这不是艺术, 而是经验(habituée[emperia]), 因为烹饪术对于其应用的对象, 并不能说明其真正性质, 因此也无法说明其原因。我拒绝对任何非理性的事物冠以艺术(技艺)一词。”(465a)在《菲利布斯篇》(Philebus 55d - e)中, 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要求他的对话者考虑: “在各种手工艺中(manual arts [cheirotechnikat]), 是否有些与学识结合得比较紧密, 因此应被视为纯净; 而有些与学识结合得不那么紧密, 因此应被视为不那么纯净?”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继续说: “假如把所有艺术(技艺)中的算术和量度及称重之学都剔除掉, 则剩下来的东西, 可以说是相当无价值的。”

但无论柏拉图用的是什么字眼, 将知识分门别类是其哲学的中心思想。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贬抑工匠知识的典型例子。苏格拉底提及使用缰绳和嚼子的骑者和制造缰绳和嚼子的工匠, 并通过二者的关系来阐述柏拉图的观点。苏格拉底说: “或许, 甚至制造这些东西的皮匠和铜匠本也不知道, 而只有懂得使用这些东西的骑者才知道这一点吧?”(601c)¹²³⁾问题并非学识和技艺的分别, 而是学识和技艺在一方, 正确的信念(orthodoxa)在另一方的分别。苏格拉底继续说:

因此, 完全必然的是: 任何事物的使用者乃是对它最熟悉的, 使用者把使用中看到的该事物的性能好坏通报给制造者。
例如吹奏长笛的人报告制造长笛的人, 各种长笛在演奏中表

现出来的性能如何,并吩咐制造怎样的一种,制造者则按照他的吩咐去制造。……因此,制造者对这种乐器的优劣能有正确的信念(这是在对乐器有真知的人交流中、在不得不听从他的意见时的信念),而使用者对它则能有知识。(601e)^[44]

词汇也许不同,但毫无疑问,工匠的知识属于另外的、劣等的范畴。

同样,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工匠单靠自己的本领,只能获得劣等的知识。其实,他甚至接受了柏拉图有关制笛者和吹笛者的寓言,并且跟随柏拉图,认为工匠的知识仅是“信从”(《政治学》1277b 27-30)。^[45]“只有精于几何的人们才能确切地选定一位测量员,只有老于航海的人们才能选定一位舵手”(《政治学》1282a 9-10)。^[46]执迷不悟是愚庸之人的顽劣本性。亚里士多德相信,即使奴隶的工作,也有学识,尽管是劣等的学识,例如烹饪就有其学识(《政治学》1255b 26-32)。^[47]就此而言,亚里士多德才是科学管理之父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真正先驱。

当然,说几个古希腊哲学家对于知识的观念,尤其是对于工艺知识的观念,就决定了西方从古到今对于知识的观念,这是言过其实了。首先,对于古希腊经典是可以有另类诠释的,现代学者的工作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可能性。例如,主流意见认为,“古希腊”思想家(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知识局限为那些可以通过逻辑、从不证自明的第一原则中推理出来的知识,这也是我对于学识的定义。与此相反,努斯鲍姆(1986:290ff)最近认为他们对于知识的观念很有弹性,亚里士多德尤甚。根据努斯鲍姆的诠释,亚里士多德把实用智慧,即生活知识,区别于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学识之外,正因为实用智慧依靠的是情绪、经验、以及其他被我归入技艺范畴的因素。努斯鲍姆认为,亚里士多德把实用智慧区分于学识之外,

但并没有因此贬低实用智慧的地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另类诠释是比较晚近的现象,而主流的诠释却至少可以上溯至阿奎那的时代。这主流的诠释虽然是诠释,却不可能是随心所欲的捏造。学识如果没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就无法在当代西方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但我们无需费这么大力气追溯到古希腊来重塑学识的历史。学识的定义本身,也许是从笛卡儿来的(极有可能是在抄袭欧几里德,尽管是不知不觉)^[46]因为笛卡儿正是在其《方法谈》(Discourse on Methods)及其《第一哲学沉思录》(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中具体地解释了欧几里德获取真正知识的方法(Descartes 1637/1641)。但在某种意义上笛卡儿是个时空错置的古希腊人,对他来说,数学就是知识模范,而知识模范的模范就是欧几里德几何。模仿数学理论形式的学识,就是针对当代知识“分裂和不确定”的应变之道(Descartes 1637/1641:编者序言 p. vii)。这应变之道,与“确定、必然、精确”相呼应。

笛卡儿开展其工作的时代背景很重要,因为它让我们明白学识何以有吸引力。学识对于笛卡儿,正如对于古希腊人一样,是针对当时威胁社会秩序的动乱的应变之道。从马丁路德时代爆发的宗教争论,使基督教徒产生严重分裂,到了笛卡儿时代,更有毁灭欧洲文明之势。笛卡儿时代是“三十年战争”^[49]时代,他本人作为纳骚亲王莫里思(Prince Maurice of Nassau)的志愿兵,亲眼看到这种威胁。图尔敏(Stephen Toulmin 1990)就指出,宗教容忍运动的主要内容,是纳瓦尔王亨利三世(Henry of Navarre)的多元化政策,以及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51]的多元化怀疑论。这运动失败,才直接引发出笛卡儿建立知识新基础的努力。

对于怀疑主义,我们也要注意其时代背景(Popkin 1979)。在近代早期,为挑战教宗权威,新教徒提出“内在权威”的观点,“内在

权威”顾名思义就是不证自明的真理,或者说不证自明的多个真理,因为结果会弄出多个真理。而怀疑论的兴起,自然就是旧教对于新教这一观点的回应。怀疑论攻击所有宣称掌握绝对真理的学说,希望借此挽回被岁月和传统侵蚀得最厉害的教宗权威,并且对于教宗的权威也加以一定的修正,令其变得比较温和,至少在蒙田的怀疑论中是如此。

怀疑论学派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也许因为蒙田温和的多元主义并不适合宗教复辟运动的要求。鼓吹多元化和容忍的主张没能盛行,反而宣称掌握绝对真理的各种学说在疯狂叫嚣。笛卡儿就是希望利用其新颖的知识体系,解决这场学术冲突。

笛卡儿和其同时代的人,就像古希腊人一样,把不确定性和疑惑等同于无序。学识是理性秩序的知识体系,因此(他们希望)也就是社会秩序的知识体系。三十年战争正是社会动乱的缩影,但当时的人不必直接接触战争,也能感受到时代的分崩离析。现代的诞生,使社会多方面都感受到痛苦,所有制度都在动摇,不仅宗教如此,还有家庭、工作、政府,当然还有土地,也都如此。

就此而言,学识在当代立足,其时代背景也与古代相似。古希腊经典专家多兹(E. R. Dodds)指出,古希腊哲学的诞生,适逢荷马时代到古典时代的转变。这个时期,人们的不安全感增加,人们并不是产生了“新的信仰,而是对于旧信仰产生了新的情绪反映”(1951:30)。无疑,人们的不安增加,原因有很多,但多兹很强调公元前7—6世纪古希腊的政治和经济动荡(pp. 44f)。但是,政治和经济危机自去自来,却并不都会产生有关知识的新颖意识形态。那么,公元前7—6世纪古希腊这段动荡时期有何特别呢?多兹认为,人们认为社会无序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家庭制度瓦解,尤其是父权崩溃。根据多兹的这种解释,当时的情况似乎和近代早期很相似,我不得不看重多兹的看法。个人权威是技艺的关键,而学识

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对于个人权威的挑战。

由于不确定性这个问题如此关键,笛卡儿死后不久,知识界对于不确定性和疑惑的处理,就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这是很自然的发展^[52]。正如哈金(Ian Hacking 1975)指出,人们意识到可疑知识与可靠知识的区别是程度上的分别,而非本质上的分别,这种新认识,结合对事件的概率性质的理解,就产生了现代的概率观念。第一本反映这些观念的著作,是阿尔诺德(Antoine Arnoide) 1662年出版的《思考的艺术》(The Art of Thinking),即所谓“波尔特—罗雅尔逻辑学”(Port-Royal Logic)^[53]。哈金的著作是力作,既精彩又有趣。他认为,知识就是绝对这个观念,源于古希腊,而概率论就是对于这个观念的批判。但是,我想他犯了错误。哈金认为,古希腊的等式:

知识:绝对 = 意见:不确定

被现代概率论打破了。概率论改变了知识和意见的分野,以至于知识可以容纳意见。但我认为,笛卡儿以及笛卡儿之后的波尔特—罗雅尔逻辑学家们,似乎在强化知识和意见的分野,把概率也带进绝对的范畴中。

因此,概率理论不是对于绝对观念的批判,反而是对于不确定性观念的攻击。概率论计算把不确定消融于真实的、确定的和知识的领域内。技艺的标志是不确定和模拟,它们都被学识的绝对和精确打消了。随着技艺向学识低头,不确定性就成了风险。风险是可以用于计算和极大化的。

就像怀疑论者的努力一样,概率论者的努力也不大奏效。诚然,概率论的贡献很大,保险业就是个好证明。多亏我们对于概率理论的了解,我们才可以购买人寿保险、火灾保险,甚至医疗保险,而价钱基本上是根据保险统计原理计算出来的。但是,无论怎样计算,也无法把不可计算的因素从技艺的领域搬到学识的领域。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技艺热爱机遇,机遇也热爱技艺。简言之,技艺就是关于不确定的知识体系,而不确定就是对于生命的祝福,当然有人会持异议。

的确,假如经济活动依靠学识方式的计算,则经济活动将大为逊色。凯恩斯和熊彼德可以说是本世纪最富创见的经济学家,就政治立场而言,他们分别处于两个极端,但在这一点上却心有灵犀,保持一致。对于凯恩斯来说,把资本投入到具体形式,即所谓投资,依靠的是“野兽精神”,这种精神“想动不想静”。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一书中,凯恩斯对这个观点作了精彩的发挥(pp. 161-2);^[54]

除了投机以外,还有其他不稳定因素起因于人性特征。我们之积极行为,有一大部分,与其说是决定于冷静计算(不论是在道德方面、情感方面或经济方面),不如说是决定于一种油然而发的乐观情绪。假使做一件事之后果,须过许多日子之后方才明白,则要不要做这件事,大概不是先把可得利益之多寡,乘以得此利益之概率,求出一加权平均数,然后再决定。大多数决定做此事者,大概只是受野兽精神的驱策,这是一种悠然自发的驱策,想动不想静。不管企业计划书写得如何坦白诚恳,如果说企业真是遵守计划书而行事,则只是自欺欺人而已。人们组织南极探险时,并不太计较利益得失,企业决定投资时,对于利益得失的估算,也不比南极探险队高明到哪里去。因此,假如这种野兽精神衰退,悠然自发的乐观情绪动摇,一切依盘算行事,企业就会萎靡而死。

熊彼德在其《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中也以相似的口吻写道(p. 85):

军事行动,即使当本来可能获得的所有情报都不具备时,也必须在既定的战略地点展开。同样,在经济领域中,即使还未研究好全部细节,也要采取行动。成功取决于直觉。直觉就是能够作出判断,虽然在当时无法证明是对是错,但事后证明正确;直觉就是能够把握关键、不顾枝节,尽管行动者本身也说不清其原理。在某些情况下,全面的准备工作、特殊的知识、深厚的学术、天才般的逻辑分析,反而可能是失败的原因。

6. 每个农庄都应该成为实验室

凯恩斯和熊彼德都认为,我们依靠学识式的计算来决定做一事而不做另一事,不过是为了装模作样,让自己看起来像个理性的人。当我们面对众多不确定性而要行动时,主要依靠的是技艺,不论我们喜不喜欢承认。

人类活动中,本质上最不确定、因而学识式计算最难以派上用场者,无过乎农业了。其实,高科技农业的问题,尤其是绿色革命的问题,可以说是农民土地与科学家实验室的差别而造成的,至少可以说这是部分原因。农民的土地是不规范的、不确定,而科学家的实验室是井井有条的。农业学识企图填平这道鸿沟,但它只懂得一种方法:削足适履。它的目标是把农地变得尽可能像实验田,重新制造实验站的人工环境,使高科技农业达到高产量。

但农业学识总是达不到其目标。土质有别、水分缺乏、微观气候有异、天气变化,任何问题都可能出现。而且条件的改变,一半属自然发生,一半亦因农业科学的干预所致。正如曼格尔多夫所说,农作物病菌与育种专家之间的战争,永无休止之日。开明的专

家们意识到这些问题,于是尝试吸收农民的知识,与农民展开对话,而非单由专家向农民灌输知识。

然而,学识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立场,严重地局限了专家与农民的对话。尽管专家既运用技艺,又运用学识,但是,指导专家知识的意识形态,却迫使专家运用学识的语言。

专家承认了农民的技艺的地位,土技术土知识就是农民技艺的主要内容。专家也乐意向农民学习。另一方面,专家利用学识重组农民的技艺,并且急不可待地将之反馈农民。但恰恰在这里麻烦出现了。专家所能反馈的,只是专家能够把农民技艺翻译成自己的学识的东西。可是,没有两种语言是同构的,因而翻译是不完整的,部分内容无可避免会被遗漏掉。我要马上补充:这并非个人的错。这不是专家善意还是恶意的问題,而是制度问题,是知识体系的问题。专家在走访一个个农庄时,更不用说走访一个个地区和国家时,必须将搜集到的资讯加以抽象、分类、简化、普遍化,简言之必须把资讯学识化。学习农民的技艺,与翻译农民的技艺是截然不同的,是要花上一辈子的。

但这只是麻烦的开始。由于知识的意识形态贬抑技艺,技艺中不能被翻译成学识的部分,便不复存在,或者成为迷信、愚昧、和信仰的残余(“我们知,他们信”[参考 Kopytoff 1981])。专家与农民的“对话”,成为专家对农民知识的挪用、简化和遗弃(甚至还意识不到有所遗弃)。

但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不仅因为意识形态作祟,也因为权力作祟。运用学识的专家,其权力大于运用技艺的农民。正是权力与意识形态的结合,才使第三世界中专家和农民接触的后果如此糟糕。美国农民可以自问:“农民在用谁的脑袋思考?”这个问题是贝里(Berry 1984)敦促农民反省的。但比起印度农民、非洲农民、墨西哥农民,美国农民的处境当然比较有利,能够自保,即索尔

所谓“土著的固执”(参考本文第二部分第七节)。想像一下吧:“农业商人”和“农民”这两个字眼引起人们多么不同的联想!我想,假如《另类农业》一书提及的农民,和典型的农民一般势孤力弱,则他们的农业改革不可能获得如此巨大成功(参考本文第二部分第一节)。但这并不是说权力是惟一的因素,权力甚至并非主要的因素。没有意识形态的催迫的话,专家首先就不会有动机或理由把技艺简化为学识。

也许并无解救之道。农民沦为农业无产阶级,依赖推销员提供种籽、化肥和农药,依赖银行家提供信贷,依赖专家组织生产。实难想像农民能够避免这一结局。^[55]但是,通过潜移默化而取得的技艺,与通过正式教育而取得的学识之间的必要的对话,也许能以内在对话的形式进行,即自己与自己的对话。美国19世纪中叶一位农业科学的鼓吹者写道:“每个农庄都应该是个……实验室,而每个农民都应该是个实践的化学家和哲学家”(Rodgers 1850: 17,转引自 Rosenberg 1976:147)。

7. 持续发展就是恢复活力,恢复活力就是多元发展

农民的技艺对社会有好处,因为技艺是处理不确定的知识体系,而我们今天根本不会知道我们在下世纪会面对什么危机——从地力衰竭到水源污染到全球温度上升,什么都有可能。在有关发展的辩论中,可持续发展这一议题已从边缘进入中心,而且随着我们准备进入21世纪,这一议题已经名副其实地定下了这场辩论的调子。因此,我们应付未来危机的能力,就备受关注。在可持续发展的农业这一大思路下,对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定义就是:可持续的发展,必须是能够恢复活力的,能够适应冲击的(Pearce et al. 1989:40-3)。假如对于未来我们惟一知道的就是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假如我们惟一肯定的就是我们会面对突变,那么,无论

怎样计划、无论什么妙方,也无法应付未来发生的变化。说到底,为人民的农业,不能不是属于人民的、由人民管理的农业,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人民通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发展出来的知识,是抗灾的最重要保障,是使农业具备康复和适应能力的最稳妥基础。

基于这个原因,多元化对于我们作为人类的发展,和对于维持生态平衡,都是同样必要的。多元化也许真的是人类生存的关键。像蛞鹬(snail-darter)^[56]这类古怪的生物,也有方法维持其基因的多元性(Myers 1983),同样,人类一系列活动,也有助于维持人类在理解、创造和模仿方面的形式多元化。但对人类而言,负责代代传授知识的是文化而非本能。因此为人类所必需的多元化格局,是文化的,而非生物学意义上的多元化格局。

简言之,我们以为可以从学识中找到所有的本领和智慧来应付未未的突变,而文化多元发展,就是对于我们这孤注一掷的最佳保险。也许我们真能完全依靠学识,但迄今为止,事实证明,学识只能够改善我们从一处走到另一处的方法,使我们更快更有效率地从这里走到那里。但是,学识却不大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何要这样走。只有非常狂妄和天真的人,才会确信学识包含了应付各种变局所必需的所有资源。

我并不是要谴责作为知识体系的学识。没有学识,西方科学和技术的成就是无法想像的。抽象出来的和分解出来的知识;建基于身心分离的、摆脱时间、空间、和个人背景的知识;工具性的和理性的知识;建基于目的和手段分离的、而且只从“不证自明”的第一原理按逻辑演绎来处理这手段——这样的学识,随着世界进入公元 2000 年,在任何文化都要占有一个位置。

可是,当学识不肯屈服于宇宙论,而冒充宇宙论时,就出了问题。宇宙论是关于现实的理论。学识成为宇宙论后,至少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就不会给其他知识体系留一余地,就不会为本土的和

个别的技艺留一余地,而技艺对于思想和行动是同样必要的。所有知识都可能植根于社会,然而一个知识体系上升到宇宙论的地位,和一个植根于文化的知识体系,就天差地远了。成为宇宙论的知识体系,很容易就宣称掌握惟一真理或多个真理,而超越了它们的文化渊源。植根于文化的知识体系却不会这样。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是否存在,尚无定论,但放诸四海皆谬的假真理存在,却毫无疑问。

作为宇宙论,学识不但给了我们科学的农业,也给了我们科学的医疗。科学的农业增加了产量,但其增产方式却贬抑了农民、污染了环境,并削弱了我们应付未来变局的能力。科学的医疗为治疗疾病提供了更有效的方法,但却把人转化成一堆实验室数据(Apffel-Marglin 1990, Nandy & Visvanathan 1990)。学识给了我们科学的政治和管理,把工具性的和理性的政治制度,抽离其背景,抽象地输入第三世界,为虎作伥,扶植了集权政体与高压政权。另外,前车可鉴,美国的历史反映,传统农业之所以变成生活方式而非谋生方式,关键在于某些农村制度,因此它们对于外界要求变化的压力,有其韧性,但学识带来的科学的政治和管理,却破坏了这些制度(Appadurai 1990, Marglin et al. 1990)。

学识这种宇宙论,要把不可计算的也加以计算,要用基于计算的管理,取代讲求稳健的道德。这种宇宙论发展到最可怕的地步时,意味着为我们带来最严重的污染和资源耗损,因为管理环境、衡量得失的努力本身,就有可能为毁灭环境开启大门。

在这个意义上,我所理解的生态,和凯恩斯与熊彼德理解的发明及投资一样,都是超越计算范围,因此完全处于技艺的领域。而且情况也相同:对于生态、发明及投资,我们都只能面对极多的不确定性,在极无知的条件下采取行动。当然有一重要区别。凯恩斯和熊彼德认为,他们的时代需要企业家,企业家的野兽精神使他

们愿意罔顾后果、一味冒险。我则认为,目前的环境状况,要求我们小心谨慎,只要仍有比较安全的另类方法,就不要冒险。我要马上补充:这不是因为我们确切知道使用化肥、农药以及农作物基因面缩小等将造成灾难,说得更普遍一点,也不是因为我们确切知道臭氧层破裂、温室效应、酸雨等将造成灾难;恰恰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其后果。我们要追求可持续的发展,就需要使讲究计算和极大化的学识,屈服于讲究谨慎和判断的技艺。

8. 双重的吁请

因此,支持另类农业的理由是双重的。首先是个人的理由:高科技农业或把农民逐离土地,就像在美国的情况,或把农民贬为农工企业集团的附属物,因而使农民不再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翁。第二是社会的理由:由于专家和农民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对话,农业如果要具备康复能力,能够应付未来的任何冲击和危机,则最大的希望,还是农民的知识。

说到底,这双重理由都来到同一个问题上:一个由主人翁组成的社会、一个由集体创造自己未来的社区,能够没有自己的知识基础而存在吗?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社区肯定自己的知识,以自己的知识为荣,并且积极地利用和建设自己的知识,难道不就是在开创自己的未来吗?

注 释

- [1]该文全无注脚,篇幅又较长,所以译者自作主张把部分正文移入注脚。除上面这个注脚以外,文章内所有其他注脚均为译者所加。加“译者注”三字的注释,为译者自注;没有“译者注”三字的注释,则是搬移原文而成。另外,作者引述其他作者文章之处,译者翻译时尽量利用目前已有的中文

译本,并进行必要的修正。——译者注

- [2]原文为 open pollinated,直译为“公开传粉”,意即通过野外花粉传播而繁殖的农作物种籽,这似乎无助于读者的理解,故译为“传统农作物”。——译者注
- [3]兹将 *episteme* 和 *techné* 以黑体字划线来加以强调,不用斜体,因为这不是中文习惯;不用引号,因为两词大量出现,文句间引号过多,效果不佳。——译者注
- [4]译者将“如果……才是怪事”一句从本段后面调到前面。——译者注
- [5]原文为:Sensitive though he was to the importance of independence in the many-faceted web of farmer's connection to the land, 疑 independence is interdependence 之误。——译者注
- [6]这一时期的艺术家里韦拉(Diego Rivera)的壁画就令人震撼地反映了这个现象。
- [7]郭大力、王亚南译(1981)《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收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北京:商务印书馆,第338—339页。——译者注
-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7—708页。——译者注
- [9]原文为:Genetic vulnerability is more problematic,但该段例子均是杂交农作物易受病菌侵害的明证,完全不 Problematic,不知作者何意。——译者注
- [10]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62)是法国哲学家和科学家,主张人信仰上帝的基础只能是信念,而不能是理智。对于上帝是否存在这问题“理智是不能决定什么的;……这里进行的是一场赌博,……[‘因为]无论赌这一边还是另一边的人都属同样的错误,他们双方都是错误的,正确的是根本不赌。”译文据何兆武译(1985),《思想录:论宗教和其他主题的思想》,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10页。也可参考 Penguin Books 系列 Krailsheimer 译本(A. J. Krailsheimer tran. & ed. [1966], Pascal Pensees, P. 150)。又,帕斯卡的著作非常散乱,现存辑本甚多。何译本是根据 Leon Brunschvicg 辑本(Brunschvicg ed. [1912] Pensees et Opuscules, Paris: Libraire Hachette),而 Krailsheimer 辑本则是根据 Louis Lafumad

辑本(1960)。——译者注

[11]原文为:“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兹用《论语·先进篇》中闵子骞语代替。——译者注

[12]1蒲式耳等于36.4升。——译者注

[13]据克洛本伯格(Kloppenburg 1988:table 5.1),我无法找到爱奥华州的玉米售价。

[14]这是1937年爱奥华州的价格,也是该州所有的最早数字(United Stat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1963:100)。

[15]而农民如果利用农作物传统种籽,则连种籽成本也可以省掉。但农民本来就不是从商业渠道购买种籽,所以无所谓节省。

[16]菲斯特对于杂交玉米研究的支持,始则无心插柳,继而无力控制。杜维克说了一个他在先锋高育公司担任育种专家和高级职员多年而听回来的故事:“菲斯特原来并不打算让里奇把他得意的杂交玉米种苗推广出去,但里奇要么不明白他的心意,要么置若罔闻(私人通讯,1993)。”

[17]这里脉络不明。作者说“转变是自发的”,但没有进一步解释,而笔锋一转说巴博克沽名钓誉。作者可能是要说,只要能够得到“科学”或“科学家”的标签,人们便再不会重视研究的内容或实质。——译者注

[18]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迪基致威弗尔(Weaver)信,1949年10月20日,1.1/323/3/19,p.3。

[19]原文为:Sauer Grapeshot:A prescient critique of the Green Revolution。按:Grapeshot原为军事用语,指一种炮弹,名“葡萄弹”。而 Sour grapes(酸葡萄)指可望不可及之物,Sauer和Sour同音,Sauer对于绿色革命批评甚力,有如炮弹,作者巧妙地利用这几个字音义相关的特点而写出上述标题。为保持作者的神髓,又考虑到原文提及骚尔的批判实际上并不起作用,故译为“隔靴搔痒”,大概能够保持“搔痒”和“索尔”的谐音特点。——译者注

[20]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索尔致威理茨的信,1941年2月4日之前,1.2/323/10/63,p.2。

[21]旧世界指欧洲,新世界是欧洲对于美洲的称呼,这里则专指南美洲。——译者注

- [22]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工作会议记录,1941年2月18日,1.2/323/10/63,p.33。
- [23]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索尔致威利茨的信,1941年3月12日,1.2/323/10/63,pp.1-2。
- [24]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索尔致威利茨的信,1942年2月22日,1.1/200S/391/4631。
- [25]乔纳森(Jonathan)是索尔之子,作为索尔的研究助理而同行,他当时是威斯康辛大学地理系学生,如今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系的荣誉教授。
- [26]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索尔致威利茨的信,1942年3月15日,1.1/200S/391/4633。
- [27]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索尔致威利茨的信,1941年2月5日,1.2/323/10/63。
- [28]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曼格尔多夫致威弗尔的信,1949年7月26日,1.1/323/3/18。
- [29]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索尔致威利茨的信,1945年2月12日,1.1/200/391/4636。
- [30]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索尔致威利茨的信,1941年3月12日,1.2/323/10/63。
- [31]原文为:the most important leguminous crop the Gangetic alluvium,疑为the most important leguminous crop in /on /at the Gangetic alluvium之误。——译者注
- [32]福特基金会档案,芬福洛克(Dwight Finrock)1965,AG 65-24(b),p.8。
- [33]我推测这实验是他在迈索尔邦农业部任职时进行的。科尔曼大概是他的同事。
- [34]萨克斯(Oliver Sacks)关于诊所历史的著作(1985),感人而有趣地记载了人类因丧失学识或丧失技艺而引起的离奇古怪甚至悲惨的病变。
- [35]原文为:epistemology,transmission,innovation,and politics,与上一段提出的epistemology,transmission,innovation,and power不符。既然

politics 和 power 的意义与用法相近,故此统一翻译为“权力”。——译者注

- [36]heart 一般译为“心”,但在中文里“用心”和“月窟”意思接近,细玩原文之意,head 与手、眼、心对立,心在此意指感觉。——译者注
- [37]both senses 其义不明,故强译为“无论是感受的意思,还是知觉的意思”。——译者注
- [38]原文为 guru shisha. 译者无法查出 shisha 之意,而 guru 则为印度教支派虔诚派中的宗教导师。该支派发源于 12 世纪印度南部,并扩散至北部。——译者注
- [39]吉利根(Carol Gilligan)的名著《不同的声音》(In a Different Voice) (1982),可以说是反对(男性)学识,而维护(女性)技艺。
- [40]我所属的大学的法律学院和商学院,从一开始就推崇“个案教学法”,它把法律办公室和商务管理人员办公室的技艺浓缩成可被学生接触的形式,使学生能够在模拟法律和商业环境下学习,即使犯错误也无妨。但就连这样的例外情形也越来越受到学识的学术建制攻击。
- [41]最近,我在前苏联心理学家鲁利亚(Alexander Luria)的自传中读到以下片段:“本世纪初,德国学者费尔温(Max Verworm)认为,我们可以根据科学家对于科学的两种基本态度而将他们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群,这两种基本态度是:古典和浪漫。”(1974:174)然后,鲁利亚大概继续发招费尔温的看法,他对科学家的古典态度和浪漫态度的说明,与皮尔锡的和我的看法惊人地相似。迄今我无法找到费尔温任何有关划分科学家态度的文章,但我仍未放弃。
- [42]中文译文采月佳冰、韩裕文译文,收于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上卷,第 314 页。——译者注
- [43]中文译文采用郭斌和、张竹明译(1996)《理想国》,收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北京:商务印书馆,第 397 页。译者对于译文略作修改。——译者注
- [44]中文译文采用郭斌和、张竹明译(1996)《理想国》,第 398 页。
- [45]“明哲”,是统治者所应专备的品德,被统治者所应专备的品德则为‘信徒’(‘求真’)。被统治者可比作制笛者;统治者则为笛师,他用制笛者所

制的笛演奏。”中文译文采用吴寿彭译(1996)《政治学》，收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25页。——译者注

[46] 参见同上书，第145页。

[47] “奴隶学术还可以从日常劳务扩充到专门技艺，例如烹饪”。中文译文参见同上书，第20页。——译者注

[48] 原文为“(and very likely was ,albeit unconsciously--I thought I was copying Euclid)”，按：“I thought I was copying Euclid”当为“I thought he was copying Euclid”之误。——译者注

[49] 三十年战争指1618年至1648年间的欧洲战争，导火线是1618年捷克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叛乱。战争一方是哈布斯堡王朝同盟，成员包括奥地利、西班牙以及信奉旧教的德国诸侯，另一方是法国、丹麦、瑞典、荷兰以及信奉新教的德国诸侯。——译者注

[50] 亨利四世(1553-1610)出生于新教徒家庭，1572至1576年间为纳瓦尔王，称亨利三世。1589年在法国登基，称亨利四世，直至1610年遇害身亡。他生于法国宗教战争时代(1562—1598)，身为新教徒，以武力击败旧教后，却改信旧教，而又使新教徒享有特权。这样，他不但鼓吹宗教宽容，而且也使法国免于分裂。——译者注

[51] 蒙田(1533—1592)鼓吹怀疑论，认为并不存在绝对真理，反对宗教迫害，在政治上主张温和路线。——译者注

[52] 原文为：In view of the central role that uncertainty plays in this chapter, it is very much to the point that shortly after the death of Descartes, the intellectual attack on uncertainty and doubt took a decisive turn。文理显然有欠通顺，因为in this chapter是一回事，笛卡儿之死是另一回事，并不相关，故译为“由于未知数这个问题如此关键”。——译者注

[53] 该书由阿尔诺德(1612—1694)以及尼柯(1625—1695)合著，出版于1662年，原名La Logique, ou l'art de penser(逻辑学，或思维艺术)，英译本标题目改为Port-Royal Logic。也有人译为《王港逻辑》。Port-Royal是一间修道院的名字，阿尔诺德与该修道院关系密切，故名。——译者注

[54] 中文译文采用徐毓柄译(1997)《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收于“汉译世界

学术名著丛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8页。译者对于译文略作修改。——译者注

[55]译者将本段最后一句调到本段前面。——译者注

[56]译者无法查出 snail-darter 何意,查作者引述的来源(Myers 1983)亦不得要领。按:darter 中译蛇鹤,则 snail-darter 姑译为蜗鹤。——译者注

参 考 书 目

- Aiyer, A. K. & Narayan, Y. (1949), "Mixed cropping in India", *Ind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19/ 4: 439 - 543.
- Alexandratos, N. (1988) (ed.) *World Agriculture: Toward 2000*,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Anderson, R., Levy, E., & Morrison, B. (1991), *Rice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Polit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Apffel - Marglin, F. (1990), "Smallpox in two systems of knowledge", in F. Apffel - Marglin & S. A. Marglin (eds.), *Dominating Knowledge: Development, Culture, and Resista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02 - 44.
- Appadurai, A. (1990), "Technology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values in rural western India", in F. Apffel - Marglin & S. A. Marglin (eds.), *Dominating Knowledge, Development, Culture, and Resista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5 - 216.
- Aristotle (1934 edn),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 H. Rackha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4 edn), *Politics*, trans. H. Rackha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Arnauld, A. (1662), *The Art of Thinking*, 1964 trans. J. Dickoff & P. James, New York: Bobbs - Merrill.

- Bailey, L. H. (1911), *The Country - life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acmillan.
- (1919), *The Holy Earth*, Ithaca, New York: Comstock Publishing Company.
- Becker, S. (1976), *Donald F. Jones and Hybrid Corn*, Bulletin 763, New Haven, Conn.: Connecticut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
- Belshaw, D. (1979), "Taking indigenous technology seriously: The case of intercropping techniques in East Africa", paper presented to a workshop at the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University of Sussex, Sussex, England; repr. in D. Brokensha, D. M. Warren, and O. Werner (eds.) (1980),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s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5 - 201.
- Berlan, J. P. and Lewontin, R. (1988), *Hybrid Corn or the Unsettled Question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Ms.
- Berry, W. (1977), *The Unsettling of America: Culture and Agriculture*,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 Begley, S. (1994), "The end of antibiotics", *Newsweek*, 123/13: 46 - 51.
- (1984), "Whose head is the farmer using? Whose head is using the farmer?" in W. Jackson, W. Berry, and B. Colman (eds.), *Meeting the Expectation of the Land: Essays in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Stewardship*, San Francisco: North Point Press.
- Bourjaily, V. (1973), "One of the Green Revolution boys", *Atlantic Monthly*, 231/2: 66 - 76.
- Bowers, W. (1974), *The Country Life Movement in America, 1900 - 1920*, Port Washington, NY: Kennikat Press.
- Brokensha D., D. M. Warren, and O. Werner (eds.) (1980),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s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Bruner, J. (1962), *On knowing: Essays for the Left Hand*, 1979 ed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utler, J. W. and Marion, B. W. (1983). *The Impacts of Patent Protection on the U. S. Seed Industry and Public Plant Breeding*. M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 Caldwell, J. P. and Caldwell, B. (1987), "Anthropology and demography: the mutual reinforcement of speculation and research", *Current Anthropology*, 28/1: 25 - 43.
- Carson, R. (1962), *Silent Spr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Crabb, A. R. (1947), *The Hybrid - Corn Maker: Prophets of Plenty*.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Descartes, R. (1637/1641), *Discourse on Methods and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1980 trans. D. Cress, Indianapolis, Ind.: Hackett Publishing Co.
- Dodds, E. R. (1951), *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ommen, A. (1988), *Innovation in African Agricultur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Duvick, D. (1984), "Genetic contribution to yield gains of U. S. Hybrid maize, 1930 to 1980", in W. R. Fehr (eds.), *Genetic Contribution to Yield Gains of Five Major Crop Plants*, Crop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Special Publication No. 7, Madison, Wis.: American Society of Agronomy.
- (1993), personal communication, letter to the author dated 31 Dec.
- East, E. and Jones, D. (1919), *Inbreeding and Outbreeding: Their Genetics and Sociological Significance*,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1.
- Edwards, R. (1979), *Contested Terr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 FAO (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89), "Fertilizer", *FAO Yearbook*, 1988, 38, FAO Statistics Series no. 89, Rome.

- Ford Foundation Archives, Ford Foundation, New York.
- Francis, C. (1986) (eds.). *Multiple Cropping Systems*. NY: Macmillan.
- Gardner, C. D. (1978). "Population improvement in maize", in D. B. Walden (eds.). *Maize Breeding and Genetics*, NY: John Wiley & Sons.
- Griffin, K. (197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arian Change? An Essay on the Gree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riliches, Z. (1958). "Research costs and social returns: Hybrid corn and related innov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6: 419 - 31.
- Hacking, I. (1975), *The Emergence of Probability: A Philosophical Study of Early Ideas about Probability, Induction and Statistical Infer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rtley, C. P. (1920), "Better seed corn", *Farmers' Bulletin 1175*,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 Hayami, Y. and Ruttan, V. W. (1985),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2nd ed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Hewitt de Alcantara, C. (1976) *Modernizing Mexican Agriculture: Soci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1940 - 1970*. Geneva: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 Howard, A. (1940), *An Agricultural Testa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enkins, M. (1936), "Corn improvement", in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Yearbook*,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 Jennings, B. (1988), *Foundation of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Science and Politics in Mexican Agricultur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Jodha, N. S. (1981), "Intercropping in traditional farming systems", in ICRISAT (International Crop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emi - Arid Tropic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Intercropping, 10 - 13 January 1979*, Hyderabad, India.

- Keynes, J. M.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 Kimmelman, B. (1987), *A Progressive Era Discipline: Genetics at American Agricultural Colleges and Experiment Stations, 1900 - 1920*, Ann Arbor, Mich.: *Unzted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Kloppenborg, J. Jr. (1988), *First the Se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nt Biotechnology 1492 - 20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losko, G. (1986), *The Development of Plato's Political Theory*, New York: Methuen.
- Kopytoff, I. (1981). "Knowledge and belief in Suku thoughts", *Africa*, 51/3: 709 - 23.
- Knudson, M. and Ruttan, V. (1988),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 biological innovation: Commercial hybrid wheat", *Food Research Institute Studies*, 21/1: 45 - 68.
- Kuhn, T.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n. 1970,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 ii, no.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atos, I. (1970). "Fals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in I. Lakatos and A. Musgrave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zonick, W. (1974), "Karl Marx and Enclosure in England",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6: 1 - 59
- Lewontin, R. and Berlan, J. P. (1985),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the penetration of capital: The case of US agriculture", *Monthly Review*, 38/3: 21 - 47.
- Lovins, A., Lovins, L. H., and Bender, M. (1984), "Energy and agriculture", in W. Berry, W. Jackson, and B. Colman (eds.), *Meeting the Expectation of the land*, San Francisco: North Point Press: 68 - 86.
- Luria, A. (1979). *Cognitive Development? Its Cultural and Social*

- Found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yons, J. (1969), *Structural Semantics: An Analysis Of Part Of the Vocabulary Of Plato*,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Malthus, T. (1967 edn.),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ed. p. Appleman, New York: Norton. (1st Pub. 1798).
- Mangelsdorf, F. (1953), "Wheat", repr. in *Scientific American* V. 189/1 (July), 50-9.
- Marglin, S. (1974), "What do bosses do? The origins and functions of hierarchy in capitalist production, part 1",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6: 60-112; repr. in A. Gorz (eds.), *The Division of Labour*, Sussex: Harvester, 1976.
- (1979), "Catching flies with honey: An inquiry into management initiatives to humanize work", *Economic Analysis and Workers, Management*, 12: 473-87.
- (1984), "knowledge and powder", in F. stephen (ed.), *Firms, Organization and Labour*, London: Macmillan: 146-64.
- (1990), "Losing touch: The cultural conditions of workers accommodation and resistance", in F. Apffel - Marglin & S. A. Marglin (eds.), *Dominating knowledge, Development, Culture, and Resista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17-82.
- in collaboration with F. Adffel - Marglin, T. Banuri, A. Nandy, and M. L. Swantz (199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system of knowledge approach", *TOES/NA/ Newsletter* 6: 5-8; repr. in *The Black Scholar* 21/1 (1990), 35-42.
- Marx, K. (1867), *Capital*, i. 1959 edn.,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 Machar, P. N. (1963), "Cropping pattern and employment in Vidarbha", *Ind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8/1: 38-43.
- Meadows, D., Meadows, D. et al. (1972), *The Limits to Growth*,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 Myers, N. (1983), *A Wealth of Wild Species: Storehouse for Human Welfar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Nandy, A., and Visvanathan, S. (1990), "Modern medicine and its non-modern critics: A study in discourse", in F. Apffel - Marglin & S. A. Marglin (eds). *Dominating knowledge, Development, Culture, and Resista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72), *Genetic Vulnerability of Major Crop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 (1989) *Alternative Agricultur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 Norman, D. W. (1974), "Rationalising mixed cropping under indigenous conditions: The example of northern Niger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1/4: 3-21.
- Nussbaum, M. (1986), *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Luck and Ethics in Greek Tragedy and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 Sen, A. (1989), "Internal criticism and Indian Rationalist tradition", in M. Krausz (ed.), *Relativism: Interpretation and Confrontation*, Notre Dame, Ind.: 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
- Oasa, E. and Jennings, B. (1982), "Science and authority in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14: 30-44.
- Papendick, R. I., Sanchez, P. A., and Triplett, G. B. (1976) (eds.), *Multiple Cropping*, American Society of Agronomy Special Publication No. 27, Madison, Wis.: American Society of Agronomy.
- Pearse, A. (1980), *Seeds of Plenty, Seeds of Want: Soci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the Green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irsig, R. (1976), *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 An Inquiry into Values*, London: Transworld.
- Plato, (1925a edn.), "Gorgias" in *Lysis, Symposium, and Gorgias*, trans. Harold N. Fowler and W. R. M. Lamb, Cambridge, Mass.: Harvard

- University Press.
- (1925 6 edn.) "Philebus" in *Statesmen, Philebus, and Ion*, trans. Harold N. Fowler and W. R. M. Lamb,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41 edn.). *The Republic of Plato*, trans. F. Cornford, New York/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olanyi, M. (1958),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 - Cr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opkin, R. (1979), *The History Of Skepticism from Erasmus to Spinoza*,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opper, K. (1968),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New York: Harper & Row.
- Postel, S. (1989), *Water for Agriculture: Facing the Limits*, Worldwatch Paper 93, Washington, DC: Worldwatch Institute.
- Putnam, H. (1974), "The corroboration of scientific theories", in K. Schilpp (ed.) *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LaSalle, Ill.: Open Court.
-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Rockefeller Archives Center, NorthTarrytown, New York: 221 - 40.
- Rodgers, M. M. (1850), *Scientific Agriculture*, 2nd rev. edn., Rochester, New York: Erastus Darrow.
- Rosenberg, C. (1976), *No Other Gods: On Science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s*,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Sacks, O. (1985), *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 and Other Clinical Tales*, New York: Summit Books.
- Schultz, T. (1964),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New Haven, Conn./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chumpeter, J. (1911),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1934 trans. R Opi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A. (1776), *The Wealth Of Nation*, 1937 edn., (ed.) E. Cana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 Steele, L. (1978), "The hybrid corn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D. B. Walden (ed.), *Maize Breeding and Gene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Sterba, J. (1990), "Indonesia gives rice farming a facelift: Pesticides are succeeded by pest managemen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16 Apr.
- Toulmin, S. (1990). *Cosmopolis: The Hidden Agenda of Modernity*, New York: Free Press.
- Trenbath, R. (1974), "Biomass Productivity Of mixtures", in N. C. Brady (ed.), *Agronomy*, 26,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1963), *Prices Paid by a Farmer for Seed*, Statistical Bulletin No. 328, Statistical Reporting Service, Crop Reporting Board, Washington, DC.
- Vandermeer, J. h. (1989), *The Ecology of Intercropp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ernant, J. P. (1965), *Mythe et Pensee chez les Grecs: Etudes de Psychologie Historique*, ii, 1982 edn., Paris: Francois Maspero.
- Vidal - Naquet, P. (1981), *Le Chasseur Noir: Formes de Pensee et Formes de Societe dans le Monde Grecs*, 1983 edn., Paris: La Decouverte/Maspero. (rev. and corrected)
- Wellhausen, E. J. (1978), "Recent development in maize breeding in the Tropics", in D. B. Walden (ed.), *Maize Breeding and Gene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59 - 84.
- West, R. (1979), *Carl Sauer's Fieldwork in Latin America*,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 Worldwatch Institute (1994), *Worldwatch Database Diskette*, Washington, DC: Worldwatch Institute.
- World Bank (1992),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2: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 后现代主义、性别、发展^{*}

◆ 帕帕特(Jane L. Parpart) 著

◇ 薛 翠 译 陈顺馨 校

倡议只要容忍女人之间的差异(difference)就行,是最粗疏庸俗的改良主义,等于全然否定差异在生活中的创造功能。我们必不仅仅容忍“差异”,还要把它当作异彩缤纷的星空,芸芸极物(polarities)在磨缠、碰撞,创造力迸出辩证的火花。(Lorde 1981: 99)

引 言

后现代批判既关注差异和话语(discourse),又抨击启蒙主义那种统摄所有真理的思想,对于批判发展理论和实践甚有帮助。有些第三世界和西方学者从后现代的角度,挑战现代化是必然可行的假设,并且质疑以下的信念:第三世界发展等同西化/现代化,解决第三世界发展困局的方法,就是追随西方政治、社会、经济的制度和实践(不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模式)(Escobar 1984; Ferguson 1985,1990; Moore 1992)。

* 本文原题为“Post-Modernism, Gender and Development”, in Jonathan Crush ed., *Power of Dev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这些学者依据后现代权力与知识的概念,特别是话语在权力/知识的建构中扮演的角色(Foucault 1972, 1980b),指出了所谓发展话语,其实蕴藏在竭力延续而非改变殖民式层级关系的、我族中心的、具破坏性的殖民话语之中,把第三世界的人民定义为具备“现代”西化社会按理不再有的所有负面特征(如原始、落后等等)的“他者”(Said 1978; Escobar 1984; Spivak 1990b)。这样再现(representation)第三世界现实,为发展专家所信奉的现代化和优越的北半球价值和建制提供理据,并且把“导致无法无天的破坏,或者卑视及抑制本土技术、知识、实践、生活方式等等”的过程合理化。虽然并非所有这些破坏和损失皆令人惋惜,但很多都是(Du Bois 1991: 21)。后现代批判,既肯定每个民族有权保存自己的文化、历史、世界观,又争取新的发展模式,一种根据南半球人民的知识需要,而非所谓北半球(及一些第三世界)发展组织的“专业知识”所发展出来的模式。再者,这种批判挑战对第三世界的现实、大自然、发展目标的既定认识,虽然也承认经济发展的重要,但拒绝盲目的现代化,并鼓吹在扎根于本土知识和文化之上,将传统和现代创新地结合(Edwards 1989)。

那么,后现代女性主义为女人与发展之宏业提供相似的角度吗?我相信是的。无论如何,那些反对西方女性主义者怎样再现第三世界人民(特别是女人)的批评,都可以应用于对“发展中的妇女”(Women in Development, WID)这个政策的实践者的批判。大部分“发展中的妇女”和“性别与发展”(Gender and Development)的实践,均将第三世界女人再现为愚昧无知、负担沉重的可怜人,无法逃出压迫女人的第三世界父权的魔掌。最近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将对南半球女人的再现合理化,即视她们为孤立无助的“他者”,惨遭第三世界社会反动传统及萧条经济的迫害。对女性发展专家来说,第三世界可怜的姊妹们委实是“他者”。

差异和第三世界“他者”

对很多女性主义者来说,后现代主义一个最引人的地方就是着重差异。女性主义者一直争论及探索女性被男性创造及定义为“他者”的概念,最显者的例子是西蒙波娃(Simon de Beauvoir, 1952)写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她挑战男性所定义的女性,呼吁女性将自己界定在男/女二元之外。她论说女性必定是分析的主体,而不是分析的对象(他者)。其他女性主义者响应西蒙波娃的论说,将其发扬光大,尤其在提出恢复女性的声音,并从女性的立场发展知识等方面(Harding 1987, 1992)。不过,这种对女性被“他者化”的关注大多出自北半球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手笔,有把自己的经验普遍化之嫌。她们的女性主义理论“诠释”,假设了全球女性只有一种超越阶级、种族、地域的现实。她们在关注女性被划为“他者”之余,却忽略了女性之间可能出现的差异(Gilligan 1982; Spelman 1990)。

可想而知,着重差异的后现代理论,为那些不赞同以上诠释方式的女性提供了抗争的弹药。北美及欧洲的黑人女原住民,逐渐大声疾呼她们自己独特的困境,并且要求把种族、文化以至阶级、性别纳入女性主义的分析范畴。少数族裔的女性主义者一直提倡的是有种族和民族针对性的女性主义(Lorde 1984; Anzaldua 1990; Anthias and Yuval-Davis 1990; Minh-Ha 1989),而后现代主义则提供一个空间,使追寻流离失所的、边缘的、受剥削的、受压迫的黑人声音的行动变得合理(Hooks 1984: 25)。胡克斯(Bell Hooks)词锋锐利地鼓吹一种黑人后现代主义,以“差异”和“他性”探索北美黑人现实经验及这些经验与批判思想之间的联系。她认为只有这样,女性主义才能真正把“差异”纳入其分析范畴(Hooks

1984, 1991; 又见于 Collins 1989)。恩贝莱 (Julia Emberley 1995) 则以加拿大女原住民为例, 提出相似的论点。

南半球一些女性主义者也发展了这论点。她们指责西方学者制造殖民话语, 把南半球女性 (包括北半球少数族裔女性) 再现为毫无差别的“他者”, 备受女性身份和第三世界发展不足的现实所压迫。莫汉蒂 (Chandra Mohanty) 分析一批西方女性主义书写第三世界女性的文章, 总结说:

(她们) 将第三世界女性在历史和物质条件上都显得异杂斑斓的生活殖民化, 因此产生/再现了单一的‘第三世界女性’形象。看上去这形象似乎是随意建构出来的, 却盖有西方人道主义话语权威的公章……一方面假设特权的、以种族为中心的齐一的思想, 但另一方面没有充分意识到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的语境下, 西方学术界对‘第三世界’的影响, 这都是为数不少的西方女性主义分析第三世界女性的文章的基本论调。(Mohanty 1988: 62-3)

第三世界女性被塑造为全是贫穷的、无力的、弱不禁风的, 而西方女性则是所谓有学识的、性解放的现代女性模范, 这种分析不但扭曲了不同女性多姿多彩的生活现实, 而且削弱西方女性主义者跟世界不同肤色的工人阶级女性和女性主义者结盟的机会。虽然肯定了像艾利加雷 (Luce Irigaray) 和西克苏 (Helene Cixous) 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所作的重要贡献, 如揭示在西方人道主义话语中女性被边缘化的本质, 可是, 莫汉蒂也振振有词地提醒我们, 西方女性主义者同样在自己的话语中忽略第三世界女性, 而且将其边缘化 (Mohanty 1988; Mohanty et al. 1991)。Aihwa Ong

(1988:90)甚至尖刻地说,“对放眼海外的女性主义者来说,非女性主义‘他者’还没有非西方女性那么拥护父权。”(又见于 Ong 1990; Barriteau Foster 1992)

把第三世界女人本质化的趋势,不仅见于北半球女性的作品,也见于那些在西方学府受训的第三世界女性,特别是当她们以西方读者为书写对象的时候。例如拉兹雷格(Marnia Lazreg 1988)发现,不论是西方或者接受西方教育的学者在写阿尔及利亚的时候,总是不思批判地采用西方定型化的阿拉伯民族和文化形象,特别是至尊无上的伊斯兰教,给描述为固步自封的信仰制度,墨守成规、一成不变。阿拉伯女性则被描绘成楚楚可怜,身陷一个注定落后衰颓的宗教传统主导的世界中;伊斯兰教世界被形容为日薄西山,阿拉伯女性只有采纳现代西方的价值才能进步。女性主义理论应用在阿拉伯女性身上,总被视为拓阔自由女性主义的知识的契机,而非探索不同女性迥异的生活经验。拉兹雷格呼唤新的分析角度,就是肯定差异,探索不同文化中女性实在的、活生生的体验。从这角度做第三世界女性的研究,会显示女性的生活是“有意思的、有条理的、可理解的,而不是‘我们’所渲染的难逃厄运和愁云惨雾”(Lazreg 1988: 98)。拉兹雷格相信为了使差异不会变成纯粹的界划,本土学者一定要背负双重的担子,即在认知论上跟现存的话语决裂,重新评估她们自己社会里的性别关系架构。(又见于 Schick 1990; Spivak 1990b)。

后现代女性主义与发展

以上的争论对那些关心第三世界女性发展的理论家和实践者有没有帮助呢?我认为有,特别是那些在主流的发展话语里书写或工作的人。40年代,尤其是二次大战后,盛行从自由主义角度

看发展问题。那时候西方思想家和决策者,假设第三世界人民在得到帮助后,便能够循序渐进地建立与工业世界相似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于是,发展被视为一种线性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国家或民族会从发展不足(落后/传统/原始)的初阶向前进,直至全面发展(现代/理性/工业)的终阶。为这样的轨迹莫下理据的是欧洲帝国主义,它设定了欧洲任何一方面的生活都比第三世界优越。这种强调与人不同而比人优越的认识,得到殖民话语的庇荫,以“进步的”西方社会(Curtin 1974; Said 1978)为准绳,贬低第三世界人民和文化,同时把全球现代化等同世界发展。

于是,所谓发展,便等于将“落后”的被殖民者带进现代(即已发展的)世界,涉及的只是程序安排事宜,即如何进行、要多快才达至等方面的问题,却没有质疑现代化这个目标本身。像罗斯托(Rostow 1960)这样的经济学家,他所做的就是建构模型,解释发展的“步骤”;有些发展专家则企图将第三世界社会带往“起飞”的阶段,使现代化变成指日可待(Escobar 1984; Moore 1992)。至于发展计划的合理性——将世界现代化——却从来不受质疑。第三世界女性,如果被考虑到的话,就至多会被视为发展的绊脚石。

殖民话语将第三世界女人再现为“富有异国情调的尤物、备受压迫的受害者、性对象、或在‘落后’社会中最愚昧落后的群体”(de Groot 1991: 115)。在殖民时代,传教士、殖民官、移居殖民地的人士制造了一整套资讯、想像力、利己私心、偏见等东西的说法,解释为什么第三世界女性是低等动物,囿于传统桎梏,不是没有能力就是不愿意进入现代世界。策划发展者不思批判地接纳这个假设,认为第三世界女性是现代性和发展的重要障碍。结果,在后殖民时代的首20年(50—60年代),有关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都忽视女性,认为现代化一旦开展,第三世界男性将会采取现代化的路线,学习如何组织他们的社会,到时候女性最终都会被迫采纳比较

“先进”的立场(Afshar 1991)。

因此,发展计划的设计,基本上假设了生产工作应全由男性担任,女性扮演工人、老板或企业家这些角色则完全受到忽略,只承认她们是未来劳动力的生产者,因而在人口政策上有她们的一席位(Hirschman 1958)。这些假设反映西方父权制度下拥有权、工作、控制的模式,虽然从发展的意义上,肯定了西方女性的现代性,但它们仍将她们贬至社会上附属的角色,尤其是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

60年代末,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承认发展并不如期望中那般容易,有一批学者特别关注第二世界女性持续发展不足的状况,伯斯鲁普(Ester Boserup)在1970年写的《经济发展中的妇女角色》(Wome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便是研究女性与发展问题上的里程碑之作。她指出各类发展计划,并没有改善第三世界女性的生活,反而削弱她们在经济上的机会和地位。她们在农业上,一般扮演生产食物的重要角色,但是现代化却将她们从这种传统生产功能中排除出去。伯泽鲁呼吁发展计划者和决策者承认及肯定女性在经济发展的角色,并指出唯有如此,第三世界才能发展起来。当时其他发展专家都附和她,在1973年通过的“美国援助外国法例之珀西修改案”(Percy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Assistance Act),确立了美国的发展援助计划必须将第三世界女性纳入发展进程中,以改善她们的地位(Tinker 1990)。

一个名为“发展中的妇女”的崭新领域出现了。这个领域属于整个发展计划的一部分,有它自己的语言和理念。一些执行女性发展工作的专家,采取北半球自由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把女性纳入男性的权力架构的方案,透过改善教育、就业、物质上的利益如土地、借贷等方面,率先寻求女性的平等权力。这些早期的

“发展中的妇女”专家在得到男性发展策划者的容忍的同时,却处于发展界的边缘位置(Moser 1989; Buvinic et al. 1983)。

“发展中的妇女”在发展社群内的地位,因着一连串的全球变化而有所促进。70年代,南半球给贫穷和人口过剩等问题缠个不休,复加印证自由主义式的援助第三世界发展方法的失败。一些第三世界经济学家如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 1978)和阿明(Samir Amin 1974)纷纷批评这种发展模式,鼓吹第三世界自给自足,拒绝参与全球化。由于这类批评不断增加,自由主义发展专家于是把发展政策转向正视穷人的基本需要。由于女性一再被渲染为穷人中的穷人,加上在人口控制政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女性成为发展计划者和决策者的关注焦点。联合国在墨西哥城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中,宣布1976至1985年为“提升女性的十年”(Decad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从那时开始,妇女被纳入发展的议程,阻碍女性进步的绊脚石也得到关注。女性研究不断增加,“发展中的妇女”专家在发展架构中的地位亦上升,尽管大部分发展组织还没有全职的专业“发展中的妇女”官员,直到80年代中(Tinker 1990; Muell 1987b)。

弗兰克、阿明等人的批评衍生了一些另类发展的方法和实践。他们认为第三世界的发展不足,完全是北半球精英(大部分是男性)及其在南半球伙伴(大部分又是男性)一手造成的。他们鼓吹自给自足的发展,拒绝为私利的资本主义精英及其当地的忠实随从的“援助”。这种观点和激进女性主义对父权的批判,为女性发展工作开拓了新的手法。有些南北半球的活跃份子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开始提倡和设计小规模、只限女性参与的计划,以避免男性的主导,无论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或是当地的。这种手法名为“女性与发展”(Women and Development, WAD),在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获得相当的支持,甚

至成为非政府组织活动的主干。一些主流的发展组织,通过它们的非政府组织项目,支持了这种手法(Parpart 1989; Rathgeber 1990)。

为了回应上述批评,“发展中的妇女”政策也修改其主流的做法。策划者把两性平等的问题搁置在一旁,强调人的基本需要,特别是健康、教育和训练方面。“发展中的妇女”专家辨析说,这种手法能提高女性工作效率和生产力,不但支援经济发展及女性的生活,连生育率也因此减低。策划者又要求让女性获得更多的借贷、土地、法律保障,以致更多的参与发展策划的机会。正如有关一份发展中之女性的报告所表述的:“必须注重发展中之女性在经济上的参与”(USAID 1982:1)。可是,作出根本改变的可能性却没多少人讨论(Kandiyoto 1990; Mueller 1987b; Moser 1989, 1993)。

然而,不论“发展中的妇女”或者“女性与发展”的实践者都认为,对第三世界女性来说,发展就是变得更现代。显而易见,发展的想法,不论是马克思主义或者自由主义那一套,都曾经是(以后也是)启蒙思想的载体,因而不会拒绝现代性的范式。因此,不论主流或者另类发展实践者,他们所定的政策和项目,大部分仍然假设北半球的专家能够解决第三世界女性的发展难题。再者,那些发展专家,不论观点如何,一般都认为第三世界女性的困难和其解决方法,与西方女性主义者的抗争和关注的议题没有多少关系,因为这些议题被视为跟实际的发展问题扯不上任何关系。这样的差距因两次的冲突而越拉越大。一次是1975年,在“联合国女性十年”的会议上,来自南北半球的女性主义者之间发生了矛盾;另一次是1977年,韦尔斯利学院举办了女性与国际发展的会议,与会的美国女性主义者和第三世界女性又发生争拗。这些冲突不但削弱很多西方女性主义者所冀许的全球女性主义者团结的前提,同时巩固了发展专家以为只有他们才具有能力去分析和解决第三世

界女性的困境(Maguire 1984; Papanek 1984; Stamp 1989)。

不过,在八十年代女性主义者之间存在的分歧稍有缩减。1985年“内罗毕会议”(Nairobi Conference)庆祝“联合国女性十年”的结束。是次会议增进了全球女性主义者之间的联系和了解,并为南半球女性的结盟提供了契机,例如会议之前在印度经反复讨论后,成立了国际组织“新时代女性另类发展”(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With Women for a New Era, DAWN)。这个组织不断针对第三世界女性发展问题而进行工作和思考,还出版一本强调聆听和学习女性迥异的经验和知识的重要性的书,并且承诺实践多样的策略,借以打破两性、阶级、国家之间不平等的架构。可以说,其政治目标是在仍然相信现代化之余,不忘留意文化差异和第三世界的议题(Sen 和 Grown 1987)。

内罗毕会议也促进南北半球女性主义者之间的对话,尤其是那些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在北美洲,这些组织之间的联系只有初步发展,而在欧洲就比较成熟(最著名的例子是萨塞克斯大学和海牙的社会研究学院)。内罗毕会议之后,彼此的关系更进一步。“新时代女性另类发展”成员也受到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著作(Beneria 和 Sen 1981),和萨塞克斯大学围绕女性从属问题而组织的讨论(Young et al. 1981)的影响。这些角度把阶级和性别的不平等放在全球背景下加以理解,为西方和第三世界的一些女性主义者提供了知性上的交汇点。她们对话的结果,除了丰富我们对比较女性研究的理解外,还结集成一些重要的文本(Robertson and Berger 1986; Afshar 1987, 1991; Stichter and Parpart 1988; Agarwal 1989)。“性别与发展”的研究和训练也有进展,萨塞克斯大学和一些加拿大学院得到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的支持,便是很好的例子。

“性别与发展”这个角度集中在性别多于女性,尤其是社会所

建构的性别角色和关系。“性别被视为一个过程,每个人出生后根据生理的界别而划为男性或女性,经过各自文化所界定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规律的熏陶,变成社会规范的男人或女人。”(Kabeer 1991: 11)因此,说明了性别角色是可以改变的。这个角度亦强调检视特定社会的性别分工的重要性,特别是女性在生产 and 再生产中备受忽略的劳动,以及这些劳动模式与性别不平等其他方面之间的关系,还关注权力和性别的关系、女性自强的策略,以致挑战那些维系性别科层的架构及思想(Kabeer 1991)。

这种思考对学术发展的话语有相当的影响。不过,不回避考虑根本的社会转化问题这种想法和那些宁可直接援助政府的庞大赞助机构格格不入,因为它们考虑的是成员国的主权问题。虽然有些政府的发展机构(最显著的有瑞典、挪威、丹麦、冰岛、荷兰、加拿大)和一些民间的发展组织,在女性发展的问题上比较采取性别为本的态度,并在现有“发展中的妇女”的训练计划里加入性别分析,但是这些想法被纳入发展企划的情况非常罕有(Moser 1989)。

大部分发展实践者认为,发展就是需要采纳西方的价值和建制,对此他们深信不疑,认为没有必要改变。过去十年经济危机席卷几乎整个南半球,这种立场更因此获得肯定,而且更加巩固第三世界发展不足和无能的僵化定型。鄙视第三世界的殖民话语早已在国际发展组织的修辞中露出马脚。口口声声“提升本地人”的家长式殖民统治,已经被强调第三世界人民(特别是女性)是脆弱又无助的发展话语所取代。这种修辞为新古典的、以市场作主导的“改革”提供理据,而所谓“改革”就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哄骗第三世界政府“重整”千疮百孔的经济结构的谎话。这些结构调整计划(SAPs)的设计,是要在南半球建立新自由经济,并假设所有国家都要以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即是现代的)制度为模范(Bernstein 1990; Elson 1991; World Bank 1989a, 1990a, 1991a,

1992, 1993)。最近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崩溃,更加巩固了这个立场(Fukuyama 1989)。

这些改革计划带来的恶果,对穷人的打击最大。为了减轻穷人中的穷人的苦楚,于是女性的福利再次受到关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及其他联合国组织首要考虑的,便是调整计划对穷人或“弱势群体”如老弱妇孺、伤残者所造成的莫大打击(Cornia 1987)。一份由“英联邦女性与结构调整专责小组”(Commonwealth Expert Group on Women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CEGWSA 1989)所做的报告,提倡特别要支持女性的项目,要求提高女性在决策过程中参与的程度,创造对社会负责的结构调整计划,而强调的是正视社会公平、经济增长和效率。这种报告在提出重要的问题之余,却在语言上巩固了“发展中的妇女”话语,把第三世界女性再现为无助的受害者,囿于传统与无能,在循环不绝的贫穷与绝望中万劫不复。因此南半球的女性(及男性)能够以技术及策略保护自己的可能性被遮蔽起来。第三世界女性统统被划为穷人,无法应付目前的经济危机,同时绝对需要依靠外国专家来营救(又见 Kandiyoti 1990; de Groot 1991)。

因此,“发展中的妇女”政策和计划的焦点继续集中在穷人中的穷人。最近,有更多具启发性的发展组织,尤其在瑞典、挪威、丹麦、冰岛和加拿大的,都把资源转移去鼓励女性做企业的能手,支持女性入读专上大学府,增加女性参选的机会。虽然这种趋势是让人鼓舞的和进步的,但专为女性项目投入的金钱和人力资源,相比那些大量由男性策划和服务男性需要的传统发展项目如建设道路、农业等等,仍然显得相形见绌。再者,大部分为女性而设的发展项目依然针对最穷困的女性,设计得谨慎而缺乏远见。她们被教导编织篮子或缝制衣服,而男性则学习操作机器。女性的项目的目标通常是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关系中增加生产力,而非提

供另类经济活动,帮助女性获得在经济和个人方面的自主能力(Kandiyoti 1990)。他们通常支持经济自发活动,但忽略通过集体行动使女性变得自强的需要(World Bank 1986b)。他们对女性的生育及家庭角色的一贯想法,阻挡了发展女性经济自立能力的视野。那些项目仍然聚焦在第三世界女性的贫困与无助方面,这加深了她们作为受害者的形象,也延续支持这种形象建构的现实条件。

后现代女性主义和发展的实践

现代化(和西化)的论说压倒所有对发展的看法,因此,南半球的女性(及北半球的少数女性)为发展专家提供另类的看法的机会也隐没其中。可是,向第三世界女性学习的地方的确很多。那些对第三世界女性的生活和态度缺乏了解的发展计划,接二连三失败(Rogers 1980; Moser 1989)。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关注点,既批评现代化及其植根于第三世界本土的、具压抑性的知识/权力制度,又鼓励发展策划者关注第三世界和少数女性的实际生活环境。要了解南半球女性现实生活的欲望,驱使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追寻从前沉默的女性的声音,尤其是她们如何诠释/再现自己的生活经验、自己的成败和改变的欲望。第三世界女性的目标和期望,应该被发掘而非被设定,同时,改善她们生活的策略,也应该建基于她们活生生的经验和表达出来的意愿之上。

一直提倡“差异”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提醒北半球的女性,南半球的女性是不能笼统地归为一种不分差异的类别。把第三世界同质化为一体,尤其是模糊女性之间差异的想法,对“发展中之女性”实践者来说或会容易接受,不过却阻碍我们对第三世界女性的了解,也不利于发展的实践。这想法忽视了第三世界的阶级和性别的

互动关系,和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评估这种互动关系的需要。例如南半球的精英女性,犹如在北半球一样,虽然和那些没有优越条件的姐妹有某些相同的经验,特别是共同受制于父权价值体系方面,但她们大多有条件避开父权社会的制约,而穷人则缺乏这些条件。环境当然随时变动,以前朝气蓬勃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女性,如今被迫承担当前的经济危机,但对付危机的经验则会因为阶级而有所不同,而这种的不同都需要辨明。

“发展中的妇女”实践者一般不特别理会阶级问题,相反只把焦点集中在贫穷的女性身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批判立场,着重阶级和性别,也强调女性的工作经验,特别是她们不被记录的再生产劳动。但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却不大重视性别意识形态在唯物分析中的重要性,亦未能提供理论武器分析意义的建构及通过语言的传播;后现代女性主义则可以做得到。不是说放弃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那种关注性别和阶级的立场,而是在唯物分析中加进后现代女性主义倡导的话语分析、知识/权力关系、差异性等角度。

这样仔细地分析第三世界社会的性别意识形态的建构,可以帮助发展策划者和学者理解在特定社会中,性别意识形态是如何塑造及限制女性掌握知识和权力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批判不但质疑已被接纳的现代化思想,同时开辟新角度,重阅女性活生生的经验,尤其是社会如何界定女性自我的感觉,以及这种感觉在社会改变和发展中面对的限制。除非我们达到这种理解程度,否则女性与发展研究仍是一个北半球对南半球进行殖民的领域(Wiltshire 1988)。后现代女性主义强调差异和话语分析,为理解和超越西方和第三世界父权的意识形态,同时不放弃追求性别平等的社会提供了可能性。

这种看待性别和发展的角度,对发展的实践与分析均有意义。

“发展中的妇女”实践者认定第三世界女性十分无助，所以理所当然地忽略当地很多具备才能的女性，这些女性其实可以对自己国家的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Staudt 1985)。发展实践者否定这个事实，继续他们拯救南半球的女性的妄想。

很多“发展中的妇女”专家对南半球的女性组织和有关发展的书写所知甚少，而且认为没有必要知道。他们很多人不知道“新时代女性另类发展”是一个组织良好、立场鲜明的运动，鼓吹从新的角度探讨发展问题。虽然“新时代女性另类发展”的取向有点乌托邦的味道，但她们的文章提醒我们，相比西方的女性主义者的抗争，第三世界女性的发展并不全然是性别斗争的问题，反而深藏于全球再分配与发展不足的问题(Sen and Grown 1987)。对西方女性主义者，以及那些以为自己的意愿等同世界各地女性的意愿的发展专家来说，这是很重要的教训。

如今很多人高谈阔论要向南半球女性讨教关于发展的计划和项目，但是落实的少之又少。北半球的发展实践者虽然请第三世界女性当顾问，但大多不理睬她们的建议。此外，南半球大部分本地顾问由男性担任，他们甚少认真讨论性别问题。最近，在南半球聘用受过良好训练的女性专家日渐普遍，但主要集中在对性别议题比较注意的北欧国家和加拿大发展组织(Wiltshire 1988; CIDA 1991, 1992)。北半球的“发展中的妇女”实践者，以及很多在北半球受训的本地专家，深信真正的专业知识只有来自北半球。他们坚信这教条，轻视本地知识，除非这些本地知识经过他们在北半球学府学过的修辞及基本论说所包装。这种态度，使很多南半球(及北半球)的女性(及男性)专家对贫穷女性的发展潜能熟视无睹，结果使她/他们忽略并削弱发展自主、自立、平等社会所需要的自信心和自力更生的精神。

结 论

发展的“危机”令一些学者开始质问整个发展计划的合理性；有些女性与发展活动的评论家也提供类似的论点(Edwards 1989; Mueller 1987b)。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发展,或者“连婴儿带污水都泼出去”,而是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角度,检视南半球女性发展的分析和实践。这个角度,挑战了很多发展专家都热烈拥护的论据:现代性相等于发展;而且反对纯粹从上而下看待发展的问题,要求仔细地、本土地和在具体的语境下考察南北半球女性的生存策略,从而定出发展计划。这样,第三世界女性才或为发展理论和实践的主体而非客体。

这种看待发展的角度,承认知识、语言、权力之间的关系,又寻求理解作为反抗和权力场所的本土知识。这个角度也促进对第三世界女性的生活作更细微的理解,质询那些再现第三世界女性为孤苦无助的“他者”的话语;并提醒发展实践者(及理论家),若要呈现女性的现实生活,就要发掘她们多样的“声音”和“知识”。如果成功,南半球女性那种“弱小无依的形象”就不会那么明确或具说服力。这种角度提供阅读第三世界女性的生活和行为的新视野,削弱北半球发展专家的权威,并希望将发展理论和实践,奠基于南半球斑驳现实中女性活生生的经验。

不过,过分强调差异也是有缺点的。一个后现代女性主义阅读女性发展的角度,需要鼓励在共同关注的问题上,全球、各地区、各民族的女性要团结一致。不思批判的极端后现代主义只会鼓励性别无限地分裂,“内在不稳定和不停地自我解构”(Bordo 1990: 134)。这样推下去则容易沦为相对主义和变得政治无能,各家自扫门前雪。相反,唯物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立场,“既为概括而

宏观的分析,也为复杂而细致的批判,提供实践的空间”(Bordo 1990: 153)。把这两种批判结合,那就是容纳后现代批判而不失女性主义的观点和政治目的.除了加深我们对全球不同现实中的女性的理解外,还使我们能够继续投身去改善全世界女性的生活。

参 考 书 目

- Afshar, H. (ed.) (1987) *Women, State and Ideology*, London: Macmillan.
- (ed.) (1991) *Women, Development and Survival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Longman.
- Agarwal, B. (ed.) (1989) *Structures of Patriarchy*, London: Routledge.
- Anthias, F. and Yuval - Davis, N. (1990) Contextualising feminism - gender, ethnic and class divisions, in T. Lovell (ed.) *British Feminist Thought: A Read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Anzaldúa, G. (ed.) (1990) *Making Face, Making Soul/Haciendo caras: Creative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s by Women of Color*, San Francisco: Aunt Lute Books.
- Barriteau Foster, E. V. (1992) The construct of a postmodernist feminist theory for Caribbea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ies* 41, 2: 1 - 43.
- Beneria, L. and Sen, G. (1981) Accumulation, reproduction and wome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Boserup revisited, *SIGNS* 7, 2: 279 - 298.
- Bernstein, H. (1971)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7: 141 - 160.
- (1990)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era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observations on Sub - Saharan Africa,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18, 1: 3 - 35.

- Bordo, S. (1990) Feminism, postmodernism, and gender-scepticism, in L. Nicholson (ed.) *Feminism/Post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 Buvinić, M., Lycette, M., and McGreevey, W. (1983) *Women and Poverty in the Third World*, Baltimore, Marylan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CIDA (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Women in Development) (1987) *WID Policy Framework*, Ottawa: CIDA.
- (1991) *CIDA's Women in Development Program: Evaluation Assessment Report*, Ottawa: CIDA.
- (1992) *WID Policy Framework*, Ottawa: CIDA.
- Collins, P. (1989)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black feminist thought, *SIGNS* 14, 4: 745 - 773.
- Curtin, P. (1974) *The Image of Afric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De Groot, J. (1991) Conceptions and misconceptions: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discussion on women and development, in H. Afshar (ed.) *Women, Development and Survival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Longman.
- Du Bois, M. (1991) The governance of the Third World: a Foucauldian perspective on power relations in 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16: 1 - 30.
- Edwards, M. (1989) The irrelevanc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Third World Quarterly* 11, 1: 116 - 135.
- Elson, D. (1991) From survival strategies to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women's needs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L. Benería and S. Feldman (eds.) *Economic Crises, Household Strategies and Women's Work*,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Escobar, A. (1984) Discourse and power in development: Michel Foucault and the relevance of his work to the Third World, *Alternatives* 10: 377 - 400.
- Ferguson, J. (1985) The bovine mystique: power, property and livestock in

- rural Lesotho, *MAN* 20, 4: 647 - 674.
- (1990) *The Anti - Politics Machine: Development, Depoliticisation and Bureaucratic Power in Lesoth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oucault, M.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New York: Tavistock Publications.
- (1980a)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 (1980b)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 - 1977*, C. Gordon (ed.),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Gilligan, C.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rding, S. (1987)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 (1992) Subjectivity,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3, 3: 175 - 194.
- Hirschman, A. O. (1958)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ooks, B. (1984)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Boston: Mass: South End Press.
- Kabeer, N. (1991) *Rethinking development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some insights from the decad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Women and Gender in Southern Africa, University of Natal, Durban.
- Kandiyoti, D. (1990) Women and rural development policies: the changing agenda,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1, 1: 5 - 22.
- Lorde, A. (1981) The master's tools will never dismantle the master's house, in C. Moraga and G. Anzaldúa (eds) *This Bridge Called My Back*, New York: Kitchen Table Press.
- Maguire, P. (1984) *Women in development: an alternative analysis*, Amherst, Massachusetts: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 Minh-Ha, T. (1989) *Woman, Native, Othe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Mohanty, C. (1988) 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 *Feminist Review* 30: 61 - 88.
- Moore, D. (1992) *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discourse*, unpublished report, Ottaw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 Moser, C. (1989) Gender planning in the Third World; meeting practical and strategic gender needs, *World Development* 17, 11: 1799 - 1825.
- (1993) *Gender,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Theory, Practice and Training*. London: Routledge.
- Mueller, A. (1987a) *Peasants and professional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women in development knowledge*,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Toronto.
- (1987b) *Peasants and professional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women in development knowledg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sociation for Women in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 C.
- Ong, A. (1990) State versus Islam: Malay families, women's bodies, and the body politic in Malaysia, *American Ethnologist* 17, 2: 258 - 276.
- Papanek, H. (1984) Coming out of the niche: intellectual consequences of segregating advocacy research on women and development, mimeo.
- Parpart, J. (1989) *Women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Lanham,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Rathgeber, E. (1990) WID, WAD, Gad: trends in research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24: 489 - 502.
- Robertson, C. and Berger, I. (eds.) (1986) *Women and Class in Africa*, New York: Africana.
- Rogers, B. (1980) *The Domestication of Women: Discrimination in Developing Societi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Said, E. (1978)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 Schick, I. C. (1990) Representing Middle Eastern women: feminism and

- colonial discourse, *Feminism Studies* 16, 2: 345 - 380.
- Sen, G. and Grown, C. (1987) *Development, Crises, and Alternative Vision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Spelman, E. (1990) *Inessential Women*, London: The Woman's Press.
- Spivak, G. C. (1987)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London: Methuen.
- (1990a) Gayatri Spivak speaks on the politics of the postcolonial subject, *Socialist Review* 20: 81 - 90.
- (1990b) *The Post - 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 London: Routledge.
- Stamp, P. (1989) *Technology, Gender, and Power in Africa*, Ottaw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 Staudt, K. (1985) *Women, Foreign Assistance and Advocacy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Stichter, S. and Parpart, J. (eds.) (1988) *Patriarchy and Class: African Women in the Home and the Workforce*,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Tinker, I. (ed.) (1990) *Persistent Inequali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USAID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82) *Women in development*, USAID Policy Paper, Washington D. C.
- Wiltsnre, R. (1988) *Indigenisation issues in wome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in the Caribbean: towards a holistic approach*, paper presented at Canadia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 Annual Conference, Quebec City, 11 - 13 November.
- World Bank (1986) *Population Growth and Policies in Sub - Saharan Africa (Berg report)*, Washington D. C.
- (1989a) *Sub - Saharan Africa: From Crisis to Sustainable Growth*, Washington D. C.
- (1989b) *Kenya: The Role of Wome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 C.

- (1989c)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9d) *Trends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1989*, Washington D. C.
- (1990a)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0b) *The Population, Agriculture and Environment Nexus in Sub-Saharan Africa*, draft for discussion, The World Bank, Africa Region, Washington D. C., 29 May 1990.
- (1990c) *Executive summary of The Population, Agriculture and Environment Nexus in Sub-Saharan Africa* (World Bank 1990b)
- (1991a)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1b) *Egypt: Alleviation Poverty 1991*, Washington D. C.
- (1992)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3)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 女性主义东方话语与发展*

◆ 阿普菲尔-马格林(Frédérique Apffel-Marglin)

西蒙(Suzanne L. Simon) 合著

◇ 黄德兴译 陈顺馨校

在19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发展中的妇女”(Women in Development, WID)话语转移为“妇女、环境与发展”(Wome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ED)话语^[1]。这个转移的意义在于打开了质疑发展大业的[思考]空间,同时也标志了对现代性和现代化过程更富批判性的态度。我们对这个转移非常欢迎。它展现了更多可能性,让非现代、非商品化以及通常是非西方的妇女的声音,以新的方式被聆听,也让人认真思考她们的知识和生活方式,是否可以是在现代性以及伴随而来的商品化以外的众多可能的另类出路。换言之,这个转变打开了通向多元分化的局面,而不再局限于非现代性不可的不归大道。

我们认为新的WED话语在跨入新的领域之际,是时候而且也有必要抛掉WID论所背负的历史包袱。在我们看来,这个历史包袱是跟殖民话语直接相连的。它暗渡陈仓,闪进WID话语中,由某种语言包装起来,让人看来两者是不相连的。如果不搞清

* 本文原题为“Feminist Orient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Wendy Harcourt ed.,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ondon and New Jersey: Zed Book Ltd, 1994, pp. 26 - 45.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楚这个历史的连续性,这个包袱有可能会污染新的 WED 的语言。要真正来个了断,我们需要揭露这个连续性和指出它是怎样表露出来的。我们也要再进一步准确点明这些殖民遗孽底下的种种假设,尤其是关于女性的身体和人格特质的那些臆断。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打算揭示 WID 话语中的“第三世界女性”的观念,跟维多利亚时代式的女性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有关受殖女性(colonized woman)的观念之间的历史连续性。“第三世界女性”的形象是“未开化”的受殖女性的当代版本。很多现代西方人看待非白人女性,很大程度上是潜意识地评价某种人格类型的一个功能,这对于维系工业资本主义(也即是现代性)甚为有利。“现代”个体对身体有一定的概念(Duden 1991),并把女性的生成能量(generative capacity),理解为一个可以用工业和生产式的隐喻来看待和描述的生物过程(Martin 1987)。很多女性主义研究已经揭示这一类对人格和女性身体化进程(female bodily process)的理解,缺乏历史—文化层面的前设思考(historical - cultural assumptions),因而不具有普遍的有效性(Bordo 1989; Duden 1991; Franklin 1993; Haraway 1989, 1991; Harding 1986; Hubbard 1990; Jordanova 1989; Keller 1992; Martin 1987; Strathern 1992)。

在 WID 转移到 WED 话语之时,有关人类(尤其是女性)跟非人类世界的关系成为中心课题。现代主义把女性的生成能量主要看做生物过程,隐设了一个根本的断裂,那就是有关女性的“自然”(即生物意义上的)过程跟她们的“文化”(即具相当象征意义的)能力之间的鸿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主义对自然和文化所持的二元论。这个二元论正支撑了现代主义意识中那种感受到“人的本能”跟非人类世界之间的疏离。我们认为生成能量的问题对于理解广义的环境关注尤为重要。只要这个问题一日还

纳入生物学的范畴之下,人类跟非人类世界之间的鸿沟就永远无法消除(后者是前者的对象物)。如果要由剥削非人类世界的关系,转向一个更广阔地包括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生成和再生成的过程(generative and regenerative process),我们就得解构某些基本的现代范畴,同时也要以新的态度聆听非现代人民的声音。为此,本文第二部分尝试介绍一个非现代主义的生存方式(being)的例子,其中不存在自然跟文化的断裂。在这个世界中,女性的生成能量并没有从她们的社会—文化活动中割裂出来;男性和女性都参与生成和再生成的活动;生成和再生是文化和社会关注的中心点。

I

维多利亚时代式的殖民主义女性主义

在殖民话语中,女性典型地被看成本质上是被动的(Etienne and Leacock 1980),受殖的妇女被视为无助和被动地忍受着她们处身那种落后、野蛮和邪恶的文明。尤其是在印度和穆斯林社会,女性被认为是在面纱背后忍受着隔离、孤立和幽禁。以印度为例,殉夫习俗(sati)被突出,象征女性在社会中的悲惨地位(Ware 1992;Ahmed 1992;Chaudhuri and Strobel 1992;Mani 1989)。女性所受的对待成为某个社会“文明指标”的准绳,面被视为活在进化的顶点^[2]的英国维多利亚女性的生活成为量度标准。

阿默德(Leila Ahmed 1992)曾经指出,在殖民时代的埃及,面纱是怎样被西化的话语视作女性受压迫的象征,也就是整个社会落后的标记。在有关面纱的措辞中,殖民主义者和维多利亚式的

女性主义者携手将女性和文化拼合在一起。于是,像克罗默爵士(Lord Cromer)(他后来出任埃及总督)这些人就可以拿“文明开化”的英国妇女来对比受殖的埃及妇女,好能一方面用维多利亚女性主义针对埃及妇女的论点来论证埃及整个生活方式都要来个彻底革新,另一方面却反对本国的女性主义者。正如阿默德指出:

……女性的问题、她们所受的压迫以及他者化男性的文化被揉搓在一起。在受殖社会,又或者文明西方以外的社会,男性(即“他者化”男性)压迫妇女的论点,在殖民主义话语里,被利用来在道德上合理化殖民者铲除受殖人民的文化的行为……不管在西方社会内女性主义跟白种男性宰制制度有什么争拗,一旦在国外,女性主义者就由白种男性宰制制度的批判者变为奴婢。人类学常常被称为殖民主义的奴婢。也许,可以说,女性主义或女性主义的理念,都成为了殖民主义另一个奴婢。(Ahmed 1992:154-5)

在印度,殉夫习俗的情况跟埃及的面纱的情况相同。曼尼(Lata Mani 1989,1992)在研究殖民时代的殉夫习俗时指出,有关殉夫的殖民论述将印度妇女说成本质上是被动的。殉夫的女性要不是被英雄化为贞烈的遗孀和传统的忠诚卫士,就是被看成亟待拯救的受害人。官方的措辞把殉夫分为“好的”和“坏的”。所谓“好的殉夫”,在这种官方措辞中,指的是寡妇自愿地盲目秉承印度教经典;“坏的殉夫”,则是指寡妇被强迫殉夫来保障其他家属的经济和物质利益。殖民官员把前者归类成合法的,后者则非法。殖民官员还要求婆罗门学者提供典籍,证明这种行为的“真实性”。在19世纪,这样的程序就等于建构宪法或发明传统(Mani 1989:113)。殖民者表面上做到保存妇女殉夫的尊严,实际上是通过把

妇女跟传统/文化画上等号而完成的,因为这个等号能说明殖民者认同什么是“真正”的印度文化。这样分辨真正和非真正的殉夫是建基于殖民者的分类行动,好颁布印度教经典和那些婆罗门诠释者为“真实性”的依归。这样实际是把基督教和西方有关经典圣文的概念套在印度之上。殖民官员自以为让殉夫的经典根据公告于大众,就是把婆罗门学者的经典权威民主化。可是在印度的文化背景之中,这样的概念根本是格格不入的。在印度,地方的口述传统可以而且确实超越经文律例。没有任何经典可以统合所有印度人,也不存在统一的、中央化的宗教神职人员。再者,地方风俗,即使没有在任何经文中写下,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比泛印度文本更有权威。1987年,珂普菲尔-马格林在印度一个主要的朝圣中心(奥里萨邦的布里)跟胜王上师(K. C. Rajaguru)谈及殉夫时,胜王上师很清楚表明这一点。那时在拉贾斯坦的一个镇上刚好进行了一次殉夫仪式。胜王上师(后于1992年逝世)是监督杰根纳特庙(Jagannatha,印度最大圣庙之一)所有仪式的最高权威。他也是布里王的灵性导师,以及负责诠释“神圣的律典”(dharmastras)的婆罗门大学士团(Mukti Mandapa Sabha)的首席。胜王上师说:

在我们的地方,从来没有这殉夫的传统。在印度某些地方,它确实有过,现在仍存在。但现在更重要的是寡妇成为brahmacarini(修士)。我们的经典说,如果丈夫早死,妻子有三个选择:1. 她可以殉夫;2. 她可以成为修士;3. 她可以重婚。我们这里的传统不会殉夫。我们的寡妇们成为修士。

当被问及1987年拉贾斯坦(Rajasthan)的殉夫个案,以及布里的印度教领袖Sankaracharya(印度的四位[印度教]领袖之一)

公开支持殉夫时，胜王上师说：

代奥拉那[拉贾斯坦]那次殉夫仪式大张旗鼓，是他们逼她的。她一直喊着：“救我，救我！”他们却把她抛进火中。难道这样做是符合经文吗？经文永远不会支持这样做……印度教领袖不应该讲出这样的话。代奥拉那发生的事根本不应该发生。

这时，他的53岁大女儿肯定地说：“殉夫的习俗从来没有在这地方存在过。这不是我们的俗例。我们的寡妇变成修士。”阿普菲尔-马格林其后在布里地区农村的研究确证了胜王上师和他女儿的说法。

由此看出，圣典并没有最终的权威，地方的惯例才是决定性的。英国“真实/非真实”的概念纯属殖民的捏造。

殖民官员所抱的传播文明教化的使命，同时包括守卫他们看起来正在腐朽和受世俗化威胁的传统，以及保护柔弱、驯服和被动的妇女免于强逼性的殉夫。这正是霍布斯鲍姆(Hobsbawm 1983)所提的发明传统(invention of tradition)。更具体地说，这样表述再现印度女性，用曼尼的说法：

……为殖民主义、国族主义和最近的西方女性主义脉络下的救赎论述提供了丰富的基础。大致而言，这三者都把印度妇女构想为被动的而不是行动的人。(Mani 1989:397)

我们还要加上维多利亚时代式的女性主义者，她们是当代女性主义的先驱。一位著名的维多利亚女性主义者在1883年伊尔伯特法案(Ilbert Bill)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条法

案本应是覆盖至印度法庭的地区司法权以及把欧洲妇女也纳入印度法庭的管辖之下。这条法案所引起的论争,主要涉及两个有关性别的议题。殖民地[英国]的女人和男人都认为印度法官阴阳怪气,很明显不适合裁判英国妇女。另一个受关注的问题是——一旦法案获通过,就会危害“在印度的纯洁和不能保护自己的白种妇女”的安全。阿克罗伊德(Annette Ackroyd)在反对这条法案时说:

在这个讨论之中,无知和受到忽略的印度妇女起来反对她们所受的奴役,明显地反抗她们的主子。她们证明了英国女性对伊尔伯特先生的提案的反感是公正的。他建议把文明开化的女性归辖到这些毫不尊重他们本族妇女的男人的司法权之下,而他们的社会观念还是处于文明的边缘。(引自 Sinhal1992:110;另参考 Ware1992:147 的有关讨论)

无知和未开化的印度妇女受她们的男人奴役已经够可恶,但竟然要开化的英国妇女接受这些男人的审判,简直是令人发指!正如在埃及和美国的情况一样(见 Bell Hooks1981),维多利亚女权主义者也板起了她们社会中的男人那副种族歧视的嘴脸。

阿克罗伊德远赴印度创办女子学校,目的是教导年青的印度女性“实用的家政和守礼勤奋的习惯”(Beveridge 1947:92),还有其他更学术性的学科。由于受殖的印度人身处“两种文明”之间,

教育他们的妇女是解救活在面纱背后的女人的唯一出路。即使那些没有受过压迫的印度妇女,她们仍然未曾受过现代教育和现代观念的洗礼。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教育是所有进步的永不动摇的根基,[也是他们的出路]。(Cowan 1912:14-15)

这类想法成为一项运动的主题。这是一个体现了本土人士对英国观念中的印度教的回应的改革运动。它提倡以英国女性作为印度妇女的仿效对象。19世纪60—70年代,这个运动的领袖辛(Keshub Chunder Sen)在1870一次对英国妇女的演说中这样说:

我此刻很荣幸各诸位英国妇女——容我称你们为英国姐妹们——提出一个紧急但谦恭的请求。我热切诚恳请求你们尽你们所能,来推动印度妇女的教育……我今晚的任务就是要告诉诸位,苦难中的印度正呼唤各位来拯救她。各地政府正尝试用立法来制止和铲除种种恶习。善心的男人已经投身这个运动,在男人中间推行文明教育。如今,假若英国妇女要维护妇女在英国的权利,假若她们要站上台发言,就让她们表明她们的观点和同情心并非只囿于这个小岛之内。(Beveridge 1947:84-5)

到了19世纪末,从英国带来给印度妇女的教育,等于是教育妇女成为更好的工业劳动力。麦肯齐(Mackenzie 1984)更进一步指出,自19世纪最后的30多年至20世纪的50—60年代,借学校及其他有关机构而开展的帝国宣传,在塑造一种独特的英国感(British sensibility)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个宣传的意识形态内涵包括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军事和民族典范崇拜,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主义。这套意识形态巩固了英国广泛传播的有关民族和国家的优越性和进步观念,尤其是对比“落后”的受殖民民族。这套意识形态反过来又被那些概念巩固了。麦肯之亦指出,这些宣传在模塑大众文化中的英国感起了重大的作用,而这种英国感以教化的道德责任为名,使殖民统治变得合理化。英国维多

利亚女性主义者、正如上面所讨论的,完全投入了这帝国文化之中。

第三世界女性与 WID 话语

正如维多利亚文化是由帝国宣传塑造出来的,20 世纪是由更隐晦、人道主义和帝国式的发展宣传所塑造的。贯穿 WID 话语的女性主义,直接承继了维多利亚时期那种具有殖民色彩的女性主义。要说明这点,可以先从比较上述辛的演说和以下论教育妇女在发展中的角色的一种当代陈述入手:

女性实在是世界上贫穷国家的第二性。她们比男性接受更少的教育,享受更少的职业机会,工作时赚得更少……贫穷很大程度上是女性的问题,至少部分是因为她们的双重角色。女性既影响发展的过程,也被发展所影响……一度被认为只属于福利范畴的女性问题,事实上影响了整体经济的效率、增长和发展。(Buvinic, Lycette and McGreevey 1983:3, 13)

在最近的“发展中的妇女”话语中,传统和社会的限制被认为是妇女进入市场的障碍。要让妇女在社会上崭露头角、开展她们的现代化并整合到工业资本主义中去,就一定要消除社会的限制,这样才能造就在经济上具生产力和独立性的个体。

第三世界女性以及她们在经济生产力上的角色被“发现”为发展的课题,在时间上正好对应波斯鲁普(Ester Boserup)的《女性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Wome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在 1970 年的出版。从那时开始,第三世界的女性日益被引进发展的讨论焦点之中。隐没无闻和传统被说成是发展的障碍,是局限,

是妇女一直以来处于从属位置的根源。或者最重要的是,女性基本上被看成是穷困的。将女性和贫穷自动地等同起来,合理化了要把全部第三世界女性转化为“具经济生产力”、自主和独立的主体发展欲望^[4]。WID 话语的最根本基础,跟殖民观念一样,是把女性变成受害者。

“发展中的妇女”这个观念(vision)把女性本质地和普遍地看成是屈从他人的,而发展正是根除男性主宰的最好途径。以下引自森(Gita Sen)和格罗恩(Garen Grown)有关这个问题的著作(1987)^[4]一段,就这个观点作了很好的说明:

改变一直对女性不利的从属性结构,是我们对于一个新纪元的憧憬(vision)的一部分。如果女性要在社会中争取公正,就必须改革法律、风俗、产权体系、对我们身体的控制、劳动习惯以及支持男性宰制和特权的种种社会和法律上的建制……在最根本的层次上,并不是要在这个宰制的体系中追赶上那种竞争的、侵略的、“人吃人”的精神。我们是尝试改造男性,将这个体系改造成富于责任感、孕育心、开放性和非层级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憧憬的一部分……女性主义不可动摇的核心是一种承担精神:打破性别依附的结构,那是女性在社会各层面的生活都能跟男性一样有充分和平等参与的憧憬。(Sen and Grown 1989:79,81)

这些作家声称,要容得下女性解放就要改变各种社会和文化,而女性一概地处于屈从和压迫的境遇,正是这类主张显得合理的基础。压迫,以及随之而来的女性解放的需要,合理化了用发展来介入和改变整个第三世界的整体生活方式。“发展中的妇女”的措辞坚称“受压迫的女性”是在最低层,即是受种族、性别和阶级的压

迫。这进一步合理化了要在象征和结构层面上改革社会,好令第三世界的女性从水深火热的贫困和压迫中翻身的主张。

在发展的话语中,贫穷的地位就像很多西方化的女性主义话语中面纱、殉夫和阴部阉割一样;作为压迫、传统和父权的象征,这些习俗和势力必须被铲除。把女性等同文化和贫穷,把贫穷等同经济落后,这些说法再一次用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来量度社会的进步,并成为这个社会的文明/现代性的指标。此外,判断第三世界女性的地位又一次地根据了第一世界“已解放”(以前是“开化”)的女性作为标准,即是自主、经济独立、完全整合在一个商品化的世界中去的。

当女性的自我观念中所关注的福祉(well-being),更多是将自我(self)置于亲属(和其他社会)网络以及当地环境之中,而不是独立自主的时候,“发展中的妇女”逻辑就会否定这些观念,视之为并不忠于现实。这样的逻辑赋予发展专家们建构现实的特权。正如 A. 辛(Amartya Sen)指出:

我们经常注意到:如果一个典型的印度农村女性被问及她个人的福利问题,她会觉得莫名其妙。如果她能够回答,她可能会……根据她的家庭的福利状况来作答。个人的福利这个概念在这个语境下可能是不切实际的……

这里涉及的概念和沟通的实质问题确实重要。[可是],这并不表示得出的结论——个人福利的概念不切实际……是完全正确的。

……缺乏个人利益的概念,加上对家庭福利的莫大关注,这种态度有助于巩固传统中的种种不平等……把没有质疑和反抗不平等看成是不存在不平等的证据,可以说是严重的错误……第三,个人的利益和福利并不仅是观念的问题;即使是没

有相应的自我观念,这些概念的客观方面是值得注意的……一个人有必要超越对这些事物的原始印象,这些印象可能是源于对某些传统上认为重要的事物毫不质疑地接受……观念看法不可跟那个人的福祉混为一谈,又或者成为所有福祉的观念都是不切实际这个说法的证据。(Sen 1990:126-7)

根据这样的论证,一个女性对自己的利益观念,如果是跟她的家庭和社区分不开,就变得极度可疑,因为家庭和社区可能存在不平等。这样的论述最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它认为不平等根源于传统。而传统往往被等同于落后和局限,相反,现代性、教育,总而言之,女性被整合在工业资本主义中则被视作解放。可是有些WID的学者已经指出,发展的过程本身正是女性苦难的另一个主要根源(Bunch and Canilo 1990:74-7; Sen and Grown 1987:15-16, 25-6, 28; Buvinic and Yudeiman 1989:36)。虽然如此,A.辛并没有因而质疑发展本身,只是告诫要追求“更好”的发展,因为在有关女性压迫的论述中,发展本身的过程和角色等问题并没有提出。A.辛所用的那个非历史化的“传统”概念,成了压迫女性的所有势力的弹药库,而没有尝试分析的是,整合的过程以及这些过程所导致的女性在态度上和实践上的变化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

再者,A.辛完全抹杀了第三世界女性对于她们处身的环境的认知。任何没有提及压迫和性别不平等的言论,就被说成是错误和被扭曲的观念的产物,是种种“原始感觉”的产品。这种观点最重要的叙述是“不管她们怎样说自己,我们知道什么对她们是最好的”。女性自己的观念和认知的方式被看成是发展的障碍。如果她们的社会经济发展要成功,这些障碍就一定要铲除或转化。认知的权威,再一次属于掌握“客观现实”的专家,而不是女性自己。就这样,专家的声音代替(和压抑)了女性的声音。

“发展中的妇女”话语的内容有别于女性主义的殖民话语。但不不变的是两种论述中的二元对立：文明/解放、自主的西方女性与受压迫、落后、囿于超然和非历史化的“传统”的非西方女性。这样的二元对立只有以西方主义为主要参照点才会出现。正如莫汉迪(Chandra Mohanty)指出,第三世界女性在众多学院的、女性主义的话语中再述呈现,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女性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历史化和具独特文化背景的经验自我呈现的产物,用莫汉迪的说法:“姐妹情谊之外,还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Mohanty 1991:68)

在19世纪,受殖女性是英国女性主义者教化活动的对象;在20世纪末,后殖民女性则成了一个称为“发展”的“规划解放”(planned 'liberation')的对象^[5]。这样的解放的种种条件都是由主导的女性主义和“发展中的妇女”话语定下的。“第三世界女性”是西方化女性主义的构想,可以说是在知识和知识生产层面上的话语殖民化。这样的构想压垮了非西方、非现代、未被整合的女性的多样性和历史独特性,同时延续了这种流行的观点:她们是默不作声、被动以及不能真实地或客观地讲述自己的(Mohanty 1991:71-2)。批评“发展中的女性”话语就会被唾弃为非理性、浪漫、怀旧和头脑简单;又或者是在话语的层面上,把所有挑战贬为不合理的低等知识,为的是确保主流话语的霸权统治地位。“第三世界受压迫女性”的形象“存在于普遍的、没有历史的光晕之中,推动着一种殖民主义话语,这种话语执行很具体的权力,界定、规范和维系现存第一和第三世界的种种联系”。(Mohanty 1991:73)

这种普世压迫的观点,更进一步优越化了以现代工业经济的性别经验为基础的种种性别建构(constructs of gender),也赋予了社会、经济和法律平等优先的考虑。这种建构始于15世纪的英国,后延续至各殖民地与后殖民社会,是一种平民阶层的封闭自限

(enclosure of commons)[译者按:作者明显呼应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enclosure)而言。]的漫长过程的结果^[6]。这个封闭自限和工业化的过程切断了个人跟社区以及自然和非人类世界的联系。这个过程带来的是一个一个封闭起来的个体,孤立于其他相似个体之外,相互竞争,并跟一个无生命的、像机器一样的环境对立,从中挖取资源。而且,在发展的范围内,第一世界的女性成为了男性化的“神话一般的标准”。罗尔德(Audre Lorde)很恰当地把她描述为“白种、窈窕、年青、同性恋、信奉基督教和经济稳定”(Lorde 1984:116)。

II

在尝试提出另一种有关个体、女性身体和人跟非人类世界的关系的并不封闭的、非现代的观念之前,有必要批判性地审视一下这个“神话一般的标准”。这样做我们可以特别着眼于那“神话一般的标准”眼剥削非人类世界的态度的关系。

个人主义和女性的封闭自限

人类的孤立单元和享有产权、拥有劳动力在市场出售的自我的出现,是平民阶层的封闭自限和工业生产模式的产物。^[7]人类的身体,被现代性拨归为自然/生物性的领域的人类一部分后,就受到如同自然一样的看待。^[8]正如自然变得毫无生气、没有思想,没有感觉,像一部庞大的机器,身体也被视作和感受为一部机器。这部机器由激情的能量所发动,当被笛卡儿观念中的理性所操控时,能够执行工业生产模式所要求的任务。笛卡儿并不赞成压抑激情,而是要控制它们成为思想的动力(Taylor 1989:150)。由此看

来,是封闭自限和工业化创造出现代的个体,这些个体是社会的原子,极大化他/她的自我利益。伴随着现代个体而来的是一整套现代自由个人主义的语言:权利、平等和自主。一个现实和一套在工业资本主义中运作的语言,令自我和社会成了市场的附属品。

可是女性身体的生育/再生产能力并不像男性身体的再生产能力那样进入市场,女性借她们的理性和意志控制她们在再生产中的劳动,就会再复制一种关系:处于商品化劳动核心的理性和身体的关系。这种做法会唤起再生产商品化的幽灵,而且逻辑上需要通过工资使该劳动的成果异化出去。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男性视他们自己是女性生育/再生产劳动成果的共同拥有者,解决的方法就是把女性限制在家庭之中,再配上家庭性(domesticity)的意识形态,把女性和她们的劳动安全地限制在家庭的范围内和保持在商品化领域之外。这样做也令女性普遍地依赖男性的收入和公共领域。生育/再生产变成了像机器一样的身体的自然/生物性操作,是女性的心智和意志不可掌握的领域,还受制于男性化的医疗科学领域(Martin 1987; Hubbard 1990)。封闭自限和工业化让女性的身体看来像“只再生产生命”,一项缺乏意识、理性和意志的活动。

在西蒙·波伏瓦的《第二性》(一本很多西方女性主义者的经典文本)中,这个现象并没有表述为西方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发展的结果,而是普遍的、非历史化的事实:

在生物的层面,一个人种只能靠重新创造自己去延续下去;可是这样的创造只会导致同样的“生命”重复在更多的个体上。但是男人一方面要保证生命的重复,另一方面要借存在(Existence)[即是目标导向,有意义的行动]而超越生命;借此超越,他创造价值,使所有价值不会重复。犹如动物,自

由和多样化的男性活动是无意义的,因为没有筹划牵涉其中除了他对人种提供的服务外,他所做的是非物质性的。(de Beauvoir 1961:59)⁹⁾

换言之,女性像动物一样,所做的“只是生命的重复”。波伏瓦这些观点对女性的含义很清楚地由人类学家奥特纳(Sherry Ortner)的一篇文章中道出(她要阐述上文所说的“存在”):

换言之,女性的身体令她们看来好像只是再生产生命;相反,男性,由于缺乏自然创造能力,必须(或者是有机会)借技术和象征符号外在地、“人工地”肯定他的创造力。如此一来,他创造了相对持久的、永恒的、超越的物体,而女性只是创造不能恒存的人类生命。(Ortner 1974:75)

当“只再生产生命”这种表述,加上“女性只是创造不能恒存的人类生命”这种观点表述得清楚不过的时候,自然的领域已经失去价值,从心智、文化的领域割裂出去。

由于封闭自限和工业化,女性身体的生育/再生产力量被家庭化,工业化国家的女性主义因此视女性能进入公众领域为一种解放,即是从家庭领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些女性主义者将“生物”、“家庭”、“公共领域”、“理性”、“个体”等众多范畴普遍化了。她们没有认清这些范畴的历史和文化独特性,还把它们套在全世界和所有女性身上。这种立场没有质疑封闭自限和商品化的逻辑;也没有质疑把身体建构成缺乏意识的机器、拥有和控制机器一样的身体独占权和孤立单元的自我的存在等问题;更没有质疑视自然为一部大机器的观念,或者人的心灵是完全割裂于非人类世界的观念。

20 世纪的后半期,当灾难性的环境问题愈发严重之际,“发展中的妇女”的信徒所抱持的信念:在全球广泛传播封闭自限和工业化是有利于世人的,证明只是殖民大业的延续多于解放的先锋。拥护发展的人,正如他们那些决心教化世界的前辈一样,必定陷入一种现代的共同勾结的疯狂之中。正如罗斯扎克(Theodor Roszak)在他的《大地之音》(*The Voice of the Earth*)中所云:

病态的灵魂很可能是病态的家庭和社会的结果;可是,什么是衡量整体社会病态的标准?可以提出很多的标准,但肯定有一条是位置最高的,那就是一种生物品种破坏自己栖息的地方来追求错误的价值,并很着意地对自己所作所为麻木不仁。那是“疯”了,如果这个字有意思的话。(Roszak 1992: 68)

在告别 WID 所提供的分析架构之际, WED 应该特别警觉,不要在概念架构中引入一些有害的历史遗孽,例如“第三世界女性”或“自主、具生产力、独立的女性”等表面上很纯洁的词语。

再生成与生态自我

在(非封闭的)平民百姓的起居饮食养生法中,自我(self)并不是封闭在皮肤之内,而是置身于跟她/他人和非人类世界的种种关系之中。身体不是一部机器,而是灵魂和神祇栖息之所。身体的构成元素同样构成了非人的世界。举例说,印度的本土医药体系“养生吠陀”(Ayurveda)的中心治疗概念是“四季合时”(ritu - satmya)。健康被理解为跟非人类世界的平衡,而疾病是失去平衡。这个平衡取决于个人怎样把环境采纳进自己之内:

医师的任务因此是配处营养、锻炼、气候等方面的起居饮食法,以配合疾病在某一个阶段和因其一个原因而出现,使病人恢复跟生活环境的和谐,即疾病破坏了了的和谐。(Zimmermann 1980:101)

人与非人类世界的这种和谐是一种体现:人的体液是由大气、气候和乡土的气质(humours)、风情(Flavours)和特性所造的,个人通过进食生长在他/她乡土上的食物和药用植物,把它们变成自己的东西。齐默尔曼(Zimmermann)这里引用的来自一本关于养生吠陀的经典梵文专论 Caraka Samhita(公元4世纪)。到了今天,民间,尤其是农村中的男女,仍然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近似的观点。1990年,在奥里萨邦沿岸的一次庆祝月经节中,一位叫狄维(Sisulata Devi)的妇女,这样跟阿普菲尔-马格林说:

庆节的这四日,丈夫不会跟妻子睡在一起。留在村里的男人也会离开女人。因为[女神]正有月事。我们因为她才有月事,也因为这事男人走开。女人留在村里……这个节日就像是我们的月经;我们不会流血,但我们会遵循来经时的种种规矩,因为我们跟她是一样的。她是女人,我们也全都是女人。我们是她的一部分(ansa)。

当地的女神 Haracandi,是那个地区的土地的一部分。参加庆节的一个男人巴利达(Bhikari Parida)这样说:

女人是大母和大地(*pruthibi*)的反映。大母、大地和女人是不同形态的同一样东西。节日的四天里,大地和大母正

在流血……我们认为女人也在流血,不是真的,只是象征性的(*sanketika*)。

女性跟土地的相同特质明显不是象征性或比喻性的。用“象征性”(*sanketika*)这个字是为了澄清女人在节日中流血是什么意思。即是说她们不是“真的”流血,她们只是遵循来经的规矩,就像狄维所说的。但是她跟巴利达谈及女性与土地的关联时,所用的语言可不一样。她说女性是土地的“一部分”;巴利达则说土地和女性是“不同形态的同一样东西”。女性跟土地的关联是实质性,而不是象征性的;这关联体现在女神的形态上。把女神说成是土地和女性的象征是把[它的内涵]变得可悲地贫乏^[10],这一种思考模式复制了意识和心智跟真实、世界之间的二元论。女神[其实]是糅合意识的元素和世界的元素的一种形式。这个形象让主观意识和世界相互渗透(Hillman 1992:7;费南迪斯,私人通信)。换言之,在这个概念中,主—客体和自然—文化二元论消融了。

女神体现了女性与土地合一的现实,同时显示世界的生成和再生成是人性、自然和神圣的活动,其中意识和世界相互渗透。在这个世界中,生物/自然与文化的二元论消失了。同时女性“只再生产生命”的观念也随之而逝。

女人和男人在月经节期间的分离,呼应了一年炎热干旱的季节,土地和雨云的分离。男人是使土地受孕的雄性雨云。人类的活动跟非人类世界的活动相互呼应,带来和谐,也带来健康和生命的再生成。正如炎热干旱季节中土地的休耕期对接着而来的雨季繁殖期是必需的一样,女性在月经休育期间,停止了一切生产活动,对再次恢复生产活动,再与她们的男人结合并孕育生命,也是必需的。正如土地在休耕期间再生它的力量,女性和整个社群也是如此。

社群的再生成也是有效地通过这个节日而达致的。各个社群为四天的庆典提供等量的金钱和食物。这些村庄是多种姓的,其中农民种姓占多数。在庆典中,欢宴和平等是全村人一起搞的,不管什么种姓。大家在大的公众帐篷中一起吃一起睡。正如这些村庄的一个男人说:

来参加这个节庆,来到大母的地方……我们感到我们都是她的孩子,大家都是一样的……这里大家都感到是兄弟,因为她是太母……没有尊卑之别……我们尝试在这里维持和平和秩序。没有人是买了这地的大爷;这个神圣的小树林属于大家。有这些帐篷,看来像是一个村……

节庆在女神 Haracandi 的一座庙所在小树林中举行。圣林周围约莫 60 个村的男人聚合在一起,搭起公众帐篷。女人则留在村里庆祝,接管所有公共空间。

社群的再生成不单止是由故意创造的平等和欢宴畅饮带来的,还有实际的活动在进行。在饮宴中,男人的主要话题是婚事。所有参加节庆的村庄都是一个姻亲圈的一部分。一个女儿是否能找到夫家很大程度视乎她所属那个村的声望。一个村的男人在节庆中的表现直接影响他们女儿婚事的成功机会。这些村民实行村外通婚制(他们从别的村迎娶妻子)。这个节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看看有谁适婚,也看看那个村是否自己女儿好的归宿和好的未来亲家的地方。

女神的神圣小林是社群再生成的地方。它是共同的土地,所有男性村民住在一起。生成和再生成带来不分自然和文化的生命的延续。女性的生育、煮食、照料牲口和任何活动,都跟男人的工作一样,对她们存活世界的生成和再生成是很重要的。人类的活

动不庸于市场和生产。他们是生成和再生成世界更大的宇宙活动的一部分。

结 论

如果用自主、具生产力和“解放女性”的语言来透视上述情况的话,这些奥里亚女人无疑是受传统以及父权所束缚。可是,如果我们认真关注生态恶化,以及清楚认识到现代孤立单元封闭的自我,以及被视为工具的身体,跟剥削非人世界的态度之间,是有关联的,这些奥里亚男女就显得不一样。我们开始察觉到人类和非人类生命的生成和再生成是人类活动的核心,不管男女。女性不再“只再生产生命”,身体和自然不再只是人的工具,不仅是人力和自然资源以及原料的来源。身体、土地和社区都是处于生成和再生成的过程中,需要男女的共同参与。这些社区最关心不是增加生产力,正如一个农民清楚指出:“我来这里是祈求女神给我足够的东西,不太多,也不太少。”一个女人在1992年回村省亲时告诉阿普菲尔-马格林,如果没有女儿,不能献上“处女奉献”(kanya dan),那个人就会被咀咒为 *antiba*, 一种什么也不足够的状态,即是常常匮乏,不能满足需要和欲求。当一个人有无限欲望,也被咒为匮乏(*antiba*)。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范式视为前提的无穷欲望,在这个非商品化的世界会被看成为一种咀咒。这确实是跟经济主义者的假设大相径庭。

其中一个有意思的生态和性别课题的一个特色是,这里没有生育/再生产和生产劳动之分。男女都参与在有意思的生成再生成的活动之中;这些活动存在于不同的层次上:个人、直系亲属、村庄和很多村庄形成姻亲圈的地区。生成和再生成包括男女的活动;也是跟四季节奏协调的活动。这交响协奏并非“模仿自然”,而

是一种存活在世的方式,其中并无人类和非人类的明确分界,人类的福祉跟土地的福祉血脉相连,两者同质共体。

我们尝试显示非西方女性是怎样被殖民主义者、维多利亚女性主义和她们的当代传人所认知的。这种观念源自现代主义对人,尤其是女性身体的建构。在第二部分,我们尝试将这些现代主义前提假设联结上人类跟非人类世界的关系。最后,我们简单地提出另一种存活方式,其中女性的身体并非被看成资源,而是跟社会—文化过程分不开的。

换言之,如果我们不去质疑像奥特纳和波伏瓦那样的有关人格和女性身体的现代主义构想,我们就会最终把女性的生成能量否定为“只再生产生命”。这样导致很多女性主义走向一种男性化和现代主义观念所构想的“解放”,也令生态和性别的问题更难整合在一起。质疑这些种种构想,我们就可望更深刻地思考生育/再生产的概念,以及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关系。

注 释

- [1]有关这个转移,参考 Harcourt(1994)的首章。
- [2]西蒙谨向佩奇(Eileen Page)致谢。她在讲课中提出了深具启发性的有关课题的讨论。
- [3]有关发展论述中“贫穷”概念的运用,参考拉内马(Majid Rahnema)在《发展字典》(*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中的条目。(Wolfgang Sachs ed. London:Zed Books,1992)
- [4]正如收录在 Harcourt(1994)一书中的文章显示出,她从那时间开始也参与了从WID话语到WED话语的转移。
- [5]关于发展的“规划”见《发展词典》(*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中埃斯科巴(Arturo Escobar)的条目。
- [6]关于发展是一种封闭自限,参考《谁的共同将来?》(*Whose Common*

Future?)一文,载 *the Ecologist*, vol. 22, no. 4, Aug - Sept. 1992。

[7]有关劳动商品化和孤立殖民的自我的出现的关系,参考:《女性的血:挑战发展的话语》(*Woman's Blood: Challenging the Discourse of Development* by F. Apffel Marglin with P. C. Mishra in *The Ecologist*, vol. 22, Jan - Feb. 1992。)另:《性别与孤立单元的自我:当聆听属民的声音时确定率领的位置》(F. Apffel - Marglin 'Gender and the Unitary Self: Locating the Dominant when Listening to the Subaltern Voice' in Gloria Goodwin Raheja (ed.) *Oral Tradition*, special edition on Gender in South Asia, forthcoming)。

[8] 创出这种世界观的最著名的是笛卡儿的著作。

[9] 斯佩尔曼(Elizabeth Spelman)在《非本质女性》(*Inessential Woman*)一书中指出西蒙·波伏瓦是怎样从思考像她自己一样的白种小资产阶级女性的处境,变成是所有女性的[共同处境]。她指出波伏瓦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男性知识分子嘲笑女性知识分子不能普遍化事物。

[10] 阿普菲尔-马格林要感谢费尔南德斯(Eduardo Grillo Fernandez)在私人通信中提出这一点。费尔南德斯曾广泛研究安第斯山脉地区(主要是盖丘亚族和艾马拉族)的土著世界。他表述本土安第斯人跟世界的关系的其中一个重要片语,是他们跟非人世界(石头、森林、河流和泥土)的对话。最能表达他们跟世界的关系是这个片语:*criar y dejarse criar*。这很难翻译,近似的意思是:“培育世界[正如培育孩子和谷物],也让世界培育我们。”参考 Eduardo Grillo Fernandez *et al.* *Desarrollo o Descolonización en los Andes?* (1993)和其他人的研究。

参 考 书 目

Ahmed, Leila (1992) *Women and Gender in Islam*.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pffel - Marglin, Frédérique (forthcoming) 'Rationality, the Body and the World: From Production to Regeneration' in F. Apffel - Marglin and S. A.

- Marglin(eds) *Decolonizing Knowledge: From Development to Dialogu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Apffel · Marglin, Frédérique with P. C. Mishra (1992) 'Woman's blood: Challenging the Discourse of Development', in *the Ecologist*, vol. 22.
- (forthcoming) 'Gender and the Unitary Self: Locating the Dominant when Listening to the Subaltern Voice', in Gloria Goodwin Raheja (ed.) 'Gender in South Asia', special edition of *Oral Traditions*.
- Bordo, Susan (1989) 'The Body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Femininity: A Feminist Appropriation of Foucault', in Jaggar and Bordo (eds) *Gender / Body / Knowledge*.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Brunswick.
- Boserup, Ester (1970) *Wome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 Bunch, Charlotte and Roxanne Carillo (1990)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Women in Development', in Irene Tinker (ed.) *Persistent Inequalit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pp. 70 - 82.
- Buvinic, Mayra, Margaret Lycette, and William McGreevey, (eds) (1983) *Women and Poverty in the Third Worl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Maryland.
- Buvinic, Mayra and Sally W. Yudelman (1989) *Women, Poverty and Progress in the Third World*.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New York.
- Chaudhuri, Nupur and Margaret Strobel (1992) *Western Women and Imperialism: Complicity and Resistanc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 Cowan, Minna G. (1912) *The Education of the Women of India*. Fleming H. Revell co., London.
- DeBeauvoir, Simone (1961) *The Second sex*. Bantam Books, London.
- Duden, Barbara (1991) *The Woman Beneath the Sk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 Escobar, Arturo (1992) 'Planning', in Wolfgang Sachs (ed.) *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 Zed Books, London and New Jersey, pp. 132

- Etienne, Mona and Eleanor Leacock (1980) *Women and Colonization*. Praeger, New York.
- Franklin, Sarah, et al. (eds) (1993) 'Precreation Stories', in *Culture as Science*, Vol. 17, Summer
- Grillo Fernandez, Eduardo et al. (1993) *Desarrollo o Descolonización en los Andes? Proyecto Andino de Tecnologías Campesinas*, Lima.
- Haraway, Donna (1989) *Primate Visions*. Routledge, New York.
- (1991)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Routledge, New York.
- Harcourt, Wendy (ed.) (1994);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Zed Books, London & New Jersey.
- Harding, Sandra G. (1986)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N.Y.
- Hillman, James (1992) *The Thought of the Heart and the Soul of the World*. Spring Press, California.
- Hobsbawm, Eric and Terence Ranger (eds) (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 Hooks, Bell (1981) *Ain't I a Woman?* South End Press, New York.
- Hubbard, Ruth (1990) *The Politics of Women's Biolog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Brunswick.
- Jordanova, Ludmilla (1989) *Sexual Vision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Madison.
- Keller, Evelyn Fox (1992) *Secrets of Life, Secrets of Death*. Routledge, New York.
- Lorde, Audre (1984) *Sister Outsider*. South End Press, New York.
- MacKenzie, John M. (1984) *Propaganda and Empire: The Manipulation of British Public Opinio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 U.K.
- Mani, Lata (1989) 'Contentious Traditions: The Debate on Sati in Colonial India', in Kumkum Sangari & Sudesh Vaid (eds) *Recasting Women:*

- Essays in Colonial History*. Kali for Women, New Delhi.
- Martin, Emily (1987) *The Woman in the Body*. Beacon Press, Boston.
- Mohanty, Chandra Talpade (1991) 'Under Western Eyes', in Chandra T. Mohanty, A. Russo-Lourdes Torres (eds)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 Ortner, Sherry (1974) '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is to Culture?', in Michelle Rosaldo and Louise Lamphere (eds) *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alifornia.
- Rahnema, Majid (1992) 'Poverty', in Wolfgang Sachs (ed.) *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 Zed Books, London and New Jersey, pp. 116 - 31.
- Roszak, Theodor (1992) *the Voice of the Earth*.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 Sachs, Wolfgang (ed.) (1992) *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 Zed Books, London and New Jersey.
- Sen, Amartya (1990) 'Gender and Cooperative Conflicts', in Irene Tinker (ed.) *Persistent Inequalit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pp. 123 - 49.
- Sen, Gita and Caren Grown (1987) *Development, Crisis, and Alternative Visions*.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 Sinha, Mrinalini (1992) 'The Politics of Gender and Race in the Ilibert Bill Controversy, 1883 - 1884' in Nupur Chaudhuri and Margaret Strobel (eds) *Western Women and Imperialism: Complicity and Resistanc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pp. 98 - 118.
- Spelman, Elizabeth (1989) *Inessential Woman*. Beacon Press, Boston.
- Strathern, Marilyn (1992) *Reproducing the Future*. Routledge, New York.
- Taylor, Charles (1989)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 Ware, Vron (1992) *Beyond the Pale: White Women, Racism and History*. Verso Books, London.

Zimmermann, Francis (1980) *La Jungle et le Fumet des Viandes : Un Thème Ecologique dans la Médecine Hindoue*. Gallimard, Paris.

关键词

发展(development)

发展,拉丁文之字根乃舒展、展开之意。一般来说,发展指生物演变、成长之阶段,没有好坏之分。到了18—19世纪,发展在西方被用来解释社会历史之变化,其演进犹如大自然定律,而且意思包含由简单变为复杂、低等变为高等、差劣变为优越。

二次大战后,西方思想家和决策者,假设第三世界人民在得到帮助后,便能够循序渐进地与西方工业文明国家看齐。1949年1月2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上任,就职演辞中便宣告发展时代(the era of development)之来临:“我们务必开展一项创举,将科技及工业上取得之先进成果,惠及欠发展地区(underdeveloped areas),以促进其改善。”

发展(development)虽然盖上所谓民主政治与公平经济之公章,仍难掩其名为发展,实则延续殖民关系之意图。这种发展话语其实蕴藏在竭力延续而非改变殖民式层级关系的、种族中心的、具破坏性的殖民话语之中,把第三世界定为原始落后的“他者”,而未

-
- ✧ 主要参考改写自 Sachs, Wolfgang ed. (1997): *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 - A Guide to Knowledge as Power*, London & New Jersey: Zed Books Ltd.

发展之原因是依赖、保护主义、缺乏市场、贪污、缺乏民主或企业精神等等。

此发展话语之前题乃将全球分为发展与欠发展、落后贫穷与先进富裕,在这种界划底下,全球三分之二人口属于欠发展地区。发展被视为一种线性的进程,一个国家或民族从“发展不足”、“落后”、“传统”、“原始”的初阶向前进,直至“全面发展”,即现代化、(经济)理性、工业化的终阶。西方任何一方面的生活都比第三世界优越,以“进步的”西方社会为准绳,贬低第三世界人民和文化,把全球现代化等同世界发展,于是破坏、鄙视、抑制原住民技术、知识、实践、生活方式的过程都被合理化。

50年代,人人迷信全面工业化乃解决贫穷的万灵药,发展的统一技术性标准为预期寿命、成人教育程度、国民生产总值(GNP)。这种经济理论架构以国民生产总值,或量化数字为发展之指标,其假设是匮乏(scarcity):人的欲望无限,而资源匮乏,所以必须发展。

60年代,工业化之发展无法解决贫穷、社会不公平、贫富悬殊等问题,联合国推行首个发展十年之行动计划,指出发展并非单是经济增长,还包括生活素质:“欠发展之困境非在于增长,而在于发展……发展乃增长并改善生活素质,在社会、文化及经济上均有改变,质量并重,人民生活素质得到改善!”

第二个十年计划,则分散为数个重点议题:环境、人口、饥饿、女性、就业、栖息地等,但如何分主次轻重,仍然议论不休。踏入90年代,北半球国家讲求重新发展(redevelopment),将以往的发展政策转移、取缔或替代,特别针对核电厂、污染环境的工厂、有毒杀虫剂、钢铁生产、微晶片制作等。相反,南半球国家政权为了不甘落后于人,除了重蹈北半球以前的发展政策,另外照单接收北半球的“垃圾”,包括核废料、违禁品、污染物以至各种有关“发展”

“进步”等意识形态，这种发展模式仍难脱不平等的殖民关系，而且发展遂成为专家之“特有知识”与“工作”，似乎群众没资格参与，只要接受专家安排便可以。

现在正在形成的新的共识似乎是：发掘传统纷纭的生活文化，肯定每个民族有权保存自己的文化、历史、世界观，又探索切合人民需要的、与大自然共存之发展模式，鼓吹在本上知识和文化之上，将“传统”和“现代”之智慧互相结合。然而，现实上真能出现这样两存其美的美好模式吗？

进步(progress)

现代社会对“进步”深信不疑，认为透过科学与技术，人之理性便可掌控现实。在进步的旗帜下，世界各地建国运动迭起，而其频催迎合经济规律及其法规，便体现这渴求进步的欲望，进步的信念逐渐成为一种现代使命。

进步的信念，令人憧憬未来是充满希望、丰足、自由、公平，但这美丽口号的核心却往往是种族中心和阶级的严格划分，换言之，是一堆抽象概念组成之乌托邦：单一、线性、科学、金钱。为抚平求进不落伍的焦虑，第三世界纷纷以西方国家为模型，如巴西的旗帜便写上“秩序与进步”的字句，在19世纪末又成为墨西哥独裁者巩固国族政权之口号。

20世纪中叶，欧美中心话语将不文明、没受“教育”、落后的地方重新命名为欠发展(underdeveloped)。在进步之信念下，古老传统被定为非理性、非科学，甚至一文不值。原来悠长的历史文化，原应能够令普通人在面对市场、工业、国家的时候，还能保留自尊与自信。但是，在各种的压力下，普通人逐渐与土地割裂，放弃祖祖辈辈留传的智慧，沦为工业的工人、市场的消费者、国家的市民。这些都是在“进步”的名义下完成的。

资源(resources)

资源,原来意思是生命,其字根是拉丁文一动词:surgere,令人联想不断从地下涌出水的活泉。Re-source,古老的意思除了感激大自然生生不息、盎然勃勃之创造力,也说明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存,人为感恩于大自然之慷慨而小心翼翼不扼杀大自然之命脉。

可惜,现代人不尊重大自然,视天然资源为可以肆虐地攫取变卖的、有利可图的商品,而不是活生生的、周而复始的生命循环、节奏。战后的所谓“发展”,以工业化、商品经济为主导,追求物质利益及资本积累,不但恣意破坏生态平衡,连大自然或者说大家共有的天然财富,都被少数人控制、掠夺、威胁原住民的生计。

例如 17 世纪,英国皇家虽然拥有森林,但农民习俗上可以从森林获取生活所需。不过,随着资本主义兴起,皇家推行私有产权法律,以喂饱工商业之口福,于是圈地、伐木,将农民赶尽杀绝,导致 1630—1940 年代农民革命迭起。可堪玩味的是,私有(private)的拉丁文词根乃“掠夺”的意思。不久,霸占共有天然资源的政策也施行于殖民地。在印度,首部印度森林法(Indian Forest Act)于 1865 年通过,授权政府将森林及荒地划为官地,这也是今天所谓“科学管理”森林之始。1878 及 1927 年又推行森林法,将土著赖以生机的资源变卖,结果全印度掀起森林非暴力运动(forest satyagrahas),但抗议运动往往被英国殖民政府血腥镇压。印度独立之后,为了工商业发展,森林政策照样推行,不但生态环境遭殃,原住民部落更陷人生死存亡之局面,而不得不顽抗。1970 年代,在喜马拉雅山区,Garhwal 妇女为了保护与其共生之森林,不使其落入官商大财团之手,一个挨一个抱着、守着树木,这便是著名的 Chipko 抱树运动。

现代科学革命改变人类面貌,以为摆脱了愚昧无知,可是越搞

科学改革,越发现愚昧无知的正是狂妄自大的人类,也许要人类知道何谓自食其果,非得到了如某原住民所说的:

“只有砍伐最后一棵树木,捕杀最后一条活鱼,污染最后一条清河后,你才会发现金钱根本不能吃。”

生活水平(standard of Living)

1949年6月24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国会公布四点大计,说有必要“帮助经济上发展不足地区的人民提高生活水平”。他强调的目标广为现代国家接受和视为理所当然。早在1945年,联合国宪章第55条清楚写明:“全球目的就是‘提升生活水平’。”这里的“生活水平”指物质富裕,乃一个可量度的概念,与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相似。

Jean Fourastie 在1958年写道:“所谓生活水平是从平均国民收入扣除购买的物品数量及服务计算出来的。”经济学者使用生活水平的概念,是因为他们将生活模式之差异转变为生活水平高低之分,犹如将缤纷色彩之彩虹简化为单一颜色。

在马尔萨斯、李嘉图、马克思之古典经济理论中,生活水平原来指不可简约之最低收入(irreducible minimum income),或仅可糊口之生活水准,或可再生产之人力成本。1934年出版之《社会科学辞典》,生活水平仍是这个意思。后来这个词慢慢指可欲求的生活方式或正常的生活条件。1945年2月,经济学者戴维斯(Joseph Davis)在美国经济联合会主席致辞中,谈到的生活水平便是这个意思。

这个词从描述现实到带有规范意味(制定一套标准),可窥见欧美中心话语如何从着重生活素质变成只看重数据的转变:生活水平不但可量化,而且可比较。早在1940年,Colin Clark便对不同国家的收入作出比较。1948年《全球人权宣言》扬言人人平等,

这种抽象的统一主义吁求人人都平等,而国民生产总值便成为量度世界平等与否的准则。

国家之间的差异被视为现代化之延误,既不公平又不可接受,于是设法消除。国民生产总值乃生活水平之基本指标、量度发展之单位,随后更加入一些标准,虽然不以金钱量度,但仍以量化为主,由预期寿命之长短到每平方米有多少医生的数字都有。1973年世界银行麦蓝马拉(Robert McNamara)著名之演说便吁求更多指标,除了国民生产总值之增长,还有失业率下降、穷人收入增长等等,简言之,世界银行采用一种全面量度经济活动之政策。早在1954年联合国报告,便制定12项生活水平之国际标准:

1. 健康
2. 食物与营养
3. 教育,包括识字与技能
4. 工作条件
5. 就业环境
6. 整体消费与储蓄
7. 交通
8. 房屋,包括家具设备
9. 衣服
10. 娱乐、休闲活动
11. 社会治安
12. 人身自由

生活水平的概念乃西方、现代性、发展之产物,主要环绕“需要、匮乏、工作、生产、收入、消费”等层面,这些概念被视为可量化,目的追求“人人平等”,却同时鼓吹竞争。生活水平的概念着重数据,却忽视不能量度的素质,而且排斥各式各样的社会价值,变为单一的个人生活追求目标。

贫穷(poverty)

“贫穷”乃一种特定文明的建构物,既与资源分配不均有关,也同时源于文化上的偏见。

在9世纪的欧洲,“穷人”(pauper)是指逍遥自在的人,惟有权贵对其自由构成威胁。11世纪,“穷人”乃免税财产之拥有者、到处流动之商人凡非战士皆包括在内。简言之,“穷人”不会不受尊重,只不过居无定所。

也有些人自甘清贫、两袖清风、漂泊流离,这种“贫穷”被视为清高,而非下贱。直至商品经济膨胀,特别是19世纪以来的欧美地区城市化导致成千上万缺乏资源的穷人,在金钱至上的统识文化下,一切以金钱与物质财产界定贫与富,于是贫穷的前题被认为就是缺乏、匮乏。随着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这种有关贫穷即物质匮乏不能满足“无限的欲望”的文化偏见,逐渐在全球有关发展的话语中取得统识的地位。在这种文化偏见的统识之中,穷人之所以是穷人,正是由于他们不能,也不应像富人一般生活,而富人的生活方式,则被赋予更高的社会价值。

换句话说,现代的“贫穷”观念,基本是将生活“经济化”。1948年世界银行之报告,将全球贫穷与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挂钩,年均收入低于100美元,就被界定为贫穷、欠发展或未发展。以抽象的数字来计算评核贫穷,赋予了富裕国家有责任帮助穷国提高生活水平的理据,由此世界“精英”达成共识:全球贫穷之病源乃欠发展、收入不足;疗方是扩张经济与提升技术。于是,专家、政客、计划者、官僚、社区组织者乃至人类学者纷纷成为扶贫灭穷的专家,不断参与建构有关世界贫穷之话语与实践。

美国总统杜鲁门著名之四点大计宣布:“[穷人之]经济生活原始又落后……其贫穷对其自身甚至繁荣地区均造成障碍与威胁。”

因此,大量生产、发展、援助、引入科技知识被视为“解决之道”及“通向繁荣与和平之窍门”。即使新的工人阶级,尤其城市的受薪阶层,都只是集中争取有限的目标如就业、提高工资、享用更多公众服务,他们透过工会去争取,但完全忽略在话语层面上的抗争,也没有深入反思什么才是“贫穷的生活”。另外,第三世界政权,假贫穷、发展不足之名义,得到更多外国资金,以巩固其政权,助军队、警察、大财团为虐。

在西方现代文明的视野中,经济贫穷乃“耻辱与苦难”;一些自甘清贫,过简朴生活,认为远离物欲乃一种福气和可追求更高的境界的哲学却被贬抑,例如伊斯兰教之苏非派禁欲神秘主义(sufis)、印度教遁世者(sanyasin)、甘地主义者(Gandhians)等。争相赚钱不但成为生存的最重要目的,也成为了新社会的道德依据。为对应这种现代文明,世界各地均不断出现不同的抗争运动,其中一个主要目标是回归本源,扎根于传统文化,发掘及更新民间智慧。例如印度 dharma 探索微观之“我”与宏观之“宇宙”之关系,以“人”与“生活”为基本;Maravodaya,意即人之觉醒,结合哲学与实践,从自我醒悟开始,推广至家庭、社区、社会,目的是建立“自律与爱”的社会;Swadhyaya,意即自我认知,自我发现,兴起于50年初,深信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位神。这些哲学均追求内在转化(inner transformation)、道德纯洁、自我认识。穆罕默德之名言也说:“贫穷乃吾之自尊与光荣”。其他如伊斯兰教、西方解放神学等认为内外自由之条件都是互相紧扣的。

现代欧美中心的文明技术,只有一幅宏观蓝图,技术官僚不断想什么应该做、如何做,任何事都切合蓝图的规划,以一堆堆枯死的数字为量度单位,其基础是一种排他的知识系统。或许参考欧美中心以外的文化生活,重新思考人类之生存状态,有助直面现代文明的种种局限。

需要(needs)

根据1892年出版的《牛津英语字典》,need有两种意思,一是有需要做某些事情;二是皇室令下的要求。到了1929年出版的《牛津英语字典》,出现了第三种意思:生理或身理之需要,为满足需要而行动起来。

需要与匮乏、发展、贫穷等字眼密不可分。1961年美国总统一肯尼迪在就职典礼上宣布:“全球一半住在草棚与农村的人挣扎摆脱苦难……我们承诺帮助他们自力更新,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们爱他们的选票,而是这样做是正确的。”60年代,在美国主流话语中,贫穷乃必须摆脱之命运。贫穷是不公平之社会与经济条件之结果,造成现代教育不足、技术落后,犹如瘟疫一般,非治疗不可。

1962年联合国开始将“贫穷”这概念操作化。联合国秘书长将贫穷指为那些生活在可接受之最低标准之下的人,量度标准是国民生产总值(40年代开始广受应用)。所谓消灭贫穷计划,则以评估何谓“需要”为基础,“需要”由一堆抽象数字的制定,例如联合国发展方案(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在70年代之金科玉律,就是八成资源一定要给予“有需要的”、发展不足之国家,即人均收入低于300美元的国家;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则着眼于文盲数字、电台、书籍、报纸的数量;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的焦点是计算医生、护士、医疗中心的比例;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FAO),则量度卡路里、蛋白质的摄取量。“需要”变为一堆抽空的数字,脱离特定的、本土的文化与社群脉络。

1973年世界银行主席宣称：“用单一的国民生产总值来量度[社会的]进步，会使收入分布之不平等更加恶化。”因此世界银行发展政策之首要目标就是“打击绝对贫穷”，这种纯粹由经济增长衡量的、影响着“发展中”国家近二亿中百分之四十的人的“贫穷”，被认为是贬低“人之尊严”，换言之，“人之尊严”只在于技术上可量度、并以金钱来计算之“需要”能否获得满足，而这“需要”则由社会科学家与官僚来界定。

吊诡的是，“需要”成为推行消灭贫穷政策的基础、无上权威的标记，但对大多数政客、官僚和经济学者来说，具体社群中纷杂多样的“需要”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欲想”、“优先次序”和“需求”等。吊诡的是，这种有关“需要”的抽象处理，也许决不是大部分人所“需要”的。